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第三辑

江阴临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江阴市档案局

主编

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

缪荃孙评传



孙文阁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缪荃孙评传 / 孙文阁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5.11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 第 3 辑)
ISBN 978-7-5496-0091-5

I. ①中… II. ①孙… III. ①缪荃孙(1844 ~ 1919)
— 评传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6027 号

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 (第三辑)

主 编 / 卞 宏

责任编辑 / 唐 麒

乐渭琦

装帧设计 / 马红玲

出 版 人 / 桂国强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无锡童文印刷厂

版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00 × 1000 1/16

字 数 / 950 千

印 张 / 98

书 号 / ISBN 978-7-5496-0091-5

全套定价 / 198.00 元

编 委 会

名誉主任：蔡叶明 徐冬青 龚振东

主 任：赵巧新

副 主 任：邱晓东 赵海鹰

主 编：卞 宏

副 主 编：张 平

编 委：赵巧新 卞 宏 邱晓东

赵海鹰 吴红敏 缪红珍

张 平 张 明 韩秀军

总序

2012年年底至今,江阴市档案局和有关镇、街道合作编纂出版了《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计三辑。第一辑收入五册:《上古圣贤季札》《徐霞客评传》《铁面仁心杨名时》《国乐之魂刘天华》《抗日英雄朱松寿》。第二辑收入五册:《东林英烈李应昇》《矢志抗清的老贡生黄毓祺》《“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刘半农》《中国植物育种学家叶培忠》《现代文学家胡山源》。现出版第三辑,收入三册:《清代小说家屠绅》《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缪荃孙评传》《音乐教育家刘北茂》。

屠绅(1744~1801)字贤书,号磊砢山人。清江阴璜土人。乾嘉间小说家。13岁即为秀才。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官云南师宗县知县,迁甸州知州。嘉庆二年(1797)任广州通判,嘉庆六年(1801),以候补在北京得暴病身亡。屠绅所著小说有《蟬史》《六合内外琐言》,杂说《鸛亭诗话》,诗集《笏岩诗抄》,志怪书《琐蛞杂记》。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筱珊,晚号艺风。清江阴申港缪家村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早年曾供职史馆,任庶吉士、编修、总纂等。后主持钟山书院、龙城书院、南菁书院。1907年创办江南图书馆,任总办。1910年奉调北京创办京师图书馆。被誉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之父”。1915年任清史馆总纂。此外,还总纂《江苏省通志》《江阴县续志》等。晚年寓沪,刊印丛书。1919年死于上海寓所。缪为清季著名金石学家、藏书家、目录学家。所著有《艺风堂文集》《续集》《藏书记》等。音乐教育家刘北茂(1903~1981)原名寿慈。

江阴城内西横街人。192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英文系，先后任暨南大学、北京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副教授，从事莎士比亚作品选读、诗学、作文指导等专业英语课的教学和研究。为继承二哥刘天华“改进国乐”的遗志，刻苦钻研二胡、琵琶演奏技巧，从事民族乐曲的创作实践。全力投入音乐教学、创作和演奏工作。建国后，任中央音乐学院、安徽艺术学院、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创作《太阳照耀到祖国边疆》《欢乐舞曲》《千里淮北赛江南》等百余首二胡独奏曲。

这些长篇人物传记，是根据散落在浩瀚档案之中的文化遗存加以挖掘、整理而编撰出的。这不仅仅是实践建设“文化江阴”的事业，因为这些震古烁今的江阴先贤，用江阴人的精神，参与创造了中国辉煌的历史文化，使之成为人类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套书冠以《华夏文史博览书系珍藏版》的丛书名是适当的，这些先辈的奋斗历程，也确实能够成为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人生启示录。

编者

2015年9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缪荃孙的学术生涯	13
一、书香门第	13
二、幼年教育	15
三、青年的读书经历	16
四、早年的科举及交游经历	17
五、早年居京的仕宦与学术生涯	19
六、山东泮源书院的学术生涯	22
七、湖北短暂的讲学与学术生活	25
八、江苏钟山书院的讲学与学术活动	26
九、20世纪初期的教育与学术生活	29
十、晚年的寓居与学术研究	31
第二章 创建近代图书馆	37
一、创办江南图书馆	37
二、创办京师图书馆	41
三、创办两大图书馆的历史意义	45
第三章 缪荃孙的藏书与刻书	47
一、书籍与金石碑拓的收藏	47
二、书籍的刊刻	52
第四章 缪荃孙的文献学成就	69
一、目录学成就与目录学思想	69
二、版本学成就	76

三、缪荃孙的版本学思想	82
第五章 缪荃孙方志编纂的成就	96
一、《顺天府志》与《昌平州志》的编修	96
二、纂修《湖北通志》	101
三、纂修《江苏省通志》及《江阴县续志》	101
四、缪荃孙的修志思想	103
五、缪荃孙修志的特点	104
第六章 缪荃孙史学成就	111
一、担任史官与官方史书的修纂	111
二、当代史的研究和编纂	114
三、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晋书》、《辽史》的补编	120
第七章 缪荃孙图书馆事业的继承者	128
一、缪荃孙在江南图书馆的继任者陈庆年	128
二、孙毓修与中国图书馆学第一部专著	130
三、孙毓修与“杜威十进分类法”	133
四、柳诒徵与江苏国学图书馆	134
结语	141
附录	
缪荃孙年谱	145
缪荃孙著作	182
主要参考文献	236

前言

—

公元1905年7月16日，清朝政府派遣了以载泽和戴鸿慈为首的“五大臣”赴西方国家和日本进行政治考察，“以期择善而从”。这是满清政府实行政治改革的一步重要举措，从而拉开了“预备立宪”的序幕。就考察面而言，名为政治考察，实则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军事、公共设施、社会福利，方方面面，无不涉及。特别是有两路考察团访问了许多图书馆，考察团回国后不久即奏请开办图书馆，在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历史上，留下了值得记录的一页。

“图书馆”一词并非中国固有名词。中国古代藏书之地概是用亭台楼阁种种名词来称呼，没有用“馆”字的。“图书馆”一词来自日本。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于19世纪60年代先后三次游历了西方国家，并写出对日本向西方国家学习产生了很大影响的《西洋事情》一书。书中首次向日本读者介绍了西方国家的图书馆。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将原旧幕府的昌平学文库和红叶山文库所藏书籍移至浅草公园设书籍馆，1874年浅草文库并入。1880年，浅草文库改名为东京图书馆。此为图书馆一名的由来。1885年，东京图书馆移到上野公园，所以又称上野图书馆。1896年，日本帝国议会通过建立帝国图书馆的议案，翌年东京图书馆改组为帝国图书馆。在1880年，图书馆正式定名之前，我国近

代学者王韬曾参观过书籍馆及浅草文库。王韬还为此赋诗一首：“夙昔同文本一家，泮宫制度似中华。极知洙泗宗风远，不独蓬莱胜地夸，百首逸书逃世外，千年秘籍出瀛涯。琅嬛何幸身亲到，眼福于今十倍加。”将书籍馆比作天帝藏书之所，说明书籍馆给王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近代著名学者黄遵宪出使日本期间（1877—1881）曾经写下《日本国志》，其中，介绍当时日本有官私书籍馆十六所，藏和汉书凡二十六万九千六百余卷，洋书十八万二百余卷，馆中各有章程等等情况。北洋机器局的总办傅云龙游历日本时，几次游上野浅草。1888年1月3日，为撰写日本图经，搜罗书籍，路经上野，但此时他并未指明是否到了图书馆。两个月之后，即3月25日，他却明确记述到了“图书馆”。虽然未见他对日本上野图书馆做进一步的介绍，但他毕竟是较早使用“图书馆”这一名称的中国人。

在五大臣出洋考察之前，已有不少中国人参观、访问过西方图书馆。大体是三方面的人：第一类是政府访问团。如1866年，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回国度假，他的中文老师斌椿率领同文馆学生张德彝等人随同他一起前往欧洲国家访问。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派使臣访问西方国家。在这次访问中，他们在西方国都参观了不少反映西方古代近代文明的文化事业，其中包括图书馆。第二类是驻外使团的成员。如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臣郭嵩焘，在他驻外两年多时间的日记里，有几篇记录了他参观西方国家图书馆的情况。此外出使英、法、俄等国的曾纪泽，出使英、德的刘锡鸿，出使德国的李凤苞等均对西方图书馆事业有不少记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出使英、法、意、比四国的薛福成（1890年出使），他于西洋各事观察较细，常做一些统计，对图书馆有过详细记载。根据他对欧洲一些主要国家图书馆的统计，法国当时有图书馆500座，藏书459.8万册；英国200座，藏书287.2万册；俄国145座，藏书95.3万册；奥国577座，藏书547.6万册；意大利493座，藏书435万册；普鲁士398座，藏书224万册。他的统计准确与否姑且不论，他毕竟是较早对西方图书馆事业做统计调查的中国人。但他只注意了藏书，却未注

意图图书馆的对公众开放，殊为遗憾。第三类是留学生。在中国的出洋留学生中，最早赴国外留学的中国学生容闳在第一次留美期间，曾管理过图书室。这恐怕是第一位中国人在国外参与图书馆的工作。

二

1906年2月25日，清政府考察团尚未到达欧洲，德国著名汉学鼻祖福郎克就在《科隆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格外醒目：“中国访问团学习外国的国家管理”。文中介绍了光绪派大臣出洋考察的上谕和四位考察大臣，称他们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 and 经济体系，特别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 and 经济体系结合中国的情况移植到中国去”。可见此次考察影响之大。根据德国国家档案的记载，中国政府制定的计划，考察团首要的任务是考察国家的法律和宪法，但考察团对其他方面也怀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德方并不是将德国的国家管理直接介绍给考察团，而是安排他们访问了许多各类单位，其中包括皇家图书馆。由此说明，西方一些国家也将图书馆事业作为向考察团介绍的方面之一。

1906年1月31日，清政府考察团的戴鸿慈和端方以及当时的驻美大臣梁诚率领代表团参观了美国国会图书馆。3月16日，戴鸿慈等人访问了柏林皇家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在中国考察团参观皇家图书馆的前两天，德国大学部就通知图书馆将有一个中国考察团参观该馆，希望准备一个讲话并配备中文翻译。

德国的陪同人员在后来关于中国考察团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的：“考察团顾不上疲劳，对所有的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在皇家图书馆和科学馆，考察团的领导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中国考察团访问德国皇家图书馆时，正看到该图书馆的扩建工程，这也给考察团留下深刻的印象。考察团大臣载泽到达英国之前，英国政府担心考察团走马看花，无实用，每以如何考察询问中国驻英使馆。驻使大臣汪大燮为此聘

请英国专家分专题为考察团讲解。在讲学部规制时，英方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科学与艺术教育三方面讲解。其中强调中央政府于科学及艺术教育甚为注意，赞助方法之一就是建设各博物馆及伦敦科学大会堂、皇家艺术学校。科学博物馆是指大英博物馆，分国家图书馆和博物馆两个部分。在他们参观的图书馆中，不少藏有中文图书，如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藏中国书不可胜数。荷兰的莱顿大学，藏中国书六千余卷。据有关学者粗略统计，考察团大大小小共参观了二十多所图书馆与阅览室。当然，对这二十多所图书馆与阅览室的参观考察，免不了有粗有细，有轻有重，有详有略。从数量上看，他们参观的图书馆大部分是学校图书馆。考察教育是出洋考察的主要任务之一，将参观学校图书馆作为考察学校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自然之事。但从质量上看，似乎对国家图书馆颇为留意。

如此有目的考察西方图书馆事业，而且一次竟然参观访问了如此多的国家的图书馆，也几乎涉及了各类图书馆，不仅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史无前例，就是放在今天，也是不多见的。我们如果分析其原因，其主要原因应该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考察团出国前，国内已出现了中国传统藏书机构向现代公共图书馆转变的趋势。安徽、浙江在省城内筹建大藏书楼，绍兴士绅徐树兰以一己之力办“古越藏书楼”，湖南、湖北图书馆的筹建得到历任巡抚的支持。表明传统藏书向省级现代公共文化事业过渡的趋势业已产生，并且得到官府的支持，呈现以公益为主，官绅合办的特征。第二，应进行教育改革，特别是普及教育，以提高国民素质。这已经成为中国国内的主要趋势，大家也已经认同，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同年底，政务处奏准设立学部，开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是预备立宪的首要任务之一。从长期失败的教训中，朝野人士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任何改革必须与提高国民素质联系在一起。而建设图书馆正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手段之一。第三，在考察团成员中也不乏热心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的人。考察团五大臣之一的端方在任湖北、江苏、湖南巡抚期间，于教

育、文化事业方面颇多建树。1904年春，他在奏陈“湖北学堂筹建完备摺”中称：“又创立图书馆一所，专庋古今中外有用书籍、图画之属，以备学者浏览。”这是目前所见第一座以图书馆命名的文化机构。他担任湖南巡抚期间又参与筹建湖南图书馆，并派人赴东瀛调查图书馆办法。考察大臣戴鸿慈在欧洲一登岸，便接到朝廷的电文，补授礼部尚书，德方称他为文化部长或文化部主席作为文化部长关心图书馆事业自然责无旁贷。考察大臣李盛铎为著名藏书世家，后来北京大学专门整理出版了馆藏李氏书目三册。考察随员夏曾佑后来于民国曾经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三

1906年10月13日，出使归来的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等连上三道奏折，一奏军政，二奏教育，第三奏如下：“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万牲园，曰公园。”后来考察大臣端方在“创建图书馆摺”中对此特别做了说明：“窃维强国利民莫先于教育，而图书实为教育之母。近百年来欧美大邦兴学称盛，凡名都巨埠皆有官建图书馆，闳博辉丽，观书者日千百人。所以开益神智，增进文明，意至善也。臣奉使所至，览其藏书之盛，叹为巨观。回华后敬陈各国导民善法四端，奏恳次第举办，而以建筑图书馆为首。”考察大臣回国前，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还只是零星小雨，除个别省份建了公共藏书楼（图书馆）外，绝大部分省并未将建设图书馆摆上议事日程。但考察大臣奏请之后，情况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考察政治大臣奏准各省遍设图书博物馆”。筹建省级图书馆被列为“预备立宪”的一项具体措施。学部在“分年筹备事宜宣单”中，要求1910年各省应一律开办图书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建设专业图书馆的议论。如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请筹设陆海军图书馆以供军人研读。除省立图书馆外，京师图书馆的建设也与考察大臣的奏请与推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京师建书楼的议论由来已

久，但始终未见动静。直到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考察大臣奏请，这才开始着手筹建起来。1909年5月，学部在“分年筹备事宜宣单”中，将颁布图书馆章程、在京师开办图书馆附古物保存会以及将博物馆作为专门教育列为1909年应办之事。在考察大臣的奏请和推动下，省立图书馆短短几年在中国十几个省建立起来，京师图书馆加紧筹建。建设这两级公共图书馆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藏书形式，改变了传统藏书机构向图书馆演变过程中仅在地方和民间零星出现的迟缓状况，更主要的是，以这两级图书馆的出现为标志，图书馆作为国家文化事业的局面已经形成。

四

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诞生，一方面是由于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社会的大变动，另一方面则由于外国图书馆文化的涌入及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倡导和推动，将几千年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藏书楼带到了一个较为广阔的文化空间，促成了中国封建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并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1. 具备了重要的社会教育功能

近代图书馆是为了配合中国资产阶级政治斗争，宣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推行维新变法而兴办起来的。为了实现“教育救国”的思想，近代知识分子大力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和藏书事业。他们认为应把藏书楼办成一种社会教育机构，图书馆应由保存书籍的场所变成推广、使用书籍的地方。民国元年，梁启超在回忆创办强学书局时曾说明其目的：“时在乙未之岁。鄙人与诸先辈，感国事之危殆，非兴学不足以救亡，乃共谋设立学校，以输入欧、美之学术于国中。惟当时社会嫉新学如仇，即视同叛逆，迫害无所不至，是以诸先辈不能公然设立正式之学校，而组织一强学会，备置图书仪器，邀人来观，冀输入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梁启超在日本避难时期，在《清议报》撰文，

列举图书馆的八项功能：“1. 图书馆使现在学校受教育之青年学子得辅助知识之利也；2. 图书馆使凡青年志士有不受学校教育得知识之利也；3. 图书馆储藏宏富，学者欲查故事，得备参考之利也；4. 图书馆有使阅览者随意研究之利也；5. 图书馆有使阅览者于顷刻间得查数事物之利也；6. 图书馆凡使人皆得用贵重图书之利也；7. 图书馆有使阅览者得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之利也；8. 图书馆有不知不觉便养成人才之利也。”1905年端方考察欧美之后提出：“窃维强国利民莫先于教育，而图书馆实为教育之母。近百年来欧美大邦兴学称盛，凡名都巨埠皆有官建图书馆，闳博辉丽，观书者日千百人。所以开益神智，增进文明，意志善也。”知识分子创办图书馆的活动，使朝野上下逐步形成了图书馆事业培养人才、振兴国家的观念。因此，我们可以说，清末创建的图书馆，已具有近代社会教育之功能。

2. 提高了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素质

近代知识分子把创办向社会开放的图书馆作为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改变旧风气的重要措施。新式图书馆把服务对象从官僚士大夫阶层，逐渐扩大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广大社会民众，真正体现了图书馆是为大多数人而设。1906年《湖南图书馆暂定章程》中规定：“本馆所藏各种图书馆报章，凡有志向学者，皆得照规例入馆参阅”；1909年成立的云南图书馆在其章程中指出：“本馆所藏图书、报纸，凡政界、学界、实业界、军事界之人，勿论本省客籍，皆得照规则入馆参阅。”从这些章程中可以看出，近代图书馆的创办，对广大知识分子，尤其对穷苦知识分子掌握新思想、学习新知识，客观上提供了较为方便的条件。凡有读书识字能力的，不问他的年龄、地位、职业等，都能在图书馆内找到适当的读物。众多近代图书馆在中华大地上的创建，为广大青年提供了一个学习西方文化和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的场所，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得到更广泛深入的传播，使读书与文化移向民间，从而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促进了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近代图书馆的创立，为广大知识分子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一个生动而丰富多彩的世界愈来愈清晰地

呈现在近代知识分子面前，从而帮助他们从传统文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

3. 形成了面向公众的文献服务机构

图书馆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需求的结果。人类离不开信息知识的交流，图书馆是社会信息知识交流的中心之一，它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有着紧密联系，并相互影响和制约。近代图书馆使图书资源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服务，为整个社会文明服务。为了满足当时社会的需求，图书馆十分重视西方图书、报刊的收藏，出现了以西学、新学图书为主，古今中外并藏，改变了原有的经史子集藏书结构，突破了封建藏书楼只保存不开放的传统做法。每个图书馆大都辟有阅览室和借书处。湘学会藏书楼对整个社会敞开大门。湖南时务学堂藏书楼：“凡外课附课生欲观者，准其入内浏览，然须向管堂领一凭单，由管堂验过，指书送阅”；金陵开劝学会藏书楼：“购买中西有用之书，藏于公所。除凑股之人任凭观览外，其有未经入股有志读书者，准其出资租阅。”古越藏书楼更是向读者无限制公开借阅图书，不需铺保，不要押金，只要先提出申请，申明愿遵守书楼章程，领得发书单一张，对牌一块，便可在室内阅览。这些藏书楼在有目的地向社会公众开放这一点上已经具备了现代图书馆的特征。由此可见，当时由进步知识分子所创办的藏书楼已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和服务性，从图书馆服务对象的日益广泛便可窥见其社会功能。

4. 开创了近代科学分类体系

自唐朝以后，古代藏书楼一般都以经、史、子、集四部类分图书。这种分类体系缺乏系统性，只能适应古代藏书楼珍藏古书。但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近代科学技术著作不断在中国翻译出版，图书馆藏书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致使原有中国传统的四部分类体系，既不能与当时知识结构的变化相适应，也无法容纳当时出现的“西学”和“新书”。为了适应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类分“新书”的需要。四部法的体系改革势在必行。1896年，梁启超、康有为两

人先后编制并发表了《西学书目表》和《日本书目志》两部著作，完全摆脱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羁绊。尤其是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不仅比较完善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分类体系，而且在理论上予以阐述说明，该书吸收了西方分类的思想，将当时中国所译的西书分为学、政、杂三大类。这个体系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综合性图书三大部类的雏形，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分类反映了当时科学技术与专业知识的分类。几年后，近代图书馆专家徐树兰编成了《古越藏书楼书目》，即仿梁氏的《西学书目表》而分为学、政两大类，创我国近代图书馆目录的先例。此后，还有徐维则《东西学录》、顾燮光《译书眼录》、沈兆伟《新学书目提要》，天津直隶省图书馆创立的十二大类分类法相继问世。1909年孙毓修将欧美通行的分类目次稍加变动，提出的二十部分类法等也都抛开了四部旧制，改用科学分类体系分类图书。这些书目和分类法尽管还存在许多不尽合理之处，但它们的问世冲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命定的“内阁以为永制”的经、史、子、集四部法的藩篱，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图书分类体系的诞生，为近代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产生开辟了道路，也为近代图书馆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五

考察团大臣曾担任总督的端方赴欧考察政治归国后，就上奏光绪皇帝建造图书馆，在奏折中提出了创办图书馆的计划，并推荐缪荃孙主持其事。当时缪荃孙已经六十四岁，即辞高等学堂事宜，专门从事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前身之一）创建工作。当时海内南北藏书家为四大家，即江苏常熟瞿绍基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以增海源阁，浙江钱塘丁丙八千卷楼，浙江归安陆心源皕宋楼，其中以丁氏八千卷楼最为著名。其时陆氏皕宋楼藏书于1907年已被日本人以重金全部购去（现藏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八千卷楼为清代杭州丁国典所创，他爱藏书因慕其远祖宋代丁凯藏书八千卷，故给自己的藏书楼起名为“八千卷楼”，

其孙丁丙（字松生，1832—1899）经多方搜集，除沿用其祖父的八千卷楼外，并以增加的藏书名为“后八千卷楼”“善本书室”“小八千卷楼”。丁丙先生去世后，其后人经商失败，决定出售藏书抵债，时论颇惧重蹈陆氏覆辙。缪荃孙主持图书馆后，十月即和陈庆年（坐办、副馆长）驰赴浙江。经过与丁氏后人反复洽谈，最后以七万三千元的巨款购回“八千卷楼”的全部藏书六十万卷。当年底，丁氏书籍陆续运抵江宁（南京）。此外，还有武昌范氏月槎木泽香馆藏书四千五百五十七种，充价调拨入藏。这大批珍贵古籍的收藏使其免于散佚，从而奠定了江南图书馆丰富藏书的基础。

江南图书馆馆址，经端方亲自踏勘，选定江宁城西风景区的惜阴书院旧址为馆址（现南京市龙蟠里九号，原为清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澎所建的惜阴书舍，光绪初年更名为惜阴书院，废除科举后改为上元县高等小学堂）。1908年五月将小学堂迁走，九月开工，次年九月建成2014平方米的两层两幢具有民族风格的长形藏书楼，前后两进计二十四间，共耗银二万七千四百六十一两。先后置办柜架设备，将八千卷楼藏书整理、编目、上架，1910年11月18日，开办阅览，制定规章，江苏省之有大规模之公开图书馆，实自是始。当年12月9日曾登报公告，正式对外开放阅览。时缪荃孙任总办（馆长），陈庆年为坐办（副馆长）。

宣统元年（1909）五月，学部奏派缪荃孙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馆长）之职。时缪荃孙正在南京主持江南图书馆，即去常熟与瞿氏商谈为京师图书馆进书事宜。八月，学部函电催赴京，正拟北行，闻恩师张之洞逝世，竟哀痛一病两月方愈，加上其他一些事情，直到次年（1910）九月才由武昌乘火车进京，十月任职。时（图书）馆犹未建，暂借城北积水潭广化寺为储书之所。缪荃孙到达北京后，随即任事，先分类清理书籍，后编写书目，为京师图书馆的创建呕心沥血。他先是组织人力对图书进行了整理与分类。当时内阁大库藏书元、明旧帷甚多，不少宋本书还是元人打败南宋时从临安秘阁中所得，为藏书家所未见。缪荃孙将其整理并集刻为馆藏《宋元本留真谱》（1911年10月刻印）。1910年11月，

清廷传旨召见缪荃孙，监国（醇亲王）询学务及南北图书馆办事。1911年3月，缪荃孙奉派回江南催瞿氏进呈书。

1911年6月，缪荃孙编出《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四卷，它是一部记载方志的专题性馆藏书目，计著录各省府州县志一千六百七十六部，虽然还不是一部全国地方志的总录，但实为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方志目的滥觞。九月份，又交本馆新编替本书目八卷，是为《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它是从馆藏中提出宋元版，各家抄校者为善本，分类编目而成，采用经、史、子、集类目。

在清末创办图书馆的过程中，缪荃孙经端方的引荐，担任中国南北两大图书馆馆长。他建造图书馆建筑、购买图书、编写书目，乃至创建规章，设立制度，培养图书馆人才，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谓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

第一章 缪荃孙的学术生涯

古城江阴，地处长江南岸，因古时水之南谓阴而得名，作为吴文化的发祥地，这里人文荟萃，钟灵毓秀，被称为“衣冠文物之邦，东南人文之薮”。自从明代万历年间江苏学政节署移设江阴，按试八府三州秀才，为江阴崇尚教育、尊重知识奠定了基础。自古以来，江阴名人辈出，如明代徐霞客，著名的“刘氏三兄弟”刘半农、刘天华、刘北茂以及在近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图书馆之父缪荃孙。

一、书香门第

缪荃孙初字小珊，号楚芴，后改字炎之，号筱珊，晚年又号艺风，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初九生于江苏常州府江阴县申港镇。

缪荃孙出身于仕宦之家。缪荃孙的家族是在清朝末年思想变革中艰难抉择的代表性家族。作为清末学术典范的缪氏家族，因其本身又是新旧文化、中西文化冲突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随着人文变迁而反映出来的学风和求学宗旨，有着显而易见的时代烙印。

缪氏是一个仕宦家族，祖籍河南，南宋绍兴时，其先祖定居于江阴。从明中叶起定居江阴城西二十里申港镇。缪氏原籍江苏毗陵。“缪氏先世，自宋南渡时，宏毅公官统制，驻兵毗陵，遂家焉。历十一世至讳仁者，于明中叶始居江阴申港镇。”这里说到的缪仁就是缪荃孙的十

五世祖，现存其资料很少。缪荃孙的六世祖为缪燧（1650—1716），字雯曜，号蓉浦，贡生。少倜傥，通经史。康熙十七年（1678）授山东沂水县知县，三十四年（1695）授浙江定海县知县。历官慈溪、镇海、鄞县及宁波府事，为政二十二年，政绩显著。后来定海士人汇编《定海遗爱录》（《云自在龕丛书》本）一卷，颂其功德。缪燧曾修《定海县志》八卷。

缪荃孙的曾祖父晴湖公缪秉奎，为邑庠生。缪荃孙的祖父缪庭槐系嘉庆甲子（1804）举人，联捷进士，曾官平凉府知府，署西宁、甘州等府知府，平庆泾兵备道。

缪荃孙之父缪焕章（1812—1890），字仲英，原名步青，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曾官贵州候补道，赏戴花翎。缪焕章喜吟咏，著有《三朝北盟会编节要》四十卷，《吟樵诗草》。对父亲作品的保存情况，缪荃孙曾说过：“先君子喜吟咏，而不甚收拾。少年所作悉毁于庚申之难。在黔中戎幕，与杨雅林兆琮年丈、龚润珊秉琳、沈菁士丙莹唱酬多，又在成都寓所为白蚁蛀蚀。今搜辑丛残，仅存数十首。”数十首只是作为儿子的缪荃孙的憾恨之言，事实上，缪焕章的诗作在后来经过寻找整理后，在缪荃孙《旧德集》卷八中录入五十三首，并且卷一三还录有文章三篇。不过，此番艰难搜觅，使缪荃孙对学者个人疏漏及时事变动对作品留存造成的影响，记忆非常深刻。他后来积极从事书籍刊刻，父亲诗文残存的遭遇不能不说是动因之一。缪焕章还著有《云樵诗话》二卷，品评查慎行的诗作。缪焕章另外著的诗文集《吟樵诗草》，今亡佚。缪荃孙的伯父缪容吉，历任四川南充知县、酉阳直隶州知州等职务，咸丰十年（1860）七月，滇匪入川，容吉于容昌县督战，斩匪数百而援兵不至，力竭阵亡。生于这样的仕宦、读书门第，对缪荃孙的人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缪荃孙外祖父瞿敬帮为有学之士，母亲瞿氏继承家法，有着一定的学识。

二、幼年教育

缪荃孙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且又聪颖。四岁开始识字；五岁识字过千，能诵唐人小诗；六岁入塾读书；七岁时，外祖父称其“口齿清，记性好，将来或能绍书香”。八岁时读完《四书》；九岁开始学习作诗；十一岁毕《五经》，习《三礼》。在缪荃孙幼年时期，其母对其学习方面管教甚严，六岁即入家塾。学塾归来“吾母必令重读，音有讹，句有误，正之惟谨，予时甚以为苦，而反乐趋塾”。缪荃孙的同族祖父缪庭楷曾夸他是读书种子，对他勉励有加。

十二岁时遭受丧母之痛。十四岁时缪荃孙的父亲离家赴四川谋生。这时虽然家庭生活窘迫，但缪荃孙仍表现出对史学的偏爱，“读《国语》《国策》《史汉八家文》。”“阅《纲目》《北史》《续资治通鉴》。”“先生只令读应制诗文，家中有书四橱，随意检阅，无人教督，然心喜甚阅之。”十五岁读《文选》；十六岁读《说文》；十七岁参加县试，名列前茅。

由于缪荃孙聪颖的天赋，以及幼年的良好启蒙教育，为以后的学术打下坚实基础。他幼年的卓越表现，也成为家里的希望所在。

清代教育并不划一，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刘禹生在《世载堂杂忆》曾经说：

当时中国社会，读书风气各别，非如今之学校，无论贫富雅俗，小学课本，教法一致也。曰书香世家，曰崛起，曰俗学，童蒙教法不同，成人所学亦异。所同者，欲取科名，习八股试帖，同一程式耳。世家所教，儿童入学，识字由《说文》入手，长而读书为文，不拘泥于八股试帖，所习者多经史百家之学，童而习之，长而博通，所谓不在高头讲章中求生活。崛起则学无渊源，俗学则钻研时艺。春秋所以重世家，六朝所以重门第，唐宋以来，重家学、家训，不仅教其读书，实教其为人，此洒扫应对进退之外，而教以六艺之遗意也。

缪荃孙虽然出身仕宦家族，但祖辈无家学传世，在学术界也无多大

影响，入清以来唯一一位附《清史稿·文苑传》者是缪荃孙的堂伯叔缪尚诰，他曾及李兆洛之门，然而英年早逝，并未见他有什么大作传世。但缪荃孙所受的教育却非“俗学”“崛起”所能限制。缪荃孙入家塾后先后从族祖缪以康、族兄缪墀读《四书》《五经》《周礼》《仪礼》，从缪重熙学作应制诗文，从表兄吴伟读《国语》《国策》《史记》《汉书》八家文，非寻常人家可比。十四岁开始翻阅《纲目》《北史》《续资治通鉴》，这些都源于家庭之赐，也是缪荃孙的自觉行为。接着缪荃孙又读《文选》《说文》。这为缪荃孙长而博通，不在高头讲章中求生活奠定了一定基础，是他成长为著名史学家、学者的根基所在。

三、青年的读书经历

咸丰庚申（1860）二月，缪荃孙应县试，被“邑侯祥煦龄先生拔置前列”。就在缪荃孙还在书塾里过着平静的读书生活的时候，战乱已经临近。四月，在南京建都已七年之久的太平军，为打破清军对他们的包围而一举攻占了常州。缪荃孙被迫流离失所，他先是侍奉继母和庶祖母移居靖江正东圩的三间鄙陋草屋数月，后又辗转到了姑丈丁林山家。流离的生活是困苦的，但缪荃孙在此期间仍然没有忘记读书。其居靖江正东圩时，曾于四月十九日渡江回宅，家中被抢掠一过，缪荃孙取回的东西是先人影像和书籍；“寓淮安，无力从师，自携《随园诗话》《吴会英才集》、洪、黄两家诗选，辄仿为之”。

同治元年（1862），局势稍定，缪荃孙又有了从师读书的机会。于是在这一年的二月，山阳葛绍裔迎缪荃孙到其家跟从汪竹堂读书。三月，经吴棠拔取第二名，缪荃孙得入丽正书院读书。清代书院是与官学并行的教育机构，多聘名学硕儒掌教，为陶铸学人之地。刘禹生《世载堂杂忆》载：

自阮云台总督两广，创建学海堂，课士人以经史百家之学，士人始知八股试帖之外，尚有朴学，非以时艺试帖取科名为学也。陈兰甫创菊

坡精舍继之，浙江俞荫甫掌诂经书院。及南皮督学湖北，创经心书院；后督鄂，创两湖书院；督学四川，创尊经书院；督两广，创广雅书院。于是湖南有校经堂，江苏有南菁书院，苏州有学古堂，河北有问津书院等，皆研求荆、学，陶铸学人之地。士人不复于举业中讨生活，皆力臻康、乾、嘉、道诸老之学，贱视烂墨卷如敝屣，光绪中叶以前之风气如此。

江苏丽正书院也是朴学兴盛之地，经学家江藩曾在此主持讲学，阮元也曾在此选拔士人，缪荃孙的老师丁晏也曾从这里受业。丁晏字俭卿，号柘堂，江苏山阳人。邃于治经，笃好郑学，著述甚丰，《清史稿》入儒林传。缪荃孙在此即受业于丁氏，丁氏“教以读经先研究小学”。在丽正书院读书的近代学者张舜徽曾说：“荃孙少时避兵居淮安，肄业丽正书院，从院长丁晏受经学、小学。一生治经，宗主汉儒故训，实植基于此时。”

同治元年（1862）八月，缪荃孙与张保慈比邻而居，过从莫逆。张保慈字敬堂，常熟人，缪焕章馆常熟时他曾及门问业，工书法，擅骈文，多得焕章称赞。缪荃孙此时始学做骈文，张氏常为之指点。后来，缪荃孙的骈文为人称赞，谓可上匹洪亮吉、孙星衍、阮元等，实渊源于此。

四、早年的科举及交游经历

同治三年（1864），缪荃孙遵父命到达四川成都，此后随父客居此地十年之久。这一阶段，他先后迈过了乡试、会试两大仕进的台阶，同时受到当时中国学术界很有代表性也很具影响力的学者的熏陶，逐渐走上了学术道路。

同治四年（1865）至五年（1866）缪荃孙在成都师从汤成彦、宋宝铨等读书，以攻帖括为主。宋宝铨，字萸湾，四川双流人，咸丰己未（1859）四川乡试解元，工书，著有《饮真阁文集》《饮真阁诗集》《益州书画录》等。汤成彦，字梅生，号秋史，阳湖人，道光辛丑（1841）进士，博闻强识，才思敏捷，诗名当世，工于辞赋，著有《听云仙馆诗文

集》等。同时，汤氏亦以经策工夫相勖。缪荃孙此时开始翻阅《三通》《御览》《皇清经解》诸书，“为考订之学”。同时也开始研治目录版本之学，渐渐走向博通之学。

同治六年（1867），缪荃孙双喜临门。八月，他以寄籍华阳监生应同治丁卯正科兼补壬戌乡试，中一百二十八名举人。座师李文田对他喜爱有加，并“以目录之学相勖”。十月娶妇庄思诱，得享天伦之乐。庄氏，元和人，庄裕松次女，工画花鸟小品，性情淑婉。千百年来，科举为中国士人进身之地，随后缪荃孙就踏上了进京会试之路。正如缪荃孙自己所讲的“幸捷秋赋，遂偕计车。五度夔门，四经云栈”。他分别于同治七年（1868）、十年（1871）、十三年（1874）、光绪二年（1876）四次参加会试，最后才得以遂愿。在这一过程中，他对科举有了深刻的认识，他在诗中写道：“马蹄岁月真虚掷，鸡肋功名亦太难。”而对学术则日益倾心，他在《与沈鹤农书》中曾谈道：“吾侪碌碌，已及壮年，思欲怀铅握槧，亡溯结绳，申纸渝墨，下穷倚杵。千秋位置，自有定论，科第得失，何足重轻，以此自慰，兼慰足下。”

在同治七年（1868），缪荃孙第一次入京参加会试，落第后返川。此时的缪荃孙开始了目录学的研究，“始收书，为目录之学，是时书值尚贱也”，六月，“崇文勤公招入署办书记”。八月，“吴勤惠公师到传督任，招入书校刻《朱子全书》，与刻书人作缘始于此”。同治十年（1871），缪荃孙再次参加会试，再次落第。回四川后，次年入姚勤元幕下。“九月大病几死，量药调水，姚勤元、杨葆初晨夕护持之，交冬始渐痊。”同治十三年（1874），第三次入京会试，又落第。此次会试，缪荃孙在京师结交王先谦。次年张之洞在成都建尊经书院，缪荃孙被延聘为“阅官师客卷”，并“执贽张孝达（之洞）先生门下受业，命撰《书目答问》”。直到光绪二年（1876），缪荃孙第四次入京会试，才终于金榜题名。

在这些年中，缪荃孙在四川的客居中，一边读书准备科举帖括之学，一边结交学者，攻治学术，并且在官场开始交游。这是缪荃孙学术研究之路的开始。这一时期，缪荃孙结交了张之洞、王先谦等近代著名

学者，研究学问，逐步走上了学者之路。

对于近代学术的特点，学者郭嵩焘曾如此评价：“自乾隆盛时表章六籍，老师大儒，承风兴起，为实事求是之学。其间专门名家言考据者又约有三途：曰训诂，研审文字，辨析毫芒；曰考证，循求典册，穷极流别；曰校讎，搜罗古籍，参差离合。三者同源异用，而各极其能。”在缪荃孙科举入仕的这十年间，不管缪荃孙治“考订之学”“目录之学”“金石之学”，还是刊刻书籍治“校讎之学”，都是在继承乾嘉诸老以考据为基础，以讲求实事求是为目的的治学方法。这与缪荃孙从小接受的教育以及蜀中乃至全国的学术风气密切相关。也与他长期与诸多学者交游有关。自童年以来他所接触的师友不管是丁晏、汤成彦、宋宝铨，还是李文田、张之洞等无不是研究这些学问的大家。

自缪荃孙出生那天起，清朝社会就已经进入了内忧外患时期。鸦片战争后，腐败的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虽然一些开明的中国人的学术研究也转向于寻求国家的出路，所谓“当时诸贤，承乾嘉学者训诂、考据、校勘之后，毅然别开生面，有志于辽、金、元三史，及西北舆地之学”。在缪荃孙出生的两年，魏源也写成了《海国图志》《圣武记》，但这不过是在研究方向上略有变化，论其研究方法，还是延续乾嘉考据一途。缪荃孙所受到的教育，也必然逃不出当时的学术圈子。他走上传统的治学道路似乎是一种必然。清儒治学，有专精之学，有博通之学，缪荃孙走的是博通一途。

五、早年居京的仕宦与学术生涯

光绪二年（1876），缪荃孙中进士第，以庶吉士，入翰林院，从此他完全融入了学术界。当时士大夫仕宦京师，以风雅为群士所归仰者，以潘祖荫、翁同龢声望最重，二人皆喜金石、碑版，富收藏，缪荃孙“适厕庶常，例称弟子”，与他们往来十分亲密。翰林院是清代清要之

地，许多廷阁大员出于此，也是硕儒辈出之地。缪荃孙进入翰林院后，实际上也面临着这两个走向，是走向学术，还是走向官场。缪荃孙走向了前者。走上学术道路的缪荃孙，对学术倾心有加，刚入翰林即向清秘堂前辈询问《永乐大典》的情况，并请借阅，却经受了这样的遭遇：“群睨而笑，以为若庶常习散馆诗赋耳，何观此不急之务为？且宫书，焉能借？”而直到十年后，他才有机会借读，两年多的时间内他就阅读了九百册，后因其母亲去世服丧而止。其倾心学术如此。

光绪三年（1877）四月，缪荃孙庶常馆散馆以一等二十一名的成绩被授予编修之职，随即被彭祖贤延为《顺天府志》纂修，总纂张之洞作出凡例后即调任他职，缪荃孙成了事实上的总纂。编写方志，涉及知识甚广，如舆地、风俗、典故、金石、目录等等，若非学贯古今、精于考订，不易为之。身为总纂的缪荃孙亲任金石、艺文两门，又撰写了《京师志》中“城池”和“宫禁下”的大部分，并和朱一新共同考订《坊巷志》，《地理志》中的“疆域”“寺观”“顺天府沿革表”，以及《人物志》中的“乡贤表”也出于其手，又兼覆纂全书，与力最多。参加编纂的其他学者也多为绩学之士，若洪良品、朱一新、蔡赓年、傅云龙、廖廷湘、汪凤藻、陈寿田等，皆学有专门，在他和其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历时十年之久，该志编成，被誉为一代名志。

《顺天府志》的编纂，使缪荃孙的学术水平得到了发展和提高。编志期间，他住在兴隆寺，闲暇之日到海王村书肆，购买图书，又和王颂蔚、潘祖荫等人相约搜访顺天碑版，大大丰富了他的藏书和拓本，开阔了他的学术眼界，《顺天府志》所记载的书籍和金石碑版，不乏他一手访得者。缪荃孙编纂《顺天府志》，在学术上也是一种锻炼，他为该志所撰《辽故城考》《金故城考》《元辽故城考》《明辽故城考》《辽故宫考》《金故宫考》《元故宫考》《明故宫考》，皆系考古佳作，后皆收入了《艺风堂文集》；为该志所撰的金石题跋，也极为精审，有多篇收入其文集；《唐侨治蕃州表》亦系为该志所撰，尽管未刻入志中，确系佳作。可以说，《顺天府志》的问世，标志着缪荃孙的目录学、金石学、方志学走向了

成熟。该志涉及多种学科门类，缪荃孙后以博通知名，也与该志的编纂不无关系。

缪荃孙喜交游，京城名家荟萃，在京期间，所交日广，如其与汪鸣銮、黄国瑾、徐乃昌、袁昶、沈曾植、王颂蔚、叶昌炽等均往来甚密，相与问难请益，商讨考订，学问日长。公务之余，他以校书、读碑为日课，撰述遂日丰。

光绪八年（1882），缪荃孙充国史馆修纂，次年三月奏派国史五传纂修，所谓五传者，即儒林传、文苑传、循良传、孝友传、隐逸传。光绪十一年（1885），缪荃孙被任命为国史馆总纂，也是这一年，他因修儒林传和掌院徐桐发生齟齬。缪荃孙编撰国史五传，分并去取，颇具苦心，而徐桐不学无术，刚愎自用，命缪荃孙将纪大奎编入儒林传。纪大奎治术数之易，为道家一派，缪荃孙从学术角度考虑，也恐为清流所鄙，力持不肯。徐桐因此构怨，先是不派荃孙应得常缺，考绩评语平常，限制缪荃孙的仕途发展，后是借朝考压制荃孙，光绪二十年（1894）御试翰詹，缪荃孙考卷本被定为三等一名，为徐桐抑为三等一百二十四名，罚俸两年。这意味着缪荃孙的仕途陷入了困境。

清代学者，名家蔚起，不尽由仕途求生活，其不乐仕进者并不罕见，若金榜、全祖望、余萧客、江藩、俞樾、焦循等皆系此类人物。他们或者主讲书院，或厕身幕府，不慕荣利，以讲学著书而终，蜚声海内。

光绪十四年（1888），缪荃孙完成国史五传，扶继母薛恭人和夫人庄氏之灵柩返乡，受江苏督学杨颐之招，被延为南菁书院山长，和黄以周同事，主讲词章，这是缪荃孙讲学的开始。光绪十六年（1890）缪荃孙的父亲病故，又丁忧三年，次年二月，缪荃孙因葬亲之费无出，被迫重谋馆事。经好友王懿荣的介绍受张曜延请，主讲山东泺源书院。

六、山东泺源书院的学术生涯

泺源书院，始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位于山东济南。建立后的数百年间，为培养人才和促进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近代的著名学者徐松、匡源、何绍基、王之翰等硕学鸿儒曾先后主讲于此，周永年、王懿荣等著名学者先后在这里读书。可以说泺源书院对近代山东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缪荃孙在泺源书院的时间不长，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培育出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在《年谱》中这样回忆：“山东诸生，经学则胶州黄象，博洽则诸城尹彭寿、日照丁文瀚、小门生王崇文，词章则世昌、王鹤年、单蓉镜、单步青、刘彤光等均优，是科大半中式。”像尹彭寿后来则成了学术名家，叶昌炽《语石》曾提及他，其传世著作十数种，其中金石著作有《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一卷、《石鼓文汇》六卷、《山东金石志》五卷、《魏晋金石存目》一卷、《诸城金石目》四卷等。在缪荃孙离开书院后，他们依旧保持着联系，尹氏不时将山东打碑人拓得的碑版拓片寄给缪荃孙，而缪荃孙也将自著文集赠送给尹氏。不难想象，尹氏的金石学曾经受到缪荃孙的影响。

缪荃孙在泺源书院除了教书育人以外，还十分注意自己的学术研究。一方面他以校讎、辑录各地金石为日课。对于校讎之书，他用力最勤的是《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荃孙在《艺风藏书记》里曾这样记载该书：“旧钞本。一蓝格纸影宋钞本，提行空格均依原式，惜止存乙集卷四、卷五、卷六、卷八之半，卷九至卷十九之半，共十四全卷，又两半卷，佳处极多，并辑出聚珍本逸文五篇，收藏有‘吴印任臣’白文、‘志伊’朱文两方印。一绿格纸钞本，纸色亦旧，存甲集二十卷，朱笔校甚细，目录后有‘丙午闰七月二十日借钱氏萃古斋钞本校对’朱笔两行，收藏有‘清逸士’小长方印。荃孙合两本为一，又照聚珍本钞足，又假刘燕庭钞本通校过。”缪荃孙对该书的校勘工作当大部分在此时完

成。录各地金石是他在编著《云自在龕金石分地编》之时，缪荃孙在光绪十四年定下该课题后，几十年不稍懈。另一方面他还很注意搜集文献资料。搜集资料包括购买书籍和搜拓金石拓片。据《艺风老人日记》记载，他曾“上三友堂购得《宋史》一部”，在“万古堂购《湘管斋寓赏编》”。“阅市购宗楼《躬耻斋诗文集》”。与孙葆田“同游古董铺得旧拓本《多宝塔碑》、赵秋谷条幅”。孙葆田“代购初印本《绎史》《江南通志》”。荃孙喜游览，每至一处，必遍游其美景。济南是一座历史名城，名胜古迹甚多，正合其意。他先后游览了趵突泉、开元寺、千佛山、龙洞、历下亭、铁公祠、汇波楼等，每一处都令他陶醉。每游一处，他必访碑。如其《日记》载其游千佛山云：“曹远谟招游千佛山。出南门五里至山麓，盘旋而上，约二里抵千佛寺。入门见隋造像千数，记十余段，皆有拓本，龕外有元人题名一段，似无人拓过者。小阁北向，鹊、华两山，风雨离合，黄河一线，自西而东，浮沙两岸，风旋成塔，东民杼柚空矣。油然沛然，敢以质之苍苍。”载其游曲水亭云：“早偕孙子方游水亭，又到历城学宫访碑，得元乡试题名碑一。”

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辛卯年（1891）五月四日说道：“金石之学，崇尚亲见实物，目验真伪，荃孙实地访碑，无疑有助于其提高金石学水平。荃孙的金石之学得到了张曜的认可。其时张曜打算续编《山左金石志》，延请荃孙主其事。基于此，缪荃孙遂雇用拓工大规模搜拓山东金石碑版。其在《艺风金石文字目序》中说：“辛卯，山东张勤果中丞曜延主泲源书院讲席，门人尹竹年副贡彭寿为觅泰安黄土琳，尽拓泰安、肥城、汶上、东阿、济宁、兰山、沂水、蒙阴十余县。”派其去拓碑，荃孙往往根据自己了解的信息先为其开好碑目。另外，他还雇用了另一个叫张天翔的打碑人，派其到青州去拓碑，并致书知会当时担任青州府教授的法伟堂，让他提供帮助。

可惜的是，张曜于该年七月即去世，其事遂未果而终。缪荃孙在山东的搜拓碑版的活动直到光绪甲午年（1894）才结束。他离开后拓工所拓碑版均由尹彭寿邮寄给他。这些碑版资料为其研究山左金石奠定了

基础。

缪荃孙喜交游，在泲源书院期间多和当地学人如法伟堂、孙葆田、夏尚樵、费伯坝、曹侗、姚彦鸿等往还。他们或同游名胜，或同席燕饮，或鉴赏书画，或谈艺论学。其中与孙葆田往还最多，缪荃孙在《校经堂文集序》中说：“迨辛卯东抚延荃孙主讲济南泲源书院，时先生主讲尚志，始得朝夕相聚，握手谈艺，并为筹画旅况，无微不至。”又说：“月夜尝过先生，煮茗清谈，素稔先生师武昌张廉卿，知桐城古文，荃孙亦尊桐城为国朝正宗，先生曰世之诮桐城，以为空腔，此学声调之弊，需运事实于文字之中，可免此诮。”又说：“又议同修《通志》，先生主章鲁派，荃孙主洪孙派。先生曰：‘汝师法乡人耳。’荃孙答曰：‘志以事实为主，以文行之，略避记账之诮，如实斋之志，首增徵实一门，仍不离乎事实；通甫则前志源流、古迹、艺文一概扫除，文字虽高，于武功、朝邑已蹈刘知几改史为文之讥矣。’先生亦首肯。”当时，孙葆田主纂《山东通志》，缪荃孙后因离开济南，最终没能参与纂修该志，但是该志自始至终都贯穿了缪荃孙的修志思想。六月二十五日，缪荃孙出了他在泲源书院的最后一次课题，即评判学生优劣的决科题。七月三日阅卷毕，科案出，荃孙本学年的教学任务算是完成了。由于有葬亲之务在身，荃孙当日即与张曜辞行，于七月八日离开济南，主泲源书院讲席凡四月有余。由于荃孙主讲泲源书院较有成就，此前张曜已经送来了续聘书。荃孙《日记》该年六月二十七日载此事：“己未，雨……晚凉，朗帅送壬辰泲源关书并《通志》关书。”缪荃孙心系书院，在赴京之前他还给张曜上了《泲源拟改章程》，这当然是他为了促进泲源书院成为更好的人才培养基地而撰写的。在离开之前，缪荃孙是做好回来打算的，他“寄书箱九只于电报局，寄书桌一枚于张兰九处”。但他一去就再也没能回来。

缪荃孙没能回泲源书院的原因是张之洞强烈要求他主讲湖北经心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十一月，至湖北谒见张之洞，受聘经心书院讲席。

缪荃孙于光绪十七年九月初扶亡父灵柩归里，在选定墓地下葬之日后，于十月二十六日出发赴张之洞湖北之招。对于张之洞要求荃孙主讲经心与荃孙辞去泲源的过程，荃孙《日记》里有详细的记载。光绪辛卯（公元1891年）十一月七日云：“丁卯。雨。卯刻到汉口……南皮师约经心书院主讲，惜已应福幼农聘，欲荐钱铁江自代，未知能允否也。”九日云：“己巳。晴。谒南皮师，呈宋刻《五曹算经》《直隶名贤手札》。南皮师命主讲经心，荐钱铁江自代，未知能来否。”十二日云：“壬申。晴……赵竹君来，言经心讲席已定局势，难再辞。”十八日云：“戊寅。阴……香帅馈赆甚丰……香帅送经心关书来。”二十三日云：“癸未。晴……上山东福中丞笺，辞泲源馆，并还书币，托彦鸿转交汤幼庵。”缪荃孙在张之洞强烈要求主讲经心书院的情况下，不得已而辞去了泲源书院讲席。

缪荃孙主讲泲源书院虽然只有四个月，但对山东当地文化发展的意义是不容忽略的。首先缪荃孙是泲源书院为数不多的名师之一，他把泲源书院的教学改造成科举加学术研究的模式，在泲源书院史上有进步意义。第二，缪荃孙在山东播下了金石学的种子，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尹彭寿、法小山等金石学家。这为清中叶吴式芬、陈介祺、李佐贤、许瀚等以来的山东金石学研究又增补了新的营养。他对山左金石的搜拓，更是为全面研究山东金石奠定了基础。第三，从光绪十六年至宣统三年（1912），历时二十余年修成的《山东通志》二百一十一卷，向以考据精审著称，追溯其源头，发其端者乃缪荃孙。

七、湖北短暂的讲学与学术生活

缪荃孙在1891年出都以后，刻有一方“以七品官归田”小印，可略见其志向，其《题竹垞图》之三云：“著书翻是还家乐，我亦归田七品官。”注云：“甲午归来，刻‘以七品官归田’小印，慕先生也。”大概以两人经历相似，皆以学术为终生归宿之故。这以后他一直从事文化、教

育工作,并致力于学术活动。缪荃孙有多次机会入京复职,皆为其拒绝。

光绪二十年(1894),缪荃孙在放弃山东泺源书院的教席后,赴武昌拜谒张之洞,被张之洞安置编撰《湖北通志》。同年由于甲午战争的爆发,受到局势的影响缪荃孙举家南迁,从此离开京城。光绪二十一年(1895),兼任自强学堂商务分校事务。

缪荃孙在武昌修《湖北通志》,并兼湖北自强学堂商务科分校,此皆出张之洞之意。自强学堂是张之洞创设的进步学堂,《清史稿》对它有记载:“至湖北自强学堂,亦之洞创设。初分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惟方言一斋,住堂肄业,余三斋按月考课。”其后算学改归两湖书院教授,格致、商务停课,本堂专课方言,以为西学梯阶。方言分英、法、德、俄四门,亦类似同文馆之学堂也。

自强学堂后来演化成了今天的武汉大学。

缪荃孙在湖北的生活时间比较短暂,只有一年多的时间,而随着张之洞官职的变化,缪荃孙的学术讲学活动也在不断地变化着。

八、江苏钟山书院的讲学与学术活动

光绪二十一年(1895)九月,张之洞又与缪荃孙约定明年钟山书院讲席,次年二月缪氏挈家至江宁,开始了他在金陵十余年的生活。

曾经周游十六行省的缪荃孙,第一次来到南京,还是在光绪十五年(1889)。《艺风老人年谱》载:“光绪十五年,四十六岁。七月,渡江初至金陵。游清凉山,北极阁,明孝陵,玄武湖,莫愁湖……乱石荒凉,结构草草,而龙盘虎踞,江山如故。”

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至二十七年(1901)缪荃孙主讲南京钟山书院,这是他第二次同南京学人接触,此后长期居住十余年。从光绪二十四(1898)年起又兼领常州龙城书院。钟山书院建于雍正二年(1724),清代许多著名学者如卢文弨、钱大昕、姚鼐等曾在此讲学,培养出了一大批人才。缪荃孙主讲该院期间,及门弟子甚众,像程先甲、

王澐、梁蕙、夏仁虎、茅乃登、陆春官、卢重庆、杨炎昌等人是其中的优异者。

对缪荃孙来讲，这是一段平静的日子。他对自己在书院的住所非常满意，其在自撰《年谱》中这样记道：“住书院，院西偏一小园，精室三间，回廊四合，北望钟山，植梧桐、杨、柳、海棠、芙蓉、梅、桂数十株，屋后丛竹数百竿，一方池，有芙蕖焉。消夏坐卧于此，最为闲适。”此亦可见缪荃孙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隐居心态。教书之余，他与金陵旧友秦际唐、邓嘉缉，名士顾云、甘元煥、傅春官等往往有诗酒流连之乐。光绪二十四年（1898）三四月间缪荃孙还偕顾云、傅春官“赴杭州游西湖”，“遍游诸名胜而归”。他又访得江宁打碑人聂明山，四处访碑。这一时期缪荃孙在学术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就，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开始写《艺风堂金石目》，编《旧德集》，并完成了《常州词录》的校勘工作；光绪二十三年（1897），编定《湖北通志稿》，开始汇刻《藕香零拾》，撰《续碑传集》；二十四年（1898）为胡聘之编《山右石刻丛编》，刻《旧德集》，并为刘世珩刻《聚学轩丛书》；二十五年（1899），为盛宣怀编刻《常州先哲遗书》成，编定《山右石刻丛编》；二十六年（1900）编刻《艺风藏书记》《艺风堂文集》，次年刻成。

缪荃孙主讲钟山书院前后数年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可谓为风云变幻。就在缪荃孙完成国史五传的那一年，以康有为为首的变法派开始了变法活动。尔后光绪二十年（1899）五月缪荃孙南返，八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康有为会试不第。次年，康有为公车上书，开强学会，维新变法拉开帷幕。缪荃孙没参加戊戌变法，但他对变法的初期宣传工作还是有贡献的。在钟山书院期间，他曾是《时务报》初期南京捐款的代收者，也代售该报，后来，缪荃孙又曾代售《知新报》，还曾经为谭嗣同代售《湘学报》。

远离政坛的缪荃孙还是或多或少地卷入到了当时的纷争中，但也主要是在学术主张的争论，而不涉及政治主张。他反对《时务报》中一些完全否定包括考据学、词章学在内的传统学术的言论，为此缪荃孙曾经

致书当时的报馆经理汪康年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对此变法的领袖梁启超曾经说过：“请告缪君，弟必不以所学入之报中，请彼不必过虑，不然《书目表》后之文早登报矣。所以不如此，自信三兰严行，无取乎此，不徒为人之多言也。若夫吾之著书，则彼乌能禁我。今直恨所著之书未成，刻书之资未充耳。他日鄙志苟逮，则将哀然成巨帙，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缪氏抢地呼天，又奚益乎？考据之蠹天下，其效极于今日。吾以为今天下必无人更敢抱此敝帚以炫者，而不意缪氏犹沾沾然志得意满，谓其文字有来历也。此等人吾亦以待林乐知之法待之，我固不与之较，彼亦无如我何也。”梁启超信奉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后来缪荃孙在阅读《时务报》四十六号报后终于下决心断绝了与《时务报》的关系，他与汪康年一札说：“阅四十六号报，倡狂无理以至于此！公主政上报，意欲何为耶？试问有何益处？恐报之不行，于此可卜。荃穷老愁困，不愿与诸公争，然阅者愤愤，必不止荃一人也。明年荃已面辞，千万弗寄，寄来亦止有原封退还耳。存书存报，下月一并寄还，不敢与闻报事，尚不如看《游戏报》，足令人笑，不令人愤也。”缪荃孙说的“四十六号报”发行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二十四日，该期载有徐勤的《中国除害议》，公开抨击考据、词章之学为无用之学，又有些文字易被认为攻击张之洞。徐氏亦康有为弟子。此后缪荃孙和维新派再也没有了联系。从缪荃孙的一生来看，他的政治思想与张之洞是一致的。

戊戌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镇压，刚实行百日的新政尽废。“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入京师，载勋与端郡王载漪相结，设坛于其邸，纵令侵使馆。”遂引发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经过庚子一役，丧权辱国，腐朽的清政府当局被迫进行了一些改革，恢复一些新政。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辛亥革命爆发，缪荃孙为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事业做了一系列有意义的事。

九、20世纪初期的教育与学术生活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缪荃孙到湖北领了个新职务，即江楚编译局总纂。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江宁开办学堂，缪荃孙总领高等、中、小三堂事，十二月，奉张之洞之命，率团赴日本考察学务；光绪二十九年（1903）缪荃孙在南京开办中、小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间缪荃孙兼任两江师范学堂稽察；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主办江南图书馆，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三年（1911），主持江南图书馆，并于宣统二年（1910）起主办京师图书馆。

江楚编译局是一个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为教育服务的编译机构，创建的初衷是为江鄂两省新创建的学堂提供教材。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九月创建，到宣统二年（1910）四月改为江苏通志局，它存在了八年又八个月。这期间，缪荃孙延请了一批绩学之士任分纂和分校，如江宁陈作霖、句容陈汝恭、常熟宗嘉禄、丹徒柳诒徵、长洲朱孔彰、吴县曹元忠、南通范当世、兴化李详、江宁徐嘯崖、福州陈季同等。他们编译、出版各类教科书约有七十余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清朝事略》《历代史略》等，还出版了《说文通训定声》《江宁金石记》《续碑传集》等，为当时的高等、中、小学堂教育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光绪十四年（1888）黎庶昌曾招缪荃孙访问日本，被缪荃孙婉言辞谢。到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十二月，缪荃孙受张之洞的派遣率团赴日本考察学务，这时缪荃孙已经是近六十岁的老人了。此次东行荃孙也说“东洋之行，殊非所愿”，但为了开办新式学堂，他仍以大局为重。此程同行者有徐乃昌，他是缪荃孙的老友，也是一行人的提调；孙筠，预定化学教师；侯巽，预定中学校长；张楠，日语译员；舒伯勤，预定生物教员；王某，预定体育教员；柳诒徵，江楚编译局分纂。从他们的构成来看，这是一个新式教育团队。柳诒徵回忆此次到日游访曰：

此行也，日人招待甚殷。预由罗叔蕴函托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校

长嘉纳治五郎，预定彼国教育专长，排日为吾等讲授教育原理、教授法、管理法等，又由文部省排定每日参观学校，缪师极为厌苦，恒属余偕张、孙诸君往听讲，张、孙等亦不暇笔记，予则记之独详。每之学校参观，亦详记其特色，如女子高等学校之做法，及某学校之柔道等，均缀述不厌其烦。

归国后缪荃孙命柳诒徵创编了《日游汇编》一书，详载其经历。这次简短的考察访问，为我国近代教育改革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光绪二十八年（1902），钟山书院改为江南高等学堂，缪荃孙任总监督（校长），在改制中他颇费苦心。光绪二十九年（1903）两江师范学堂创立，它是清末大力提倡新式教育的产物，是我国第一所省级师范学校，今天的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前身，缪荃孙是创建者之一。在改建和创建学堂过程中，他很讲究管理和教学之法，主张中、西学并重，旧学、新学同举，他曾说：“己亥，荃孙在金陵与蒯礼卿同办高等学堂，研究中外学术，略有领悟……荃孙以为旧学宜保存，新学宜增入，当由旧学窥新学，不宜舍旧而图新，亦不能弃新而守旧。”这种见解可谓通达，符合当时的实际，也成了该校的一种传统。学堂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颇有明达通才，像农业专家章元善，语言学家赵元任，著名学者朱师辙、张小楼、翁之龙等均受到江南高等学堂（钟山书院）的教育；国学大师胡小石、陈中凡，著名书画家、美术教育家吕凤子等是两江师范学堂（三江师范学堂）培养出的佼佼者。思益学堂是南京第一所新式小学堂，是在缪荃孙和陈三立极力赞助下，由柳诒徵、陶逊、陈义等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创办的，该校的学生里，就有后来成为科学家、文学家的茅以升、宗白华、陈方恪等人。

建立公共图书馆是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近代以来，中国一些学者，如郑观应、李端蔡、梁启超、罗振玉等，也屡有建立公共图书馆的提议，作为学者、藏书家的缪荃孙更知道保护典籍的意义，由缪荃孙等筹备建立的江南图书馆和学部图书馆是我国最早、最大的公共图书馆。当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民族产业纷纷破产，

一些大藏书家也因破产被迫出售藏书，建立公共图书馆为防止典籍散失和流落海外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从事文化教育的同时，缪荃孙仍然在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他每至一处必大力搜购旧籍，所收日富，暇日以校钞为事。这一期间他很注意对文献的整理和出版，刻书较多，自刻《云自在龕丛书》和代替刘世珩所刻《聚学轩丛书》均在这一时期印行，所编《藕香零拾》《对雨楼丛书》和为盛宣怀所编《常州先哲遗书后编》均刊成，这几部丛书均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使许多秘籍得以流传，在近代出版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十、晚年的寓居与学术研究

宣统辛亥年（1911），辛亥革命爆发，天下大乱。对缪荃孙等自幼受封建文化熏陶，接受“三纲五常”思想的人来说，无疑是黑色的一年。此时缪荃孙在京师学部图书馆任职，《艺风老人日记》八月廿日载：“赴会贤堂请客，劳玉初、吴仲怡、王季樵、章式之、孙师郑均到，酒半，得金陵乱党起事之信，大家失色，荃孙全家在南，尤为难受。朔幼年遭难，迄今正六十年，又逢此厄，不知伊于胡底。”九月十二日缪荃孙待京师图书馆事略定，即告假南返，全家寄居上海。《艺风老人年谱》于该年载：“十二月二十七日，皇帝逊位于民国，南北合同，国破家亡，生不如死。”其心态可见。

从辛亥年十月起，至民国八年（1919）缪荃孙去世，他一直以遗老的身份流寓沪上，其间曾经去北京参加《清史稿》的修纂工作，但时间也不长，主要寄居上海。这期间缪氏所交往之人多为遗老，如沈曾植、陈三立、樊增祥、瞿鸿禨、吴庆坻、吴昌硕、李详、沈瑜庆、陈夔龙、周庆云等，他常常参加超社、淞社、逸社等雅集，赋诗饮酒，抒发亡国之恨，衰年之感。如其作于民国元年（1912）的《读史六首》其一云：“重见生平五十年，橡枪蓦地遍垓埏。信传上谷驰银鹊，风急台城堕纸

鸢。攘臂募民团白甲，伤心妖讖改黄天。眼前多少苍生泪，化作长河灌百川。”有时也发表一些不满时局和当时学风的言论，他曾与曹元忠说：“民贼固无与彼办事之理，彼亦不用我辈。现与国粹学报馆办《古学汇刊》。荃之书未刻稿尚多，然与近来学人均不合式。小叫天到上海钹了，并非唱戏人退化，实看戏人不能知叫天好处（所谓程度不穀），但见派头与上海不合耳。”

这里仅节录缪荃孙在1912年（民国元年）及1919年（缪荃孙在世的最后一年），在上海的寓居学术研究生活时的学术研究成果，可见其在晚年的寓居生活之一斑。

季秋华所作《缪荃孙晚年书事系年要录》部分内容，就可以看到缪荃孙在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寓公生活。

民国一年（壬子）1912年，年六十九岁，寓沪。

一月：校《唐风集》《长江集》《联珠集》《周礼》《夷坚志》《翠微南征录》《菊潭集》《台阁集》；写《周礼校记》《穀梁传校记》《左传校记》《常州先哲遗书目》；撰《潘木崖文集》《钝吟杂录》序及《张未未手札》《六唐（人）集校本》跋。

二月：校《伪齐录》《云林集》《山村集》；校《蜀石经》并撰跋；校《鬼谷子》毕并撰跋；写《吴渊集》毕；撰《夷坚志跋》及《续夷坚志跋》；购元版《左传》。

三月：校《琬琰集》《顾子方诗》并撰跋；校《滋溪集》毕；写《刻书缘起》；撰《瘞鹤铭》《古文集成》《宋太宗实录》跋；撰《葛氏守先堂书目序》毕；订《士礼居题跋》《秦淮明妓考》；购《梁有誉集》《唐集》。

四月：校《圆明园记》《国初品级考》《西辽事迹考》《长安客话》《大学正业》《士礼居题跋》；校《宋太宗实录》毕；撰《丁帘话旧》《爱日吟庐书画录》《秦淮话旧录》《纪锁》序；撰《有学集》跋。

五月：校《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岛夷志略》《柳夫人传》《陈圆圆传》《董小宛传》《山静居诗话》《雪庐诗话》；校《诸蕃志》《汪文摘谬》毕；撰《感旧录》；购旧钞《清容居士集》《钝翁类稿》。

六月：校《有学集》毕；写《康熙朝事》《江南金石记目》；购《韩文》印。

七月：校《夷坚志逸文》《志雅堂杂钞》《阳羨摩崖录》；勘《沈西雍集》；校唐五代碑目毕，撰《宾退录》《尹河南集》《老莲香山四乐图》《午风堂丛谈》《像象管见》《常州先哲遗书》跋；写《江左金石目》。

八月：校《玉雨堂书画记》《南征集》《古滇说略》《芳山文集》及影宋《陵阳集》；校《青楼集》《新柳记》《此山集》《怀芳记》《徐正字集》《岛夷志略广证》毕；始校《唐徐侍郎文集》《木并桐集》；校《藏春集》《名臣事略》毕并撰跋；撰《静素堂诗集》序；撰《曝书亭考》；写《夷坚志》毕；购《元史》《陈书》。

九月：校《芦川词》《樵川词》并撰跋；始校《陈书》；校《石鱼题名所见录》毕。勘《广西志外金石》《宾退录》《续板桥杂记》；写《秦淮话旧录》；撰《宝竹坡传》。

十月：校《谱系》《滕语》《国史唯疑》《萍心集》《巴歛集》《北马南船集》；校《庆湖遗老集》《史通》并撰跋；校《春灯谜》《小忽雷》《大忽雷》毕；校勘《续藏书记》《壬寅消夏录》；写《刘猛进志》《诗存》；撰宋本《方言》、元版《南齐书》《道德经集解》跋及《韶老吟序》《爱日吟庐书话续录》序；购《续碑传集》《抱经堂集》《杭氏外集》、倭版《七经》《孟子发》《东都事略》《豫章遗文》《敦交集》。

十一月：校《瑶华集》《方山文录》《涑水纪闻》《新唐书》《考古录》《墨客挥犀》《续墨客挥犀》及嘉靖本《词选》；校《嘉禾志》并撰序；校《蒙斋诗》毕；勘元本《草堂集》毕；撰旧钞本《名臣事略》跋；购三朝版《宋文鉴》。

十二月：校《上谷访碑记》《倚松集》《平陈记功颂》；校《漱水志》《蒲庵集》及《谢宣城集》毕；始校《诗人玉屑》；撰《嘉七史跋》《哲堂叔祖传》；撰《毛诗释义》《石鱼文字所见录》《章实斋文》《吴藩乐府》缘起；撰《清风室文集》《风入松琴歌》《灵峰志》序；写《秦淮广记》；购旧拓《龙藏寺碑》。

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年七十六岁，寓沪。

一月：校《东山外纪》；校《草堂雅集》毕；撰《耆旧续文》跋。

二月：校《王渔洋与汪于鼎札子》《申港明碑》《吴山子集》；撰《片玉词》跋。

三月：校《钱氏私志》《京师坊巷衙集》及《酒谱》；撰《嘉业堂丛书》跋及《士礼居藏书记》序；得《渔洋续集》为其平生所未见。

四月：校《黄文献公集》；校《云溪友议》并撰跋；撰《王友石山人集》《月河所见录》跋；撰《王长沙师家传》《嘉业堂藏书记》。

五月：校《演繁露》《董子中诗》《齐民要术》《待访录》《李文忠尺牋》《涑水纪闻》《东坡先生诗》；校《嬾真子》毕；撰《四川访金石记》。

六月：校《旧五代史》；校《幽怪录》《任氏尚书》《任氏尧典》毕；校《涑水纪闻》毕并撰跋；撰《二程全书》《包孝肃奏议》《唐伯虎集》《宋名臣言行录》《两山笔谈》《水南集》《郑成功始末》跋。

七月：校《书录解题》《陈书》；校《韵语阳秋》毕并撰跋；撰《翁覃溪集》序；撰《申港志》；写《侨石碑目》。

闰七月：校《南部新书》《迩言》《孔丛子》、翁评《渔洋诗》；校《吴友鹿忆语》《柴庵忆语》毕；校《东轩笔录》毕并撰跋；撰《鸟鼠山人集》及《犁眉公集》跋。

八月：校《鲒埼亭外集》《萤雪丛说》；校《扈虱新语》毕；撰《左传正义》《广州城砖考》《王翰集》《七国考》及明九行本《十三经》跋；写《中州碑》。

九月：校《徐星伯先生集》《辽文续存》《潜邱札记》；校《五代史》《圣武亲征录》毕；撰《董美人志》跋；撰《地基始末》；购《东莱博议》《儒林外史》《季文敏年谱》。

十月：校《东山外记》《梁书》《句馀土音注》；校《江文通集》毕并撰跋；勘《说郛》目毕。缪氏晚年书事记止民国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十一月初一日艺风老人病逝上海。

但遗老们政治立场也是有区别的，缪荃孙和同寓沪上的好友沈曾植

就不同，沈氏追随清廷残余势力甚殷，张勋复辟，他是积极参与者，不顾衰年多病，赶到北京，“逊帝复辟，诏授学部尚书，而时局旋变”，“期以身殉”，“仓卒中谋所以保义皇室者无微不至”。其于清廷眷恋如此。而缪荃孙则自从光绪甲午弃宫后，对清廷已失去信心，但他仍相信皇权，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称帝，洪宪江苏代表首列缪荃孙其名，《艺风老人日记》该年记事，首行即题“岁在丙辰，洪宪元年”，可知其对袁氏是认可的。

此时，尽管他以前清遗老自居，仍然关心学术、文化的发展，以保护旧文化为己任。进入民国以后，随着中国社会越来越开放，西方文化对中国影响的一步步加深，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办学务者，废弃国文，学生举先辈词章考据之学一扫而空之，以张新学，旧籍也被人们弃如敝屣。这显然不符合文化递承、学术发展的规律。民国二年（1912），他曾给教育总长蔡元培写信，要他设法保护江南图书馆。同年，他以保护传统文化为出发点，和邓实一起发起编刊《古学汇刊》，并提出“学无今古，亦无中西”。缪荃孙居沪，由于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生活比较困难，常以旧槩易米，但是遇到喜爱的书，仍是忍不住购买。他担心典籍流往海外，说：“源流聚散原泡影，慎弗轻归海客船。”同时，他还大力鼓动有力者从事收藏、出版事业，盛宣怀、刘承幹、张钧衡等人藏书，均受到缪荃孙很大影响和帮助，缪氏馆于其家，亲自为他们收书，编写藏书书目，规划、校讎、编刻丛书，成就卓著。秦更年说：“沪上富人之解藏书刻书，亦皆先生有以倡之，得不谓为书林之德星欤。”由于缪荃孙经济上的原因，他这一时期编刻书及所撰题跋多署他人名。缪氏自己也编刻了《烟画东堂小品》《尧圃藏书题识》等典籍。张元济、傅增湘等学者也时向其请益，张氏主持的民国间最著名的古籍《四部丛刊》的编刻，也是缪荃孙首先发起的。

民国三年（1914），缪荃孙参加并主持了《清史稿》的编纂。他不顾年迈体衰，曾两度赴京商办史事。王钟翰曾经谈起：“民国三年（1914），开清史馆。赵尔巽为馆长，聘总纂、纂修、协修，先后百数十人，而名

誉总纂、纂修、顾问不计焉。馆中执事者，有提调、收掌、校勘等职。是时遗老，有主张修史者，有以为不当修者，卒之应聘者多。缪荃孙为国史馆总纂前辈，以史事自任，巍然为之魁率。体例未定，建议蜂起。梁启超所言尤繁夥，然多不中义例，卒从荃孙之议，而略加通变。”缪氏亲撰儒林、文苑等数传。清史馆最终接受了缪荃孙的修史建议，但有所抉择。

民国六年（1917），缪荃孙主纂了《江阴县续志》，他十分关心家乡江阴的文献保存。民国八年（1919）十一月初一日，缪荃孙胃溃疡发作逝世，就在他去世的十天前，他还在撰《翁叔元传》，校《江文通集》，勘《书录解题》，并准备辑撰“今在古书目”。

缪荃孙的一生和整个中国近代史相始终，和近代文化、学术息息相关。他在学术上深受乾嘉学派的影响，最终也没有突破它的桎梏，开创或接受新的治学方法。清代的学术成就，很大程度表现在理董旧籍上，他是清代最后一代理董旧籍学者的典型代表。当一种新文化、新学术兴起的时候，人们往往会产生两种极端，一是将新的东西视为洪水猛兽，拒之门外；一是将旧的一切全盘否定，浮躁肤浅。晚清民初时期的文化嬗变进程中，也产生了这样的流弊。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缪荃孙为我国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为保护传统的东西付出了巨大努力，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财产。我们的文化有了缪荃孙这一个环节才很好地传承了下来，像王国维、陈寅恪、柳诒徵、陈垣、余嘉锡等学者，正是在缪荃孙一辈学者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第二章 创建近代图书馆

近代以来，中国诸多有识之士屡有建立图书馆的提议，到了清末腐朽的清政府几经打击之后，被迫进行改革，公共图书馆的创建也是其中之一。缪荃孙是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先驱者，可谓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

一、创办江南图书馆

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派两江总督端方等五大臣赴欧考察政治。回国后端方盛赞西方文明，首在图书馆之美备。于是上奏光绪皇帝建造图书馆，在奏折中提出了创办图书馆的计划，并推荐缪荃孙主持其事。当时缪荃孙已经六十四岁，即辞去江南高等学堂事宜，担任了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前身之一）的创建人。从江南图书馆筹建，到1907年江南图书馆创建，缪荃孙可以说是主要的创建人之一。1907年江南图书馆建立以后，他又担任江南图书馆首任馆长，直到1909年到北京的京师图书馆赴任，他共担任江南图书馆馆长三年之久。在此期间，缪荃孙为江南图书馆的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具有开创之功。

首先是江南图书馆馆址的选定与馆舍建造工作。经端方亲自踏勘，决定选择江宁城西风景区的惜阴书院旧址为馆址（现南京市龙蟠里9号，原为清道光年间两江总督陶澎所建的惜阴书舍，光绪初年更名为惜阴书院，废除科举后改为上元县高等小学堂）。1908年五月将小学堂迁走，

迁走小学以后，缪荃孙于是主持江南图书馆馆舍的修建工作。1908年九月开工，次年九月建成2014平方米的两层两幢具有民族风格的长方形藏书楼，前后两进计二十四间，共耗银二万七千四百六十一两。先后置办了柜架设备，将八千卷楼藏书整理、编目、上架，1910年的“十一月十八日，开办阅览，制定规章，江苏省之有大规模之公开图书馆，实自是始”。当年12月9日曾报公告，正式对外开放阅览。

上任伊始，缪荃孙作为馆长，不仅开始监督建造图书馆的馆舍建造，还开始了给图书馆收购古籍文献的工作。

当时海内南北藏书家有四大家，即江苏常熟瞿绍基铁琴铜剑楼，山东聊城杨以增海源阁，浙江钱塘丁丙八千卷楼，浙江归安陆心源皕宋楼，其中以丁氏八千卷楼最为著名。其时陆氏皕宋楼藏书于1907年已被日本人以重金全部购去（现藏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八千卷楼为清代杭州丁国典所创，他爱藏书因慕其远祖宋代丁凯藏书八千卷，故给自己藏书楼起名为“八千卷楼”，其孙丁丙（字松生，1832—1899）经多方搜集，除沿用其祖父的八千卷楼外，并以增加的藏书名为“后八千卷楼”“善本书室”“小八千卷楼”。丁丙先生去世后，其后人经商失败，决定出售藏书抵债，时论颇惧重蹈陆氏覆辙。当此珍贵典籍去留存亡之际，浙江提学使支青向著名学者、翰林院编修江南图书馆馆长缪荃孙以及陈庆年通告此事，为丁氏书寻求妥善归宿。于是缪、陈即向两江总督端方建议，全数收购八千卷楼藏书，以免珍籍重蹈外流之辙。缪荃孙主持图书馆后，正值江南图书馆缺乏图书之际，于是本年十月他即和陈庆年（坐办、副馆长）驰赴浙江。

缪荃孙之所以能够很快启程前往浙江购买“八千卷楼”藏书，一是江南图书馆建馆之初藏书的需要，一是缪荃孙与“八千卷楼”的主人有着密切的交往，这与他可以前往购书有一定的关系。当时八千卷楼主为丁申之子丁立诚及其堂弟丁立中（丁丙子）。丁立诚字修甫，光绪元年（1875）乡试亚魁，曾居官内阁中书。缪荃孙与丁立诚素来友善，二人早在光绪二年就在京师订交。30年来书信往还不断，问书质疑，考订版

刻。各出所藏以为校勘，刻印善本以广流通。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时任钟山书院山长的缪荃孙还曾由金陵赴钱塘，一览八千卷楼珍籍，为之赞叹不已。但因当时丁丙（1832—1899）病重，缪氏虽入其门，却终未与丁丙相会，只由丁立诚兄弟接待。次年丁丙谢世，缪氏还深以为憾。光绪二十六年（1900），丁立诚兄弟曾将丁申选定、丁丙编撰的《善本书室藏书志》40卷书稿交缪荃孙，请缪氏删消润饰。缪氏鉴定后，应丁立诚之请，为之撰序文一篇。称赞该志“实能上窥《提要》，下兼士礼居之长，赏鉴考订两家合而为一”。正因为缪、丁二人有长达30年的友谊，有考订学术的多年交往，有共同的藏书志趣，缪氏才成为收购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的最佳人选。

缪荃孙、陈庆年二人与丁氏昆仲先后洽谈四次。丁氏既放心于先人藏书归为天下公产，又可偿还所欠公债，遂于十月二十四日（公历11月29日）与缪、陈签订合同。最终江南图书馆以七万三千元的巨款购回“八千卷楼”的全部藏书六十万卷。缪、陈二人与丁氏成就近代书林一大善举，学界为之庆幸欢喜。当年底，丁氏书陆续运抵江宁（南京）。

此次交易，缪荃孙为主要谋划者。而具体一应交易琐事，缪氏之弟子江南图书馆副馆长的陈庆年居功之首，出力甚多。为保证购书无误，陈氏搜罗八千卷楼全部藏书目录，如《善本书室藏书志》40卷，《八千卷楼书目》20卷等刊印书目与抄本书目，按目核书，查明有无短少，并载入合同。陈氏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合同订后两日，缪、陈与丁氏交易的中间人王绶珊代丁立诚传信给陈庆年，称书目中原载宋版《周易》实为明版。陈氏也以宽容之心未再究，只是在回宁前与丁氏重申前约。又到藏书楼详细查看，以求事成圆满无憾。

丁氏藏书归藏江南图书馆，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蔡元培、梁启超等一时学人无不欢欣鼓舞，赞为盛举。现在此书妥为保存在南京图书馆，辟为专藏。当时因无馆舍，丁氏藏书暂存于南京七家湾自治局内。后来图书馆房舍建成以后，才归藏此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馆内藏书不断丰富。除八千卷楼的丁氏藏书外，

尚有武昌范氏、桃源宋氏的藏书，山阴薛氏之清中名人手札、墨迹，南陵徐氏之书画，以及开办时所调取的各馆书局之官书，加上历年所购的书籍，公私团体、中外名人、作家所赠送的珍品，总计二万二千五百零五部，四十四万二千三百零三卷，百余万册。后来，金石影片图表及淮南书局、江楚书局、缪氏艺风堂等藏书也藏入此馆。所有藏书百分之九十以上为线装书。而线装书中宋元旧刻、精钞名校，占百分之三四十，以购得丁氏善本书室之旧藏为大宗。该馆如此丰富的馆藏，在当时来讲，是任何一家图书馆所不能及的。这是历任图书馆负责人及管理人员在重视藏书和认真保护书籍的结果。这一大批珍贵古籍的收藏使其免于散佚，从而奠定了江南图书馆丰富藏书的基础，亦可谓缪荃孙有功于图书馆事业之一明证。

缪荃孙担任图书馆总办，处理图书馆的重大事务。除了为江南图书馆购买书籍外，还检查图书馆的工程进度。据《艺风老人日记》记载，他曾多次到图书馆工地查看工程进度。1909年江南图书馆建成后，他又主持了图书的搬运上架工作。在缪荃孙的主持下，1910年8月图书馆正式开放阅览。

江南图书馆创建至今已有百年，多次更名，1929年更馆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到1952年10月1日并入南京图书馆。由于该馆丰富的馆藏，上乘的服务，国内许多著名学者曾来此潜心阅读，如鲁迅先生1912年初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签事时，曾经常到江南图书馆借阅古籍。

江南图书馆是江苏省第一家公共图书馆，也是中国最早创立的少数几个公共图书馆之一。从创办时间上看，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以张亨嘉1903年创立浙江藏书楼为第一，其次是1904年创办的湖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福建图书馆，尔后则是江南图书馆。从建馆的时间上，江南图书馆排在第五位。从创立者来看，排名前五位的图书馆，只有江南图书馆由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和著名学者共同创建；从影响来看，江南图书馆也是名震东南，大江南北无出其右；从藏书情况来看，江南图书馆藏书

数量与质量，也雄视天下，独步江南。尤其是在藏书方面，缪荃孙功不可没。

二、创办京师图书馆

京师图书馆的创设，有三个至为关键的人物，首先是礼部侍郎李端棻。光绪二十二年（1896）五月，李上《请推广学校折》主张：“自京师及十八行省会，咸设大书楼，增益人才，其益盖非浅鲜也。”李端棻的构想，由于是首次提出，因此显得较为笼统模糊。李端棻之外，第二个重要人物是学部参事罗振玉。光绪三十二年（1906），罗振玉上“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条陈，指出“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鄙意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划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并提出以下具体办法：第一是“择地建筑也”。“图书馆宜建于往来便而远市嚣，不易罹火灾之处。”“规模宜宏大，至建筑式样，宜调查各国成式而仿为之。其经费至少之数，约须一百万金”。第二是“请赐书以立其基也”。“图书馆之书籍，分二大部，一本国，一外国。本国之书，宜奏请颁赐库藏，以为之基。”第三是“开民间献书之路也”。“从前库书，大率采诸民间。但百余年来，新著日出，而古籍之存海内藏书家，未经进呈者亦不少。今宜援照旧例征取，而奖之亦如旧例”。第四是“征取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各省志书，为历史地理之资料，亟须裒集。宜咨行各省，征取储藏”。“至古金石刻，在秦汉以前者，大有裨于古文学，秦汉以后者，亦有裨于历史。宜仿之通志馆成例，令各省进呈。其私家所藏，则如征书例可也”。第五是“置写官”。“馆中宜置写官。凡民间珍异之书，不愿献纳者，可令写官移写后，而返其原本。写官之选用，可考选各省士子之文学较优者充之。其待遇如各部之书记，其有年劳者之奖励亦如之。其员数不能预定，大约二三十人可矣”。第六是“采访外国图书”。“外国图书至繁赜，宜先择最新最要者购之。先由调查员于调查建筑时，向专门学家咨访，写成应购书

目。回国后可依目购之。以后逐年增置，以期完备。”上述办法之外，“至监守之法，借阅之例，设官之员数等，应参考各国成规而采用之。先由调查员从事调查。”比之李端棻，罗振玉的构想要具体生动、切实可行得多。如果说李端棻、罗振玉的构想尚属倡议的话，学部尚书张之洞的奏请则是实施的至为关键的要着。宣统元年（1909）三月，清政府预备立宪之际，张之洞以学部名义上“分年筹备事宜折”，在折中张之洞确定1909年的筹备任务是颁布图书馆章程、开办京师图书馆，次年各省一律开办图书馆。七月他又上“筹建京师图书馆折”，该折首先指出，在清政府预备立宪之际，应该在本年在京师开设图书馆。张之洞又继续强调设立京师图书馆的必要性，并提出了具体建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京师图书馆开始筹建。因此，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建设，与近代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清末草创中的京师图书馆：在上奏筹建京师图书馆的同时，学部即着手进行人事安排：“图书馆开办之初，事务较烦，应派专员经理其事。查有臣部奏调丞参上行走、办理图书馆事宜、四品卿衔、翰林院编修缪荃孙，堪以派充该馆监督。又现任国子监丞徐坊，堪以派充该馆副监督。又总务司郎中杨熊祥，堪以派充该馆提调。如蒙谕允，臣部即行知该员等迅速到差，以专责成。所有典司书簿，分别部居，及经画工程，商定规则各事，即由该监督、提调等妥筹分任，赶紧办理，以期早日竣工。”

京师图书馆的关防印信有两颗，学部为一颗藏书印鉴曾专门上奏称：“此次开办图书馆，除颁赏书籍外，所有官刻、报效、购买各项书籍，自宜仿照（仿乾隆时翰林院书籍用印）办理。惟图书馆距臣部衙门较远，书籍繁重，移运维艰。且部务殷烦，亦与翰林院不同，臣部之印势难兼用。拟仿照度支部盐茶印、钦天监时宪书印之例，请飭下礼部，添铸印信一颗，文曰‘学部图书之印’，尊藏馆中，用钤图籍，此外一切文牒皆不钤用。是否有当，谨附片陈明，伏祈皇上圣鉴。谨奏。宣统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当日“奉旨依议”。至于关防，京师图书馆曾从学部领回一颗木质关防，文曰“京师图书馆之关防”，但终未启用。宣统

二年（1910）六月初一，京师图书馆监督缪荃孙仍未到差，故只好由副监督徐坊签署报送学部文件，要求启用京师图书馆关防。关防的启用，意味着京师图书馆作为学部下属的一个正式机构开始正式运作了。

宣统二年十月，京师图书馆监督缪荃孙、副监督徐坊均在职视事。十月十七日，缪、徐共署咨部呈文称：“本馆已于本月十六日在地安门外广化寺开办储藏殿阁之典籍，搜采中外之图书。”表明什刹海东北隅之广化寺已定为京师图书馆馆舍，并开始入藏书籍。同时为了赞画馆务，特请学部准聘京卿柯劭忞、侍郎王宝田、京卿董康、参事罗振玉、中书吴昌绶、大令震钧、郎中蒋黼淳、大令于鸿恩等八人为本馆顾问。

由此可见，缪荃孙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是朝廷的委派。当然与当时大臣的举荐是分不开的。缪荃孙担任京师图书馆馆长期间，为京师图书馆的筹办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是为京师图书馆收购图书；二是确定了京师图书馆的办馆宗旨。以他为首对馆舍布局、机构、人员、藏书、阅览开放、经费等进行全面的筹划。应该说缪荃孙为创办京师图书馆做了大量的工作；三是为图书馆编辑书目。

在图书的收购方面，当时缪荃孙正在南京主持江南图书馆，即去常熟与瞿氏商谈为京师图书馆进书事宜。1909年八月，学部函电催赴京，正拟北行，闻恩师张之洞逝世，竟哀痛一病两月方愈，加上其他一些事情，直到次年（1910年）九月才由武昌乘火车进京，十月任职。当时（图书）馆犹未建，暂借城北积水潭广化寺为储书之所。即“任事，先分类清理书籍”。内阁大库藏书元、明旧帙甚多，不少宋本书还是元人打败南宋时从临安秘阁中所得，为藏书家所未见。缪荃孙将其整理并集刻为馆藏《宋元本留真谱》（1911年十月刻印），它著录每书之序跋等，并撰考证一篇。1910年十一月，传旨召见养心殿，监国（醇亲王）询学务及南北图书馆办事，缪先生奏对明澈，以学部参议候补。次年三月，奉派回江南催瞿氏进呈书。约两年前，缪先生曾将瞿氏藏书书目仔细阅读，将其中孤本或钞本、外间流传甚少者，摘出七十一种，嘱即精抄，

并加以旧刊本共百种，准备抄毕一并呈进。不想因质量要求高，抄手又极少等原因，迟迟未完成。遂将抄成的三十七种，暨元明及汲古阁等旧刊十三种，共五十种，开列书目，详细注明影本图章，呈交缪先生五月解往北京。

在京师图书馆的筹办方面，缪荃孙多方面地进行了细致的工作。首先，关于办馆宗旨：缪荃孙按照张之洞主持学部时关于京师图书馆的创建原则“唯是图书馆为学术之渊藪，京师尤系天下观听，规模必求宏远，搜罗必极精详，庶足以供多士之研求，昭同文之盛治”，清朝学部颁布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告章程折》中一方面讲要保存国粹，造就通才，图书应广征博引，供人浏览。图书分为两类，一为保存之类；一为观览之类。但一方面又颇多禁忌，称“唯近时私家著述宗旨悖谬者，一概不得采入”，“海外图书，宗旨学说偏驳不纯者，也一概不得采入”。事实上造成清末的京师图书馆大量调入和采进了中国古籍、善本、孤本、抄本和金石拓片。

馆舍：按照奏折的说法，京师图书馆馆址选在德胜门内，净业湖与湖之南北一带（即今积水潭汇通祠附近），当时这里水木清旷，迥隔嚣尘，是近水远市之地。湖中央分建四楼，入藏四库全书及宋元善本，湖之南北汇通祠一带购房征地建筑书库二所，阅览室及馆员办公室之用。目前急于开馆，暂租广化寺临时充当馆舍之用。

机构设置：缪荃孙担任清末京师图书馆正监督（馆长）时，对机构及人员进行设置，其中设正副监督（正副馆长）各一人，总纂、总校、提调、总办各一个，纂修五人，设四科正副科长各一人，科员十人，写官十八人。

经费的筹划：缪荃孙为筹划京师图书馆置馆地、租用广化寺房屋、修缮、购书、馆内行政开销，曾于1911年（宣统三年）7月报学部，要求拨经费七万两，学部因经费困难要求核减，缪荃孙称五万两仅能勉强敷用，不宜再缩。学部又称京师图书馆两年预算一万五千两要派员一律取回，而缪荃孙称向各处派人购置书籍已花销一万，文庙工程已节约库

银三百三十八两四钱，已无再校之余地。总之，缪荃孙尽力为京师图书馆争取经费，据民国后第一任馆长江瀚称清末已花销两万余两足银，可见缪荃孙之努力。

图书馆书目的编辑：1911年六月，缪荃孙又编出《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四卷，它是一部记载方志的专题性馆藏书目，计著录各省府州县志一千六百七十六部，虽然还不是一部全国地方志的总录，但实为我国近代公共图书馆方志目的滥觞。九月份，复交本馆新编替本书目八卷，是为《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它是从馆藏中提出宋元版，各家钞校者为善本，分类编目而成，采用经、史、子、集类目（1912年，缪荃孙在《古学汇刊》上发表了这两部书目的稿本）。后来，由于辛亥革命起，缪荃孙回上海，与京师图书馆联系至此为止。

在京师图书馆的建设上，虽然有李瑞棻、罗振玉、张之洞等人的建议与筹划，但真正使京师图书馆的建设走向正规的正是缪荃孙，因此缪荃孙作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之父，当之无愧。

缪荃孙在寄寓上海期间，有武进（今江苏省常州市郊）人盛氏自建图书馆，虽无秘册，通行精本甚备，亦请上海的缪荃孙编制书目，遂成《盛氏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这是缪氏为近代武进私立图书馆所做的工作。

三、创办两大图书馆的历史意义

缪荃孙主持创办南北两大图书馆并非偶然，这是因为他在清末藏书界、学术界的地位以及崇高的威望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精通目录版本之学，并且有着丰富的典藏图书整理图书的经验，这是他能够被选为南北两大图书馆的馆长的因素。他在任期间也确实胜任这一职务，在清末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顺应时代潮流，创建了两大图书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缪荃孙创建南北两大图书馆，为中国近代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两大图书馆在创建过程中，收藏并保存了大批古籍，使之免

于散佚，客观上起了保存文化遗产、传播文化的重要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图书馆馆长的缪荃孙功不可没。江南图书馆和京师图书馆所藏之书均为我国流传下来的文化典籍的精华部分。尤其是缪荃孙购买的丁氏藏书为明清两代许多著名藏书家藏书的总汇，有宋本四十余种，元本约百种，精抄精校本和稿本颇富，其中多有范氏天一阁、祁氏澹生堂、朱氏曝书亭、毛氏汲古阁、项氏万卷堂、吴氏瓶花斋、张氏爱日精庐、曹氏倦圃、劳氏丹铅精舍、叶氏得一居、马氏笏斋、汪氏振绮堂、叶氏菜竹堂、王氏十万卷楼、许氏鉴止水斋、赵氏星凤阁、李氏瞿硎石室、袁氏五砚楼、卢氏抱经堂等数十家旧藏。而缪荃孙参与创建的学部图书馆所藏内阁大库藏书宋元旧刻多为明文渊阁遗存，而明文渊阁藏书又来自宋元秘阁。这部分藏书藏在秘阁，罕有人阅览，中不乏孤本重宝。另外其翰林院、国子监南学的旧藏也多为善本珍品。将这些书保存下来，让其避免外流和流散的命运，这无疑是极大的贡献。保护了文化典籍，实际上也是延续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民初之际，人们注重新学，旧籍颇遭土苴。与此同时，别国文化间谍的掠取活动却没有停止，公共图书馆保护古籍的意义也就更加突显了。尤其是缪荃孙为江南图书馆成功地购藏丁氏八千卷楼藏书，为在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的私家藏书流向指明了方向。

其次，这两大图书馆的建立为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奠定了基础。这两大图书馆是西方先进管理方式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们以创建的规模和藏书之富为世人所注目。这两大图书馆在当时均不是建立得最早的公共图书馆，但它们是当时规模最大、运营最为成功的图书馆。经过多代人的努力，今天，以这两座图书馆为基础的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仍是国内最大的两座图书馆。

缪荃孙不仅创建了这两大图书馆，而且在这两座图书馆建立以后，还进行图书馆的图书编目工作，开公共图书馆编辑馆藏书目之先河。他还培育造就图书馆人才，使图书馆事业后继有人，这些使缪荃孙成为我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有突出业绩的人物之一。

第三章 缪荃孙的藏书与刻书

缪荃孙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刻书家，又是著名的藏书家。缪荃孙一生“身历十六省，著书二百卷”，是清末民初与王壬秋、张季直、赵尔巽齐名的“四大才子”。其刻书成就主要包括：书籍与金石碑拓的收藏、书籍的刊刻、文献学著述三个方面。

这位自称身历十六省，著书二百卷的学者，说他是藏书家、目录学家、校勘版本学家、图书馆学家、金石学家、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都有斑斑事迹可证可考。对于这样一位学术上和事业上的多面手，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值得研究，都可以写上洋洋洒洒的专论以至专著，这些都是应该做的。综观缪氏一生藏书事业是一根主线，贯穿平生，只有放在当时背景下，揭示他对我国近代藏书事业的贡献，才能更深刻地、更全面地认识他、了解他，给予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缪荃孙首先是一位藏书家，他积数十年之工夫，藏书十余万卷，金石拓片一万多件，先后建设了对雨楼、艺风堂、联珠楼、云自在龕、丛抄堂、云轮阁、烟画东室、藕香等藏书楼来收藏、保存图书。

让我们先看看缪荃孙的藏书成就吧！

一、书籍与金石碑拓的收藏

在我国漫长的藏书史上，无论于公于私，向来在内容上注重正经、

正史、诸子百家、名人诗文集收藏整理，以为这是根本，在版本上注重宋槧元刊、名抄精抄，以为这是至宝，然而这些东西毕竟越来越少，路子越走越窄，缪荃孙一则自己没有大量钱财，二来不是藏书世家，所以他审时度势，注重方志，金石拓片，以及不为时人所重的小说、闽版书的收集与整理，拓宽藏书路子和范围，并对近代藏书事业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缪荃孙一生喜爱藏书。他行踪遍布大半个中国，所到之处，都设法收藏书籍，即使在赴日本考察期间也有访书的经历。另外，缪荃孙对金石碑拓的收藏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缪荃孙不是藏书世家，因此从书籍的收藏来源来看，他的藏书都是由自己收集而来。其中购买的书籍所占数量最多。同治七年，缪荃孙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始收书，为目录之学”。后来入京，任京官十六年，积极收藏图书，集“四库未收之书，名家孤传之稿，共十万余卷”。光绪十五年，缪荃孙在江苏钟山书院任职时期，恰逢恩科，“书坊云集，贡院前购书颇多”。光绪二十年，“到江宁时，举行甲午乡试，购书多种”。“二十三年丁酉正科，购书甚多”。光绪二十五年，缪荃孙回京，与友朋门生“聚琉璃厂书肆，……在沪土见蒋香生太守书、在都见方柳桥太守书，购及千金。”光绪二十八年“八月补行庚子科场，书贾云集，得书极多。在江南逢科场五次，己丑及是年书最佳。”其后“至庚戌先后，游日本东、西京，又观书于天一阁，领江南学部两图书馆，颇见异书，有购者，有易者，有传钞者，有影摹绝精者，所得与前相铎，辛亥革命以后，缪荃孙寓居上海，佳槧旧钞，于往往易米，……然遇心喜之协，相当之值，遂损衣食之费而置之。”

除购买书籍收藏，他还通过与人传抄交换、接受友朋赠送以及辑佚的方式增加藏书。如他通过与人交换以及传钞补缀而成《全宋文选》三十卷，该书所选文章皆北宋人撰，保留有《元丰类稿》逸文六篇，且是北宋本朝人选文，甚是珍贵。“吾友金君澐生，博雅好古，昔与夏君彦保及荃孙二人互相砥砺，以收拾先辈著作。得一书则彼此传钞，十余年

中，长编零帙得五六十种。”他接受友朋赠送，如朱子涵赠送明曹氏钞本《司空表圣文集》，“吾友朱子涵观察旧藏，曾摹刻《结一庐剩余丛书》，荃孙为校讎，子涵以原书见赠，友朋高义，谨识不忘。”

从其他资料中辑佚整理，再抄录成书，是缪荃孙收藏书籍最费时力的一种方式，然而也是他收藏到十分珍贵书籍藏本的时机。如在修纂《顺天府志》时，从《永乐大典》辑得《明初顺天府志残本七卷》《泸州志残本七卷》《曾公遗录三卷》等多部著作。《瞿木夫金石跋二卷》则为缪荃孙前后数年于各处辑得数十篇，加上朋友况夔生抄录《湖南通志》相关内容补缀而成。以这样的方式和精神搜求和收藏书籍，足见缪荃孙搜罗书籍的执著精神。

缪荃孙所著《艺风藏书记》《艺风藏书续记》《艺风藏书再续记》等书籍，皆为他藏书中质量较优者，而非其藏书总量。但就是这三部著作所著录的藏书数量也是十分可观的。《艺风藏书记》，著录书籍六百三十五种；《艺风藏书续记》，著录书籍七百三十种；《艺风藏书再续记》，著录书籍一百一十种。《三记》共计著录书籍一千四百七十五种。

缪荃孙编撰《艺风藏书记》时称自己的藏书“今天下称瞿、杨、丁、陆四大家，藏书目皆高数尺许，荃孙一鳞片甲，第与拜经楼、平津馆伯仲。”他著《艺风藏书续记》的时候，又收集到《艺风藏书记》写成之时数量近似的书籍。由此可知，在最盛时期，缪荃孙藏书当有二十万卷左右。到了晚年，由于战乱流失、友人借阅未还以及出售等原因，流失颇多，虽遇心爱之书尽力购买，但总体数量却呈减少趋势。寓居上海时期建联珠楼藏书“楼上下五楹，藏书十一万卷，三万余册，触目皆佳籍也。”可知在其去世以前，藏书总量大约维持在十余万卷。而在他去世之后，藏书由其子禄保售于上海古书流通处，十余年间流失殆尽，不禁令人唏嘘感叹。

缪荃孙的图书收藏，方志的收藏是他藏书的一大亮点。

他极重视方志的收藏与整理。他不但直接参与《顺天府志》《湖北通志》《江苏通志》《江阴县志》《昌平县志》的纂修，发凡起例，撰写序文、

志文，而且从他的《艺风堂藏书记》书目中可以窥见一斑，特别是他任职京师图书馆时，在当时内阁调入书多的情况下，他一抓宋元旧刻的整理，编成《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八卷；二抓方志整理，编成《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四卷，收录省府州县志书多达一千六百七十六种，其中明代方志二百二十四种。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缪氏把方志视作与宋元善本同等重要地位。众所周知，我国方志专科学目，前于此者一是《传是楼书目》著录的《天下志书目录》，此书已佚，今不得见。二是周广业的《两浙地志录》，不过集一省之志书目，至于清初顾栋高的《古今方輿书目》，从书名上可知所录不限方志，而包括輿地书。因此缪氏此目是当时最完备的方志书目，称雄几十年，直至1936年任氏《天春园方志目》问世以后。而民国时代的王体仁、任振采、刘承干所谓三大方志藏书，无不是深受缪氏影响的结果。

在金石拓本的收藏方面，缪荃孙也很早就开始了。缪荃孙有意治金石之学始于早年阅读欧阳修的《集古录》与赵明诚的《金石录》。缪荃孙于同治九年冬第二次入京会试之时，“始为金石之学。”第二年落第后返蜀途中，开始了金石收藏。由于金石碑拓的自身特色，缪荃孙收集途径有购买和实地拓印两种方式。金石碑拓的购买主要有如下几次：光绪三年，在京师首次大规模购置书籍和金石碑拓，“汤文端家藏书全出以千金购之，又购韩小亭家碑版拓木四大箱”。光绪十三年，“供职京师，始购书画”。同年“冬月到苏州，得刘燕庭拓木三千六百种”。

另外，实地拓取也是缪荃孙收藏金石碑拓的另一重要途径。“荃孙自二十一岁有志金石之学，身自搜访，手自椎拓。”在京师期间，他曾邀约潘祖荫、叶昌炽等人“纠资往拓顺天、易州、宣化、定州、真定碑刻”。光绪七年主讲山东泮源书院，派人“尽拓泰安、肥城、汶上、东阿、济宁、兰山、沂水、蒙阴十余县”的碑刻；光绪二十二年主讲南京钟山书院之时，认识了善于拓碑的聂名山，尽拓当地以及“上江之太平、当涂、潜山、桐城、贵池，下江之常熟、松江、太仓等处”的碑刻，于是金石碑拓的收藏数量大量增加。缪荃孙本人也由于经常参与这

种实地的拓碑活动，加之处处留心，博闻强识，因此在碑版鉴定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缪荃孙金石碑帖的收藏数量，根据《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自序》：“去其重复者、破损者、模糊者、造像墓志之伪造者、摹刻者、无年月亦无官衔地名可考者，按代编目，共得一万有（又）八百余种”。此书目刻印以后，缪荃孙又陆续有所得，“后收者又及二卷，盖亦千种”，所以缪荃孙金石碑拓的收藏在一万两千种左右。缪荃孙去世以后，他的金石藏品幸而没有散失，基本完整地收藏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内。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为后世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重要的原始资料。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早年在编辑《道家金石略》这部巨著的时候，就曾把缪氏的金石藏品作为最主要的原始资料来源。对此，陈垣先生有明确的交待，他说：“余昔纂《道家金石略》，曾将《道藏》中碑记及各家金石志、文集并艺风堂所藏拓片，凡有关道教者悉行录出，自汉至明，得碑千三百余通，编为百卷。”

缪荃孙首先是一位学者，然后才是一位藏书家，所以他的藏书宗旨不单纯是收藏图书，而是当作一种文化事业来进行，一为著述，他是为了使用而进行收藏的，确切地说就是藏书为著述。他自称“身历十六省，著书二百卷”。二为流通。借阅、赠送和出版是缪荃孙采用的三种图书流通方式。借阅是大家普遍采用的流通方式，他经常把书借给别人，如叶德辉、张元济、刘世珩、叶昌炽、李慈铭、李盛铎等人。赠送：缪荃孙藏书中有很多是友人所赠，他也常常赠书与人。王先谦曾说：“到家后，始拜《藕香零拾》诸书之赐，拔弃百虑，寝馈其中者有日矣”。出版：他“一生与刻书为缘，孤稿秘籍多赖流传，广人见闻，裨益文化之功，可谓至巨。以视世之藏书家得一珍本严锢深扃而不与人共赏，其度量之判，奚啻霄壤”。传先哲之精髓，启后学之困蒙，正是他所秉承的精神。因此他对于刻书之事乐而不疲，自己刻的书和帮助别人刻书的数量当时无人出其右者。三为文化传承。他深切地认识到，藏书活动能够用来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他在著述中说：“藉以网罗散佚，掇

拾丛残，续先哲之精神，启后学之途轨，其事甚艰，而其功亦甚巨”。

二、书籍的刊刻

我国古代公私藏书的历史源远流长，绵延不断，并且形成代代相因的藏书传统路子，这就是：第一步千方百计地广集典籍，保存文化；第二步利用广集的典籍进行校勘，提高文献价值；第三步把校勘的典籍或者所聚的孤本秘籍，重新刊刻出来，使之化身千百，广为流传。私人藏书家之刻书，其类型不外乎一是阅读和研究藏书后的新撰述，二是利用藏书编纂编辑著述，三是利用广集异本校勘后的著述，四是所藏珍善孤本。

缪荃孙一生刊刻书籍繁多，在清末印刷出版界占有一席之地。他“一生与刻书有缘，孤稿秘籍，多赖流布，广人见闻，裨益文化之功，可谓甚巨。”

缪荃孙热衷于刻书与他的经历与学识有关。在刊刻书籍方面，缪荃孙受张之洞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清儒学案·南皮学案》中记载，缪荃孙是选录为张之洞弟子的唯一一人。缪荃孙青年时期在四川谋生，张之洞时任四川学政，缪荃孙以弟子身份投张之洞门下协助其文教工作。其后在缪荃孙供职京师、讲学南京等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张之洞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张之洞一生热衷刊刻书籍，曾作《劝刻书》褒扬刻书者：“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他指出刻书可以：“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缪荃孙对张之洞存有极深的感念之恩，“荃孙一生，与南皮因缘最深。”张之洞在设立广雅书局和江楚编译书局，也曾聘请缪荃孙参与从事。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初刻成之时，还专门“持印本谒张文襄公过目，公阅之以为善”。

足见张之洞在热衷刻书方面对缪荃孙的影响。

从缪荃孙刊刻中负责的事务和所起作用来区分，他的刻书可分为在官办书局任职（公刻）、代替协助私人刻书（代、助刻）和完全以自己

名义刻书（自刻）等几种类型。

公刻书籍

缪荃孙一生三次在官办书局工作，他最早参与的刻书活动也是从同治七年供职成都书局开始的。当时，他还没有科举入仕，为生活所迫，在四川成都书局参与刻书工作，“八月，吴勤惠公师到川督任，招入书局，校刻《朱子全书》，与刻书人作缘始于此。”严格来说，这次刻书工作只是他进入书籍刊刻事业的开始。第二年，他又参与刊刻了《八家文》（方望溪选本）和殿版《汉书》。至于他在成都书局具体担任何种职务，由于无相关资料的记载，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当时缪荃孙还是一个未科举入仕，且家庭生活拮据、学业未成的青年人，其刻书大概也就是干一些具体的事务吧。

光绪十四至十五年，缪荃孙受张之洞延聘，供职于广东广雅书局。广雅书局为张之洞设立，专司刊刻古籍以及教材。所刊刻图书逾千种，包括经、史、子、集、杂著、丛书等等。当时的缪荃孙已经在版本、目录学上有着深厚的造诣，因此被张之洞委派负责访求与选择应刻之书。缪荃孙为担此重任，在尚未到任之时就在浙、京师等地奔走搜求，和其他数人“遍访要籍返粤，在广雅书局刊印”。因此对书局贡献极多。

光绪二十七年，张之洞与刘坤一一起上奏，要求变法，建议开设新式学堂，并筹建译、编撰教科书的新式书局——江楚编译书局，缪荃孙担任了江楚编译局的总纂。该书局除刊经史类书籍外，大量翻译日本及西方书籍。该处所刊刻的《历代史略》，“由纲鉴的旧形式，一变而为教科书的新形式，这大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该局制屡有变革，缪荃孙在此期间又兼任于钟山书院、龙城书院，对在书局工作记载不多，甚至供职至何事也不得而知了。

缪氏为公刻书活动

同治七年（1868）为成都书局刻《朱子全书》。

同治八年（1869）为成都书局刻《方望溪选八家文》、殿版《汉书》。

光绪十四年（1888）助王先谦和江阴南菁书院刻《南菁书院丛书》八集四十一種、《续皇清经解》二百零七種。又为张之洞的广雅书局刻书而访书、选书、校书。该书局所刻《广雅书局丛书》等多达千种，如其中《大金集礼》一书即为缪氏校勘的。

光绪二十七年（1901）再应张之洞所聘，领江楚编译书局总纂，缪氏《续碑传集》八十六卷附存文一卷，即宣统二年该书局所刻。

代刻、助刻

同治八年，缪荃孙除在成都书局供职外，开始为私人刻书，“是年，为董叔纯姻丈校刻《方立遗书》，刻汤秋史先生《听云仙馆文集》”。这是他代人刻书的开端。

同治十一年（1872）为章寿康刻《皋闻词选》《绝妙好词笺》七卷；光绪元年（1875）为姚觐元刻《咫进斋丛书》十二种；光绪三年（1877）为周寿昌（荇农）编《曹文正公文集》；光绪九年（1883）为潘祖荫辑刻《尧圃藏书题识》十卷；光绪十四年（1888）为盛宣怀编《续经世文编》八十卷；光绪二十年（1894）为盛宣怀编刊《常州先哲遗书》，是书皆缪氏搜罗，盛氏出资，至二十四年刻成，凡四十一種附三種；光绪二十四年（1898）为胡聘之编《山右石刻文编（丛编）》四十卷，缪以己藏补入一百余种，为刘世珩助刻《聚学轩丛书》五集六十種附一種，至三十年印成，缪氏出己藏经类书《周易虞氏略例》等七種、史类《周公年表》等五種、子类《松崖笔记》等九種、集类《清白士集校补》等两种；宣统元年（1909）为缪衡甫刻《中吴纪闻》，并撰札记，又为之刻《玉峰志》《玉峰续志》为刘葆良刻其兄刘葆真（可毅）文集；宣统二年（1910）为吴仲飴刻《拙轩集逸文》；宣统三年（1911）为盛宣怀刻《常州先哲遗书续编》二十八種补遗两种附一種，为沈曾植刻《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漱水志》两卷；为吴闿生刻《姑溪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并撰札记，为端方刻《壬寅消夏录》四十卷。

以上所列可知缪氏助人刻书，包括为人选编、提供家藏本、做校勘札记，既无吝色，亦不惜力，成人之美，乐而为之，其精神堪称高尚纯

洁。此外他还向同时代刻书家张钧衡、刘承幹等传授刻书经验，包括怎样选编、挑选底本、校勘、找写工、刻工，乃至版式诸问题。

缪荃孙代刻、助人刻书又可分为这样几种形式：代为选辑，如为盛康、盛宣怀父子编纂《皇朝经世文续编》；代为编辑校勘，如为盛宣怀刻《常州先哲遗书》（正、续编）；出藏书相助，如刘承幹刻《聚学轩丛书》。缪荃孙提供自己藏书二十三种供他使用。缪荃孙受盛宣怀委托刻《常州先哲遗书》，在他代刻书籍中最负盛名。

《常州先哲遗书》的编纂，开始于光绪二十年，刻成于光绪二十五年。《艺风老人年谱》光绪二十五年条记录有书名作者，共计三十六种。而他在《常州先哲遗书正续集缘起》说道：“盛公来函自任刻资，另荃孙任搜辑并校勘，时荃孙乞假赴鄂，选匠征书，先搜旧篋，无者借之友人，写之浙中文澜阁。至丁酉成书四十种六十四册而止。”这两种说法与现存该丛书实际书目共四十三种有所出入，《缘起》一文中还记录有拟刻书目初编共二十七种，可见缪荃孙在编纂过程中不断有所增减，年谱中所记载也非最终成书的记录。该丛书是清代所刻地方丛书中较为优秀的一种，它的内容涵盖了由南朝梁到明的常州籍学人著作，目录学如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史料如明李逊之《崇祯朝纪事》、地理书如宋单懔《吴中水利书》，另外还有多种诗文集等。格式整齐美观，各书皆四周粗黑框，左右双边，上下阔黑口、单鱼尾，版心有书名、页数，半页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字。该丛书出版后颇受好评，故光绪三十四年盛宣怀再请缪荃孙代为刊刻续编，缪荃孙以此体例又先后刊刻二十八种，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后盛宣怀逃亡日本中断。

自刻

缪荃孙完全以自己名义刊刻书籍，开始于光绪八年（1882），这一年缪荃孙刊刻《万善花室文集》《洪幼怀文集》，这是缪荃孙自己出资刻书的开始。自刻书籍类型包括：个人著作《艺风藏书记》《艺风堂文集》等，辑存的有史料价值的著作《云自在龕丛书》等，和外界失传的个人珍藏如《烟画东堂小品》丛书，《藕香零拾》《云自在龕丛书》《对雨楼

书》等。

对缪荃孙所刊刻的书籍的评价历来都很高，这是由于他刊刻的书籍除书籍内容大多是外界罕见且很有史料价值的原因外还有其他几个因素。

首先，他所刻书籍精于底本选择。“书有数本，须择至精者。每书必序原委。异同多者，撰校勘记。”《对雨楼丛书》中有五种书籍为影刊古籍，因此其底本选择颇能体现缪荃孙选本之精。《南朝史精语》《荀子考异》底本为精钞本，《诗品》底本为明正德元年退翁书院钞本，《茅亭客话》底本为穴研斋钞本，《宾退录》底本为影钞宋书明本。如《南朝史精语》“此本有秀水朱十潜采堂图书为曝书亭旧藏，署名《南朝史精语》，仍取宋、齐、梁、陈诸书，未用延寿之作。孤本流传，无别本可校，因取汲古本各书校之方知此本为佳。”精选底本，一则可以保证所刻书籍质量，二则可以减少校对等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其次，缪荃孙非常重视书籍的校勘校对。他所选定的底本必经校勘：“刻书先校底本，是最紧要事。然有佳本方可校，不宜空校臆改。校又须旧刻、旧抄本方可据依。”在刻书过程中，缪荃孙对文字校对要求严格，“校需六次。两人初校、覆校、改错、改完、总校、办画一，揭签、发刻；刻成校亦同之，改好印清样。”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刊刻错误的发生。

再次，他所刻印的丛书很注重版式美观整齐。除《云自在龕丛书》随遇随刻、《对雨楼丛书》有五种为影刊，依照旧版形式之外，其他各套丛书各自版式大体统一。如《常州先哲遗书》格式整齐美观，各书皆四周粗黑框，左右双边，上下阔黑口、单鱼尾，版心有书名、页数，半页十四行、每行二十五字。《藕香零拾》版式为每半页十四行，每行二十一字。上下阔黑口，单鱼尾，四周宽黑框，左右双边，版心有书名、卷数、页数，并标明著者、卷末记字数等。刊刻印刷也很精致，如《对雨楼丛书》，纸质坚白，墨色黑亮，卷末皆有“云自在龕”朱文方印，可列为清刻善本书之列。

缪荃孙刻书最重视丛书。与单行本相比，丛书内容更丰富，在治学方面辅助更大；从收藏角度讲，丛书更便于搜求。所以，他认为丛书更利于书籍传播，他说：“虽云有槧刻而书易传，然传书之功亦惟丛书为最大矣。”

缪荃孙编纂丛书的要求很高。他认为：“凡刻丛书，亦须定一宗旨，采书须全，删节者不录；须雅，平常者不录；习见之书或得后定本、校补本，亦可刻。又宜以类相从。”对于缪荃孙所刊刻丛书的甄选，时人评价很高，叶德辉称：“江阴缪氏《云自在龕丛书》，多补刻古书缺文，亦单刻宋元旧本。虽平津馆、士礼居不能过之。孙、黄复生，当把臂入林矣。”

缪荃孙所刻丛书，以世间罕有或已成孤本的史学、文学著作为主。如《云自在龕丛书》所收《尚书记》《吴兴山墟名》《集古录目》《北窗琐言》及《藕香零拾》中《寓庵集》《静轩集》《清和集》外间早已失传，《藕香零拾》中《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兴战功录》《玉磬初草》等是研究唐宋史的重要史料。另外如《云自在龕丛书》中的唐皇甫枚《山水小牋》为他本人辑佚所得；而《烟画东堂小品》中的《宋元小说残本》的刊行使学界第一次得窥宋元话本的早期面目；《烟画东堂小品》“汇辑宋元以来罕传小品著述”，《藕香零拾》“多世间罕见之书，或虽收入《四库》，但所得版本不同者，始行阑入，间及清代钱大昕、曹中溶著述，但以罕见者为主……此缪氏存古之功，有关史学，不可没也”。《对雨楼丛书》则专门影刻善本，更是体现了保存文献的特色。

缪荃孙的藏书、刻书思想

缪荃孙以其个人藏书数量而论，虽比同期藏书四大家有所不及，但数量及质量均颇为可观。而他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开创阶段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更是无人所能企及。他以私人藏书家和公共图书馆负责人的两种身份，对官私藏书的理解和认识是与一般藏书家不同的。缪荃孙藏书的总体特色是藏以致用，这个特色在不同视角下又有不同表现，具体而言可归纳如下：重视藏书的学术价值；重视藏书的流通；积极主张

公共图书馆收购私藏；重视藏书编目工作等几个方面。

重视藏书的学术价值。私人藏书家藏书的旨趣，很早就有学者进行过研究和分析。明朝学者胡应麟将藏书与绘画鉴赏相对照，认为私人藏书家可分为鉴赏家和好事家。藏书目的一为收藏保管，一为使用赏玩。而后清代学者也多提出自己的观点，例如洪亮吉认为乾嘉时期的藏书家可分考订家、校雕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几种。如果从藏书目的考察，可分为辅助治学、收藏保存和经营贩卖几类。综合而言，到了清代后期学者一般根据藏书的目的和利用方法，大致把藏书家分为三类：以学术研究、读书著述为目的的藏书家，以搜集、收藏典籍为目的的藏书家，和以买卖、整理出版为目的的藏书家。

缪荃孙治学方式恪守乾嘉学风，重实证，不尚空谈，善于参较各种史书、文集以及金石资料为其研究服务。因此他对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其中以目录、版本、辑佚、金石等为精。他自己撰写或参与编撰的著作在百种以上。而且，他的著述，大多经过长期的积累和酝酿，在资料不完备的时候绝不轻易成书，不少著作都是经历十几年的磨砺，而《艺风堂金石文字》更是经历了三十年的积累、校考才最终成文。他一生著述卷帙浩繁，非博览群书而不能为。在一般藏书家视书如宝密不示人的清代，求知的第一条途径就是先丰富自己的藏书。因此，若以藏书的目的而论，缪荃孙主要是为了学术研究之需要。这样的目的决定了他在收藏书籍的时候最先考虑的是书籍的学术价值。

缪荃孙编撰的《艺风藏书记》《艺风藏书续记》《艺风藏书再续记》三种书目所收录的是自己较为珍贵的藏书，最能反映他的藏书旨趣。从这三种书目来看，缪荃孙藏书集部最多，史部次之。但这不能说明缪荃孙对集部专注高过史部。集部书籍的存世数量本来就大大超过史部，收藏较易，而且，集部文献中很多也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缪荃孙治学之主流为史学，而治史之时涉猎广泛，经常参考集部文献也是很正常的。从版本角度来看，缪荃孙藏书宋、元刻本不多，仅为四十五部，而明刻本为最。之所以缺少宋版书，主要是缪荃孙自身的经济条件决定的，并不

是他不喜欢宋版书，而是为了学术研究的需要，尽可能多地收藏对自己学术研究更为有所帮助的图书。宋版书的学术价值在清代早被学界所公认，缪荃孙作为有成就的藏书家对宋版书不可能没有收藏的渴求。而且缪荃孙所撰藏书记尤其详细记载版本信息，也体现出他对书籍版本的重视。清人对宋版书的渴求由来已久，到晚清时宋元版书籍已多为如藏书四大家等财力雄厚者所获，市场所有的少数也是物以稀为贵，叶德辉对此有专门记载：“至近时，宋板（版）书本日稀见，以吾见闻所及，张南皮以三百金购宋本《诗经朱子集传》，可见当时书价之高！缪荃孙所购宋版书，如《魏鹤山集》价白银六十两，《渭南文集》价白银五十两。缪荃孙生活不富裕，是以难以有足够财力收藏宋刻本也是必然的。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因“百宋一廛”而自得，藏书家陆心源以“皕宋楼”夸耀，可见四十五部宋刻本书籍的收藏，也已经不是一个小数目了。

总数达六百七十种之多的各种钞本也很引人关注，这些钞本除收购外，还有很多是他与朋友之间互相相传钞而得，多为外间不易得之书。名家校批本更是学术价值很高，如《仪礼识读》，是卢文弨的校批本，并有卢氏所撰二跋；《一切经音义》则经过段玉裁、王念孙的校定；另外，稿本惠栋《松崖笔记》、孙同元所辑《永嘉见闻录》、戴震《直隶河渠书》等稿本则是清代学术名家之著作。依据上述所分析，可以看出缪荃孙藏书所重视的是书籍的学术价值，而非单求孤稿绝本以屯货居奇。

重视藏书的流通。自古以来，中国藏书家都注重通过各种渠道搜集丰富自己的藏书，缪荃孙也是如此。购买之外，缪荃孙主要靠传抄、交换和接受赠送以及自己辑佚收集书籍。

以详实严谨著称清代朴学，博览群书是治学的必要条件，然而大量购买藏书又必须有可观的收入作为后盾。缪荃孙为人“性刚不能谐俗”，虽三十岁开始入仕为官，早负盛名，但淡泊名利，一生南北奔波，未曾高官厚禄，到五十而弃官归养，以著述自娱，不曾有富贵之时。因此，缪荃孙十分赞赏明末清初藏书家曹溶提出的“古书流通”的观点。曹溶认为，彼此的藏书家，各就观书目，标出所缺少的，彼此约定有无而相

交换，那么，再让人抄写、誊录、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自互换。这样才能真正起到丰富藏书、防止散佚的目的。他认为藏书，必约二三同志，用《流通古书约》之例，差不多会日有增益。对那种固守密藏的藏书家他颇不以为然。所以，他在个人藏书实践中也乐于和人相互钞借。缪荃孙是十分赞同这一主张的。在《艺风堂友朋书札》中记述了他多次与王懿荣、沈曾植、朱祖谋、王国维等人互借传抄书籍事情。

古代藏书家多藏书于密室、束之高阁，如声名赫赫的宁波范氏天一阁，禁以书下阁梯，非各房子孙齐至，不开锁的规矩，并且规定，如有违反，则不许参加祭祖大典的惩戒来严戒子孙，防止图书外流。这在藏书家搜集保存图书典籍方面可为一大功，那么在保存期间不能令其得以利用，竟致书籍徒饱蠹鱼之腹，或者遭水火兵焚之祸，却不能不算是项罪过了。对此缪荃孙说“兹既幸贵归朴手，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珠璧，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于予又何裨？……予不敢自秘，正予之宝爱是书也。”不受囤货居奇的狭隘思想局限的互借互钞，对丰富收藏、学术研究和防止典籍散佚都有裨益。

缪荃孙还积极主张公共图书馆收购私藏。清朝末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西方图书馆事业和思想开始影响中国政界和学术界。光绪十八年，郑观应就详细描述了欧洲国家的图书馆，尤其是大英图书馆的运作特色，倡导在中国建立“藏书院”。其后，维新派、洋务派等纷纷倡导，各地逐步开设图书馆、藏书楼。当时对西方图书馆的关注主要着眼于开放阅览、民众教育等方面。缪荃孙一生追随张之洞，思想不免受到他影响，他又曾赴日本考察学务，对近代图书馆有一定了解。清末危亡的国势，使许多著名藏书世家逐渐走向败落，致使书去楼空、典籍散亡之事屡有发生。“东邻西舍乘我之不虞，图画书籍古物，尽徙而入于海外人之手。”光绪三十三年，号称藏书四大家之一的陆氏皕宋楼藏书被日本岩崎氏静嘉堂文库悉数购去，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同年冬，法国人伯希和盗取敦煌文物及藏书，四部书籍及佛经经卷精美完好者，几乎全被掠去。学术界对于愈演愈烈的典籍流失现象痛心疾首。所以，作为

藏书家的缪荃孙更多关注的是国立公共图书馆收藏文献的作用。他力主利用公立图书馆收购私藏,以防止典籍流散海外,而这也成为是缪荃孙藏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南宋楼藏书流失以后,海内藏书最富的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因为楼主经商失败,家产将被官方主持拍卖,日本人于是又觊觎起丁氏藏书。丁氏所藏大多为明清两代著名藏书家的遗藏,极为珍贵。如范钦天一阁、钱谦益绛云楼、黄丕烈士礼居、汪宪振绮堂等藏书。其中还包括一些《四库全书》修纂所依据的底本和许多名家校勘本,可以说是明清数十位藏书家数百年收藏成果的结晶。值此珍贵典籍存亡未卜之季,缪荃孙等向两江总督端方建议全数收购丁氏藏书,以免重蹈珍籍外流覆辙。江苏巡抚端方于是奏请清政府筹创江南图书馆,缪荃孙与丁氏有三十年的学术交往,于是亲为奔走,使得丁氏放心地将藏书售于国有,为江南图书馆的建立奠定馆藏基石。建馆之后,江南图书馆又收购了许多私人藏书,到1911年辛亥革命时,已经拥有藏书八十万卷,增长速度在清末各公共图书馆中名列前茅。其后,缪荃孙在赴京师筹办京师图书馆之际,南京职务未卸,即赴常熟与“铁琴铜剑楼”主人瞿启甲“商量进书事”。因瞿氏不愿出售,缪荃孙即依据瞿氏《铁琴铜剑楼藏书目》,“详加选择,就其中之孤本或钞本,外间少流传者,摘出七十种,嘱即精钞,并益以久刊本,足成百种。”后来瞿钞录三十七种,另加元明汲古阁刻本共计五十种入呈京师图书馆。缪荃孙赴京师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以后,他又负责先后接收端方采进的扬州徐氏、归安姚氏等私人藏书,以及文津阁《四库全书》、国子监藏书、敦煌隋唐经卷八千余卷和翰林院《永乐大典》残本数百部等国家图书。在收购私人藏书方面,缪荃孙一方面可以防止典籍外流,另一方面也可快速增加馆藏,为以后其他图书馆所效仿。在宣统三年颁布的《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中已经将此作为一项明确条文:“图书馆管理员,均应访求遗书及版本,由馆员随时购买,以广搜罗。……其私家世守不愿出售者,亦应妥为借出分别印刷、影印、过录,以广流传。”

重视藏书目录的编撰

无论对公立图书馆藏书还是私人藏书的整理，缪荃孙都十分注重图书编目工作。身兼私人藏书家和公立图书馆馆长两种身份的缪荃孙，对于藏书编目有深刻认识。综观中国古代藏书史，藏书散亡、焚毁等悲剧屡有发生，仅靠藏于密室保存书籍的方法无法达到保存典籍的目的。学者周永年曾叹息：“藏之一地，不能藏之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之于后世。”缪荃孙认为，藏书编目可待书去之日有目存于世，作为寻一访和辑佚的参考和依据。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顾广沂的观点，指出书目不仅能“开聚书之门径”，而且能“标读书之脉络”。从图书的收藏和利用两个方面指出了藏书编目的重要。

缪荃孙一生自撰或参与编撰的书目有二百一十多种，大多是很有价值的，而且体现出不少创新之处。关于他在目录学上的成就将在“目录学思想”部分有专门论述。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缪荃孙的藏书思想继承了中国古代的私人藏书观念的开明成分，又深受当时社会局势的影响。无论以一己之力还是担任官方职务从事藏书活动，他的藏书思想均体现出最大可能地保存典籍，光大学术的目的。而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清季民初私人藏书与图书馆界藏书的标志性人物之一。

刻书思想。清代有良好的刻书风气。清政府之部、院、监、寺，地方之州、府、县学以及各大书院大多印行书籍，官方先后刊刻多部大型图书，如《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古今图书集成》等。康熙年间，“匠籍”的废止，使得手工业者有了较大的人身自由，解除了手工业发展的一大桎梏。而到了清中叶，由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上述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民间的私人刻书业蓬勃发展，江南四川等地尤其发达，这对早年生活于此的缪荃孙是有很大影响的。

缪荃孙的刻书成就前文已经做出叙述，这里通过分析他所刊刻的书籍以及关于刻书方面的相关著述，来分析他的刻书思想。

重视刻书的原因

除了以上所述的传统刻书风气的影响之外，缪荃孙刻书思想的形成也与他的经历、学识有关。在刊刻书籍方面，缪荃孙受张之洞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

缪荃孙青年时期，在四川谋生，张之洞时任四川学政，缪荃孙以弟子身份投张之洞门下协助其文教工作。其后在缪荃孙供职京师、讲学南京等人生的重要转折关头，张之洞都起到了很大作用。《清儒学案·南皮学案》中，缪荃孙是选录为张之洞弟子的唯一一人。张之洞是清末“新政”中坚，他一生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热衷刊刻书籍。他曾经作《劝刻书》，在书中他褒扬刻书者：“其书终古不废，则刻书之人终古不泯”。他指出刻书可以：“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近代学者叶德辉曾经评价张之洞倡导刻书的巨大社会效应：“文襄倡此言，故光绪以来，海内刻书之风，几视乾嘉时一相倍。”缪荃孙对张之洞存有极深的感念之恩，“荃孙一生，与南皮因缘最深。”张之洞在设立广雅书局和江楚编译书局时，也曾聘请缪荃孙参与从事。缪荃孙《艺风藏书记》初刻成之时，还专门持印本请张之洞过目，得到张之洞的称赞。足见张之洞在热衷刻书方面对缪荃孙的影响。

如上所述，缪荃孙本人是个学者藏书家，藏书搜求未得的苦恼势必经常经历。除了对曹溶《流通古书约》彼此开放书目，相互传钞非常欣赏之外，他对该文章的另一个重要主张也十分认可：就是除相互传钞书籍之外，有条件的藏书家应该将自己所藏书籍刊布流传。缪荃孙认为曹溶：“为古书流通创一良法，藏书家能守此法，则化单刻为千百化身，可以不致湮灭，尤为善计。”他曾经以《流通古书约》中：“节宴游玩好诸费，可以成就古人，与之续命。出未经刊布者寿梨枣。始小帙，讫巨编”三十二字为目次，刊刻《藕香零拾》丛书三十二册三十九种，足见这种刊布流通思想对他的影响。因此，在自己热心刻书之外，他还积极助人刻书，从提供底本，到选辑、校勘等各环节提供帮助。

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成的《常州先哲遗书》四十三种，“则全出

先生藏本，编校亦一手所成。”

这种从增加书籍存世数量以保存典籍的做法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清末典籍外流的严重形势，必然让缪荃孙这样眼界比较开阔一些的学者对中国文化典籍的存亡深为担忧。东洋西洋对中国文化典籍劫掠的放肆和清政府的懦弱无能，促使缪荃孙去思索如何去避免历史上多次出现的“书厄”发生在当时。这种反思导致两种保存书籍的见解：一是加强图书的收藏与管理，二是增加书籍数量扩大流传范围。第一种想法，促使他对建立公共图书馆鞠躬尽瘁；而第二种想法，使他乐于相互传钞藏书，而且热心刊刻书籍。通过这样的途径可以很好地避免由于收藏不慎导致水火灾害、兵祸、虫蛀的损毁以及国破家亡导致的散亡，使得虽亡书于一家，而依旧流传于世。再加上缪荃孙本人精于版本目录之学，而且他所从事的工作多与书籍校勘、辑佚有关，对于古今典籍的流传、聚散情况十分熟悉。因此，他对刻书的功用和认识比较深刻，也身体力行之。

重视丛书刊刻

缪荃孙自己刊刻书籍，最为重视丛书的刊刻。他对于丛书发展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丛书之名所自始韩昌黎诗云门以两版丛书，其间即从积之意。……至唐宋人始合刻各家书，而摘要刻之，曰《马总意林》，……皆任意删减也。后又取各家书，以类相从，而别署美名，曰《儒学警悟》，……首尾完整也。明程荣刻汉魏六朝著作，始以“丛书”名之。”和单行本书籍相比，丛书在治学方面辅助更大，从收藏角度讲便于搜求，而从刊刻而言，所保存的资料更为丰富。缪荃孙讲道，“虽云有刊刻而书易传，然传书之功亦惟丛书为最大矣。”缪荃孙盛赞刻印丛书者，“人谓收拾零星小种，稗不至于湮没，有功艺苑甚巨。”他本人刻印书籍之时也表现出喜刻丛书的风格。他一生刊刻了《云自在龕丛书》等，所刻丛书在收录书籍数量上占他所刻书籍的大部分。

缪荃孙所刻丛书，以世间罕有或已成孤本的史学、文学著作为主。如《云自在龕丛书》所收《尚书记》《吴兴山墟名》《集古录目》《北窗琐言》；《藕香零拾》丛书中《寓庵集》《静轩集》《清和集》外间早已失传，

《大唐创业起居注》《中兴战功录》《玉蝶初草》等是研究唐宋史的重要史料。另外如唐皇甫枚《山水小牍》(《云自在龕丛书》)为他辑佚所得;而《宋元小说残本》《烟画东堂小品》的刊行使学界第一次得窥宋元话本的早期面目;《烟画东堂小品》“汇辑宋元以来罕传小品著述”,《藕香零拾》“多世间罕见之书,或虽收入《四库》,但所得版本不同者,始行阑入,间及清代钱大昕、曹中溶著述,但以罕见者为主……此缪氏存古之功,有关史学,不可没也。”《对雨楼丛书》则专门影刻善本,更是体现了保存文献的特色。

对于缪荃孙所刊刻丛书的甄选,时人评价很高,例如叶德辉称:“江阴缪氏《云自在龕丛书》,多补刻古书缺文,亦单刻宋元旧本。虽平津馆、士礼居不能过之。孙、黄复生,当把臂入林矣。”除此之外,缪荃孙也十分推崇清代刻丛书者自觉保存和传播文献的做法:“近出所刻丛书,见视盖专求近儒辑述,取未刻之书为之,传播经学史学地学算学,无所不备,书又多可传,无偏嗜,无杂糅,丛书之善至此极乎。”可见缪荃孙刻书,重古但是并不轻今。

精选底本、工于校勘的特色

对于缪荃孙所刊刻的书籍的评价历来都很高,除书籍内容大多是外界罕见且很有史料价值的原因外还有其他几个因素。

其一,他所刻书籍,精于底本选择,工于校勘。

“书有数本,须择至精者。”这是缪荃孙刻书的重要原则。《对雨楼丛书》中有五种书籍为影刊古籍,因此其底本选择颇能体现缪荃孙选本之精。《南朝史精语》《荀子考异》底本为精钞本,《诗品》底本为明正德元年退翁书院钞本,《茅亭客话》底本为穴研斋钞本,《宾退录》底本为影钞宋书棚本。如《南朝史精语》“此本有秀水朱十潜采堂图书为曝书亭旧藏,署名《南朝史精语》,仍取宋、齐、梁、陈诸书,未用延寿之作。孤本流传,无别本可校,因取汲古本各书校之,方知此本为佳。”

精选底本,一则可以保证所刻书籍质量,二则可以减少校对等工作强度,提高工作效率。缪荃孙非常重视书籍的校勘,无论对于藏书还是

刻书，他都把校勘作为必要的手段。他认为，“刻书先校底本，是最紧要事。然有佳本方可校，不宜空校臆改。校又须旧刻、旧抄本方可据依。”“书有数本，须择至精者，每书必序原委。异同多者，撰校勘记。”缪荃孙从丛书内容的筛选标准，书籍底本的选择与校勘的方法都有概括。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刻书方式的一次总结。

其次，他所刻印的丛书比较注重版式美观整齐。单刻不记，丛书除《云自在龕丛书》随遇随刻、《对雨楼丛书》有五种为影刊之外，其他各部丛书各自版式大体统一。如《藕香零拾》三十二册，收书三十九种，版式为每半页十四行，每行二十一字。上下阔黑口，单鱼尾，四周宽黑框，左右双边，版心有书名、卷数、页数，并标明著者、卷末记字数等。刊刻印刷也很精致，如《对雨楼丛书》，纸质坚白，墨色黑亮，卷末皆有“云自在龕”朱文方印，可列为清刻善本书之列。

再次，刻书重视题跋撰写。在经过严格选本、精心校勘之后，缪荃孙多作序跋记录从底本选择到校勘的过程，“每书必序原委，异同多者，撰校勘记。”这也是和他目录学者的身份相符合的。另外，缪荃孙一生敬仰黄丕烈，对黄氏所著藏书、刻书题跋十分推崇，他自己在刻书的时候自然也勉力而行。夏孙桐说他：“所校刻古书，详溯原委，剖析异同，具载于序跋。论者谓与莞圃书跋允称同调。”由于这些原因时人对缪荃孙所刻书评价颇高，“近年贵池刘世衡《聚学轩丛书》仿宋本书，兰陵徐乃昌刻《积学斋丛书》及《随庵丛编》，仿宋元本书，南得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刻丛书均缪氏主持，胜于杨氏（守敬）所刊远矣。”

对印刷史和对刻书经验的总结

长期的刻书工作，缪荃孙对中国印刷史也有一定研究，留下许多关于古籍版本考证的序跋，保存了中国印刷史的许多相关资料。例如他从版本流传角度详细论述了明监本宋、辽、金史的草率之处。他讲道，元人徐一夔《始丰稿》载俞之中墓碣云：“至正初（四年甲申）朝廷修三史，移文江浙行省缮写镂版，遣翰林应奉张翦视工，属子中校正。”……《续夷坚志·王起善跋》云：“至正戊子八年，武林始刊《金史》，始获一

睹。殆以《宋史》卷帙繁重，《辽、金史》政事僻陋，故止浙中一刻，无他本，行世遂少。”《日知录》载：“嘉靖初，国子监官张邦奇刻《清二十一史》云：十七史取旧版修补，宋史取广东版，辽金史求善本翻刻。”

通过这段话，我们可以得知，元刻宋、辽、金史，初于浙江刊印，后只有《宋史》广东版在明刻监本二十一史时尚存，其他皆为依照印本翻刻而成。

他进而又从版式上考证监本辽金史直为摹刻，未加校勘：“……其字形、行格每页廿二行，每行廿二字，低行，错卷皆同……大抵取浙版印本翻作监版无疑。”

这样不加校勘的翻刻最终导致了“致北监本，踵成其谬”。这对于考证明代殿本《二十一史》版本的研究很有借鉴意义。他还记述了明清时期活字印刷的有关事情：“锡山兰雪堂活字本，华君理字汝德，别号梦管印也。印书有《百川学海》《蔡中郎集》《白氏长庆集》等书。”其后“会通馆活字本，华君隧字文辉印也。印本有《容斋五笔》《锦绣万花谷》《书经》《诗经》白文等书。……后有安国，亦无锡人，亦有活字本有《颜鲁公集》《魏鹤山集》等书。”这为研究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线索。由于他经常参与具体的刻书活动，因此对于刻书的工作程序和方法有深入了解，并乐于传授他人。例如他在给张均衡、刘承幹写信，除前面提到的校勘方面外，还对所刻书籍内容标准，底本选择，工作程序，刻印时的校对等方面作出总结和建议：

凡刻丛书，亦须定一宗旨，采书须全，删节者不录；须雅，平常者不录；习见之书或得后定本、校补本，亦可刻。又宜以类相从。刻家须觅向来能任事之殷实铺户，多雇写手，分写校定，分致刻匠。沪上刻手不多，……今宜分送湖北、江宁、苏州三处，以便速成。校对须添数位，……校不速，不送；校不精，亦不送。校需六次。两人初校、覆校、改错、改完、总校、办画一揭，签发刻；刻成校亦同之，改好印清样。先请二君将所藏欲刻之书检出多种，分至佳、两单至佳者先刻。其次在可刻可不刻之间，后有佳者亦换去。垞乡先辈之著述，如张秋

水……之著作，广布为是。于宋元乡辈文集，尤宜搜求。虽有刻本，刻亦不妨。

后人对缪荃孙刻书成就赞赏有加，说他“一生与刻书有缘，孤稿秘籍，多赖流布，广人见闻，裨益文化之功，可谓甚巨。以视世之藏书家得一珍严锢深扃而不与人共赏，其度量之判，奚舍天壤。”

第四章 缪荃孙的文献学成就

缪荃孙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还是晚清时期著名的文献学家。他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方面都堪称大家，学术成就斐然，学术思想卓著。

一、目录学成就与目录学思想

缪荃孙二十五岁始治目录学，即“粗识目录之学，奉兹环宝，欢为钜观，扶幽显晦，共知搜集之苦心，嚼征含宫，惮识源流于雅乐云尔。”终成晚清一代目录学泰斗。其目录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目录学著作

缪荃孙是晚清目录学大家，涉及目录学领域甚广，兹将其著作分类如下：

书目汇编：《五家宋元书目》六种，包括《稽瑞楼书目》《孝慈堂书目》《书钞堂书目》《宜稼堂宋元版书目》《张幼樵藏书》《结一庐原目》。

通论：《日本访书记》一卷，《琉璃厂书肆后记》一卷。

史志目录：《唐书艺文志注》四卷，《辽艺文志》一卷，《拟清史艺文志稿》不分卷。

藏书目录：《艺风藏书记》八卷，《艺风藏书续记》八卷，《艺风藏书再续记》不分卷。《嘉业堂藏书志》四卷；《适园藏书志》十六卷（代张钧

衡辑);《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十八卷,附录二卷(代盛宣怀辑);《天一阁失窃书目》不分卷。《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五卷,《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一卷。

题跋:《艺风堂题跋》一卷,《红雨楼题跋》二卷,《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二卷,《士礼居藏书题跋再续记》二卷,《尧圃藏书题识》十卷,《补遗》一卷,《刻书题识》一卷,《补遗》一卷(与章钰、吴昌绶合辑),《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六卷(代潘祖荫辑),以上编辑之属。

举要目录:《书目答问》四卷(代张之洞辑初稿)。

专题目录:《词小说谱录目》不分卷。

版刻书影:《宋元书影》不分卷。

郡邑著述:《湖北通志艺文志残稿》不分卷,《顺天府志艺文志》五卷,《江阴县续志艺文志》二卷。

金石目录:《艺风堂金石文字目》十八卷;《艺风堂金石文字续目》三卷;《金石分地编目》三十二卷;《再补寰宇访碑录》三册;《寰宇访碑续录》不分卷;《金碑目》一卷;《云自在龕金石目初编》《续编》不分卷;《云自在龕金石目杂稿》不分卷;《直隶金石文钞》一卷;《江西金石目》不分卷;《江苏金石志》二十四卷,《待访目》二卷;《湖北金石志》十四卷;《金石录今存碑目》一卷;《辽金石目》一卷;《顺天府志金石志》三卷;以上金石碑版之属。《读画斋印谱》不分卷,以上印玺之属。《壬寅消夏录》四十卷,以上书画之属。

通过上述分类我们可以看出缪荃孙的目录学涉及领域之广,著作之富。

(二) 目录学思想

缪荃孙对于目录学史和目录学理论,既能继往开来,又能独树一帜。我国约两千年前已产生图书目录。缪荃孙指出“自更生刘向《七略》出而有天府之书目,自孝绪《七录》传而有私家之书目。……书目亦分两类,一则宋槧明钞,分别行款,记刻书之年月,考流传之图记,以鉴古为高,以孤本自重,如《爱日精庐藏书志》《艺芸精舍宋元子目》

是也。一则涉猎四部，交通九流，蓄重本以供考订，钞新佚以备记载，供通人之浏览，补秘府之缺遗，如高儒之《百川书志》、钱遵王之《述古书目》是也。”即官家目录起自《七略》，私家书目源于《七录》，并分两派，这样概括是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对于书目的作用，缪荃孙认为，“藏书、读书者循是而求，览一书而精神形式，无不具在。”我国著名目录学家钱亚新认为，所谓“精神”是指一书的内容实质，所谓“形式”是指一书的外表体制。这种要求是我国目录学的优良传统，而鲜明地加以强调的，却始于缪氏。缪荃孙对私家著录又有精辟的论述，他说“目录之学，始于向、歆。以私家著录，屹立于天壤者，以昭德晃氏与吉安陈氏为最。国朝以来，钱遵王《敏求记》为人所重，然钞刻不分，宋元无别，往往空论，犹沿明人习气。若《也是园书目》《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季沧苇藏书目》仅存一名，更无论已。”其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缪荃孙序《书林清话》说：“荃孙于版本之学，亦有同嗜。丁卯川闾，策问《文选》一条受知李顺德师，以目录之学相勖，孜孜屹屹五十余年，未尝稍懈。”据《艺风老人日记》记载，该序撰于民国七年（1918）八月八日，这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一生治目录学的一个总结。缪荃孙于此学终生用力甚勤。

缪荃孙对目录的分类，主要体现于其所编著的藏书目录、举要目录、专题目录、郡邑著述目录著作和所编辑的题跋中，其他各种目录著作或无关平分类，或过分简陋谈不上分类。

1. 对四部分类法的继承和突破

缪荃孙采取四部分类法的书目主要有《适园藏书志》《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录》《天一阁失窃书目》《堯圃藏书题识》《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书目答问》。四部分类法始于魏晋，经千百年的调整、完善，到《四库全书总目》时被定为一尊，受其影响，清代藏书家编目少有违之者。四部分类法的流行，一方面是学术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受《四库全书总目》的影响。缪荃孙在编上述书目时继承了四部分类法，同时又表现出

了改革精神。在编写《书目答问》时，他采用了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又从辨章学术角度考虑，将丛书独立，与四部并列，他说：“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丛书独立立目始于明祁承陂《澹生堂书目》，是一大突破，不过仍附于子部内。其后《千顷堂书目》及《明志》附之类书，《四库全书》列之杂家杂编，尤为不类。《书目答问》将丛书独立，使其不再杂于四部，突出了丛书的价值，也符合当时丛书的发展现状。丛书的辑刻，至明渐众，入清大盛，而晚清最盛。这和魏晋时期史学需从经部独立出来颇相仿。由于这种分类法较具有科学性，至今仍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书目采用。缪荃孙将丛书独立出来，也符合书目实用化的标准，因为“丛书最便学者……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丛书独立，当然更便于检索利用。除了《书目答问》外，《愚斋图书馆藏书目》实际上也是采取了这种分类法，其附录二卷，即为丛书目录，附录部分或非出缪荃孙手，但体例为其手订当无疑义。

值得一提的是缪荃孙将丛书目录独立出来的书目均非善本书目，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风气，善本书目多载宋元旧刻与旧钞秘籍，其时丛书尚不发达，鲜有收录。故缪荃孙其他几种善本书目仍守旧法。

缪荃孙在目录分类上的另一大创建表现在方志、艺文志上。其《顺天府志·艺文志》分为“纪录顺天事之书”和“顺天人著述”两类，《昌平府志》又踵其例。方志艺文志的功用在于录一地之文献，使人藉以览一地人文之盛，史事沿革，所以这两类著作缺一便不完整，而如此分类，也更便于检索。所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艺文志》及‘记述顺天府事之书’，虽属创体，最为可法。”

缪荃孙对于目录比较看重解题，且有自己的目录学取向。他对目录学发展史有系统的认识，“艺文有志原出更生，目录标目始于高密。”更生指刘向，他撰《叙录》是我国目录学的源头；高密指郑玄，《四库全书总目》目录类小序云：“郑玄有《三礼目录》一卷，此名所防也。”论其发展史说：“目录之学肇自西京，更生撰《叙录》于前，子骏成《七略》

于后，条流派别，兼具解题，班氏《艺文志》因斯而就。私家编辑始于梁处士阮孝绪，隋《经籍志》据订存亡。今所传者则以南宋晁、陈两家为书林之矩矱焉。《遂初》兼载重本，《敏求》独嗜宋刻，踵事增华，例益加密。至于考撰人之仕履，释作书之宗旨，显征正史，僻采稗官，扬其所长，纠其不逮，《四库提要》实集古今之大成。若夫辨板刻之朝代，订钞校之精粗，则黄氏堯圃蹊径独辟，惜《所见古书录》未能手订成书，而掇拾丛残，犹觉空前绝后，非他书目可比。”他对目录学的演化历程一目了然，也指出了各家目录的显著特色。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他希望目录能兼具《四库提要》与黄跋两者之长，在评价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时说它“实能上窥《提要》，下兼《士礼居》之长，鉴赏、考订合而为一，可谓书目中惊人秘籍”。这实质上是要融提要体、藏书志为一体，为治学、藏书提供门径。他的这一观点在评价《积学斋藏书志》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积馀此目，其书必列某本旧新之优劣，钞刻之异同，宋元本行数、字数，高广若干，白口黑口，鱼尾旁耳，展卷具在，若指诸掌，其开聚书之门径也。备载各家之序跋，原委粲然，复略叙校讎、考证、训诂、簿录汇萃之，所得各发解题，兼及收藏家图书，其标读书之脉络也。世之欲藏书、读书者，循是而求，览一书而精神、形式无不具在，不胜于《敏求记》倍蓰乎。”荃孙的这种提法是对顾千里、张金吾的继承与发展，顾氏在序张氏书目时即说：“若夫月霄之目，乃非犹夫人之目也。观其某书必列某本旧新之优劣、钞刻之异同，展卷具在，若指诸掌，其开聚书之门径也欤！备载各家之序跋，原委粲然，复略叙校讎、考证、训诂、簿录汇萃之，所得各发解题，其标读书之脉络也欤！世之欲藏书、读书者，苟循是而求焉，不事半功倍欤！”但张目不尽完善，荃孙说：“月霄《爱日》，牖列序跋用《通考》例，未举异同，虽略胜于前型，犹未推为巨擘。”故进一步强调继承《四库提要》考订学术源流与《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讲究版本源流两种优秀目录，将二者融而为一。缪荃孙的这种观点对于目录的最终要求在于为读书者提供治学门径，为藏书者提供藏书门径，所谓使人们“循是而求，览一书

而精神、形式无不具在”，这样可以使目录最充分地发挥作用，无疑代表着当时目录学发展的方向。

缪荃孙提倡的这种兼具鉴赏、考订之长的目录学理论，可谓近乎完美，但实践起来却不容易，缪荃孙自己就没能做到。若论版本授受源流，翻摹本末，行幅疏密广狭，帙缀精粗鄙好，开聚书门径，后人书目胜过《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者颇多；若论提要钩玄，释作书宗旨，考学术源流，指治学门径，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能企及《四库提要》者。余嘉锡说：“若夫考作者之学术，因以定其书之善否，此在目录中最居重要，较之成一家之言者为尤难，非博通古今，明于著作主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不能办。”荃孙所编书目，皆在短时间内匆匆完成，故不能达到较高境界。其《藏书记》是“尽录题跋、印记，有《四库》未著录者略举人之仕履，书之大意”，《续记》《再续记》皆踵前例。严佐之评价说：“就此数端而言，与前时或当时其他藏书志相比，并无什么新意新制。”另外，其晚年所编的《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则完全是版本目录。

当然我们并不能说缪荃孙撰写目录著作完全没有鉴赏、考订并重的取向，其后期为张钧衡编写《适园藏书志》，即“依《四库》分类，而每书先具撰人仕履，再述书之大略，载其行款，陈其同异”，反映了鉴赏考订并重的趋势。为刘承幹编《嘉业堂藏书志》亦是如此，兹举《佩韦斋文集》为例说明：

《佩韦斋文集》二十卷，旧钞本。宋俞德邻撰。德邻字宗大，号太玉山人，永嘉人，徙居京口。举咸淳癸酉进士，宋亡不仕，遁迹以终。宗大以文学负世众望，为当道罗致。方其劫质军中，爵禄不能诱，刀钺不能懼，卒全其志。诗则闲雅冲淡中发扬蹈厉之意存焉，文则论辨闳深，叙述详核可据，忠厚恳恻之情藹如也。后附《辑闻》四卷，多考论经史，间及于当代故实及典籍文艺，大抵皆详核可据，不同于稗贩之谈。首有皇庆元年建安熊禾序，《辑闻》前有自序。《四库》以诗文十六卷入别集，《辑闻》四卷入子部杂家。此犹旧时原帙。有“古香楼”朱文圆印，“休宁汪季青家藏书籍”朱文方印，“抱经楼”白文方印。显然是

兼论学术高下和版本异同了。

另外，缪荃孙所撰写的一些题跋也能反映出其鉴赏、考订并重的目录学思想。题跋于宋代大兴，多用来评鹭他人诗文或记录收藏和鉴赏的金石书画，到陆游开始大量用以论藏书，到清代，题跋成了目录学的一种重要体裁，同时在风格上，也由以记叙为主的小品散文转向了注重考订的论文体。

2. 对中国传统目录学的认识与前瞻

缪荃孙在长期的编制书目的实践活动和学术研究中，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形成与发展有深刻的认识。中国的目录学，从东汉刘氏父子肇始，即体现出重视辨彰学术的良好倾向。其后，史书经籍志、艺文志，以及大多数官私书目，走的都是这条道路。而至宋代，随着印刷技术的快速发展，书籍印刷和传播速度剧增，同一书籍的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由于印刷导致的版本问题，成为影响书籍内容表达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版本的鉴赏和考证开始成为一门专门学问，而版本目录也成为一种重要的目录类型。南宋尤袤所著《遂初堂书目》划分版本按照刻书时代、地域、刻书机构以及刻书行款等例，开创了版本目录学的先河。到了清代，随着考据学的兴起，宋版书以其印刷精良考究，讹误较少，更为贴近古籍的原始面貌而受到藏书家和学术界的重视，版本目录也呈现兴盛之势。缪荃孙把古代私人藏书书目分为二类，一类重在版本流传的考证，一类主要在于对书籍内容的保存。并进而提出，目录之学演进至清末，“例益加密，至于考撰人之仕履，释作者之宗旨，显征正史，僻采稗官，扬其所长，纠其不逮，《四库提要》实集古今之大成；若夫辨版刻之朝代，订钞校之精粗，则黄氏尧圃蹊径独辟。”可以看出，他对于反映书籍内容的学术性和方便收藏鉴赏的版本方面都是相当重视的。

目录学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从书籍内容和形态的不同角度将其归类与区分，以方便研究、收藏、检索与利用。从这个角度而言，某一分类标准在编目实践时能够贯彻始终，起到分门别类的作用，此种分类法就有一定的可取性。然而，学术研究深化后的包容与贯通性，在一定意义

上是排斥这种单纯偏重某一角度的分类的。业已形成的偏重学术和偏重版本的两种编目方式，由于这个原因，在清末有兼容的趋势，如清末四大藏书楼在编藏书都表现出这种倾向。

因此缪荃孙申明了编撰目录的原则：“藏书、读书者循是而求，览一书而精神形式无不具在。”缪荃孙很赞赏《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志》的编目方法，称该书“考其事实，月卢其得失，载其行款，陈其异同，成书二十卷，实能窥其《提要》，下兼士礼居之一长，赏鉴考订两家合而为一，可谓书目中惊人秘复。”他还指出《积学斋藏书志》：“其书必列某本旧新之优劣，钞刻之异同宋元本行数字数、高广若干，白口、黑口、鱼尾、旁耳、展卷具在，若指诸掌。备载各家之序跋、原委集然，复略叙校雕、考证、训诂、薄录汇萃之，所得各发解题，兼及收藏家图、书一其标读书之脉络也。”他所主编的《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在对已所收录的书籍记录流传过程及版本外，特别记录了书籍的尺寸和印刷特征。如记录“子部天算类”《景佑乾象新书》，先列出为归安姚氏藏书，再列出撰写人，尔后记述该书为明沙棉纸蓝格本，书上有无锡白文华馆藏书印等，使人见文如见原书，为研究书籍真伪和版本流别提供佐证。

二、版本学成就

缪荃孙又是清代著名的版本学家，缪荃孙非常精通版本，对于历代刻本情况，可谓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其于版本源流、版本鉴定、版本目录都有独到的研究和贡献。关于宋刻本，缪氏在《藏书纪要跋》中说：“宋人印书，纸、工、墨价与今仿佛，但流传于世者，无不精妙，不似今之粗率……故以宋刻为善。宋人之书，纸坚、刻契、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著水经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关于清坊刻本，缪氏说：“近时闽中书肆刊书，往往改易，其类甚多，不能悉记，今姑取一二言之……将来谬乱书传，疑误后

学，皆由此也。”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此外，缪氏还从内容、形式两途鉴定版本，进而弄清版本年代、优劣真伪，提高刻本质量，为读书治学和科学研究提供一个精良的善本。总之，由于缪氏精通版本，知其善恶，因而，缪氏刻本在底本、校勘、纸张、用墨等方面处处注意，故能饮誉海内，有口皆碑。

（一）缪荃孙对版本源流的研究

关于图书载体竹简、嫌帛、纸张的演变，缪荃孙说：“炎汉初兴，书皆竹帛。班固所谓‘篇’，竹书也；‘卷’，帛书也。竹册书则用刀刻之，灭则削之。……帛则以笔书之，笔之制始自蒙恬。汉孝成帝时，宫中出小赫蹄，即纸也。后汉始有以纸书者，皆以卷计。”这就是说缪荃孙认识到东汉才有了纸张的出现，并出现了写本。关于历代写本的特点，缪荃孙认为，梁代、陈代书皆短幅黄藤纸，文字拙恶，且内容多不审定。齐周书则纸墨恶劣，文字欠画加点，应三反四。隋代旧书最为丽好，率用广陵麻纸缮写，书体妍妙可爱。关于雕版印刷起源时间，缪荃孙认为始于五代，“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至冯道始奏请镂板印行，自是刊镂益多”，此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

对于历代刻本情况，缪荃孙可谓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对于宋刻本，缪荃孙在《藏书纪要跋》中云：“宋人印书，纸、工、墨价与今仿佛，但流传于世者，无不精妙，不似今之粗率……故以宋刻为善。宋人之书，纸坚、刻契、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著水经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缪荃孙从纸张、刻工、字体、避讳、用墨等方面肯定了宋刻本的精妙。对于元刻本，缪荃孙在《藏书纪要跋》中也有精辟论述，“元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细，印刷清朗”。对于明刻本，缪荃孙认为，明人刻工最轻制书雅意，在明中叶，尚属讲求，末造则不及矣。对于清坊刻本，缪荃孙之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他说：“近时闽中书肆刊书，往往改易，其类甚多，不能悉记，今姑取一二言之……将来谬乱书传，贻误后学，皆由此也”，此外，缪荃孙对于明清时期活字印刷的有关情况，也有精辟论述，“锡山兰

雪堂活字本，华君程字德，别号梦营印也。印书有《百川学海》《蔡中郎集》《白氏长庆集》等书。”其后，“会通馆活字本，华君隧字文辉印也。印本有《容斋五笔》《锦绣万花谷》《书经》《诗经白文》等书。……后有安国，亦无锡人，亦有活字本。有《颜鲁公集》《魏鹤山集》等书”。这为研究中国活字印刷的发展历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线索。

缪荃孙为了能够准确考订一书版本源流，常常广泛搜集书目并加批注，如当他见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时，“大喜捧归，觅人录副，小小讹脱，见即订正，并就所见书目、添注眉头，藏诸筐中，以作枕秘”。在考订过程中，缪荃孙善于利用书目与题跋，如“《增修复古编》二卷，宋张有谦编，元吴均增补，明洪武刻本，传本甚少。各家书目止《爱日精庐藏书志》有之，与此本合，是洪武年刻……拜经楼题跋有是书，为汲古阁钞本。有济美堂、汲古阁诸图记，并脱陈张两序云云，愈显此刻本之不易见矣，艺风”。由此可见，缪荃孙通过查《爱日精庐藏书志》及《拜经楼题跋》得出《增修复古编》一书有洪武刻本和汲古阁钞本，且“传本甚少”的结论。另外，缪荃孙为了考证明代殿本《二十一史》的版本情况，从版本流传角度详细论述了明监本宋、辽、金史的草率之处，“元人徐一夔始丰稿载俞之中墓褐云：‘至正初（四年甲申）朝廷修三史，移文江浙行省缮写镂版，遣翰林应奉张霁视工，属子中校正。’……《续夷坚志·王起善跋》云：‘至正戊子八年，武林始刊《金史》，始获一睹。殆以《宋史》卷帙繁重，《辽、金史》政事僻陋，故止浙中一刻，无他本，行世遂少。’《日知录》载：‘嘉靖初，国子监官张邦奇刻《清二十一史》云：‘十七史取旧版修补，宋史取广东版，辽金史求善本翻刻’。”通过这段引证，可以得知，元刻宋、辽、金史，初于浙江刊印，尔后只有《（宋史）广东版在明刻监本二十一史时尚存，其他皆为依照印本翻刻而成。他进而又从版本上考证监本辽金史直为摹刻，未加校勘：“……其字行，行格每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低行，错卷皆同……大抵取江浙印本翻作盗版无疑。”这对于研究明代殿本《二十一史》的版本有借鉴意义。

（二）版本鉴定

版本鉴定是古籍版本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通过鉴定，弄清版本年代、优劣真伪，为读书治学和科学研究提供一个精良的善本。

从内容上鉴定版本，又可从卷数、篇目、内容文字、编例等几个方面进行。缪荃孙在考订《宋太宗实录》一书时，即是从卷数上入手，“《宋太宗实录》，原八十卷，今存卷二十六至三十卷、七十六及七十九、八十共八卷……《艺芸书目》有十二卷，为三十一之三十五、四十一之四十五、七十七、七十八，与此不同，自是两本。”可见，《宋太宗实录》有八卷、十二卷两个版本。篇目是古籍的最小单位，篇目的数量，排列等也可作为鉴定版本的依据。如“《曹子建集》十卷，魏陈思王卷……此十卷本明嘉靖中郭万程所刻。目录后附音释，有徐伯札序。荃孙以宋本校一过，宋本每页八行、行十五字，板刻精妙，字太悦目。凡赋四十三篇、诗六十三篇、杂文九十篇，与郭本不合……”，此为缪荃孙从篇目的数量上考证郭本与宋本的不同。又如《刘宾客外集》十卷，旧钞本，唐刘禹锡撰。《宾客外集》，世罕流传，颇称珍秘，至有颠倒正集以充贗本者……”这是从篇目的排列顺序上进行鉴定。缪荃孙还从内容文字上纠正士大夫在版本鉴定方面的错误认识，“赵寒山《玉台新咏》，崇祯六年刻本，镌本古雅，书估往往抽去后序，冒宋原本，即士大夫亦信之。其实宋本每卷之末《玉台新咏》。下注诗若干首，字数不一，均与寒山本不同，一望而知。”“编例”是指一书内容的编制体例，不同时代的版本在编例上往往存在较大差异，缪荃孙说：“明刻本惟不遵旧式，妄为分体，明人恶习，大约不止八种……”由此可知，明刻本在编例上，一改宋刻本将唐诗按感兴、咏怀、送别、哀伤等方面分类编排特点，而将其按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等方面分体编排，这为我们鉴定宋刻和明刻本唐诗别集提供了一可靠依据。

缪荃孙在鉴定古籍版本时，重视内容，但并不完全排斥形式。他常从版本的字体、行款、牌记、序跋等形式特征来鉴定版本。如“《漫塘刘先生文集》二十二卷，宋嘉熙四年赵葵序，即《天禄书

目》所推为宋版者，然字形微带方体，又系活字，不敢速定为宋刻，疑《天禄》所收为真宋本，此则明人以活字印行者”。“方体”即明之“匠体字”，缪荃孙正是通过字体这一形式特征，区别宋刻本与明活字本。又如“《吴越春秋》十卷，明翻元本，此书每半页八行、行二十七字，与他刻九行、行十八者迥异”。此为从行款上鉴定版本。牌记文字大多反映了刻书时间、刻书地点、刻书者和版本类型，为鉴定版本提供条件，同时也是书贾作伪惯用的伎俩。如缪荃孙在鉴定《文献通考》一书版本时，因该书目录后有：“黄明正德戊慎独精舍刊行”，是故缪荃孙将之鉴定为“明慎独精舍”刊本。又如，“《南唐书》三十卷，明嘉靖庚戌顾汝达万玉楼翻宋本，东海晋明姚昭跋提行，避讳均从宋刻，字画亦极秀雅，向见友人藏是书，诧为宋版，果得高价售去，贾人撤去姚跋，伪刻末叶，增入一牌子，终难掩作伪之迹也”。此为缪荃孙根据牌记识别真伪。序跋的撰写时间和书的刻印时间往往相差不远，因此序跋对鉴定版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近代名臣言行录》，十卷，明徐咸撰。嘉靖辛未自序，即刻于是时”。此为缪荃孙通过序的撰写时间，确定该书的刻印年代。

在鉴定版本时，当从内容或形式两途不能做出正确判断时，则应采取综合的方法，即别本比勘，用别一相同或相关的本子从内容、形式特征进行全方位比较，从而知某本之优劣、某本之真伪、某本之源流及发现相似版本的细微差别，这是最可靠、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如，“《天籁集》一卷，传钞本，与六安杨希洛刻本不同，其来旧矣。丁氏旧钞本颇异杨本……王序在前，孙序在后，一也。摸鱼子五首，杨本在上卷，钞本在下卷，二也。有杨本脱，钞本有者，三也。有杨本误，而钞本不误者，四也。有两本不同，而两通者，五也。”可见，缪荃孙从五个方面考订了杨本与丁氏旧钞本的区别，孰优孰劣，已甚为明朗。此方法对我们今日之版本鉴定工作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版本目录的编订

版本目录的编订：版本目录是考订图书版本的记录。缪荃孙对版本

目录的三个类型书目、书影、题跋都有深入的研究，成就斐然。

书目编制，版本对读书治学的重要性。缪氏对所著录的图书，往往述其版本之优劣、源流。他在《书目答问》版本著录上，用力甚勤，共花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考证了两千多种书的版本，通过比较各种版本的优劣来推荐善本。如《十三经注疏》下标云：“共四百一十六卷。乾隆四年武英殿刻附考证本，同治十年广州书局覆刻殿本，阮文达公元刻附校勘记本，明北监本，明毛晋汲古阁本。目列后。阮本最于学者有益，凡有关校勘处旁有一圈，依圈检之，精妙全在于此。四川书坊翻刻阮本，讹谬太多，不可读，且削去其圈，尤谬。明监、汲古本不善。”借此回答了“书以何本为善”的问题。另外，缪氏在编制《艺风藏书续记》《艺风藏书再续记》《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时，也表现出这样的风格。

缪荃孙将版本目录著录方法程式化，影响深远：

××××几卷

××××卷（撰人上有籍贯或官街，须照原书卷首抄写），××刊本（何时刊本，须略具鉴别力），每半页×行，行××字，白（或黑）口，单（或双）边，中缝鱼尾下有××几字，卷尾题二×××（此记校刻人姓名或牌子），前有××几年×××序，××几年×××重刻序，后有××几年×××跋。××字××，××人，××几年进士，官至××××（撰人小传可检本书序跋或四库提要节抄），书为人××所编集（或子侄所编或自编），初刻于××几年，此则据××刻本重刻者。××氏：×斋旧藏，有××印。

另外，缪荃孙在编撰《京师图书馆善本书目》时，首次提出著录时，要有书的高广尺寸及边栏两项，以作为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尔后，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在编制著录时，都有这两项。可见，缪荃孙影响之巨。

书影编制，缪荃孙对于书影的编制，多有创新。书影作为版本目录的一种，是目录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缪荃孙在书影编制上，起着承

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厥功甚伟，我国出现的第一部书影是杨守敬影刻的《留真谱》，其不足之处是对单页文字仅摹刻第一行的全部和其他各行的首末二字，中间留作空白，从而影响了实用价值。缪荃孙克服《留真谱》这一缺点，采用影印的方法，据其藏书摹刻《宋元书影》。该书影以原书版式大小将单页全部摹印下来，字体、行款等与原书惟妙惟肖。在编排上，《宋元书影》先以四部分类，同类之中再以时代为次，亦有一书兼采几种版本者，比起《留真谱》，不仅影摹质量提高，而且体例也趋于完善。程千帆等《校讎广义·版本编》评价道：“为后人了解宋元图书版式之异同，字画之形体，行幅之疏密广狭提供了依据，一直为言版本者所重视。”受缪氏此举影响，用照相制版影印古籍者，接连不断，主要有《寒云书影》《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钵山书影》《嘉业堂书影》等。

题跋，缪荃孙一生撰写了大量题跋，“详溯原委，剖析异同，具载于序跋。论者谓与茝圃书跋允称同调”。即可与黄王烈所撰题跋相媲美。另外，缪荃孙还整理、汇辑了几种题跋，为后人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文化遗产。即《重编红雨楼题跋》二卷、《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一卷（1896年辑）、《士礼居藏书题跋再续记》二卷（1911年辑）、《茝圃藏书题识》十卷计六百二十二篇（1919年辑）、《茝圃刻书题识》一册（1919年辑）。北京大学王重民教授对所辑《茝圃藏书题识》评价说：“学习版本目录学的最好参考资料。”

三、缪荃孙的版本学思想

光宣之世，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文献学家，而缪荃孙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版本学造诣在当时独步一时，他的学问呈现出博通的特点，不仅他的版本目录之学造诣精深，而且在金石、碑帖、诗词、史志、地理等多个方面贡献卓著，但是最享誉士林的是其版本造诣和作为藏书家的成就。关于缪荃孙的藏书成就另有章节专门论述，这里专就其

版本学思想做一论述。

缪氏版本学研究与他的丰富藏书及编写目录著作紧密相连。庚子以前，是他搜访文献古籍、进行版本研究实践的第一阶段。他自云：“荃孙年十二三，住申浦老屋，屋中有书四大橱，读经之暇，即取阅之，诸子杂家，尤所心喜。庚申之难，只字不存。转徙江淮，流离琐屋，亦时购零本，以消永日。甲子游蜀，受知于李顺德师，助以目录之学。三上官，陆遵秦晋，水出楚豫，遇书辄购，所积遂多。通籍后供职十六年，搜罗群籍，考订版片。迺时谈收藏者，潘吴县师，翁常熟师，张南皮师，文治庵丈，汪间亭前辈，蔡松夫、黄在同两同年，盛伯羲、王廉生两祭酒，周芸生编修，王葬卿、徐梧生两户部，陆纯伯中翰，互出所藏，以相考订。旧刻旧钞，四库未收之书，名家孤传之稿，共十余万卷……荃孙一麟片甲，与拜经楼、平津馆相伯仲也”。他在南京时，“故家藏庋，时时散出，苏沪密迹，估客奔棧，所收旧籍金石书画乃益富。”

庚子后至辛亥以后大约十年，为第二阶段。缪荃孙先后游日本东京、京都，多处寻访图书古籍。或者购买，或者抄录，其中有不少精本绝本。可惜的是辛亥革命以后，这些图书计划运往上海时，损毁不少。但他的寻访图书，为其版本学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辛亥以后，缪荃孙在上海的居住，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是他版本学研究的突飞猛进阶段，也是他的学术总结阶段。作为前清的遗老，在清亡后，虽然无心收拾图书，然而如果遇到心喜之书，自己又生活条件许可，即使节衣缩食，不惜损衣食之费而进行收购。这个时期，前清的遗老大多避居在上海。向缪荃孙访书问字的人，踵接于门。这个时期的缪氏藏书还很有规模。他的联珠楼上下五楹，藏书十一万余册，触目皆佳籍，铭心之品则置卧内。好友吴庆坻说他：“牙签十万载珠船，海上重安百宋廖。”周庆云也说：“百城坐拥艺风堂，古色斑斓映缥囊，宋槧元雕勤校勘，吉金乐石富收藏。”可以说，这些藏书是他进行版本研究的重要基础。

编写目录著作则是缪荃孙进行版本研究的重要体现之一。他编著有

《艺风藏书记》《艺风藏书续记》《艺风藏书再续记》；他又为其他藏书家编著书目，如为徐乃昌编《积学斋藏书记》，为刘承幹编《嘉业堂藏书记》，为丁丙编《善本书室藏书记》，为张均衡编《适园藏书记》。在这些目录著作中，包含着大量的版本研究成果，如对善本书的认识、对版本内容的考证、对版本鉴定方法的运用等等。

缪荃孙出于治学实事求是的精神，重视求古书之真，他对版本学进行过专门的研究，有着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大量反映在他的许多藏书家的私藏目录著录之中，许多私藏目录对于书籍、版本之先后，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减，授受之源流，翻摹之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演之精粗敝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

在版本学中，什么是善本，怎样收藏善本，是版本学家和藏书家所极为关注的问题。缪荃孙在这方面也有着自己的学术主张与版本实践。这也是明清时期藏书家和学者所极为关注的重要问题。

在清代，对于“善本”有清晰描述的是张之洞和丁丙两人。张之洞为指引学生门徒读书门径，在《轩语·语学·论读书》中说：“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付刊、不讹不阙之本也。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序跋，是本朝重校刻而密行细写、写刻精工者即佳。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钞。”这是张之洞对所谓“善本”应该具有完整性、校勘性和原始性的概括。而晚清四大藏书家之一的丁丙对“善本”的定义更详细。他说：“善本书室择可珍者约有四端，特筑善本书室储藏之：一曰旧刻，宋元遗刊，日远日鲜，幸传至今，固以球图视之。二曰精本，朱氏之朝自万历后，奇阕固属草草，然追溯嘉靖以前，刻书多翻宋槧正统，成化刻印尤精，足本、孤本所在皆是。今搜集自洪武迄嘉靖，萃其遗轶，择其最佳者，甄别而取之，万历以后间附数部，要皆雕刻既工，世鲜传本者始行入录。三曰旧钞，前明姑苏丛书堂吴氏、四明天一阁范氏二家之书，半系抄本，至国朝小山堂赵氏、知不足斋鲍氏、振绮堂汪氏多影抄宋元精本，笔墨精

妙，远过明抄，寒家储藏将及万卷，择其优异，始著于编。四曰旧校，校勘之学至乾嘉而极精，出仁和卢抱经、吴县黄莞圃、阳湖孙渊如之手者，尤雠校精审，他如冯己苍、钱保赤、段茂堂、阮文达诸家手校之书，朱墨灿然，为艺林至宝，补脱文、正误字，有功后学不浅，荟萃珍藏，如与诸君子面相质问也。”丁丙提出的这四条标准比张之洞的善本标准更为详细，为后来的许多学者所吸收。当然，作为个人的善本观念也不尽相同，何况丁氏提出的标准是针对自己的藏书，具有一定的特色。光、宣时期缪荃孙以目录版本之学独步一时，他对“善本”的界定需要我们充分认识。陈乃乾总结道，缪荃孙在制定善本与非善本之间的界限是：“一、刻于明末以前者为善本，清朝及民国刻本皆非善本。二、抄本不论新旧，皆为善本。三、批校本和有题跋者皆为善本。四、日本及高丽重刻中国古书，不论新旧皆为善本。”陈乃乾之所以这样评价，一方面是他通过对缪氏版本目录著作的了解得来的。如缪氏代撰的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张钧衡《适园藏书志》、徐乃昌《积学斋藏书记》、刘承幹《嘉业堂藏书志》及自己所撰《艺风堂藏书记》。另一方面，缪荃孙晚年以代人编藏书目录为生财之道，而且他也没有用心编著，仅规定一种格式。在编目时，首先要解决，何者为善本可收入目录，何者非善本不可收入目录。由于缪荃孙已经把此当成一种“职业化”的工作，所以为了提高效率，就不顾及在昔藏书家皆自编书目，各有旨趣，取舍之间，亦各有用意，不必求合于人。这样的要求使得的缪荃孙的“善本”定义具有时代的意义。正是在近代图书馆事业崛起时所需要的。

所谓刻于明末以前者为善本，清朝及民国刻本皆非善本。可能是缪氏在以编目为职业化的一种应时态度和做法，在其版本思想中绝非如此，刻于明末以前者为善本，指出他对善本的时间定义，善本最迟应到明末，那么毫无疑问就是强调宋元本必是善本。这种认识在清代的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不同看法，同样缪氏也有不同的认识。

缪荃孙仰慕黄丕烈的版本造诣，追步其学问。他一生四十多年搜刻

黄跋，对黄氏学术理解甚深，他自称治版本学“守宋廛一民之微旨。”但是他的善本看法并未和黄丕烈一样“佞宋”，而是能够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有更加科学和更加符合时代情况的认识。

第一，崇尚宋元刻本

入清以来，私人藏书家追求宋元刻本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从钱曾《读书敏求记》对宋本的大加推崇，到黄丕烈的“百宋一廛”，又有吴騫的“千元十驾”，所谓“为慕一廛藏百宋，更移十驾度千元”。到了清末，四大藏书家对宋本的追求更是不遗余力，像陆心源更是名藏书处为“皕宋楼”。作为一名著名的藏书家，缪荃孙同样也对于宋元旧版倍加推崇，赞叹不已。他对于清代藏书家仅仅能见到的十卷本宋版《金石录》，就大加赞叹。说道：“赵氏金石录宋本止存十卷，国初为嘉兴冯研祥所得，刻一印曰金石录十卷，人家帖尾书头往往钤用，传之艺苑，以为美谈。后流传于江玉屏、阮文达、韩小亭，最后归潘文勤公。郑盦文勤师尝出以相示，推为天地间惊人秘籍”。

缪荃孙对于善本的态度是建立在他以治学为目的的认识之上的。宋元版刻应具有更接近原著的面貌，在内容的错讹上相对后世的传本更少，所以历来的校勘家对宋元刻本极为重视。缪氏所藏宋元刻本亦是其从事校勘工作的珍贵精品，在此基础上写成许多学术著作。他自己在古籍整理方面的著作，包括：《孟子音义札一记》一卷、《蜀石经校记》存一卷、《辽史艺文志补正》一卷、《安禄山事迹校勘记》一卷、《华阳国志巴郡士女逸文》一卷、《元和郡县志阙卷逸文》三卷、《湖北通志艺文志稿》一册、《增辑书目答问》四卷、《慎子补遗》一卷、《逸文》一卷、《云自在龕群书校补》无卷数、《三水小牋逸文》一卷、《附录》一卷、《欧阳行周文集校记》一卷、《司空表圣文集校记》一卷、《东坡集校记》三卷、《剡源集校》一卷、《乐章集校勘记》一卷等。这充分说明，缪荃孙贵宋元刻本是以服务他的学术研究为目的。在这里有一点要说明，缪荃孙虽然对于宋元旧本非常珍爱和推崇，但是我们看到《艺风藏书记》《艺风藏书续集》和《艺风藏书再续集》中对于宋元刻本记录的数量所占比例很少。这主

要是因为，第一，当时全国出现了私家藏书的聚集，例如杨氏海源阁、陆氏皕宋楼、丁氏八千卷楼和刘氏嘉业堂的出现，宋元旧刻多被其所追购。第二，宋元旧刻的价格非常昂贵，非一般的藏书家所能承担。而缪荃孙晚年寓居上海时，经常拿所藏善品出售以“易米”，可知其生活窘困。故也没有条件追求宋元旧刻。第三，缪氏是把不同版本书的校勘价值和学术价值放在首位。所以也不会达到“佞宋”的地步。

第二，重明刻本

清代的著名藏书家和校勘学家，对于明本一般不够重视，对于明刻更多批评。很多明人刻书喜欢按照自己的意志改刊原书，对原文进行窜改。有的在刻一种书时往往进行改头换面，删节换名，结果造成越刻距离原书面貌越远。这对于极其重视校勘的清代学者，是不可接受的。缪荃孙也曾揭示这一明人陋习。他说：“注东坡先生诗四卷……与康熙己卯宋漫堂刻本核对，方知刻本谬，有旧有注而今无者，有旧有注而今易之者，有旧注短而引申之者，有改易书名者，几无一完篇。乃是明代刻书之故态，逊黄芑圃、胡果泉多矣。”

然而，缪荃孙却能以学者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去认识明刻本，更多地揭示明刻的重要价值。可以说，为今天我们研究明刻古籍提供了重要的借鉴。缪荃孙在他的藏书书目中对明版的收录多达五百多种，这说明他是花大工夫去搜罗的。他对明刻本的重视，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1. 重明初刻本

在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就注重书籍刊刻的问题。在当时南京的国子监，保留了大量元代西湖书院的书版。这其中不仅包括了大量元刻书版，而且还有南宋留下来的部分书版。这些书版有的可以直接印刷，有的经过工匠的修补后继续印刷。像当时南京国子监刊刻的《二十一史》中就有七部是来自宋版，所谓“眉山七史”——《宋书》《梁书》《南齐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和《周书》。

缪荃孙说：“增修《复古编》二卷宋张有谦中原编，元吴均仲平增补。明洪武刻本。……传本甚少，各家书目止《爱日精庐藏书志》有

之，与此本合，是洪武年刻。惜首尾及赵张两序均剝损，以充元本。不知洪武初年之版，亦不亚宋元旧刻也。”在这里缪氏充分肯定明初刻本的重要价值，一些书商利用洪武初年的刻本，通过剝改来充当宋元旧本，实在得不偿失。因为明代初年的刻本，很多还能继承宋元旧版的衣钵。

2. 重明中期刻本

明代中叶，正德、嘉靖年间，以李攀龙、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开始影响明代知识阶层。对宋元旧版的诗文典籍的阅读，成了他们的需要。但是，毕竟流传下来的宋元刊本为数很少，于是，覆刻宋本的潮流经由文人阶层推动发展起来。刻书版式大多依宋本版式，本朝人的一些著作也依照宋本样式。许多在嘉靖年间翻刻所用的旧版，后来已经毁亡。大量的宋代及宋代以前的著作，或宋代刻本面貌，幸赖一些嘉靖本才得以流传后世。有的翻刻甚至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缪荃孙曾提到：“南唐书三十卷，明嘉靖庚戌顾汝达万玉楼翻宋本，东海晋明姚昭跋。提行避讳均从宋刻，字画亦极秀雅。向见友人藏是书，诧为宋版，果得高价收去。”作为以治学安身立命的缪荃孙，在从事版本研究的过程中，虽然对宋元旧版向往不已，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能比肩于黄丕烈、汪士钟辈。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改前人忽视明刻本的做法。而是从治学的目的出发，通过这些嘉靖本中的一些校勘精善的本子和翻刻本中所保留的宋本原貌进行学术研究。他说：“昔顾涧滨先生慨宋元旧本日渐散佚，以为将与三代之竹册，六朝之油素，名可得而闻，形不可得而见，徒使后人咨嗟太息，曾何有毫末之益于艺林哉！何如覆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后千百年为今日也。而寰宇同志更兴迭出，或得以相寻而无穷乎”。可见，他对于通过翻刻的方式来保存宋元旧版的面貌是何其重视。又如他所藏《陶靖节集》十卷中说：“明嘉靖戊申大中丞傅印台刻于九江郡斋本，晋陵华云序，九江知府王廷翰跋，有梁昭明太子序、总论九叶，诗四卷，文四卷，群辅两卷，附靖节征士诔序，录集私记，集后书诗文，句下略有笺

释。间采东坡、山谷、赵泉山、韩子苍、汤东涧、张縠、胡仔诸人之论，附于诗文后。行款与元刊李公焕集录本同。序言取宋蒋氏本翻雕，殷、敬、微、真、竟皆缺笔，则出于宋本无疑。每半页九行，每行十八字。”这对于治学具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3. 重汲古阁本

明末毛晋的汲古阁刻书在当时风行一时，在整个出版历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许多古籍幸赖毛刻才得以流传，如毛刻陆游《南唐书》是明末以来的唯一传本，刻附在《渭南文集》中，以后的一些版本则已经改变其体例和卷数。同时，不少古籍的毛刻本成为了该书传世的唯一全本。像毛刻本《孔子家语》是明代以来传本最全的本子。

尽管如此，概观整个清代藏书家和版本学者对于汲古阁刻本评价并不高。孙庆增《藏书纪要》说：“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率，错误甚多。”《士礼居藏书题跋记》载陈鳣跋云：“莞圃尝曰，汲古阁刻书富矣，每见所藏底本极精，曾不校，反多臆改，殊为恨事。”叶德辉说：“今所刻十三经、十七史、《说文解字》传本尤多。浅学者不知，或据其本以重雕，或奉为秘籍。昔人谓明人刻书书亡，吾于毛氏不能不为贤者责备矣。”由此我们可知清人对毛刻的批评多集中在底本的选择和校勘不善。清儒宗朴学，尚考据，对刻书及版本眼光甚高。不可否认，毛氏汲古阁刻书在一定程度上亦沾染明人刻书不重校勘的恶习，虽然有许多珍品传世，但也有一些底本选择不善或校勘不严的书刻流布。

缪荃孙能以科学的眼光，十分赞赏和推崇毛刻中的精粹部分。王欣夫在《文献学讲义》中说：“毛氏刻了十余万的版本，当然有不少缺点。对于这些缺点，严肃地指出来，使后人不被所误，也是必要。但绝不能强调了部分缺点而否定了全部成绩。”缪氏其实在实践中已经做到这样的要求。如对于毛刻《津逮秘书》非常重视。这部毛晋刊刻的丛书既有鲜明的特色，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它所收的书多为完备的足本。所选刻的书很多是当时并不易见，许多学者通过毛刻《津逮秘书》所选的版本获得更多的资料。而毛晋在刊刻这部书时，也非常注重版本的选

择，多是选取一些宋元旧版，且很多相当完备。再经过很认真的校勘，刊刻成精品。缪荃孙正是认识到这些优点，所以像缪氏的《艺风藏书记》《续记》《再续记》也是收录了不少的“津逮秘书本”，如其所藏的汲古阁本《剧谈录》二卷，缪氏就认识到此书外间流传，只有毛氏《津逮》本，以前的旧本已经不传，故能看到它的重要价值。另外，毛晋的另一部刻书的精粹《宋六十名家词》，所选用的版本亦多精品。缪氏对于此也极为欣赏，他在《词小说谱录》中，也多有著录并给予很高评价。缪荃孙后来在校勘词集和刊刻词集时也时有参考。

第三，重清刻本

清代刻本，由于时代太近，所以清人对清刻本的善本性质基本上是否定的。但缪荃孙在清末能够指出清刻的部分精品，可谓有独到的眼光。他说：“国朝老辈于明覆宋元本绝珍爱之，与真宋元等。即国初乾嘉名刻，近人亦宝爱之，真识涧滨先生此意矣。”这说明缪荃孙并不以时间远近为版本优劣的绝对界限，最重要的是对学术研究的贡献大小。在清刻本中，缪荃孙主要把重点放在如下几个方面：

1. 重清仿宋本翻宋元刻本

缪荃孙曾说道：“若之《通志堂》、黄尧圃之《士礼居》，近如黎莼斋之《古逸丛书》，举古人欲绝之迹，海内未见之本，传之艺苑，播之寰宇，稗又可绵延一二百年，不致泯没，而且勘订讹脱，补缀逸佚，使后人读此一编尽美尽善，无所遗憾，所谓守先待后者非耶！苟反是而娣锦为衣，旃檀为室，以扃钥为保守，以钞校为多事，同志好友不得一观己，又无暇题跋！校勘以传诸世。一旦兵火摧烧，拉杂不肖子孙称斤论银售储不解事者，甚是为外洋捆载以去。夫古人一生精力，辛苦成书，缈缈千百年于兵罹劫夺之余，仅获存亦云至幸，奈何徒知宝爱，不知流传，自非与古人深仇重怨”。一些仿刻本其自身不仅工本高价，外观精美，更重要在于所保存的宋元旧本原貌，这对于有清一代崇尚考据学风是必须的。所以缪荃孙又说：“昔顾涧滨先生慨宋元旧本日渐散逸，以为将与三代之竹册，六朝之油素，名可得而闻形不可得而见，徒使后人咨

暖太息，曾何有毫末之益于艺林哉！何如覆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缩今日为宋元也。是后千百年为今日也，而寰宇同志更具迭出或得以相寻而无穷乎。”

清代中期以后，很多著名的藏书家将所藏的一些宋元秘籍通过仿刻或翻刻的方式流传下来。上述所说的《士礼居丛书》和《随庵丛刻》就是其中的代表。当然，仿刻本的价值要高于翻刻本。

2. 重清人著作的罕见版本

对于清刻本，缪荃孙不以新刊而薄之。尤其对于一些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则是极为重视。缪氏在《桂氏说文义证原刻跋》中说：“逮南皮张文襄公刻于鄂局，海内始得见桂氏之书。文襄公序言，杨氏书版质于厂肆，不知桂书并不在内，临清徐君梧生言板毁于拳匪之乱，皆传闻之辞，不如印林与高伯平书可据。文襄公见此刻于何小宋制府许，内缺一叶，至求日照丁小山写本而钞。印林校例于攀古小庐文校语条辨于谤喜斋，合订于前，稗知此书刻不易，校亦不易，而原刻之为难遇也。”清代治说文之学的两大家，号称“南段北桂”，“南段”之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自刻后，得以流传，为学人推重。而“北桂”之桂馥的《说文解字义正》卷帙繁重，在其生前则无力刊刻。道光年间，李璋煌得到原稿，杨尚文出资刻入《连筠籍丛书》，由著名的小学家许瀚负责校讎。书版刻成后，很快毁于战乱，所以印本极其稀罕。故缪荃孙在得到这样的刻本后，当然如获珍宝。

第四，重日本和高丽等海外传本

清末以来，随着与外界交流越加频繁，许多流传在海外的中国旧籍和宋元旧本开始被中国学者认识并得到重视。杨守敬在日本多购唐宋以来散逸海外的旧籍和一些宋元旧本，后来的黎庶昌在日本搜集宋元旧本和部分明刻善本在国内进行刊刻。这些都得到士林的推重，并增加了对这些旧本的重视。其中很多是在中国已经亡佚不传的版本，自然国内学者也多未见。缪荃孙对于海外的这些刻本也非常重视，常常作为善本而视之，甚至等同宋元旧本看待。如他叙述日本影宋刻本刊《尔雅》时

说：“旧本影宋刻刊本，首载郭序，后有音释，每卷总计经若干字，注若干字，每半叶十行，行二十至二十三字不等，注每行三十字，均与瞿氏书目所载宋本相同，至胜于吴元恭本之字，及诸讹字亦与书目同，其为善本无疑。校讹一卷颇可观览。”

缪荃孙对于这些海外刻本中，能够重现宋本原貌的旧刊本和校勘精良的刊本，更是心所向往。在《艺风藏书记》卷一中有“校元本论语注疏十卷”，根据杨守敬跋曰：“按今世所传《论语注疏》以十行本为最古，然脱误亦不少，此本与《汉志》《释文》合，若无此本，则‘宋’‘朱’二字竟不能定为谁误。又‘不逆诈’章、‘古之狂也肆’章、‘叔孙武叔毁仲尼’章疏文，十行本有空缺，闽监本同毛本以意补，此本独全。又凡浦镗及阮校所疑疏中伪字，此本皆不误。是本虽刊于元代，必根源于单疏，决非从十行本出。至于雕刻之精，俨然北宋体格，亦决非十行本所及。”这部书是杨守敬在日本搜得，缪荃孙借得后不胜赞叹曰：“是书杨惺吾得于日本，刊印之精，为元刻中罕见。跋中推为北宋体格，实非虚语。留案头月余，因议值未妥，校阮刻一过，成《札记》一卷，还书之日，颇为惆怅。”可想而知，缪荃孙对于这部元刻《论语注疏》极其看重，并想收之，但是由于价格原因而未果，使得心中郁郁不畅。这些海外的古刻本对补足国内刻本的不足，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缪荃孙是十分看中的。

第五，重钞本校本和稿本

钞本接近原本，与流行的刻本相比较，价值要高。有的古旧钞本是依据作者的稿本所钞，而这种稿本有的没有进行刊刻。有的钞本比传世的刻本时间要早，内容上要足，这种钞本在某些方面可以弥补刻本的不足之处。明清以来的藏书家除重视宋元刻本外，对于钞本的地位则放在明刻本前面。像黄丕烈、孙从添、张金吾等都是非常看重钞本的价值。缪荃孙对于这些钞本的价值也是极为看重，多尊为善本。

1. 重影钞本

影钞本就是将质簿而且坚韧的纸覆在刻本上照其点画行款，一笔不

苟地摹写，它酷似原本。所以人们称为“下真迹一等”。这样的精妙之品，缪荃孙视为名副其实的善本。他的《藏书记》中收录约七十多种影钞本，其中最让人铭记的是《藏书记》中的明影写宋刊本《华阳国志》十卷。他说：“明影写宋刊本，卷十，上、中、下三卷俱全。《汉中士女传》亦多出赞词数句，系钱叔宝手钞，校勘精详，字迹古劲。每一展卷，墨香横溢，为云自在龕钞本书中铭心绝品。”

缪荃孙不仅藏有前人的影写精品，而且有时自聘请精工巧匠专门影摹。比如《艺风藏书续记》中的影元钞本《马石田文集》《道园类稿》《草堂雅集》都是缪荃孙请当时著名写手丁绍裘影摹的。“吾友董授经得元印本，爱玩不忍释，属丁君绍裘影写，精妙不亚原本”。缪荃孙看重的这些影钞本不仅精妙，而且这些影摹写本多摹写孤本、难得之本或是远远胜于通行刻本的本子。如前面所说《草堂雅集》即是元刻孤本。又如《藏书再续记》中所记《吴文正公诗余》是从汲古阁毛钞影写的，对于此本缪氏说：“此毛季斧校本，从《文正公集》百卷本钞出，若通行四十九卷无此词也。百卷本明初刻，颇罕见。”

2. 重旧钞、名家钞本

旧钞本多是指明代及明代以前的钞本。黄丕烈说：“大凡书籍，安得尽有宋刻而读之，无宋刻则旧钞本贵矣；旧钞本而出自名家所藏，则尤贵矣”。如缪荃孙所藏旧钞本《元丰九域志》十卷，棉纸黑格，纸墨极精。而且缪荃孙在与冯集梧校刊本比勘后，认为，均胜于冯本。

缪荃孙对钞本有着一般藏书家和版本家所不及的眼力，如穴研斋钞本《茅亭客话》十卷，宋黄休复撰。缪荃孙录黄丕烈与王芭孙跋于藏书记上，其中黄氏跋曰：《茅亭客话》曾刊入《津逮秘书》中，外此皆钞本流传，若旧刻，惟宋版耳。余所藏有二本：一宋版，即《敏求记》所云太廓前尹家书籍铺刊行本也；一旧钞，为钱罄室家藏。得此穴研斋缮写本，共有三本矣。此册取对宋版，大段都同。中有正文写为小字者，宋板如是，故仍之。古书源流明眼人能自辨之，弗可为外人道也。穴研斋钞本之胜于别本，可见一斑。对于穴研斋钞本，清代藏书家著录绝少，

仅有黄王烈和翁方纲。缪荃孙能通晓其价值所在，可见缪氏对于版本优胜之眼光老辣，非一般学者能及。

缪荃孙认为这些钞本自当是善本。如他所藏的《会稽掇英集》是澹生堂钞本；《通玄真经》是严可均钞本；《录鬼簿》是明代的尤贞起钞本等等，不枚盛举。

3. 重校本和稿本

校本的价值更多地体现对学术研究的贡献，其中凝结着学者的巨大心血。孙庆增就曾说过：“书籍不论钞刻好歹，凡有校过之书皆为至宝。”缪荃孙曾有一首诗《题朱古微校词图》，曰：“汲古毛偕石研秦，半塘搜辑更翻新。谁知落水疆村老，别出心裁傲古人。元钞宋刻古今殊，一字搜求比一珠。校史讎经功力等，词家亦有戴钱卢。校讎屢下度丹黄，同志仍须往复商。五夜一灯频改削，不知斜月上西墙。”缪荃孙视校本为善本，尤其在经过名人藏校后更视为秘籍。如他说：“《剡源逸稿》七卷，从何梦华手写本录出，并录尧圃两跋。其中朱笔细字，是劳季言手迹。则为名人藏校之书，尤为可宝。”一书之上，有何梦华、黄丕烈、劳格的学术手迹，真是不可多得。又如，“《鬼谷子》三卷，据明蓝格纸钞本劳平甫校本，校于秦氏石研斋第二刻本上，《鬼谷子》世以嘉庆乙丑石研斋刻本为最佳，秦本出于卢抱经所据鲍禄饮藏述古堂本，秦氏又自辑古今论鬼谷子者为附录，较乾隆己酉刻道藏本高出不啻倍徒。……又有小字：‘此本原系苏州文氏所藏，乾隆甲寅严九能以钱曾述古堂本校过，又经抱经先生覆校。九能有跋。明年徐北溟再校，咸丰丁巳藏劳平甫所，亦跋之，可谓善本矣’”。此《鬼谷子》在经过钱曾、卢文弨、徐松、劳权一校再校后，可谓校勘性大善本。

稿本更具学术价值。稿本保存著作的最原始状态，要进行校勘，没有别本比它更可靠。若作者的著作没有被刊行，则著作的流传只能依靠稿本。缪荃孙在藏书中，极为注重稿本。伦明说：“余最爱者，为所藏近代名人未刊稿本及单行本，《记》中不尽载。”但从缪氏的《藏书记》中，可以看到许多名家的稿本，如戴震的《尚书义考》《直隶河渠书》刘逢禄

的《尚书今古文集解》刘燕庭的《刘燕庭丛录》、方履钱的《金石萃编补正》、钱大昕的《竹汀日记》等等。作为一位以学问博通见长的版本大家，缪荃孙的善本观深刻体现着，书为学而用的鲜明特色。宋元旧版年代久远，能更准确地反映原书面貌。但缪荃孙能把仿宋本、翻宋本与宋元旧刻同等看重，这恰恰说明他的学者本色。缪氏视一些明刻本、清刻本为善，这说明他不以时段僵硬区分优劣；缪氏视钞本、稿本等为善本，说明他充分挖掘不同形制版本蕴含的巨大价值；缪氏视海外传本为善本，说明他有广采博取的版本理念。一语而言之，缪荃孙眼中的善本是建立在以有功于读书治学为基础的前提之上的。

第五章 缪荃孙方志修纂的成就

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书目》统计，清代流传下来的方志有五千七百余种，是宋、元、明三朝流传下来方志总数的五倍。随着方志纂修之风的盛行，清代诞生了一大批方志学家，他们有实践、有理论，甚至形成了流派，缪荃孙就是其中的一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举清代优秀方志，缪荃孙主纂的《顺天府志》《昌平州志》《江阴县续志》《湖北通志》均在其列。当代学者仓修良亦称“缪荃孙确实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著名方志学家”。

缪荃孙一生参加过众多方志的纂修，主要有《顺天府志》《昌平州志》《湖北通志》《常州府志》《江苏通志稿》和《江阴县续志》等，在地方史志研究上颇有成就，其代表性作品则为《顺天府志》《昌平州志》和《常州府志》《江阴县续志》。前两部方志的修纂在缪荃孙学术生涯的早期，而后两部方志则在缪荃孙学术生涯的晚期，各有其代表性。

一、《顺天府志》与《昌平州志》的编修

顺天府作为京师之地，清代属直隶省。由于北京是元、明两朝之故都，元代曾有《燕京志》《析津志》，明代有《北平图经》《北平志》等的修纂：保存下来的有明万历时期沈应文所修撰《顺天府志》六卷。清代同治年间，李鸿章奏修《畿辅通志》，调取各府州县志书，发现顺天府

志需要重修。于是就有了《顺天府志》的修纂工作。光绪三年（1877），缪荃孙在京授职编修不久，就应彭祖贤邀请参与修纂《顺天府志》。当时邀请张之洞拟定了义例，缪荃孙照例编辑。光绪五年（1879），由周家楣奏请开局，缪荃孙与刘恩溥、洪良品、廖廷相、傅云龙等八人“晨夕搜讨，先成《沿革表》四卷。”光绪七年（1881），张之洞令缪荃孙专任其事，周家楣“催二十四州县采访册，书牋并发，舟车踵接”。缪荃孙复引傅云龙、屠寄帮修，并由范思本、李棣构等“周旋琐屑”，管理日常事务。

光绪《顺天府志》是缪荃孙参与编纂的第一部方志。同治十一年（1872）直隶总督李鸿章重修《畿辅通志》，调取各府州县志书，顺天府独缺，故光绪三年，就商议修顺天府志，延请张之洞任总纂，张之洞延缪荃孙协纂。不久张调往山西，修志工作全部交由缪荃孙负责。当时重任顺天府府尹的周家楣因张之洞调任，恐其应允为府志“画一厘订”之举无法实现，张之洞却说：“得公再任京兆，得小山主总纂事，事无不成，成书必不至鄙陋也。”可见张之洞对缪荃孙学识能力之信任。此志于光绪五年开局，缪荃孙年仅36岁，正是年轻有为之时，他不仅编写了疆域、乡贤、艺文、金石等卷，而且复审了全书。同时，他又延请当时的“名儒硕彦”担任各门分纂，其中有鲍恩绶、廖廷相、陈燾、汪凤藻、刘恩溥、洪良品、朱一新、傅云龙、蔡赓年等，他们志同道合，晨夕搜讨，历七年至光绪十二年（1886）始刊刻成书。凡一百三十卷，总纲十一，子目六十九。

缪荃孙在编修《顺天府志》时，按照张之洞的要求，对“前代旧制，近日积弊，均为详采”。在经济政策上主张“务本节用”“休养生息”等地主阶级经世致用的传统史学观点，另外还赞同洋务派采用西方近代技术，兴办实业，发展商业，来加强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的主张。

缪荃孙在编修方志的方法上，严格恪守张之洞拟定的“义例”去编修。张之洞在《修书略例》中提出的具体要求，如，“图地理须川目验、实测、聘通算学者为之，不得凭成书及约略揣度”，“赋出于地，役出于

民，故户口、物产先于赋税”；“官师门多归表，少立专传，立表以省传”，“人物以朝代为次，不分州县”；“艺文门每书撰一提要，注明存、佚、未见、未刊四等，以时代为次，不分经史子集”；“金石门以时代为次，注见存、拓本、存目三类，各缀考释”，“各门前为小序一则”等，在编修方志时均一一贯彻。

缪荃孙知识渊博，讲究考订古今之变，十分注意“寻其脉络，观其会通”。在志书各门中附入了不少考史文章，同样也很有史料价值。《顺天府志》在编修方法上反映了晚清方志学和考据学在受近代科学方法影响较以前有所进步。

光绪《顺天府志》记述了清代以北京为中心的顺天府（包括五州十县）的各个方面，是清后期修北京志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清代官修北京志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巨著。

全书共十志六十九目，一百三十卷，三百五十多万字。一至十八卷为京师志，以都城为首，内容有图、城池、宫禁、苑囿、坛庙、祠祀、衙署、兵制、官学、仓库、关榷、厂局、坊巷、水道、寺观、风俗。下为府志：卷十九至卷三十五为地理志（包括图、疆域、山川、城池、治所、祠祀、寺观、冢墓、村镇、边关、方言、天文表、顺天府沿革表），卷三十六至四十八为河渠志（包括水道、河工、津梁、水利），卷四十九至五十三为食货志（包括户口、物产、田赋、旗租），卷五十四至六十四为经政志（包括官吏、仓储、漕运、矿厂、盐法、钱法、典礼、学校、营制、驿传），卷六十五至七十一为故事志（包括时政、兵事、学派、祥异、杂事），卷七十二至九十为官师志，卷九十一至一百二十一为人物志（包括先贤、杂人、鉴诫、方技、列女、释道、侨寓、选举、爵封表、昭忠表、乡贤表），卷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六为艺文志，卷一百二十七至一百二十九为金石志，卷一百三十为序志。

此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材料丰富，考证严谨。总裁前顺天府尹沈秉成序云：“盖自群经笺注、地理专书、正史别史、诸子文集，与夫图经志谱、公牍访册，于古若今，数十万卷中探讨而出。”查其引用书目竟达

八百四十二种之多，可见搜罗史料之丰富。对于所收集到的众多资料，还要鉴别真伪，核实各家之言。全书征引文字，必注明出处，列出异同，加以辨析，力求一是。除了考订文献，缪荃孙及其同仁还进行调查研究，实地考察并征询故老耆旧而后成书，正如总裁周家楣序所云：“考古难矣，证今尤难。盖采访诸端，一字未确，一节未稔，往往搁笔。至是乃条征件采，书牋并发，舟车踵接，日下耆旧，敦请考证，务尽所能。其日久无应及访征弗获者，仍其阙。纂辑既齐，继以校讎……”这种一丝不苟、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在官修方志中是难能可贵的。

此志另一个特点就是提供了较系统完备的资料。如卷一百二十二艺文志里的《记录顺天事之书》，以当时顺天府辖区为限，收录了自古至今，上起周之《燕春秋》，下迄清〔光绪〕《昌平州志》，历代所修北京地方志和有关北京史志的专书目录二百二十多条，并注明存佚及版本流传情况，这是一篇可单独成编的北京地方文献书录，也是最早的北京地方历史文献的专题书目，为北京史志的研究提供了按图索骥的便利。另外在艺文志的《顺天人著述》里收录了顺天府属各州县人著作共八百多部，记录了自汉至清末一千多年间顺天府作家的重要著作。

金石志则收录了顺天府境内历代碑刻一千五百多方，这些都为研究北京地区历史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系统完整的文献资料。再如沿革、官守等目都是从周代一直记载至清末，河渠志对畿辅五大河五百余条水道沿流探源，脉络毕见，而且记述了历代在此修水利的人物和事迹，记述了对河患的治理等等，这些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翔实完善的资料。

此志一直为后人称道。近代方志学家瞿宣颖赞曰：“是其立例初，已有刊除俗体，悉归雅正之意。……以暨其他载笔之士，皆一时豪俊，学有专长，而缪荃孙擅目录之学，既自纂金石、艺文二志，兼为覆辑全书，故能卓然成不磨之业，为近时诸志称首也。”

当编纂顺天府志时，需寻求各州县资料，于是昌平知州吴履福等倡议重修昌平州志，由前福建道监察御史刘治平主持，令贡生刘万源等搜集资料，写出初稿，延缪荃孙总纂，发凡起例。此志从光绪五年开始纂

修，至光绪十二年刊印成书。

全书共十八卷：一皇德记，二輿图记，三、四土地记，五山川记，六大事表，七职官表，八选举表，九道里、风土、祠庙、伽蓝四记，十冢墓记，十一会计簿，十二学校志，十三衙署、营卫、物产三志，十四列士传，十五列女传，十六艺文录，十七丽藻录，十八序录。

此志基本沿袭了《顺天府志》的风格，即注重实际调查，“山川关隘亲履其地，而前人之异说可折中，物产人物无取借材，而邑乘之统病可尽涤。”此志的体例虽不属于“创纂”，却也是缪荃孙吸收乾嘉考据学派，特别是著名学者洪亮吉编纂方志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志书的类目，都以前人的撰著为依据，如皇德记，系仿汉侯瑾《皇德传》；土地记，系仿晋朱育《土地记》；职官表，系仿汉班固《百官公卿表》；道里记，系仿隋《西域道里记》；会计簿，系仿宋李常《元祐会计簿》；列女传，系仿汉刘向《列女传》等等，所有类目皆有所本，可谓无一处无来历。在全书的编纂上，因昌平为明陵所在，故卷一即为皇德记，记述了从清顺治四年至光绪九年止，历朝皇帝对明陵的制谕及各大臣的奏折，以示“皇恩浩大”。此志侧重对土地记的撰述，土地记的篇幅占全书四分之一强，详载了昌平的建置沿革，废置分合情况，为研究昌平地理提供了详细的材料。对于这部《昌平州志》，《续修四库全书提要》赞其有“六长”：“荃孙精于史学，娴于掌故，体例谨严，文亦朴实，其长一也；表历之体，爽眉目，约篇章……省无限篇幅，其长二也；后汉列传，广立多名，品题牵强，清儒议之，今除流寓传外，皆不分类目，概以时代为次，史识卓矣，其长三也；序录首论方志沿革及功用，次述本书体例之所自仿，甚为明晰，其长四也；史志论赞……今并废除，其长五也；艺文录，首列记录昌平之书，次记昌平人著述，并仿朱氏经义考之体，附以序释，且搜集甚广，其长六也。淹博巨制，实不亚于顺天府志也。”然而方志学家瞿宣颖则认为“观其名例，近于洪孙之撰，然所变者名，所因者实，实无大异于旧志也。划四至于土地，别名以道里，易赋役为会计簿，皆有未安。若风土记之类，则弥为徒有空名，惟艺文一录，搜

采州之掌故颇多精蕴，盖目录之学，固缪氏之专长也。”昌平人麻兆庆有感于此志之阙略，于光绪十八年作《昌平外志》，专门考订、校正前志尤其是建置沿革方面的疏漏，瞿宣颖赞曰：“其论颇能提纲挈领，前志实逊其精到。”

二、纂修《湖北通志》

光绪十九年缪荃孙因与相国徐桐不合，以小疵而遭严厉且有失公正之指斥，愤而辞去国史馆编修之职，次年往湖北武昌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张氏乃留其纂修湖北通志。然而当时战乱仍频，国体变更，“当日纂述未竟之志稿者，无人过问，遂毁弃于兵燹而不复存”。现只有缪荃孙所撰《光绪湖北通志序录》收录在其《艺风堂文集》中。从序录中我们可以想见当时的修志规模还是相当大的。全书共分六十六个类目，“凡群经诸史以及圣训、会典、则例、三通、大清一统志暨诸省郡县志书、诸子百家文集、杂著靡不甄录，又檄郡县采访，月以册闻，铄聚成钩，缕绩盈笥，然后条区类别，分授编纂。旧志徇俗，今皆考订；……旧志失序，今皆综核；……旧志虚文，今皆删除；……又有旧志所无，今应增益；……凡所编述，具勒成二百有六卷。”惜全书已佚，我们已无从知道所纂内容。

三、纂修《江苏省通志》及《江阴县续志》

宣统元年（1909）江苏通志局成立，创议纂修江苏省通志，缪荃孙又被聘为总纂，其分纂有李详、丁国钧、陈作霖、柳诒徵等三十四人，宣统二年正式纂修，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编纂工作停顿。所编志稿类目分十二志：诏谕、天文、地理、渠道、经政、学校、武备、故事、官师、人物、艺文、序志。1918年江苏省通志局恢复，聘冯煦为总纂，续修省志。缪荃孙虽未亲主其事，仍派其子缪僧保参纂，而“尽发篋中拓

本，考释编订，仍悉一手成之”。民国十年秋，缪荃孙所纂《江苏金石志》单独刊行。而通志稿的编纂从宣统二年起，越数十年，经五次纂修和整理补充，于1945年才编定完毕。然而除金石志等少数内容系沿用旧志成篇外，编纂者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有不少变化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社会环境的变化，后继者的观念也与缪荃孙有很大的距离，不过我们仍可从《金石志》中看出缪荃孙在金石学、目录学上的功力。

《江阴县续志》是缪荃孙总纂的最后一部地方志书，他在总纂中对续志篇目设置、内容记述和编纂方式进行了创新。第一，在方志篇目设置上强调志目增新，《续志》共设二十八卷二十三门类，与其所续蓝本光绪《江阴县志》相比，在篇目设置上保留了建置、山川、民赋、学校、武备、祭祀、风俗、氏族、物产、职官、选举、人物、烈女、寺观、艺文等基本类目，新增天文、石刻、前志原委、杂识、前志证误、叙录等六个类目，忽略了历年变化不大的疆域、方外、古迹、冢墓等类目，使志书更接近当时的实际。第二，在续志内容的记述上，一改过去方志重人文、轻经济的做法，十分重视经济资料的收集，不仅对水利、物产、赋税、蚕桑等给予浓墨重彩，而且录有江阴地方的茧行、布厂、纱厂等实业的详细资料，关注江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状况。第三，在续志编纂方法上注意吸收近代科学成果用于地图测绘和统计表的编制。《续志》中的全志总图、城厢图、水陆交通图、三角网图及四十五张乡镇分图，都用近代科学方法绘制，标明东西南北方向，用比例尺说明比例大小，所显现的效果是过去传统的地图标注手法无法达到的。除此以外，《续志》用较多篇幅记载江阴大量地方性真实资料，注意反映地方特点和时代特点，不但如实记载江阴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以后经济状况、社会生活的变化，如县民兴办实业，改进缫丝、织布技术及机具等，还如实反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教育文化在江阴逐渐得到传播的状况；再如通过详写境内各新式学堂状况，反映原本为江苏学政驻地、科学氛围浓厚的江阴，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改变传统理念，办新学，废科举的大潮流等。由于《续志》彰显地方特点，又合乎时代特点，所

以1921年续志刊出后，当时的方志界大加推崇，普遍认为此部《续志》是缪荃孙所纂志书中成就最高的一部，也是其创新方志理念最显著的一部。

四、缪荃孙的修志思想

从缪荃孙所参与纂修的这几部方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修志是十分重视的。他认为修志可以体察民情，有利于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他认为述地理志是“验风俗盛衰，则思与民休息，维之于不敝”；述河渠志“是在穷其源，极其委，勤板筑，通淤塞，使堤有金石之固，而防无丝缕之罅，则沮洳皆化上腴，黔首于以永谧也”；述食货志则是要蠲除苛政，“使民知耕凿之乐，效输将之忱，而沐仁泽于无涯也”。由于缪荃孙一生追随张之洞，故张氏“通经致用”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反映在地方志的纂修上，他注重所纂内容与国家与百姓密切相关。如在《顺天府志》中用很大篇幅来记述顺天府水道、水利，计有河渠志十三卷。这是由于元明清以来，每年需漕运三四百万石粮食供应北京，因此畿辅的水利关系到漕运及京城之安危，故此志对京畿五大河五百余条水道“沿流探源，脉络毕见”。此外此志对京畿的煤矿记述也很详尽，荃孙亲纂经政志之矿厂，详列了自汉至清顺天所有煤铁矿之所在，他认为“近年以来，大开封禁，轮船机器，取法泰西，煤铁要需，尤宜筹画，……非惟富民，抑亦强国”。这与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是一致的，实际上也是对张之洞所倡导的洋务运动的一种支持。

从光绪三年（1877）到民国八年（1919），从三十四岁到七十六岁，在跨度长达四十多年的修志实践中，缪荃孙曾先后主编或参编过顺天府、昌平州、湖北省、常州府、江阴县等地的六部地方志，其中，《（光绪）顺天府志》《（光绪）昌平州志》与《（民国）江阴县续志》等完整地流传至今，被公认为方志中的上乘之作。

前人认为清代方志学有两个流派。一是地理派，志书内容以属于自

然现象之疆域、建置、山川、物产为主，属于人文之政治、经济、文化为辅，因其最重考证地理沿革，亦称考古派，以戴震、洪亮吉、孙星衍等为代表；一是历史派，视方志为历史，认为方志即一方之史，主张以撰史之法写方志，他们认为编纂方志的目的是保存文献，故亦称文献派，以章学诚、谢启昆、鲁一同等为代表。有将缪荃孙视为文献派者，如仓修良《方志学通论》认为，缪荃孙修《江阴县续志》多取法章氏。而续昌在光绪《昌平府志序》中则认为缪荃孙继承了洪亮吉的家法，说：“我朝儒臣辈出，舆地之学，上掩前人。阳湖洪氏尤为精核，自时厥后，继轨接踵，名郡剧县，著作林立，缪编修生于其乡，习闻家法，以承明大雅之选，博稽掌故，参酌体制，勒为是书。”缪荃孙亦自视为考古派，他在《孙佩南校经堂室集序》里记他与孙葆田谈论同修《山东通志》事说：“又议同修《通志》，先生主章鲁派，荃孙主洪孙派。先生曰：‘汝师法乡人耳。’荃孙答曰：‘志以事实为主，以文行之，略避记账之消，如实斋之志，首增征实一门，仍不离乎事实；通甫则前志源流、古迹、艺文一概扫除，文字虽高，于武功、朝邑已蹈刘知骛改史为文之讥矣。’先生亦首肯。”是时，孙葆田主纂《山东通志》，缪荃孙后离开了济南，没能参与该志纂修，但是该志自始至终都贯穿了缪荃孙的修志思想，以考据著称。笔者以为，缪荃孙所编纂的方志，既非纯粹的章鲁派，也非单纯的洪孙派，而是兼取二家，各有所继。

五、缪荃孙的修志特点

1. 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编辑原则

他既重视地理派所重视的地和物，也重视文献派所重视的人和事。所以缪荃孙所主纂方志，既注意考古，也注意征今，皆以征实为要旨，反对空论。

清代中叶，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根据自己的史学理论以及当时方志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志属信史”的观点，认为方志就是一个地方的历

史。缪荃孙接受了这一观点并有所发挥地说：“志也者，志地、志人、志事、志物，上之自古迄今，下之由近及远，无饰辞，无私造，则谓之良志”。所谓“无饰辞，无私造”，就是主张根据真实可信的古今文献，发扬实事求是的“良史”传统，秉笔肖书，才能写出信而有据的“良志”。缪荃孙在纂修方志时，始终坚持了这一编辑原则，既不虚文夸饰，更不妄加论断，对善恶、贤愚的褒贬抑扬全部寓于如实的记述之中。

他在光绪顺天府志序志中说：“谕旨宜择要恭录，不必径类案牒”。通览顺天府志，发现收录的皇帝谕旨确实很少，即使入选，选的也只是那些与历史机构设置、地理沿革有密切关系的部分，在这篇序志中缪荃孙还主张“人物不分贤否，理宜并载，但以子目区别之”，他深知“史例与经制不同”、经学的体制，要求对各家经说进行是非判断、在取舍之间，保持传统经术的纯洁性，而反映一地人文的地力一志乘，则要求完整地全面地记述一方史迹，以具体人物传记为例，缪荃孙主张无论是贤明士绅，还是土豪恶霸，只要对当地的历史有过一定的影响，就应该在方志中有所记载。

2. 详今略古，务求实用的编辑方针

方志是一个地方的历史，它的作用就是使人以史为鉴，去恶向善，唐宋以前古人的事迹，因年代久远对当代人的影响不大，而明清以后的史实则使今人感到亲切，容易产生共鸣，近世的典章制度、政事沿革对当代也具有较大的指导作用。基于这样一种认识，缪荃孙所编纂的每一部志书，都是详今略古，务求实用如《顺天府志》一书，宋元以前的部分，记载完备而简要，明清以后的部分，记载周密而详尽区别明显。在修志时，缪氏不仅注意搜集历代地方文献、官方档册，而且特别重视实地调查和采访的材料。

据《湖北通志序》所言，缪荃孙在组织编写这部志书时除了搜集文献资料，又“缴郡县采访，月以册闻”；在编纂《昌平州志》时，缪荃孙也是“搜古书之记载，证父老之旧闻，山川关隘，亲履其地”。

缪荃孙主编的最后一部志书是修纂于民国六年至民国八年（1917—

1919)的《江阴县续志》。此志延续光绪初年卢思诚等纂修的《江阴县志》，只是“述历光绪以来，至宣统而讫。比事属词，上承前志，缺者补之，误者正之”。记录的大都是四十年以内新发生的事情，富有时代气息，详今略古的特点就更为突出。县志正文之后尚附有缪氏亲撰的江阴近事录三卷，专记民国初期江阴的新事物，他在江阴近事录跋语中道：“江苏各县，同修邑志，……均以宣统三年为限断，因以后历日不同，官职不同，政令不同，势难合并，且由图经而为方志，均属古法，将来新学昌明，或不复仍袭‘志’之旧号。然民国以来历年事实不能不记。章实斋先生尝言每邑当设一志科，掌其事实，为修志之蓝本。今辑此数卷，权作志科掌录观可也。”这说明缪荃孙重视现实，能以发展的目光看待社会历史与学术研究，学术思想十分开明。江阴近事录中所载史实，大多是社会大事在地方上的具体反映。

3. 科学严谨、详略得当的编辑体例

一部好的方志，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好的体例，完善的体例是高质量的基本保证。缪荃孙所编的几部志书，之所以历来为人称道，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在发凡起例、谋篇布局的时候，很好地处理了继承与创新、详尽与简要、纲与目、主与次等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能够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文献资料、地区特点制定出科学严谨、详略得当的编辑体例。缪荃孙创例（或协同创例）的几部志书，主要为纲目体或平目体。

纲目体方面的代表是《顺天府志》，此志先立京师、地理、河渠、食货、经政、故事、官师、人物、艺文、金石、序等十一志为大纲，十一志之下平列城池、宫禁、苑囿、坛庙等等六十九个子目。纲与目之间既属统领的关系，又能相互补充，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平目体则以《昌平州志》为代表，此志详列皇德、舆图、土地、山川、大事表、职官表、选举表、道里、风土、祠庙、伽蓝、家墓、会计、学校、衙署、营卫、物产、烈士、列女、艺文、丽藻、序录等二十二个门目，其下不复细分。

顺天府因是京师所在，事关全国，因而采用的是一种周密详备的纲目体；昌平州则只是一个普通的行政区，因而采用的是一种比较简括的平目体。这反映出缪荃孙在选择方志体例时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态度。

缪荃孙在材料的取舍、内容的剪裁方面也能够做到繁简合理、详略得当，仍以《顺天府志》为例。此书以十一志为总纲，总纲之中又以“京师志”居首，显然意在宣扬“王化”，借以提高朝廷的威信。子目中把城池、宫禁、苑囿、坛庙、祠祀、衙署等项放在前面，首先从封建政治的角度对这个“首善之区”的“王政”进行重点叙述，内容十分详备。但是，这种详备又不是绝对的，有时缪氏还会根据实际情况删繁就简。他不仅在一书之内注意合理地分配笔墨，而且还照顾到了自己编纂的志书与当时流传较广的其他志书之间在内容上避重互补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非深明学术又熟谙文献者不可。

4. 提倡新学、开明豁达的编辑态度

缪荃孙受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的影响，在对待新学的态度上是比较开明的，他主张引用西方的科学技术，借以发展中国的工商实业。在其方志著作中能够显现其基本态度，《顺天府志·经政志》中的“矿厂”一篇是缪荃孙亲笔撰写的，其中有这样的文字：“近年以来，大开封禁，轮船机器，取法泰西，煤铁要需，尤宜筹画。”在评论新式邮电业务时，写道：“去如风发，捷似星流，朝令夕闻，借著运筹，附以电报，制度尤周。”缪荃孙认为纂修方志必须附图。在编纂《江阴县续志》时，他强调聘用精通算学的专家，通过目验、实测来绘制地图，力求精确翔实。《江阴县续志》中附有五种地图：一幅总图，一幅城厢图，四十五幅分图，一幅水陆交通图以及一幅三角网图。数量既多，种类也很齐全。而且，这些图全部用近代的科学方法绘制而成，以符号文字标出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用比例尺说明远近、高下的实际距离，使人一目了然，既精确，又实用。

5. 注重金石和艺术的内容编纂

缪荃孙是目录学家和金石学家，每编一志，他于这两门用力最勤，成就甚大。

《顺天府志·艺文志》是缪荃孙编纂的第一部方志艺文志，它分为纪录顺天事之书和顺天人著述两部分，前者收录了二百二十余种，后者收录八百多种。所收书按人编次，注明存、佚、未见，佚者考其所见书目，考其卷数异同，存者注明版本，或著见于某丛书，对于作者履历必加叙述，对有事迹见于该志的直接指出，不再重录，重要之作撰有提要，略加评述，可谓详略得当、重点突出。所撰提要尤其可贵，极具学术价值。其评述有的可指点读书门径，如论《吴中田赋录》云：“是书记事亦极详赡可法。”论查林《花农诗钞》云：“林足迹遍天下，其诗不主一家，沉郁顿挫，间以流丽，读之令人神往。”有的则系文坛掌故。如记徐松《新料注地理志集释》云：“是书取嘉定钱站《新斜注地理志》，斜订错误，并改还钱氏臆改之处，采国朝名人订《汉志》者书于眉端，不能尽者，夹签于内。松所自考，加‘松案’二字。本无书名，手稿为姚方伯颺元所藏，嘱荃孙理稿，爰录各条，分缀本文之下，属会稽章大令寿康刊行，以为读《汉志》者之一助。原签内偶有集释二字，即取以名其书。”前人每谓地方文献之书，以孙治让《温州经籍志》为最，《顺天府志·艺文志》比之，则后者简明有法，精审有过之而无不及。另外，《顺天府志·艺文志》中有的解题文字采自《四库全书总目》，如《春明梦余录》等条，读者不可不知。

缪荃孙主编的《昌平州志·艺文录》和《江阴县续志·艺文志》也比较成功，二书皆搜采甚广，沿袭《顺天府志·艺文志》的体例，采录序跋较《顺天府志·艺文志》多。以《江阴县续志·艺文志》载吴访《宜斋野乘》为例，缪氏著录《艺海珠尘》本、《栗香斋丛书》本、《常州先哲遗书》本，首录吴仿自序，次录《四库全书总目》该书提要，再录盛宣怀跋语。此皆本于缪荃孙“郡志宜简，邑志宜详”的编纂思想。

近代以来，为方志编金石志，其精审殆无有逾缪荃孙者。缪氏所纂现存者有《顺天府志·金石志》《江苏金石记》《江阴县续志·石刻记》等。

这三种金石志有以下特点：一是三种金石志颇有开创之功。入清以后顺天不曾编纂方志，元明旧志也仅传下来明万历沈应文所撰《顺天府志》残本六卷，谈不上金石志，而江苏也向无金石志。二是搜罗宏富。缪荃孙编纂《顺天府志·金石志》期间雇碑估李云从在境内四处访碑，李氏承命，“裹粮幢被，狂走京徽诸邑”，“荒村古刹，足迹殆遍”，所收遂富。在《江苏金石记》编纂时，缪氏也曾雇袁姓带徒四人到处搜访，访至江宁七县、镇江四县、常州三县等地金石，所得不少，加上艺风堂所藏旧本，共收有五百余种。《江阴县续志·石刻记》也收录近百种。三是这三种金石志体例都颇为完善。它们皆以时为序，著录了题名、释文、拓本高广尺寸、金石所在地等项，《江苏金石记》《江阴县续志·石刻记》还照原碑摹写篆、隶文，这非常有利于读者了解各种金石的原貌。四是考释精审。三志都辑录了前人大量的金石题跋、考释语，缪氏也时加考订按语，如《江阴县续志·石刻记》中的《孔子见延陵君子葬题字》条，缪荃孙就附录了严可均的题跋和孙星衍的《孔子题吴季子墓字考》，严跋考证了江阴朱彦记所论“季子墓在申港”和“润之延陵非古之延陵”的正确性，并考释了碑文的最后一字即“葬”字，指出乃碑文剥蚀而为摹写者臆改。孙氏考证了碑文最后一字为“葬”字，并指出碑文系孔子在齐观葬嬴博时所书而辗转流传入吴者。缪荃孙也在朱彦记后加按语指出《舆地纪胜》镇江府所载之季子墓碑是唐刻，江阴所载系宋刻，非一碑。这种多角度的考证使读者对于这个争论繁多的墓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三种金石志还各有自己的特点，如《顺天府志·金石志》多注明碑石的存佚，便于搜藏者搜拓；《江苏金石记》兼收金器，明知碑在而无拓本者编入待访目，故《江苏金石记》还附录待访目二卷，利于进一步地搜访；《江阴县续志·石刻记》兼收明石，和一般金石志断代至元代不同。前人修志，以明碑易得，往往不载，但县志宜详不宜略，收录到明可使文献大大丰富，况且从时间上来讲，清末之视明与清初之视元已无区别。这三种金石志为人们汇聚了大量的地方金石文献。

缪荃孙在方志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编纂方志取得的成就与他

丰厚的学养以及对前人的继承有着密切的关系。方志所涉及的学科极广，像地理、天文、历算、水利、民俗、史学、目录、金石等无不包含，没有各科丰厚的学养恐怕很难胜任方志的编纂。缪荃孙在晚清以博雅著称，精通多门学科，在史学、目录学、金石学领域均足以名家，其他各门如地理学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为他编好方志奠定了基础。缪荃孙是文献学家，博通古籍，这使他所编方志均以文献丰富见称。他精通考据之学，故其所编方志皆注重考辨，讲究征实。而亲任的金石、艺文二门，更是亮点。缪荃孙编纂方志盖由张之洞引领入门，从他所撰的光绪《顺天府志序录》和《重修常州府志条例》，我们可以看到张之洞为《顺天府志》所拟定的《修志略例》也为后者所承袭。缪荃孙还吸收了章学诚、洪亮吉、孙星衍等方志名家的方志学精神，将之融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的方志理论。他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方志学，这一点尤其可贵。他在《江阴近事录序》中说：“因以后历日不同，官职不同，政令不同，势难合并，且由图经而为方志，均属古法，将来新学昌明，或不复仍袭志之旧号。然民国以来历年事实不能不记。章实斋先生尝言每邑当设一志科，掌其事实，为修志之蓝本，今辑此数卷，权作志科掌录可也。”用意可谓深远。

第六章 缪荃孙史学成就

作为史学家，缪荃孙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一方面他是中国传统史学中最后一批官方史官，在史馆担任过国史纂修、国史总纂，参与过清代官方国史的修纂。另一方面，他又是著名学者，在晚清史学转型时期坚持传统史学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史和当代史的纂修、地方志的纂修做出了卓越的成绩。缪荃孙一生著述繁富，在史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史学不仅继承了乾嘉的遗绪，而且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其基本特点则表现为由封建传统史学开始向近代资产阶级史学转化。

缪荃孙处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激烈变动中，他的史学由于时代变化的影响，已开始呈现出由封建史学向资产阶级史学转化的趋势。尽管他并没有完成这种转变，但和其前辈相比毕竟还是提供了新的东西。由于中国封建主义影响很深，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又不发达，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史学也很难一下子完全摆脱封建史学的束缚，这正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特点。

一、担任史官与官方史书的修纂

官方修史，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传统。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封建官府又委派史官、设立史馆，控制修撰当代史的大权。缪荃孙的史学研究就是从被任命为史官修史开始的。在缪荃孙的一生中，多次担任史馆史官

或者相当于史馆史官的官职。他的许多史学著作也是在史官职务上完成的。光绪九年（1883），缪荃孙在史馆被任命为国史（清史）五传纂修，第二年又担任了国史馆总纂官。光绪十四年，因缪荃孙父亲去世而丁忧离职。后来，光绪十九年担任国史馆提调，但不久因与总裁徐桐不合而离职。到了晚年，缪荃孙又被邀请参加了《清史稿》的编纂，担任了清史馆总纂。在史官任上，他的主要的史学成就如下：光绪十四年（1888），纂成清国史《儒林传》上二十二篇，下四十九篇，《文苑》七十四篇，《循良》四十三篇，《孝友》二十九篇，《隐逸》十五篇。但是，他的史学研究成果受到总裁徐桐的挑剔和斥责。其原因是徐桐以《参同契》之言说《易》，要缪荃孙把纪大奎编入《儒林传》。缪荃孙认为：“《易》有经学之易，有术数之易，所以朱子注《参同契》，《四库》列入道家，而不收经部，似此为例，大奎似未便补入。”结果被攻击为“恃才独断，渺视前辈”。1894年在保和殿参加“御试”，被抑置三等一百二十四名，罚俸二年。缪荃孙决定弃官离京，临行将稿交馆，徐桐不办进呈。缪荃孙将“初稿留篋中，本欲刊入私集”，后因“费重而止”。缪荃孙虽然离开了史馆，但他并不甘心做一个隐居的学者。他认为：“古有三不朽，日立德、日立功、日立言，士君子厕身儒林，将以求志为达道之原，修身为本，岂愿沈冥蜀庄，草木同腐已哉！”那种“匿迹销声，不为世用”，“独善其身”的做法，“曾何益于天下也”，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为了经世。

1914年，清史馆开，聘缪荃孙为总纂。他于“开馆之始，多所赞画”。最主要的是拟订开馆办法。鉴于清代实录全录谕旨，起居注止载发钞之谕旨，大臣传无表字，无事实，无著撰，止录奏疏，且仅二品以上有传，三品以下则无，国史馆的资料是很不完备的，缪荃孙认为要保证史书质量，非广搜群籍不可。他与杨钟羲、于式枚、吴士鉴、秦树声、陶葆廉等六人同呈了《谨拟开馆办法九条》。在其中，缪荃孙等提出了“搜档册”“采书籍”“仿《明史》”“勤采访”“办长编”等九条意见：

“搜档册”。就是清查档案，包括：1. “史馆大库皮藏”，“须将史馆

旧稿、巨编零册、摺包旗档全数发出，交收掌编号备查”；2.军机处方略馆档案及各处所存档案；3.“满蒙字档，须延认满文、蒙文者编号并摘由”。

“采书籍”。缪荃孙等认为：“本朝文人考古则优于历代，征今则不如前明，推原其故，满员知之而无记载，汉员则不使知之，即知之而亦不敢记载。”但是，清代编修的地方志很多，江南图书馆、上海盛氏图书馆及各省省城图书馆藏书丰富，其中有关史事的书籍应“不厌其详，不避其复”地送史馆，以资采获。

“仿《明史》”。缪荃孙等主张修史“必据至近之史为例”，认为《明史》“其辞达，其事明，远出唐宋二史上”。大体说来，“其书纪、表不如志，志不如传，宏正（弘治正德）前之传，不如嘉靖以后”。但是，它“汇聚数十年之名流，考证三百载之事实，上搜开国之群雄，下录三王之事迹，数人同事则类叙，一人数事则别见，不漏不蔓，体例最善。今日修史，惟专仿《明史》，不必高谈皇古也”。

“勤采访”。缪荃孙等主张要像《明史》开馆那样，“各府均有采访局”，从事采访。

“办长编”。即用司马光撰《通鉴》的办法，“先编丛目、草卷”，“请纂修官认定门类”“事各一门，人各一册”，写成草卷，然后“删削成篇”。缪荃孙等认为：“满洲蒙古列传，又宜分族办长编。龚定庵曾言，满蒙人取满语汉语为名，不过吉祥语数百字，往往雷同。《元史》有一人为两传之弊，近时恐有合二人为一传之弊。长编须如此起，至编纂仍分时代事迹。”

除提出这些办法外，缪荃孙等还拟了一个“目”，包括纪十二篇，志十五篇，表十篇，传十七篇，供史馆参考。在列传的分类上，缪荃孙等不赞成“以算学归入儒林”，认为“本朝专家甚多”，主张“畴人传另立专门”，反映了其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但是，从整体看，缪荃孙等所提出的修史体例基本上还是沿袭旧史，并未冲破封建正史的束缚，与梁启超偏重于创修新史的《清史商例》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由于缪荃孙年迈，身居沪上，不能久留京师，赵尔巽允许他“携书自随”。因《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五传初稿，原出缪荃孙手纂，故仍归他增订，后以《循吏》一传让归他人，余四传均在两年内脱稿，又纂成《土司传》《明遗臣传》，拟全书凡例一卷，并“遍阅《明史》列传一过，发明其每卷编次义法，笔录寄馆，以备印证。”至1918年为止，他曾两次到京，商办史事，“力主先拟定传目，以时代为段落，择人分任”，并自任康熙一朝史传，脱稿者十之六七，未竟其事，即于1919年去世。

二、当代史的研究和编纂

编写当代史，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传统。缪荃孙曾长期担任清朝国史馆编修。他在担任史官之余，利用其有利条件，在清代掌故和史料的搜集、研究、整理、编纂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续碑传集》《羽埠山民逸事》和《云在龛笔记》等是他编纂的当代史的代表著作。

《续碑传集》的编纂是用碑传形式记录史事，在清代始自全祖望的《琦亭集》，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黄宗羲、万斯同以一代文献自任，实为史学嫡派”，“乾隆以后，传此派者，全祖望最老。”

缪荃孙自光绪辛巳（1881）起开始编纂《续碑传集》，至宣统庚戌（1910）在江楚编译局刊成八十六卷，另有补乾嘉诸名人十四卷因志局裁撤未刊。碑传是碑和传的合称，包括刻在石碑上的人物传记和写在纸上的人物传记。《四库全书总目》称：“墓碑最盛于东汉，别传则盛于汉魏之间。”其盛行也久。唐宋以来的文人文集，碑传文往往占相当篇幅。至宋杜大珪始荟萃一代碑传，编《名臣碑传琬琰集》一百零七卷，为史家称道。明徐统、王元继踵于后，编《明名臣琬琰前后录》《续录》。清代首先编辑碑传集的是钱仪吉，缪氏的《续碑传集》就是为续钱书而作。缪荃孙自序该书道：“国朝钱衍石给谏，亦成《碑传集》百六十卷，一本大珪之例。钱书成于道光间，至嘉庆朝为止，迄今又九十年，

中兴伟绩，贤才荟萃，长篇短牍，记载较多，荃孙不揣猥昧，起而续之。自光绪辛巳迄今三十年，仅成书八十六卷，可谓陋矣。”

缪荃孙之《续碑传集》是钱仪吉《碑传集》的续编，但在编纂思想上合于全祖望《鮑琦亭集》保存文献、颂扬先贤的思想是一致的。

在著作的体例方面，《续碑传集》大体遵循钱书体例，按照传主的官爵、事业、事迹及时代分类，具体为：宰辅、院部大臣、内阁九卿、翰詹、科道、曹属、督抚、河臣、监司、守令、校宫、佐贰杂职、武臣、忠节、藩臣、客将、儒学、女学、孝友、义行、艺术、列女二十二类，其中宰辅、院部大臣、督抚、监司又分道光朝、咸丰朝、同治朝、光绪朝四朝，列女分为贤明、孝淑、辨通、节操、烈义、贞洁、义行七小类。较钱书体例，缪荃孙还根据形势的变化做了些调整，他取消功臣类下的沈阳功臣、国初功臣，宰辅类的开国宰辅、明臣宰辅，因为这些类目在道光以后已无实际内容；将经学、理学合为儒学，因为“分经学、理学而二仍是道学、儒林之习”，不符合当时学术发展的实际；“藩臣”改称“外藩”，后加“客将”一目，因为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曾经利用了洋将；列女中添“辨通”一目。缪荃孙“又用明《琬琰集》《言行录》例，收集句文”，无疑更加丰富了各传主的事迹。另外，缪荃孙还遵循钱书例，为各家作者撰有小传，附之卷首目录之后。

碑传文主要取材于各家文集，各地方志。其丰富的藏书，渊博的目录学知识，广泛的交友为其编纂该集打下了基础。《艺风老人日记》记载了其编纂经过，这里摘录其光绪丙申年（1896）八月的有关记载，以窥一斑：

六日，戊辰。晴……校《湖南文征》《碑传集》。

十三日，乙亥。阴……校施均甫文人《碑传集》。

十四日，丙子。晴……校《程密斋文集》入《碑传集》。十五日，丁卯。雨未止……校蒋湘南文人《碑传集》。

十六日，戊寅。晴……校孙琴西文人《碑传集》。

十七日，己卯。阴……校李次青文人《碑传集》。

十八日，庚辰。晴……校戴存庄文人《碑传集》。

十九日，辛巳。雨，旋止……弟二次理碑传稿。

二十日，壬午。雨……校徐晦甫文《善思轩文钞》入《碑传集》。

廿一日，癸未。阴……校天岳山馆文人《碑传集》。

廿二日，甲申。阴……校天岳山馆文人《碑传集》。

廿四日，丙戌。阴……校陈口口文人《碑传集》。

廿五日，丁亥。丑刻大雨，阴……校王少鹤文人《碑传集》。

其中若《戴存庄文集》、徐晦甫《善思轩文钞》均系从友人借得。光绪丙申年（1896）八月十四日载：“邵仰源、黄杭之靖海来，仰源借来戴存庄《味经山馆文钞》四卷、徐晦甫《善思堂文钞》九卷。”他也直接向朋友、传主子孙搜求，《艺风堂友朋书札》所载王先谦致缪荃孙第四十八札云：“承示《续碑传集》，闻之欣快，谨寄上数篇，以备甄采。”邵松年致缪荃孙第六札道：“顷又奉到手教，并《续碑传》二册，先君志铭已承刊入，敬佩弗忘。”

1840年开始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封建社会闭关锁国的大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日益兴起的农民革命运动，清政府已不得不借助外国资本主义的洋枪洋炮来镇压人民革命，所以，《续碑传集》在卷七十增添“客将”一目，将华尔、法第福、戈登等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与“藩臣”僧格林沁等并列，大加表彰，说明了缪荃孙的史学思想，正适应了清王朝勾结外国侵略者的政治需要。

至于“儒学”不分经学理学或道学儒林，更是维护清朝统治的需要。乾嘉时考据风行，汉学大盛。道光以降，今文经学兴起。而曾国藩专习程朱。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下，曾国藩曾大声疾呼：“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门户之所也。”

可见，农民起义的客观形势迫使地主阶级联合起来，从政治、思想上消除门户之见，共同对抗革命运动。《续碑传集》卷七十一至七十五

关于“儒学”的编纂不分经学理学或道学儒林，也正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需要的写照。

《续碑传集》搜集广泛，收录传主数量多，人物类型多样。其八十六卷共收录作者三百五十九家，志书六十种，记录道光至光绪时期的历史人物一千一百多人。它包含了各阶层的人物，从朝廷大员到各地守令；从地方将督到佐贰杂职；从儒林到文苑；从孝友到列女。不以政治态度不同而有所舍，不因学术倾向相异而有所弃。有不少传主还收录了多篇传记，例如道光朝监司类的姚莹，收了徐子苓撰的墓志铭，收了徐宗亮撰写的墓表，还收录了吴嘉宾撰写的传。再如文学类的周济，收了魏源撰写的传，徐士芬撰写的记事，沈铭石撰写的传，丁晏撰写的家传。这些传记并非重复，而是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传主的事迹，大大丰富了《续碑传集》的内容，提高了它的文献价值。

《续碑传集》在史学上的价值，主要在于为清史和近代史研究提供资料。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鸦片战争时期的禁烟派领袖黄爵滋、林则徐、邓廷桢，投降派人物穆彰阿，为抵抗英国侵略而牺牲的关天培、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陈化成，投水自尽的两江总督裕谦，被贬官削职的台湾道员姚莹，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俘死在印度的两广总督叶名琛，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张国梁，咸丰时进行币制改革的王茂荫，中法战争时的爱国将领冯子材，戊戌变法时期主持维新事业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反对变法的封建顽固派御史朱一新，义和团运动时搞“东山互保”的两湖总督刘坤一，经学家王念孙、刘逢禄、阮元，俞樾，史地学家张穆、何秋涛、徐松、徐继畲，金石学家吴大澂，藏书家杨以增、丁丙、朱学勤，文学家张维屏、张际亮、包世臣等人，都可在《续碑传集》中翻检到他们的生平资料。

缪荃孙一生所撰碑、传、铭、记甚多，其中大多有史料价值，但也夹杂着一些应酬之作，而在《续碑传集》中，仅收录了十三篇，却是经过精选的。这十三篇碑传记叙的当代历史人物，基本上都与所谓“中

兴”事业有关，而大体上则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清中央政府中的封建洋务派官僚，如：曹毓瑛，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常说：“军旅之事，患信任不专，事权不一。”为那拉氏和奕訢出谋划策，缪荃孙说他：“一言之褒贬，一事之成败，皆足以斡旋大局，辅佐中兴。”郭篙焘，曾“出使英国”，是洋务派中湘系集团的重要人物，他“以鸦片为当禁，教民应分别约束”，主张“铁路应办，矿务应开，一切内政当整顿，而练兵为后”，缪荃孙认为这都是“阅历有得之言”，反映了他对兴办民用工业的重视。周家楣，曾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并两任顺天府尹，为文祥所器重，他在办理四川教案时，主张“但论曲直，不论民教”，反对“偏护教民”，对外国传教士有所警惕，认为“转以中国治民之柄男之该教，决不可行”。缪荃孙赞赏他维护中国主权，不卑不亢，不媚不愚，认真对付外来侵略的立场。

第二类是地方督抚和湘军将领，如：陶模治理新疆，在边疆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坚持“属地当争，边要当守”。为了开发中国西部，增强国力，他还议辟径路，分道测绘，探索矿产资源。浙江巡抚祖翼，在“咸同以来，外交内患，百端纷集，事机变幻，间不容发”的情况下，“能当机立断，措置裕如”，在平息人民反抗及办“洋务”时均颇为能干，缪荃孙称赞他“勇于任事”。两淮盐运使洪汝奎，咸丰年间被胡林翼招去，参与曾国藩军事，同治年间为李鸿章总理粮台，供应防军及他省协同，光绪年间又代沈葆楨治事。湘军将领田兴恕、周达武，曾分别在骆秉章、李续宾部下镇压太平天国和少数民族起义。

第三类是依附于封建洋务派的学者文人，如：张文虎，在太平天国时曾被曾国藩“聘赴安庆”，李鸿章任两江总督，“议刻经史”，又与他“商定条例”。刘庠，是曾国藩门下士，晚年着手写《十三经》，自号“写十三经老人”，在提倡程朱理学方面，深得曾国藩之真传。翰林院编修俞樾，政治上并不依附于洋务派，他“以高邮王氏为宗，其大要在正句读，审字义，通古文假借，由经以及诸子”，但其晚年常语人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中学为体者，道也；以西学为

用者，器也。”用“道”和“器”的关系具体表述了他对“中体西用”这一主张的理解，在思想上与封建洋务派有相通之处。

上述事例说明，缪荃孙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所记叙历史人物主要是以曾、左、李为代表的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为主要对象的。这些人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其中有官僚武臣，也有学者文人。尽管他们的表现各有差异，但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为维护 and 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缪荃孙为这些人树碑立传，歌功颂德，无非是为了讴歌洋务运动，宣扬“同治中兴”。

当宣统二年（1910）江楚编译书局刊印这部书的时候，不仅“中学”之“体”早已动摇，而且代表这个“体”的清封建王朝已面临它的末日，所谓“中兴伟绩”完全成了历史的陈迹。《续碑传集》的价值仅在为后世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一部有用的资料。

在缪荃孙《续碑传集》的影响下，近人闵尔昌以清代人物为主，辑录各家文章，兼及道光、咸丰以前为《碑传集》《续碑传集》所遗漏者，编成《碑传集补》六十卷，又卷末一卷，于1923年成书，共收八百多位清代人物的传记。这三部碑传集合在一起，为我们检阅从清初到清末人物的生平，提供了较为丰富的资料。

由于缪荃孙曾长期在史馆任职，他极其关心清代掌故的搜集和记载。他认为：“掌故，军国大事，治乱仪关，祖宗家法，沿革备载，诚立国者之所资，亦秉笔者之盛业也。”在《古学汇刊》上，他发表了不少关于清代掌故的笔记。如：《山民逸事》，记录了龚自珍的海涵地负之才，对其蔑视一切的言行和近于桀骜不羁的行为做了具体描述。收罗掌故更多，内容更丰富的则是《云自在龕笔记》，《古学汇刊》上先后发表过其中的“书画”“顺治朝补记”“列朝一”“列朝二”“康熙朝诸臣”等部分，尚有未刊部分，后由邓之诚作序，分“论史”“书画”“金石”“书籍”四卷，补编为《云自在龕随笔》。这些笔记和随笔，出自私家之手，忌讳较少，有的比官方记载要详，可互相对照补充。此外，缪荃孙还用抄书的办法，大量保存清代掌故。北京图书馆现藏有《艺风堂杂钞》二十二

册，搜辑了不少清代文献、清人书札、日记及书目。这些资料虽未经分类编排或按时代整理，但在搜载清代掌故上的贡献却不能低估。如第一辑卷一中的《天聪时诏奏》，记载了清军入关前书房中用贝勒，编修国史开始汉字、金字并用，以及纳粮赎罪和清查土地等法令规定。卷五录《顾亭林与朱长孺书》，则记载了顾炎武对自己编《日知录》的看法，说：“吾辈所恃在自家本领，足以垂之后代，不必傍人篱落，亦不屑与人争名，弟三十年来并无一字流传坊间，比来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传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事，则确乎可信也。”这反映顾炎武的崇高气节与其所从事的学术活动的自信。《艺风堂杂钞》第二辑卷二中，还著录了嘉庆十九年（1814）英吉利国遣使臣罗尔阿美士德等入贡方物的贡单，详载三十九种贡物，反映了当时的中西交往的历史情况。

总之，这类杂钞，虽未经分类编排或按时代整理，比较零乱，但在搜罗清代掌故上的贡献，却是不可低估的。

三、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晋书》《辽史》的补编

缪荃孙在古代史研究上的主要成就是对《晋书》和《辽史》的补编。在这方面继承了乾嘉史学的成果并有所发展。《晋书》修成于唐代，是唐太宗亲自令人重修和直接参与修撰的，号称“御撰”。在这部书之前，曾有十八家晋史，唐太宗认为这些史书“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其文既野，其事罕传”，全部推翻，下令重修。在政治的压力下，这部官修《晋书》一成，其他不合要求的晋史逐渐亡佚。后世史家怕与“御撰”之书出现矛盾，对亡书不敢辑佚，对《晋书》也不敢批评、补遗。到清代，由于皇朝几经更迭，年代久远，这方面的忌讳自然减少。

从清初万斯同起，对《晋书》的志表，补编甚多。由于《晋书》编撰者的正统观点和大汉族主义思想，晋代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被列入“载记”，记载粗疏。尽管唐朝皇室本身含有鲜卑血统，但唐太宗最忌讳

别人说他是鲜卑人，一向标榜出自陇西李氏。晋代十六国中，唯有张轨所建之前凉和李嵩所建之西凉编入列传，反映了唐太宗的意志。最早为《晋书》补编的万斯同，是明末清初史学大师黄宗羲的弟子，由于思想上怀念已亡的汉族地主政权，对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不满，他在编撰《晋僭伪诸国世表》《晋潜伪诸国年表》及汉、成、赵（包括后赵）、燕、秦、后秦、后燕、南燕等九国将相大臣年表时，表名前均冠以“伪”字，以示鄙薄。但因当时文网甚严，也不敢再有任何其他发挥或评论。此后，练恕撰《西秦百官表》，表前略加小序，叙述编撰缘起，表名不用“伪”字，反映了清代满汉民族的日渐融合。缪荃孙编撰《后凉百官表》《南凉百官表》《西凉百官表》《北凉百官表》《夏百官表》《北燕百官表》，基本上沿用陈恕的体例，并进一步在序中增加了对史事的评论，突破了乾嘉史学单纯考证、辑佚、补遗、注释的传统。这是和晚清以来文网松弛，风气大开分不开的。

缪氏补编《晋书》，正面临清末鼎革之时，他对史事的评论，首先着重在总结历史上政权成败的经验教训。如吕光带兵进军凉州，正是苻坚为姚萇所杀之时，缪氏评论他说：“夙抱风尘之志，适值鼎沸之时，一欲成大业，类有明征，择福地之可居，非叛乱之挺险矣”。吕光的军队，骨干是氐族人，吕光本人也是氐族人，正是依靠这支队伍称霸河西，缪氏总结其经验说：“上既加之青眼，臣亦报以赤心，一带砺千秋，本支百世，立国之道，莫过于斯。”吕光病死后诸子争立，自相残杀，政事败坏，后凉灭亡，缪氏总结其原因是“萧墙之内，干戈自动，一弟兄发难，民众土崩”。一个政权的兴亡，与领导核心内部的团结分不开，缪荃孙的分析，说出了这个道理。

缪氏对史事的评论，还有些属于揭露性的。在《夏百官表序》中，他揭露刘裕“篡位谋巫，定边志疏”，因忙于夺取东晋政权，灭掉后秦不久就退回江南，才使赫连勃勃乘机夺取长安称帝。但赫连勃勃是个视民如草芥的暴君，缪荃孙说他：“残忍众殊，骄奢习重。处士既至，以过礼而杀身；将作益精，以严刑而慑众，民至瘁矣，国亦随之。”确是击

中要害。

对十六国政权中某些较有才干的少数民族首领的业绩，缪荃孙并不一概抹杀。在《南凉百官表序》中，他说鲜卑族首领秃发乌孤“智本兼人，情殷复国，……甄西州之豪杰，乐南亩之农桑，假令运祚久长，声名洋溢，虞廷喜起，以契稷为元勋，南国乐歌，嘉周召之夹辅，未可知也。”对北凉的首领，卢水胡沮渠蒙逊，缪荃孙说他“博涉史学，通晓天文”，表彰他能“搜求贤哲，广进当莞，纳建忠之言，安我桑梓”，对其晚年淫风盛行，“乞灵于鬼”的荒唐行径，也做了揭露和批评。北凉的首领比较重视文化，缪氏指出：沮渠牧键（茂虔）嗣位后，“拜宋慈为右相，吏洽克昌；尊刘晒为国师，文学日盛”。十六国时期，由于凉州地区比较安定，河西文化不仅和江左文化息息相关，而且还吸收了西域文化和佛教文化。北凉灭亡后，河西文化被介绍到中原地区，对北魏文化有很大影响，正如胡三省在《资治通鉴》注中所说：“代北以右武为俗”“而魏之儒风及平凉州始振”。缪荃孙能根据历史事实，比较公允地评价少数民族政权对发展我国文化的贡献，这种史学观点是值得重视的。

缪荃孙补编《晋书》六表的另一成就，是他通过对《晋书载记》《御览》、姓氏书、金石拓本全行搜采，纠正了《晋书》在史实上原存的一些谬误，如：关于后凉灭亡的时间，关于南凉存在的年数，关于西凉的灭亡时间和存在年数，关于北凉的灭亡时间，关于夏政权存在的年数，缪氏都纠正了《晋书》之误。由于《晋书》的编修者，不少是文人学士，并非史家，在史料选择不十分注意甄别取舍。晋代之十六国，本各有史，流传颇盛，后魏崔鸿按照此书，作《十六国春秋》，诸国之史，渐以湮废，而自宋以来，鸿之本书，亦不见著录。《太平御览》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由李防等编成的一部大型类书，当时记载十六国之史的一些较原始的资料还未全部亡佚，如崔鸿《十六国春秋》中之《后凉录》《南凉录》《西凉录》《北凉录》《夏录》等均被《御览》所引。缪荃孙根据《御览》，纠正《晋书·载记》之误，应该说是比较可信的。

除为《晋书》补表外，缪荃孙还曾为《辽史》补志。辽、金、宋三

史，成书于元顺帝至正年间，当时社会激烈动荡，元政权风雨飘摇。元顺帝欲藉前代“治乱兴亡之由”，“垂鉴后世”。但因仓促成书，俱甚粗疏。《辽史》《金史》皆缺艺文志，此二朝旧著存佚，无可考见。清代考史家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曾将辽、金二朝人之著作，并以附焉。此后，倪灿、卢文昭《补辽金元艺文志》，亦因“辽金篇籍无多，不足分列，故合元以为一编”。金门诏撰《补三史艺文志》，也是“取（辽、金、元）三史所载，并旁博采，合为一志”。最早单独为《辽史》补艺文志的，要数缪荃孙。由于辽代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唯听刊行于境内，有传于邻境者，罪至死，故书籍流传于后世者绝少。要补编《辽艺文志》，首先必须做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缪荃孙的补编，正是从这里入手的。据其《辽文存》序讲：“昔年读《黄琴六文集》，知昭文张氏月霄曾辑金文，心仪久之，癸未之夏，南海谭叔裕前辈以伍刻《金文最》百二十卷见贻，即张氏所辑者。翻阅累日，如获壤宝，……余因思契丹开国，久于完颜，文教之彰，使命之美，亦与金源仿佛，因采金文见有辽文亦并甄录。惟辽时书禁甚严，不准传于邻境，五京兵焚，嫌素塌地。迨元人修三史，以文献无证，致蹈简略之消。今辽人遗书止存《龙龕手鑑》《焚椒录》《星命总括》三种，而《焚椒录》尚有与《契丹国志》不合，言其伪者，即记载辽事之书，正史外亦止《国志》一种。降而搜采金石文字，又仅得顺天属易州、宣化一带，山西、奉天，力所未及，晨钞螟写，单词片语，靡不搜采，共得诗文二百余篇，不及金文十分之一，然其难十倍矣。”

缪荃孙在张金吾辑《金文最》的影响和启发下辑《辽文存》，历时十余载，于1896年成书。该书凡六卷，卷一录诗七十首，附谣谚八首。卷二录诏令三十七篇，附会同六年《下令》：“兵行有伤禾稼，损租赋者，以军法论。下有司敕：于每村定有力人户充村长，与村人议，有力人户出腾田亩，补贫下不逮，顷田自愿者，据状征收。”反映了辽初军纪的严明和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从中可以窥见耶律德光时代契丹兴盛的原因。另有册文二篇，一为《册立石敬瑭为皇帝文》，一为《册封高丽

王制》。卷三录策问一篇，文二篇，表十三篇，奏疏六篇，铭八篇，其中《普济钟铭》：“甲戌年铸，用白铜一万五千斤。”录自《高丽图经》。《星宿寺钟铭》：“当生东国之时，同修善种；后往西方之日，共证菩提。”录自《东国通鉴》。反映了辽代冶炼事业的成就，佛教的兴盛及其与东西文化的交流。卷四著录记二十三篇，其中大多是宗教史料。有一篇乾统七年王鉴写的《大辽国析津府三河县重修文宣王庙记》说：“阐扬儒教，辅助国风，新众目之观瞻，增一色之壮丽，功待人兴，人与时会。”反映了汉族文化对辽的影响之大，说明辽朝后期契丹民族基本上已与汉族融合。卷五著录序八篇，书十八篇，碑八篇，墓志三篇，其中除书为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史料外，其余大多是宗教及文化史料。卷六录塔记十四篇，幢记十九篇，杂著二篇，均为宗教史料。为了便于考见梗概，缪荃孙编了《辽艺文志》和《辽金石存目》，附于书后。《辽文存》收集的材料，很多是金石碑刻。用金石学研究的成果来补充史学，是缪荃孙史学的一大特色。

《辽艺文志》是在编撰《辽文存》的基础上写出来的，它著录辽代图书五十一种，包括小学、译语、实录、起居注、杂史、仪注、地理、政书、传记、史钞、五行、医书、释道、别集，凡十四类。

小学类著作《龙龕手鑑》一书，乃统和间燕僧行均编。据辽统和十五年燕台悯忠寺沙门智光撰序介绍，这部字书“计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余字，注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余字，并注总一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余字，……绷以新音，遍于龙龕，犹手持于蛮镜，形容斯鉴，妍丑是分，故目之曰《龙龕手鑑》，总四卷，以平上去入为次，随部复用（四声）列之，又撰五音图式附于后，庶力半功倍，垂益于无穷。”真是蔚为巨著。

译语类著作重熙中翰林都牙萧韩家奴译《译五代史》《译贞观政要》《译通历》及耶律庶成译《译方脉书》，反映了把汉族的史学、政治和医学等介绍到辽国的情况。

研究辽史，往往苦于资料缺乏，语言又为一大障碍。缪荃孙在编撰

《辽艺文志》时，首列小学、译语二类，放在记载帝王事迹的实录和起居注之前，在史学上是很有见地的。在缪氏之后，王仁俊撰《辽史艺文志补证》，黄任恒撰《补辽史艺文志》，俱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在史学见解上是远远不及缪氏的。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个人精力的有限，缪荃孙不可能在更大的地区和范围内进行搜访。1922年庆陵出土了汉、契丹两种文字对照的帝后哀册，1951年在锦西孤山又出土了辽静江军节度使萧孝忠的墓志，这些都是缪氏生前所未见的。解放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对辽史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写出了一些较有分量的专著，但深入开展辽史研究，还有待于资料的大量挖掘，缪荃孙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缪荃孙终其一生是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剧烈震荡以至崩溃相随的。道咸之际，清王朝已完全从盛世的顶峰跌落下来，进入“衰世”和“乱世”。当时吏治败坏，贪污贿赂公行，各级官吏贪残欺民，整个封建统治尾大不掉，颓废不堪。与此同时，土地兼并恶性发展，王室、贵族、官僚的穷奢极欲全部转到对民众的残酷榨取上，老百姓失去田产房室，大批流民转迁沟壑，社会矛盾日益严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给清统治者以极大的震动。就在清王朝内部岌岌可危之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凯觎中国广阔的原料和销售市场，对中国进行猖狂的殖民掠夺。而此时清室的腐败自然就给西方列强以可乘之机，汹涌的鸦片贸易侵蚀中国人的意志和躯体，而且由此造成白银大量外流，财税枯竭。帝国主义的大炮开始轰击古老中国的大门。清王朝内部腐败透顶，农民起义不断，外部帝国主义逼迫，内忧外患，使强盛一时的清帝国正一步步由原来的大一统封建国家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沦落。清王朝内外交困，一种旷古未见的历史变局正在形成。

面对这一风雨欲来的大变动，学术思潮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在经学领域，汉宋对垒与汉宋调和两种倾向仍然存在，但汉宋调和的倾向占了上风，汉宋合流已成趋势。当时的不少学者，都强调变通，摒弃门户，主张以汉补宋，以宋补汉，既考证文句典章，又推究经籍大义。

这实际上是在提倡一种既重实证，又重义理的新学风，以适应社会变动对学术的要求。其次，今文经学开始成为经学研究的潮流，经龚、魏提倡，公羊变易历史哲学异军突起，成为当时人们认识历史、讥切现实、变法图强的有力思想武器。再次，考据学风遭受批判的同时，经世思潮再度高涨。缪荃孙生于清末道光年间，正值“上流人才，集精力于考古，以现代事情实为不足研究。此种学风及其心理，遗传及于后辈专喜得拙残编，不思创垂今录”，在传统思潮的影响下，乾嘉以来的相当部分的学人终生陷入考据一途不能自拔。然此时考据学不合时宜，不能直接为社会变革提供依据，而时代风气中又有一股潜流在升腾，即清初曾经提倡的经世致用思潮开始复活。他们对乾嘉末流只注重考据而较少关注现实的学风进行了批判，倡导关注现实的经世致用学风，大有欣欣向荣景象。因为乾嘉考据学虽吸引了不少学者作为一生选择，但到后来演变愈趋繁琐空疏，与实际生活几无干系。从厌倦到叛逆，一部分学者背其道步入经世一途。所以，道光年间这两种学术风气盛行于全国，影响和感召着新一代的士人、学者。

缪荃孙生于此时，无疑这一社会思潮对其学术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缪荃孙有着乾嘉传统考据学术的熏陶，学术研究中重考订，在1865年移居成都时即追随传统学者学习考据、目录之学。“翻阅《三通》《御览》《皇清经解》诸书，始为考订之学。”一方面，缪荃孙又由于受到时局的影响关心时事，留心经世之学。与洋务派的官员张之洞等人结交，提倡经世致用。所以，缪荃孙的思想观念有着新旧交替时期所特有的特点，即在他身上既有传统学术思想的影子，又有新的学术思想因素。

缪荃孙治史是在乾嘉考据史学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首先，在清末的经世思潮下，缪荃孙的治史注入了经世的目的。修史首先是要崇明教、尊国体。这和其在史馆担任史官，撰写官方史书的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国史馆充任五传纂修，后来又广泛采录道、咸、同、光人物碑传，撰写《续碑传集》就是要“借名人之文字，则以存名人之事迹”，

保存文献的真实性，借此以表扬当时的忠臣义士，强调士节。其用意自然是为了崇仰名教，宣扬忠孝之道。这是缪荃孙治史的首要目的。

第七章 缪荃孙图书馆事业的继承者

缪荃孙是近代中国图书馆馆长之父，他所创建的图书馆后来又由其弟子或执弟子礼的学者所继承发扬，使得中国近代的图书馆事业继续发展。在这方面做出显著成就的就是缪荃孙在江南图书馆馆长的继任者陈庆年以及缪荃孙的弟子柳诒徵和刘毓秀。

一、缪荃孙在江南图书馆的继任者陈庆年

陈庆年是缪荃孙江南图书馆的继任者，他和缪荃孙一起创建了江南图书馆，又在1907年以后成为江南图书馆的馆长，他为江南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庆年（1862—1929），字善余，自号石城乡人，晚年又号横山，江苏镇江人。陈自幼随父读书，十二岁就师于高公书院，好研究文学，经史百家无所不读。二十一岁补县学生，寓居金坛，常在书店看书，发现多年企求而未得者疾读牢记，返寓苦忆而录于纸。

清光绪十二年（1886），被江阴南菁书院录取，为院长甬东大经师黄元同、清末著名学者王益吾所赏识。取得优贡生后，不复追求功名，以热衷科举、猎取富贵为可耻；而悉心治学教书，终身从事文化教育事业，先后在江苏、湖南、湖北讲学近四十年。清光绪二十三年至武昌，见两湖总督张之洞论学，张大喜，对左右说：我今天才真正实现延揽人

才的心愿，遂聘至两湖书院讲史。陈撰史作多部，均属上乘，尤以《兵法史略》为最。张通夜研读，击节赞赏。时京师大学（即北京大学）初创，张冶秋尚书函聘北上主持，被婉言谢绝。

清光绪三十年，端方任江苏巡抚，以桑梓之义劝其东归，而陈苦于久在异乡，遂返镇江。张挽留不成，怏怏若有所失，曾说“他人以湖湘子弟失名师为惜，吾以良史中断为可惜也”。次年，端方调任湘鄂，聘其为湖南省学务提督并筹建长沙图书馆，推辞未准，锐意经营，是我国最先以图书馆命名的藏书机构。

清光绪三十三年，陈庆年主持江楚编译局和江南图书馆事，实际上担任了江南图书馆馆长，在任期间，对江南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尽心尽力。在他的书札和日记中常常留有进行馆务活动的相关记载。比如，1909年2月21日日记有“屠静山来图书馆看书，置酒款接”。屠静山即屠寄，著名的学者，与缪荃孙、陈庆年均有密切交往。又如，1909年3月7日日记“四时至图书馆检书”。1909年3月24日日记：“至龙蟠里，勘图书馆工程，甬砖墙脚料已运齐”，5月16日，“请陶斋为江南购藏小印印图书馆书”，8月18日，“图书馆开办阅览室，往馆一日，今日不收券价，来观者十余人而已”。可见陈庆年在任馆长期间，对图书馆的建设是尽心尽力的。

陈庆年对江南图书馆的主要贡献是力排众议，保住了江南图书馆，避免了江南图书馆被裁撤的厄运，也使得近代的图书馆事业得以正常发展。1910年辛亥革命前夕，江苏省咨议局议员屠宽提出了裁并江南图书馆的议案，时为咨议局议员江南图书馆馆长的陈庆年对裁撤议案极力反驳。他提出，所谓江南图书馆所藏图书多为古籍，不合普通社会之用，不合时用，清闲特甚等等论调过于轻率，是很不谨慎的说法。他反驳说：“今日海内日言兴学，安见无专家来馆阅览。古书在世界中最难得而可宝。本年春法国文学博士伯希和来馆看书矣，何能轻量我邦人士。今馆书尚未经陈列，乃决其无人过问，岂得为实施乎？目下友人托抄馆书者且纷纷不绝，屠君之父敬山即其一也。若发篋陈书之后，阅览室中坐

客常满盖可知矣。今不能以抄书一端卜此后看书之多，而乃据为无人过问之证不亦侦乎。”

为了维持江南图书馆的独立，陈庆年还专门致电北京学部，请求学部出面调停，他在电文中说道：“北京学部各堂宪钧鉴，江南图书馆正在遵章设备，顷度支部电飭归并通志局。查志局书成即撤，与图书馆永久设立者，性质迥殊。二月间已详，蒙督宪批准独立。此次应请钧部主持，电商督院，俾有遵守。”经过陈庆年的努力，最后学部出面调解，避免了江南图书馆被裁撤的命运，这是陈庆年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重要贡献。

二、孙毓修与中国图书馆学第一部专著

缪荃孙的弟子中，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有所贡献的首先是孙毓修。孙毓修，字星如，一字恂如，号留庵，自署小淶天主人，江苏无锡城郊孙巷人，清末秀才。早年在南菁书院执教，得到缪荃孙指教，为缪荃孙的弟子。孙毓修对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创建了近代著名的图书馆涵芬楼，二是撰写了第一部图书馆学著作，第三是对图书分类法的引进与改进。

中国历史上有过许许多多名目各异的公私藏书楼，保存了大量的书籍，为中华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涵芬楼是商务印书馆上海时期的藏书楼，它的创立可追溯到1904年。当时，戊戌维新人物、翰林出身的张元济主理商务印书馆的编务。在主持编译所工作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图书资料建设的重要性，陆续购置了不少书刊资料，但苦于找不到好的善本，于是设立了图书室，供编译所同仁参考、使用。当时，图书室并没有正式的名称。直到1907年孙毓修进商务印书馆以后，由于他旧学根深，又懂英文，对东西学都有造诣。张元济便选他为筹建图书馆的主要助手，大量收集中外各类藏书。他从收集古籍开始，鉴别版本的真伪，收集真正的善本，继而中外图书兼收。凡遇国内各家藏书散出

者，总是尽力搜罗，日本欧美各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也尽量购置。他多次行走在南京路上看到英国人开办的上海图书馆，而中国自己却没有，非常感慨，进而萌发开办图书馆的想法。

1909年，编译所内置的图书已有相当规模，于是在商务印书馆图书室的基础上设立图书馆。孙毓修提议，以张元济先祖藏书处“涉园”作为图书馆的正式名称。但是，张元济认为不是很妥当，委托孙毓修另外想一个名字。孙毓修反复思量，最后以“涵芬楼”作为图书馆的正式名称，取含善本书香、知识芬芳之意。孙毓修应该算是涵芬楼名副其实的第一任“馆长”，虽然当时并没有这个名称。他从选购旧书、鉴别版本，到联系配抄、组织修补等事情都亲力亲为，做了大量的工作。涵芬楼所藏中华善本多为真本，这是和他慎重采购、严格把关分不开的。后来，在张元济的支持下，孙毓修还编辑了“借阅图书规则”和最初的善本书目。经过十多年的筹划，“涵芬楼”已经成为东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私立图书馆，它所藏古籍善本更是富甲一方，称盛一时。据粗略统计，涵芬楼藏有宋本一百二十九种，元本一百七十九种，稿本七十一種，鈔本四百六十种，名人批校本二百八十八种，其中尤为珍贵者有宋刊《六臣注文选》、宋黄善夫刊《史记》、南北宋配合的《南华真经》等，另包括十二卷濒于失传的《永乐大典》。涵芬楼还以收藏地方志为特色，其入藏的厅州县志种类之多、收藏量之丰富远远超过各家公立图书馆；在外国书刊方面，涵芬楼收藏有数套欧洲科学杂志；除书、报、杂志外，涵芬楼还收藏了五千张照片、地图、图表和绘画，成为当时最大的藏书楼。后来，到了1925年，与商务编译所其他中外新书并成一处，改称东方图书馆，并于1926年建成开放，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由一家私营出版企业的小型内部资料室涵芬楼，发展成颇具规模的公共图书馆东方图书馆，这确实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的一大创举。其中孙毓修功不可没。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晚清“西学东渐”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以公众阅览为核心的西方公共藏书观念愈来愈深入人心，并且落实在开明士

绅的言行之中。有部分藏书家公开自己的藏书，提出有关藏书公共的倡议、见解和实践，这说明封建藏书楼在逐步衰落过程中，正在孕育着向社会公开的趋向，这种趋向为近代图书馆的出现创造了条件。1894年，湖南学政江标在长沙建校经书院藏书楼，其章程规定“不论何人，皆准上楼游观，且看书凭单”，已初具图书馆性质。1903年7月，湖南常德图书馆向公众开放，每日到馆看书的人都有数十人。1904年，随着古越藏书楼的开放，中国私人藏书楼开始向公共图书馆的产生迈出了一大步，旧式藏书楼日渐衰落，开始从完全封闭性向有限公开化方向发展，封建藏书楼体制开始向近代图书馆体制过渡，近代西方图书馆学思想慢慢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公共图书馆事业逐渐兴起。图书馆事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旧的藏书理论体系已经不能适应这时新藏书楼的工作内容，迫切需要一种新的、能作为近代图书馆的指导理论的图书馆学。但在20世纪初，中国的图书馆理论建设几乎还是一片空白，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孙毓修萌发出对图书馆的开办做系统介绍的想法，于是我国最早的图书馆学著作应运而生，这就是他所著的《图书馆》。由于在涵芬楼工作的实践经验，加上他钻研欧美、日本图书馆管理的新知识，孙毓修从1909年起开始在著名的《教育杂志》中的“名家著述”栏目连载由他编写的《图书馆》一文。作者自称是由于考虑到“图书馆之当筹办也，如彼其急，但此前无成典”。所以，“仿密士之约，庆增纪要之篇，以日本文部之成书，美国联邦图书馆之报告，而成此书”。

在这篇著作中，他倡导图书馆应注重平民教育，进行图书普及工作，以启迪民智，唤起民众。这篇著作既总结了古代藏书的经验，又参考世界东、西方办图书馆的经验，联系我国现状，从建置、购书、收藏、分类、编目、管理、借阅七个方面，提出了要设立图书馆的宗旨、职能。从结构上看，此文绝对是一部完整的图书馆学概论性著作。孙毓修的图书馆意识在开篇就提出，“图书馆之意主于保旧而启新”。这在现代已经是常识，但在当时可算是新思维了。该文内容主要有三方面：

1. 阐明近代图书馆的意义作用，认为“图书馆足以辅学校之不及”；

2. 根据所了解的欧美图书馆的理论方法,提出了许多普及图书馆的具体办法,主张向欧美图书馆学习,建立都会图书馆、国立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和乡镇图书馆,多层次多类型的图书馆。3. 将“杜威十进分类法”介绍到中国。虽然《图书馆》一文没有刊载完,也未结集出版,不过从已经刊出的文字中可以看出,这是早期学者对图书馆进行系统论述的第一部专著,反映了20世纪第一个十年我国从藏书楼到近代图书馆过渡时期,一些开明人士对图书馆的认识。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历程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并针对当时图书馆理论相当滞后的现象,第一次系统回答了图书馆建设的理论问题,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孙毓修与“杜威十进分类法”

清末民初,图书分类是新旧并行制度,很多学者并不满意,因为这不仅影响到读者的借阅,也制约着图书馆的发展。因此,以近代学科为标准,类分中外典籍,对图书进行分类的问题就提上了日程。但这种依学科性质进行分类的做法,因为人们对分类标准理解上有分歧,同样会造成图书分类混乱,存在着较大局限性,难以适应近代图书分类及知识分类的需要。于是,西方近代符号化的图书分类法开始传入中国,并迅速流行起来。我国最早介绍杜威法的是孙毓修。1910年,孙毓修首次在《教育杂志》上介绍了“杜威十进分类法”。他介绍的目的除了希望作为类分西书的借鉴外,更重要的还在于试图创立一个能类分新书的分类体系。他认为四库体制不能适应当时著译的新书,所以仿照欧美图书馆做法,制定出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新书分类法,按照著作的内容和性质分门别类,大量采用当时世界通用的科学用语,不用经史子集之类含糊的概念,并依据这样的思路,按照杜氏十进法类分图书,将中外图书分成一个有别于“杜威法”的新的二十二部分类体系,作为新书分类表。由于杜威法的一些重要特点,它立即引起了中国图书馆界的重视,许多学

者都致力于借鉴杜威法，编制适合中国特点的文献分类法。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当时的学术界出现了我国第一次文献分类法的编制高潮，这对于冲破四库分类法的束缚，为新旧图书、中外图书的统一分类开辟了可行途径，满足了科学发展图书类别多样化的需要，具有一定的历史影响。杜威法的出现，使我国用十进系统的分类法逐渐取代四部法，建立了以现代科学体系为基础的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导致了我国分类法编制技术上的一场革命。

作为缪荃孙的弟子，孙毓修只是因为涵芬楼编书而偶尔涉足图书馆学，全部图书馆学作品只有一部没有连载完成的《图书馆》。但孙毓修对图书馆的认识，1917年以前无人能及。他的《图书馆》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开山之作，反映了当时创办图书馆的指导思想，我们从中可以读到真正的近代图书馆观念，其开创性意义不言而喻；此书问世于清末公共图书馆兴起之时，在舆论上配合了公共图书馆运动，对事方草创，前乏师承的中国图书馆事业，起了理论启蒙与奠基的作用，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建设来说，是有重要指导和现实意义的，因而它在图书馆学史上应占有鳌头地位。“杜威十进分类法”在中国的第一次公开介绍是孙毓修在图书馆学应用研究方面的一个大胆探索，对我国分类法编制技术的改进功不可没。孙毓修是20世纪初最早阐述图书馆全方位发展的一个学者，他提出了一系列有见解的图书馆学思想，以具体的实践实现其理论主张，并丰富了其内涵，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名副其实的奠基者和先驱人物。因此，我们可以说，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孙毓修可以说继承了老师缪荃孙的事业，并有重大的发展。

四、柳诒徵与江苏国学图书馆

柳诒徵则是缪荃孙的另一位弟子，他与缪氏的关系则更为亲密。

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晚号劬堂，又号盩山髯；江苏省镇江人。一生经历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时代，是我国近代著名学者、

历史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图书馆事业家。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缪荃孙是柳诒徵走向学术道路的引路人，学术导师。据柳诒徵自己的回忆：“缪先生激赏吾文，手批于册曰：古之刘孝标，今之彭兆荪甘亭。迄今思之，匪所敢承也。及之江宁，馆于钟山书院园榭，遂执贽于先生之门，先生温煦，奖掖备至。”缪荃孙是近代著名政治家、学者张之洞的学生，又是柳诒徵的老师。1901年，缪荃孙受张之洞之邀到南京主持江楚编译局，成为近代东南地区这一文化机构的主持者。而柳诒徵在进入江楚编译局以后，在缪荃孙的领导下，进行编书活动。在学术上受到缪荃孙的指导，学术思想上也受到缪荃孙的影响。

柳诒徵编纂《历代史略》时，缪荃孙不时提出意见。如在柳诒徵后人家藏的书札中就有缪荃孙一篇书札，申述如何修改《历代史略》的内容，指导得十分具体：

元史略末篇乞稍改即付钞，近来止张、胡二位钞书，恐迟误，可交荃请人另钞也。明亡应入明史略，于元止载明祖起兵何处，何时得某地入上都，载于上篇之末。昔人议论毕修《通鉴》不应载明祖战胜攻取之略，是也。

缪荃孙不仅教柳诒徵做学问，还教他做人的方法。针对江楚编译局这一官方书局中人浮于事的情况，缪荃孙曾谆谆告诫柳诒徵，“局所积习，必有若干人不事事，子毋染其习”。

1903年初，缪荃孙、徐乃昌奉命带领代表团赴日本考察学务。代表团以江楚编译局的人员为主，柳诒徵也在这一代表团之内。实际上这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张之洞等人主持的教育新政的一部分。这年阴历的正月出发，三月回国，在日本的考察实际只有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的考察中，柳诒徵等人在缪荃孙的带领下，遍游日本的横滨、大阪、东京、京都、神户等地，考察了日本的诸多学校和教育机构，所到之处日本教育界多派人进行讲解介绍日本的教育情况与经验，只有柳诒徵作了笔记。回国后，柳诒徵受缪荃孙的嘱托，把笔记整理出来，交与缪荃

孙。这就是后来以缪荃孙署名出版的《日游汇编》。

这次考察对柳诒徵影响很大，一方面使他眼界大开，增进了对近代教育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使他深受教育，认识到中国要想发展起来，必须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柳诒徵此后几乎离不开中国的教育事业，与这次考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柳诒徵的有些论文，是因为缪荃孙的缘故而撰写的。如他曾撰写的《清史刍议》的论文。这篇文章对《清史稿》的撰写中各家的不同意见进行了比较，并就“清史”的编纂体裁、体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而这篇论文的撰写，也是由于缪荃孙的缘故。在这篇论文的开头，柳诒徵曾这样写道：“此在都门代某君所撰稿，其中皆就旧史法立论，不敢讲新史学之义利也。后某君竟以此见摒于当事，该旧史馆诸公，十九清之达官，即此亦不谓然也”。

“某君”指的就是缪荃孙，“竟以此见摒于当事”，是指后来缪荃孙因与清史馆总纂不和，被辞退之事。可见，柳与缪在学术交往上是极为密切的。

在学术观点上，柳诒徵在一些方面也继承了缪荃孙的观点。最明显的是在文献目录的分类方面继承了缪荃孙的分类方法。缪荃孙在文献目录的分类方面，主张不受四部分类法的约束。他对中国典藏图书重新制定了分类标准。他的图书目录分类法有十分法、七分法两种。柳诒徵继承了缪荃孙的目录七分法并付诸实践，在他后来主持编写《江苏国学图书馆总目》中，所用的就是七分法：经、史、子、集、志、图、丛七部，古今兼顾，中西会通。

在研究方法上，缪荃孙治学注重文献的搜集和史料的考证整理，旁征博引，坚持以精益求精的学风被柳诒徵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从学理上来看，柳诒徵可以说是缪荃孙史学的传人，而缪荃孙是柳诒徵学术的引路人和早期的导师。

1919年，缪荃孙在上海逝世时，柳诒徵曾赴沪吊丧，有挽诗一首道出了他与缪荃孙的关系：“白门从游十稔强，温温春座更东航。论文上

掩谟觞馆，校士亲承学海堂。陵谷崩腾千古变，乾嘉流派万流藏。江淮独诵招魂句，洒涕钟山旧讲堂。”

柳诒徵还曾给其师缪荃孙作传，其中对自己的老师有如下的称赞：“缪荃孙，字炎之，号筱珊，晚榜所居堂曰艺风，世称为艺风先生。……性直而和，好学若命，工文词与诗及骈体文，均能抗中晚唐人。貌丰朴，能饮酒，善谈谑，豁如也。”

更为重要的是柳诒徵还继承了缪荃孙的图书馆事业，把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更推进了一步。江南图书馆，作为中国最早创立的少数几个公共图书馆之一，自创办到1926年的十多年间，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1927年6月，江苏省教育厅聘请柳诒徵担任该图书馆馆长。从此以后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柳诒徵一直担任此职。此时中国政局相对安定，再加上柳诒徵等学人的努力，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后来改名为江苏国学图书馆）开始兴旺发达。

柳诒徵上任伊始，即清查整理馆藏，制定章程。柳诒徵强化图书馆管理，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使图书馆各项工作开展得别开生面。柳诒徵担任馆长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和方法：一是制定图书馆管理的规章制度，开放时间和借阅制度，采编、藏书保管制度和防火安全制度，生活和总务制度等。二是加强书籍的整理和藏书建设，在他的管理下，该图书馆成了全国藏书量最大的图书馆。他对图书馆的书籍进行了重新整理从而便于使用，并将宋元时代的珍本、普本书籍做了复制本。虽然国学图书馆经费不足，但是柳诒徵尽可能挤出经费，收购图书，为了提高大批宋代、元代善本的社会利用，筹划印刷书影，先后推出《钵山书影》三种（宋本一、元本二），以及若干单行珍本百余种之多，全国绝无仅有，成为当时国内著名图书馆。三是大胆引进人才。柳诒徵十分重视人才，并大胆地使用人才，发挥他们才智。四是轰轰烈烈地开展学术研究，在他的带动下图书馆很好地发挥学术研究功能和作用，当时他领导的国学图书馆研究的成果，走在国内前列。

柳诒徵是有志于图书馆管理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一直在孜孜不倦

地探寻先进的管理方法，不断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他不以皮藏典籍之吏为己任，把整个精力投入图书馆事业，使该馆蜚声海内外。他还致力于向全国推广图书馆学知识以改善全国图书馆的管理水平，满腔热情地为读者服务与培养人才。

柳诒徵把图书馆藏书楼进行了整理，并命名为陶风楼，图书馆的情况，逐渐才有所改观，图书文化事业逐渐走向兴旺。他自己撰写的《陶风楼记》描述了这一情节。柳诒徵初来之时的江苏国学图书馆“或竟日无人叩扃发篋而诵书者”，经过柳诒徵及其同仁的整理，才逐渐改变了这一萧条状况，“余既于故书要挚友整比，粗有端绪，都中知斯楼来读者亦渐集。”同时柳诒徵还罗致四方学子，门生故旧，充任各部员工。图书馆一时人才济济，各项业务迅速开展起来。

为了提高图书馆的管理水平，1928年，柳诒徵又聘请了一些学者担任图书馆的参议，其中包括有名的学者陈汉章、汤用彤、王伯沆等人。图书馆定期请他们到馆会商图书馆事务，这一制度在当时的图书馆界是一种创举。

柳诒徵上任后，江苏国学图书馆在清理整顿图书以后，即开始影印馆内所藏珍贵古籍，使之广行于世，造福学界。同时以影印古籍与各地团体或个人交换图书，以此增加馆藏图书，可谓一举数得。仅在1927—1934年间，江苏国学图书馆影印古籍九十六种，其中史部四十种、子部二十种，集部二十四种。另外，国学图书馆还影印了馆藏宋元刻本、珍本孤本、名家稿本墨迹的书影，每种书影柳诒徵均撰写考证文字。

柳诒徵在江苏国学图书馆，不仅是一个图书管理者，也是一个学者。他在江苏国学图书馆，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工作，同时也创办刊物，组织学术研究工作。结合江苏国学图书馆的业务活动，柳诒徵先后主持编印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三十巨册：正编收录图书三万七千零二种，五万九千二百二十八部，十九万八千八百三十八卷；补编收书二万四千九百二十六册。此书目将四库分类法予以增删，新编分类法为经、史、子、集、志、图、丛七部，将丛书子目又分归各类，

检索方便。中国近代自建立现代图书馆以来，编写图书馆全部藏书总目，国学图书馆是第一家，柳诒徵功不可没。

柳诒徵在编写国学图书馆总目的同时，还撰写了《国学图书馆小史》。对江苏国学图书馆的源流、创建经过，进行了详细的记述，这是中国较早的图书馆史。

柳诒徵除了主持图书馆馆务，还提倡学术研究，尽力把江苏国学图书馆办成学术活动基地。为此，1928年创办了《国学图书馆年刊》，刊登学术文章，报道馆务，为学术研究开辟了交流的园地；并经常鼓励提携年轻后辈钻研学术。如著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向达，当时是该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就是在柳诒徵的提携下撰写出《唐代刊书考》的。著名目录学家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也是在柳诒徵的鼓励下写成的，柳诒徵还为此书撰写序言。图书馆的职员王焕镛曾在柳诒徵的指导下撰写了《首都志》，这是近代比较全面地叙述南京的地方史志，柳诒徵也曾为此书撰写序言，后来此书出版时署名为叶楚伦、柳诒徵主编，王焕镛编纂，柳诒徵在此书的序中叙述了此书编纂的原委和经过。他说，“甲戌之冬（1934），楚伦叶先生枉过盩山讨论文艺，谓党国建都金陵，寻将七稔，未有专志，诵述沿革及建设之懿。中外人士諏访所及，仅以旧肆古书应之。非所以掩张首善之义也。以诒徵尝从事方志之学，珍重陲委，诒徵佺录馆务，未皇兼及，爰举王生焕镛从事编辑，周生恂佐之，六月阅而成志廿四卷，都五十余万言。”柳诒徵为编辑此书给王焕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并且，每成一编，柳诒徵都给予体例上和内容上的增补和删定。

《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是柳诒徵就任江苏国学图书馆馆长以后，创办的馆刊。这一刊物，也是柳诒徵学术阵地之一，它曾发表许多长篇学术专著，如柳诒徵自己所著的《里乘》《江苏通志稿·风俗志》、范希曾所著的《书目答问补正》等，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年刊每年一期，连续发行十年，后来因为抗战爆发，才被迫中止。

柳诒徵作为一位史学家、图书馆馆长，热心为读者服务。在他的帮

助下，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长期居住在该馆研究著述的有：蔡尚思、吴天石、柳慈明、赵厚生、王诚斋、张叔亮等人。其中以著名的历史学家蔡尚思最为突出。在蔡尚思所作的《柳诒徵先生学述》中，他有过这样深情的回忆：“就我个人受教益于柳先生这一方面来说，也有几个‘最’。柳先生是使得住大图书馆最多读书的长者。他既允许我住入国学图书馆中，不收房租及其他费用，尤其还给我一个特别优待的权力，他对阅览室的人员说‘蔡先生为了著大部头的《中国思想史》一书，特来我馆从历代文集中搜集他人所少收集的宝贵资料。我们必须尽力支持他。他的贡献也等于我图书馆的贡献’。”蔡尚思还说：“柳先生是最多讲历史掌故给我听的长者。在我师友辈中同我接谈之多，没有一个超过柳先生的，听先生执教犹如是读一部大的活书。我于日间在阅览室赶阅图书，晚上整理笔记，常于夜间八九时以后去向柳先生请教。他从清朝的掌故到民国的时事，无所不谈，如袁子才与戴东原之异同之类，真使我闻所未闻，均为书本上无法得到的知识。”

柳诒徵在江苏国学图书馆工作期间，他除了在本职工作中对史学学术有所贡献外，还参加了大量的社会学术团体活动。柳诒徵在这些学术活动中，逐渐成为东南地区特别是南京的史学领军人物。

总之，作为江苏国学图书馆馆长柳诒徵，他没有辜负其老师缪荃孙的信任，他在图书馆馆长的任上，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结 语

清末民初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变动、大变革的时期，这种变动和变革是全方位的，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缪荃孙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一位学人。缪荃孙自幼即受考据学风的熏陶，走上了考据学的道路，终生治考据学，其治学成就也有着乾嘉以来考据学的特点。至其中晚年，中国的学术界日益受到西方现代学术的影响而学风急剧嬗变，他仍然坚信考据学是学问的正统，恪守乾嘉诸老之学。正是这种恪守使他著作繁富，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缪荃孙也顺应时代的变革，他的学术也有着经世致用的倾向，并对后来的学界影响深远。正是由于其治学有着经世致用的特色，使得缪荃孙在清末创办图书馆的过程中，由一个传统的学者而却逐次创建了中国南北两大图书馆并担任馆长。在建立图书馆的过程中，他建造图书馆建筑、购买图书、编写书目，乃至创建规章，设立制度，培养图书馆人才，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谓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

作为学者，缪荃孙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这也是他成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创建者的根基与出发点。他治学，主要继承了乾嘉的遗风。这主要表现在他注重文献的搜集记载和史料的考证整理。其著述，大多经过长期的资料积累，在资料不完备的条件下，决不轻易成书。在资料考证上，注重旁征博引，坚持精益求精的作风，不仅善于鉴别图书的版本源流，还善于考证金石碑刻，主张以金石资料补史籍之缺；对历代地理沿革，山川城阙，当代掌故，朝野人物，无论巨细，都广为采摭，并

尽量将其成果用于史书和方志的编修。王先谦称他“高才博学”，屠寄说他具有“乾嘉诸老之风”。

但缪荃孙毕竟不是乾嘉时代的人物，他的思想受洋务派思想影响较深，赞成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主张。为了维护中学这个“体”，他从事金石、版本、目录和当代史学研究。在治学方法上，如方志编修的方法上无论地图的测绘，还是统计表的编制，都注意吸收近代科学成果。在古代史研究上，他已不是单纯地考证、补阙，而注意总结历史上成败的经验教训。学术著作具有经世的倾向。而这也是他作为图书馆创建者的思想基础。

缪荃孙作为学者，又有着以史经世的思想倾向，由于受时局的影响关心时事，留心经世之学。与洋务派的官员张之洞等人的结交，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所以，缪荃孙的思想观念有着新旧交替时期所特有的特点，即在他身上既有传统的乾嘉考据史学的影响，又有晚清史学经世学术思想因素。

缪荃孙所生活的时代，还是传统学术占据主导位置的时代，缪荃孙也不是纯粹的史学家，他涉猎的传统学术领域十分广泛，而且在其所涉及的学术领域有许多方面都是集大成者。清人治考据学，分博雅和专精两派，缪荃孙属博雅一派。柳诒徵称缪荃孙之学“博贯衡综，洪纤毕洞”，“继朱彝尊、全祖望、纪昀、阮元、王昶、黄丕烈、顾千里、钱仪吉之绪而恢溢之”。在典籍收藏方面，缪荃孙成就卓著。缪荃孙一生辛苦搜淘，积累藏书达十余万卷，其中多有善本。他虽然不是当时最大的藏书家，但在当时的藏书界有很高的地位，他是当时藏书界影响最大的藏书家，是当时藏书界的中心人物。这源于他好书若痴的精神，源于他对书的深刻认识，也源于他的藏书思想。缪荃孙主张藏书流通，这是我国历史上开明、进步藏书思想的结晶。

目录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清代是我国目录学最发达的一个时期，众体皆备，成就极高。缪荃孙的目录学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藏书、读书实践形成的。他涉及了目录学各个领域，所编书目众

多，可为后来的藏书家、读书者提供藏书、读书的法门。其提出目录著作应该兼具《四库提要》与《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之长，将考订学术源流和讲究版本源流融二为一，是对前人目录学理论的总结，也为今后的目录学发展指明了方向。而其编目的格式化，为以后大规模编目探讨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清代的版本学发展到晚清已经成熟。缪荃孙上承黄丕烈，精于版本鉴赏、考订，对于各个时期的版本都有深刻的认识和深入的探讨。可以说，版本鉴别方法至缪荃孙已经大备。缪荃孙对乾嘉时期的版本学家黄丕烈的大力推崇，确立了黄氏在版本学上的地位，对版本学发展成为独立学科具有重大意义。而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的问世，则正式宣告版本学的独立。缪荃孙治目录版本学，在晚清民初为一时宗主。

缪荃孙一生勤于校雠，以校书为读书之法，终生不辍，为人们留下了大量精校善本和校记，也为其编刻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缪荃孙深得前人编刻书之法，其自编刻书和代人编刻书数量大、品质好；是我国刻书史上的最后一道风景线。他刻书爱用宽边瘦字，节省纸墨又不失精美。这种宽边瘦字正是刻书人的经验结晶。在他之后，刻书逐渐为排印和影印所替代。

清代的金石学，发展到晚清已经到了集成阶段，叶昌炽的《语石》便是代表性的成果之一，缪荃孙的金石学亦然。缪氏在总结性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纂了多部金石目录。另一方面，他又自觉地利用金石文献辑佚、校雠，编纂总集和别集。他的金石学研究方法是综合性的。

缪荃孙是晚清文化、学术向近、现代转型的关键人物之一。缪荃孙的思想并不激进，甚至有些保守，对乾嘉时代充满留恋，但在实践上能顺应时代潮流。清末，清政府被迫实行一些改革，缪荃孙是积极的实践者，在这一实践过程中，缪荃孙先后创办了江楚编译局、江南高等学堂、三江师范学堂和南北两大图书馆，为我国文化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影响深远。这奠定了他在我国文化史上的地位，也是他成为中国近

代图书馆之父的时代原因。

缪荃孙在当时的学界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其主书院讲席多年，弟子多能继承其学。有的弟子，如柳诒徵、曹元忠等，成就甚大。现当代的文献学家如范希曾、王欣夫、赵万里、顾廷龙等也多和缪荃孙有渊源关系。

清末民初，旧学日衰，新学日兴。当时的学界是混乱的，研究西学者，大多肤浅、浮躁，而旧的传统学问又遭到抛弃。缪荃孙为使旧学得到传承，积极从事保护传统典籍的事业，大力鼓动、帮助有经济实力者若刘承幹、张钧衡、盛宣怀等人藏书、刻书。张元济、傅增湘的学术活动也多受其影响。江南一代后起的大藏书家几乎都和缪荃孙有关系。他亦是晚清民初保护传统文化典籍的关键人物之一。当然，受时代的局限，缪荃孙的学术研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从清初到民国的学术历程来观察，清代的考据学发展到乾嘉时期，达到了顶峰，治学方法粲然大备，方法上已不可能再有新的开拓，故缪荃孙的治学在方法上属于守成，没有新的拓展。他晚年虽然曾到日本考察过教育，他本人也处于我国新旧文化交替的重要时期，但他没有接受新的治学方法。这是他们那一代学者的共同特点。这决定了他无法从学术高度上整体超越乾嘉学者，他比乾嘉学者的进步主要表现在乾嘉学者学术成就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提高。而接受新的方法，开辟新的学术领域，达到新的高度，只能是王国维、柳诒徵、陈寅恪等下一辈学者的事了。

缪荃孙一生和整个动荡不安的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生活不安定，影响了他的学术成就。他幼年遭受咸丰庚申之难，中年经历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晚年又遇到辛亥革命，他的学术大环境并不安定。缪荃孙自曾祖以来家无立锥之地，其本人也不曾宦达，他中年因葬亲而被迫先后主讲南菁、泲源等书院，晚年为谋得生活之资，不得不为宦、富商编书、刻书，使他无暇致力于某一项专门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附录

缪荃孙年谱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1844）农历八月九日癸卯亥时，缪荃孙生于江苏江阴申港镇祖居西宅。

缪氏家族是一个仕宦家族，祖居河南，南宋初年时迁居江阴，至明中叶开始定居于江阴城西二十里申港镇，即《新唐书·韩滉传》所述之申浦。

缪荃孙的祖父缪庭槐系嘉庆甲子（1804）举人，联捷进士，曾官平凉府知府，署西宁、甘州等府知府，平庆泾兵备道。缪荃孙之父缪焕章（1812—1890），字仲英，原名步青，道光十七年（1837）举人，曾官贵州候补道，赏戴花翎。缪焕章喜吟咏，著有《三朝北盟会编节要》四十卷，《吟樵诗草》。

这一年，缪荃孙祖母年七十。父亲三十四岁，母亲瞿氏也是三十四岁。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1845）年二岁

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年三岁

道光二十七年丁未（1847）年四岁

四月种痘，危甚，母亲日夜泣。缪氏母亲娘家赠嫁一婢王如意，金陵人，护理甚勤，幸而获安。（如意后嫁青旻沈亮玉，丈夫早卒，王矢志不嫁。咸丰十一年遭难饿死。遗子一，亦死。缪荃孙官庶吉士时，为

她请旌表。辛卯亲自为之拾骨，与其夫合葬。）这年冬开始识字。

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年五岁

荃孙识字数千，并诵唐人小诗，皆母亲口授。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1849）年六岁

开始入私塾，跟从族祖缪集珍先生读书。先生名以康，岁贡生，时年七十余。

这年夏大水，淹私塾，停课月余。

发生饥荒。

道光三十年庚戌（1850）年七岁

跟从族兄缪翻飞先生读书，先生名墀。

夏，母亲归宁。缪荃孙随侍。时外祖父瞿绶先生（敬邦）掌教山东兖州书院，将返常州，舅母董恭人在常州赁东门外凤官庵坊口赵氏宅以迎，继而不果。七月回家。

九月，又至常州府城。外祖父十月到常州，不久返回南京。

十一月归故里。

外祖父见荃孙读书，谓其父曰，是子口齿清，记性好，或能绍书香也。

是年，广西农民军初起。

咸丰元年辛亥（1851）年八岁

跟从缪翻飞先生读书，读《四书》毕，遂读经。

咸丰二年壬子（1852）年九岁

继续跟从缪翻飞先生读书，开始学作诗。

咸丰三年癸丑（1853）年十岁

继续跟从缪翻飞先生读书。

二月，太平军攻陷南京、镇江。

六月二十一日，缪荃孙祖母去世。百日后祔四河保李家村祖坟。

咸丰四年甲寅（1854）年十一岁

继续跟从缪翻飞先生读书，《五经》读毕，开始读《周礼》《仪礼》。

咸丰五年乙卯（1855）年十二岁

继续跟从缪翮飞先生读书，又跟从族叔缪星熊先生学作应试诗文。星熊先生名重熙，郡庠生，著有《桂荫轩诗》。

八月二十六日，缪荃孙母亲去世，当时缪荃孙父亲在张国梁军大营从军，与太平军作战。缪荃孙母亲起先患疾病，后转痢疾，于是卧床不起，最终去世。当时荃孙未知人事，日夕号泣而已。

咸丰六年丙辰（1856）年十三岁

为母亲守制。

跟从缪翮飞、缪星熊两先生读书。

三月，父亲娶继母薛氏。薛氏外祖父名廷楠，江阴四河镇人。

是年大旱。

咸丰七年丁巳（1857）年十四岁

继续跟从缪星熊先生学习作文，又从表兄吴炯堂先生读书。先生名伟，山东历城人。

是年，读《国语》《国策》《史》《汉》、八家文。

正月，父亲入蜀，探望缪荃孙伯父伯康公于酉阳官舍（荃孙伯父名荣吉，是年以通判分发四川，补充州副通判。是年，署酉阳州）。

开始阅读《通鉴纲目》《北史》《续资治通鉴》（荃孙的先生只令读应制诗文，因其家中有书四橱，随意检阅，无人教督，然荃孙十分爱读，于是逐次阅之）。

咸丰八年戊午（1858）年十五岁

继续跟从缪星熊、吴炯堂两先生读书，开始读《文选》。

咸丰九年己未（1859）年十六岁

继续跟从缪星熊、吴炯堂两先生读书，开始读《说文解字》。

咸丰十年庚申（1860）年十七岁

继续跟从缪星熊、吴炯堂两先生读书。

二月，荃孙应县试，江阴县令祥熙龄拔置前列（祥熙龄名和，满洲正白旗人）。阅卷者为马仞千先生（讳鸿翔，山东人，道光丙戌进士）。

闰三月，江南大营溃败，江阴戒严，始练乡兵（主其事的人，是缪荃孙族祖缪珊宝先生，名瑶，前浙江临平司巡检，廪生。吴仲明先生，名铭）。

四月六日，常州被太平军攻陷，当时溃兵、难民晨夕过境，乡里惊扰。八日，荃孙侍奉庶祖母、继母迁居于徐村。江阴西路火光烛天，夜不能寐。十一日晚，荃孙寻觅小舟奉庶祖母、继母渡江，露宿沙滩。十二日，移居靖江正东圩，时居住草屋三间，上漏下湿，荃孙等人与吴氏二姑母同住。十三日，乡兵溃散，江阴陷落，申港亦为太平军占据。十四日，太平军走向无锡。十九日，荃孙渡江回宅察看。自己家宅内，窗户尽坏毁，什物无存。草间有两尸体，非本地人，荃孙命家仆埋之。于是荃孙奉先人影像、搜检书籍，仍然渡江至正东圩。

六月，荃孙复回家宅，检剩物，两日即回。

八月廿一日，庶祖母病歿。九月葬庶祖母于沙洲。

荃孙由泰州、高邮、宝应至淮安，寓姑丈丁竹虚先宅（丁氏名林，山阳诸生），荃孙得疟疾。

咸丰十一年辛酉（1861）年十八岁

荃孙与继母寄居淮安。因在外避难，无力从师，自己携《随园诗话》《吴会英才集》、洪黄两家诗文选阅读，并仿照作诗文。所居傍临管家湖绿波红舫，烟水弥漫，散步湖滨，吟咏成秩。

五月，捻军气势日逼，荃孙又奉继母避难从宝应、兴化来至泰州，寓居泰州北门外韩家桥，因经济困窘，早晚只能吃一顿饭。

七月，荃孙始接到父亲从贵州来信并所寄钱财，此时捻军已退。丁竹虚姑丈仍接荃孙母子至淮安。

同治元年壬戌（1862）年十九岁

正月，捻军扰山阳河西，山阳一日数惊。

二月，山阳少定。缪氏世交葛子贤（绍裔）迎荃孙至其家。荃孙跟从六合汪竹堂先生读书，先生名芝兰。

三月，捻军气势又迫紧张，荃孙随子贤世丈至盐城乡间暂避，不久

返回。

是年，丽正书院甄别，荃孙蒙受漕帅吴棠赏识，拔取为第二名，荃孙入院肄业。当时山长为丁俭卿（名晏，山阳举人，著有《诗礼堂七编》）教荃孙读《经》，先研究“小学”。

八月，荃孙晤见常熟，起先张保慈曾受业于荃孙父亲，张保慈工书，擅骈文，荃孙日日请益，开始学骈文。

同治二年癸亥（1863）年二十岁

荃孙寓居淮安，仍到葛家读书，读书时，得晤杨慧生守备。杨负博雅名，诗文卓然成家，与荃孙一见如故，并约荃孙至别墅谈二日，告荃孙以诗学源流。

八月，父亲遣刘、唐两兵弁迎荃孙母子往湖南。荃孙表兄吴鹤生（侃）送至汉口。荃孙买小舟，出扬州，入大江，过金陵、芜湖、安庆、九江，至武昌，鹤生别去。又浮洞庭至长沙，住文星桥，晤见族兄缪子勤。

是年，荃孙得诗一卷，为《萍心集》。

同治三年甲子（1864）年二十一岁

荃孙与继母寓居长沙。

正月，父亲遣苏、萧两弁寄川资，命荃孙侍继母入蜀。

五月，荃孙由长沙买舟，经常德溯长江而上，历瓮子洞、清浪滩诸险达辰州，复陆行至镇筴厅，住二十日。由永绥苗疆至酉阳州，知州董叔纯（貽清）留住三日。陆行至龚滩，赁船浮乌江而下，一日夜行七百里，达涪州，转大江至重庆。陆行十日至成都，寓居堂兄荫孙处（缪荫孙字长恩，伯父长子）。

八月，荃孙陆行至保宁府，后转至平武属之蒿溪，即汉阴平道也。于军门周达式军营，见到父亲。父子乱后重逢，悲喜交集。住十日，时军门军援甘肃，父亲令荃孙回省侍奉继母。荃孙于是由彰明、绵州至成都。荃孙跟从汤秋史先生读书（先生名成彦，阳湖人，道光辛丑进士，刑部主事，有《听云仙馆诗文集》）。

是年，荃孙得诗一卷，曰《巴歛集》。

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二十二岁

荃孙在成都读书。

五月，父亲自军营归，移住西河沿。秋，荃孙咳嗽，至冬始愈。荃孙数年奔走，至是年稍定。

同治五年丙寅（1866）年二十三岁

在成都，荃孙跟从宋萸湾先生读书（宋萸湾名宝械，双流己未解元，曾任贵州毕节县知县）。与郫县王问山（光裕）、华阳吴柚农（祖椿）、光州吴幼岑（镜澄）、月笙（镜沅）、德清傅懋垣（云龙）、鹏秋（鼎）、芜湖沈鹤农（芝田）、合州秦剑香（代馨）、华阳王雪橙（秉恩）、成都杨葆初（寿昌）、遵义杨济生（作霖）订交。

冬，父亲为荃孙聘庄氏（元和人，甘肃盐茶厅同知署平凉府知府，死于镇压回民起义，讳裕崧次女，十九岁）。

在四川省两年，专攻帖括，汤先生助以经策功夫，时一月三课，首课三艺，次经，次策，同受业者有张道生（人端）、凌仲桓（兆熊）、王雪橙昆仲，翻阅《三通》《御览》《皇经清解》诸书，始为考订之学。

同治六年丁卯（1867）年二十四岁

在成都读书，书院应课，受知于杨重雅，钟峻。

八月，荃孙以寄籍华阳监生身份应举，行同治丁卯正科，带补壬戌思科乡试。入场试题首题：“子夏曰：虽小道全节。”次：“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见乎？”三：“‘乐正子强乎？’曰：‘否’。‘有知虑乎？’曰：‘否’。‘多闻乎？’曰：‘否’”。诗题《巫峡秋涛天地心》。二场《易》：“六爻，发挥旁通情也”。《书》：“克宽、克仁、彰信、兆民”，《诗》：“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春秋》：“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礼》：“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三场经学、史学、文选、金石、水利揭晓，荃孙中一百二十八名举人。房师为朱麟泰，座师为孙毓汶，李文田，以经策受知。同学中张道生、友人王问

山、秦剑香、傅鹏秋同中举人。

十月，娶庄氏。

十一月赴京会试，与鹏秋偕行。由水路至重庆，下巫峡，至宜昌，陆行至襄阳樊城，赁车至襄城，于襄城过年。

同治七年戊辰（1868）年廿四岁

元旦即行，五日入汴梁，时捻军在卫辉，于是循黄河由济宁、德州、固安至京师。先寓居天仙庵，谒见孙毓汶、李文田两座师。孙师带见全中堂（全庆）等人。李师带见王小山侍郎（发桂），成惠卿侍郎（成琦），贾中堂（桢）。蜀人因籍贯不允荃孙会试，于是荃孙复试居改归原籍。在礼部递呈行查寄籍原籍。

移寓崇实宅，宅内半亩园饶有水石花木之胜，始收书为目录之学。是时，书籍价值尚贱。

五月出京都。偕傅秋鹏、张希仲（懋柔）两同年，毛季彤大令同行。过保定，见费学曾于清河道官署，费公子妃怀（念慈）年方十四，已觉顾视不凡矣。自井陘入太原，行经汾、霍，至蒲州渡河，至陕西华阴、临潼，新遭寇难，残破不堪，入西安小憩。见吕曼叔先生（俊孙）于盐道署。时回民起义军在武功、耀州之间，大道阻塞，因入子午谷道，出洋县城，固至汉中府，再入南栈，所经剑阁、千佛崖诸名胜，遂抵成都。

六月，崇实招荃孙入官署为文书。

八月，吴棠任四川总督，于是招荃孙入书局，校刻《朱子全书》。与刻书人作缘始于此。吴棠，字仲宣，号棣华，安徽盱眙（今安徽明光市三界镇）人，晚清封疆大臣，历任淮安府桃源县（今江苏泗洪县）县令、清河县（今淮安市清河、清浦区）县令、邳州知州、徐海道员、江宁布政使、漕运总督、江苏巡抚、闽浙总督、四川总督、成都将军。

是年，荃孙汇钞两年诗一卷，曰《北马南船集》。

同治八年己巳（1869）年廿六岁

荃孙在成都书局刻《八家文》《方望溪选本》，刻殿板《汉书》，与嘉

兴钱徐山年丈（宝宣）、张道生同年同事。

是年，为姻亲董叔纯校刻《方立遗书》，刻汤秋史先生《听云仙馆文集》。

同治九年庚午（1870）年廿七岁

在成都书局。

三月，女福保生。

闰十月，荃孙计划偕同固始吴幼岑同年同行，由南北栈自陕入豫孟津渡河至孟县，由西大道入都。时沈鹤农、傅鹏秋两人在礼部，傅懋垣在兵部，傅懋垣在京，约荃孙同住绳匠胡同。幼岑、月笙、葆初、济生众好友寓居北京伏魔寺，相距咫尺，友朋之乐最盛，荃孙始为金石之学。

同治十年辛未（1871）年廿八岁

参加三月会试，首题有“子曰：信近于义”全节，次：“人一能之己百之至，果能此道矣！”三：“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诗：《移花便得莺》，得“移”字。揭晓，荃孙落第。卷出茂名杨蓉浦师（颐）房，力荐，以微疵斥，杨师极惋惜，手抄二三场文。

五月，荃孙出都。当时大水过正定，正值滹沱盛涨，不得渡，于是遍游大佛寺、龙兴寺、开元寺，搜拓旧碑，水落后，渡滹沱，由西大道至河南卫辉，再趋孟县渡河，遭遇大风，飘渡船至偃师之下收口。在偃师住一日，访碑至洛阳，后入西安，在西安住二十日，遍游西安名胜。仍由南北栈回蜀，至武连访开元寺画壁，得唐宋刻数种。

九月，到成都，再入书院。

十月，嗣初二兄（缪长龄，荃孙伯父次子）歿于巴州吏目任上。

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年廿九岁

二月，移居小福建营。

四月，川东道姚觐元（彦侍）到任，约荃孙入幕，与杨葆初同事。

五月，浮江东下，覆舟于道士观，书籍衣履尽湿，犍为令林书原（之洛）接入官署居住二十日。后陆行至重庆，姚觐元工于篆书，搜访

金石刻，与荃孙最为莫逆。

九月，大病几死，量药调水，姚彦侍、杨葆初晨夕护持，至冬始渐痊。

是年，为章硕卿刻《皋闻词选》《绝妙好词笺》，汇写数年诗曰《惊鸟集》。

同治十二年癸酉（1873）年三十岁

四月，到涪州游北岩之胜，到忠州转垫河谒袁潮生丈（绩震），邻水谒吕静甫丈（烈嘉），合州谒费幼鹤丈（兆铎）、张瑞之丈（德升），住满一月，游濮岩钓鱼城，复返重庆。

七月，回省寓。

十月，计划偕同杨葆初入都，过绵州，住三日。游西山观，到剑州秉炬游鹤鸣山，拓《重阳亭记》。到广元游千佛崖。至褒城游石门洞。至长安，住六日。游雁塔、碑林、花塔寺，访碑选胜无虚日。

二月，入都，寓居老墙根傅懋垣兵部宅。

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年三十一岁

三月，会试。首题：“君子坦荡荡”，次：“自诚明谓之性。”三：“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诗：《无逸图》，得“勤”字。榜发，又落第。卷出长沙一梧师（先谦）房，留京度夏。

七月，航海到沪，始回故里，寓居族兄缪禄田处。乱后十四年，始回乡里，亲朋相见不甚相识。修人墓，渡江。至正东圩，迁庶祖母灵柩还葬肥场。

十月，附轮船至湖北，谒潘司林远村，林氏助以百金，由宜昌回蜀。祀灶日始抵成都。吴棠邀入幕府。

十二月，听闻同治皇帝去世，嗣君光绪接位之信。

光绪元年，乙亥（1875）年三十二岁

在督署幕府。与同来陈孝兰（陔）订交。

二月，建尊经书院。学使张孝达（之洞）、吴仲仙修尊经书院，专课经古，延请沈谷成、钱篋仙为山长，均辞以道远。吴仲仙延请钱铁江

(保塘)、钱徐山(宝宣)同阅官师课卷。

八月,执贻张孝达先生门下受业,命撰《书目答问》四卷。

九月,到富顺,游中岩千佛洞。到宜宾,游涪翁岩。回至简州,矩卿八叔新署简州,住署中。二日,偕云孙弟(延祺)游绛溪,归途又游大佛岩,均访碑。

十二月,到重庆,住姚彦侍川东官舍,为姚校定《咫进斋丛书》十二种。

光绪二年丙子(1876)年三十三岁

正月二日启行。到涪州,游白鹤梁,得宋人题名五十段。游北岩,得宋人题名六段。到夔门,阻风,得《皇宋中兴颂》。下宜昌,遵陆至襄阳,入汴梁。

二月廿一日,始至京师。

三月会试,首题:“康诰曰克明德”两节,次:“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三:“维义所在。”诗:《南山苍翠若浮来》,得“来”字。二场:《易》:“孚于家,吉,书宽而有制,从容以和。”《诗》:“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礼》:“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三场:经史、官制,造举、仓储。夷患鼻衄,迁居崇文勤公半亩园。

四月,榜发,中三十一名。房师:三原梁曦和侍御(名景先,道光乙巳进士)。以经策补荐。座主甘泉董酝卿(董氏名洵,原名醇,道光庚子进士)、宛平桑文恪公(桑春荣,道光壬辰进士)、善化黄恕皆先生(黄倬,庚子进士)、蒙古崇文忠公(崇绮,同治乙丑进士)。

复试一等十三名。

殿试二甲一百二十五名。

朝考一等十七名。

五月,引见以庶吉士用,留京候明春散馆。

六月,入庶常馆,大课。

七月,移居粉房玻璃街屠梅君前辈宅内东院。

八月，大课，《重修翰林院及庶常馆赋》《太液秋风》诗，置首卷。

与同年曹竹铭（鸿勋）、冯联棠（文蔚）、吴燮臣（树梅）、冯心兰（金鉴）、冯听涛（崧生）、黄再同（国瑾）、黄枚岑（彝年）、陆伯逵（宝忠）、王季樵（锡蕃）、倪澹园（思龄）联诗，赋《小课目再叙》。时沈鹤农明经入都应乡试，瞿表兄（酉同）解饷来都，友朋之乐，于斯为盛。

光绪三年丁丑（1877）年三十四岁

留京师。

四月散官，题《为三阶平则风雨时》赋，《奇文共欣赏》诗，一等二十七名。江苏名在第七。引见授职编修。汤文端家藏书全出，以千金购之。又购韩小亭家碑版拓本四大箱。

五月，梅君移寓，于是迁居永兴寺，与吴幼农庶常同居。后章硕卿引见，亦同寓居。周荇农嘱荃孙为曹文正公编定文集。彭祖贤议修《顺天府志》，延请荃孙充纂修。时南皮张之洞自署回京，为总纂，发凡起例，迥殊凡近。

八月，乞假回籍扫墓，仍由鄂中水道返成都。

父亲客居方子箴臬台官署。

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三十五岁

在成都。

五月出省，走乐至，转遂宁，又到顺庆，下合州。见费幼鹤，再游钓鱼城。至重庆，客姚彦侍道台官署，彦侍集资相赠。行至叙州，游涪岩，得宋人题名五十段。转富顺中岩，得蜀武成造像四、宋人题名十五段。自流井盐商王颜诸君厚资之，仍回省城。

九月，由水道至眉州，游中岩寺，得唐宋题刻三十余段，皆刘燕庭所未见者。

十月，仍由重庆水道至武昌，自此不复入蜀，思之黯然。

附轮至镇江、扬州，售书甚多，美不胜收。

十一月，从东大道入都。途中瞻望泰山，未能往游也。

十二月，到京师，仍然寓居永兴寺。

光绪五年己卯（1879）年三十六岁

供职京师。

四月，保和殿考差，信而好古，经题“望于山川”、诗“进贤兴功”。

八月，充同考官，入帙阅卷七百余，荐四十卷中，谢隽杭等二十一名：福山谢隽杭、开州刘云卿、福山王懿荣、雄县张文泉、安平杜庭荣、丰润王熙鋈、吴桥梁豫熙、天津张连元、旗籍齐普松武、曲阜刘永绶、汉军郑文钦、安丘王典、昌黎张钧、天津韩金鳌、天津刘思源、深泽司空群、旗籍恒年、满城单蓉镜、河间刘炳、蔚州班毓琛、邢台赵允中。副榜五名：清丰郝卿云、冀州王钧如、汉军萧廷琛、汉军文照、满洲桂斌。其中福山王廉生户部（懿荣）以经策补荐，徐中堂（桐）多疑，欲置副榜，力争始得之，王懿荣，荃孙旧友。

十月，兼尹万文敏师（青藜）、府尹梁檀圃前辈（兆煌）延修《顺天府志》。同事刘博泉（恩溥，时以御史丁忧）、洪右丞（良品）两前辈，廖泽群同年，傅懋垣（云龙）、潘季驯通两兵部，蔡松夫学录（赓年），羊辛楣刑部（复礼）共八人，晨夕搜讨，先成《沿革表》四卷。

光绪六年庚辰（1880）年三十七岁

供职京师

八月，出京，时专人赴蜀迎荃孙父亲并眷属入都，荃孙自往武昌迎接，寓居瞿耕甫表兄处。

十一月，荃孙父亲至武昌。回江苏。当时观察恽祖翼为荃孙借小轮拖放镇江，换船入江阴口，到苏州，赁司前街谢宅暂住。时境遇困甚，行资无所出。得李瀚章、彭芎庭两人资助，以及周小棠，杨葆初资助，始得过年。

是年，撰成《五代史·方镇表》十卷。

光绪七年辛巳（1881）年三十八岁

在苏州，费幼亭（学曾）、刘云樵（翊宸）两世丈为荃孙纠集得到

五百金，始得成行。

四月，自运河到济宁，为父亲换船，随漕船同行。荃孙先入都寻觅宅屋，住大川淀涵秋阁朱椒堂，先生手书额在焉。阁不甚高，下临苇荡数十顷，秋风萧瑟，颇近江南风景。远望矩堞，西山时在目前，向称胜地。

七月，荃孙父亲始至通州，荃孙亲自往迎入宅。

冬，招族弟缪佑孙入都。

光绪八年壬午（1882）年三十九岁

供职京师。

四月，大病几死。傅懋垣为之供药，得以生。考差未能参加，修《顺天府志》。

九月，顺天榜发，族弟缪佑孙中举。

十二月，荃孙充国史馆协修。

是年，刊《万善花室文集》《洪幼怀文集》，为荃孙刻书之始。

光绪九年癸未（1883）年四十岁

供职京师。

修《顺天府志》。

为潘祖荫编辑《士礼居题跋》，潘祖荫交来八十篇。荃孙以为偏少，亲自辑得二百四十篇，刻之。

三月，奏派《国史·五传》纂修。

四月，族弟缪佑孙下第出京。

秋，家人大病，亦延请傅懋垣治之，得生。

充本衙门撰文。

派教习庶吉士：山东管廷猷、江苏秦绶章、浙江童祥熊、山东李兆勋、江西刘炳燮、甘肃张琦、福建张亨嘉、河南马吉樟、冯汝骥、广西骆景宙。

充国史馆纂修。

是年，刻《东湖丛记》。

光绪十年甲申（1884）年四十一岁

供职京师。

五月，荃孙妻庄宜人因病，一夕而逝。寄厝观音院。

九月，聘继室夏氏，夏氏祖父夏子龄曾为易州隶州知州、父亲夏诒钰曾为永年县知县，是年夏氏二十五岁。

充国史馆总纂。

十二月，京察保送一等。

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年四十二岁

供职京师。

二月，京察引见，未记名。

四月，考差。首艺：“古者言之不出”一节，次：“一曰食，二曰货”。诗：《华月照芳池》。

因办《儒林传》与徐桐议不合，尔后，事事齟齬，遂自此始。

冬，与李莼客、沈子培、子封、施均甫（补华）、朱桂卿（福诜）联消寒会，唱酬无虚日。

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年四十三岁

供职京师。

三月，《顺天府志》成。监尹毕东河（道远）、府尹薛抚屏（福成）进呈，交部议叙，加一级。

四月，会榜，祖弟缪佑孙中式，为户部广东司行走。

李莼客、陶心云（浚宣）、徐诵凡招游西山。

纳妾任氏，易州人。

十月，为子祖保娶阳湖吴氏。

光绪十三年丁亥（1887）年四十四岁

供职京师，始购书画。

正月，长女归于恽氏（阳湖恽崧耕观察长子毓良）。

六月，两湖总督裕寿山制府（禄）入都，延复纂《湖北通志》，与柯逊庵中丞（逢时）同事。

十二月朔，子禄保生。

京察一等。

是年，辑通籍以后诗，止一卷，曰《秋窗集》。

光绪十四年戊子（1888）年四十五岁

供职京师。

正月初，感时疾甚重。继母薛恭人向患嗽疾，自冬至今不愈。荃孙稍痊，而恭人陡加喘逆，遂不起，时二十七日也。暂停观音院。

三月九日，子佛保生，妾任氏出。

五月，整理《儒林》等五传，撰成稿本，托陆提调呈堂。自辛巳潘文勤师为总裁，廖谷似（寿丰）为提调，奏办《儒林》《文苑》《循良》《孝友》《隐逸》五传。张幼樵（佩纶）、陈伯潜（宝琛）为总办。壬午，荃孙传到，即充分纂，谷似外简王小云（貽清）为提调，幼樵署副宪，改派钱馨伯（伯潜）出为江西学政，改派汪柳门（鸣銮）。癸未，文勤师丁忧，徐荫轩相国（桐）为总裁。小云丁忧，柳门出为山东学政。馨伯辞退，改派李苾园（端棻）、邓莲裳（蓉镜）为提调。谭叔裕（宗浚）及荃孙为总纂。叔裕外简，荃孙独任其事，成《儒林传》上二十二篇、下四十九篇。《文苑》七十四篇，《循良》四十三篇，《孝友》二十九篇，《隐逸》十五篇，分并去取，略具苦心。中有佥人潜之于相国徐桐，徐桐不知是非，以先入之言为主，随加排斥，埋没荃孙苦心。

徐桐少年与薛执中游受周太谷之传，以参同契之言说《易》，一日示以纪大奎所著书，命荃孙编入《儒林传》。荃孙以为，《易》有经学之《易》，有术数之《易》，所以《朱子》注参同契，《四库》列之道家，而不收入经部。以此为例，大奎似未便补入，徐桐亦首肯。而奔走掌院之门者，如李岷琛、王廉、蒋璧芳等群潜荃孙恃才独断，藐视前辈，以激东海之怒，命官磨蝎，动遇小人，夫复奚言。

编成《续经世文编》八十卷，交盛杏荪观察。

七月，辑《全辽文》。

八月，逊庵简陕西学政，将《通志》全数交与荃孙。

中秋定议。荃孙父亲全家留京。家事外则子祖保主之，内则荃孙妻子主之。

荃孙父亲时年已七十有六，勉强叩别。荃孙扶继母薛恭人及庄宜人两柩由海道回里门，暂停宗祠。

九月，杨蓉浦督学江苏，招至南京，命荃孙主讲南菁书院。书院延两院长，黄元同（以周）先生专课经学，荃孙分课词章。诸生正额八十人，附额不计数。

荃孙赴乡扫墓，并看墓地。

十二月，张之洞招游粤东，遂至广州，住广雅书局东校书堂与陶心云（浚宣）、屠静山（寄）、章硕卿同寓。王雪橙、王子展（存善）为提调，旧友梁节庵、凌仲桓、陈孝兰、粤人黎贞伯（念椿）、陶春海（福祥）、陈孝贞（宗侃）、孝圣（宗颖）、同年廖泽群、金学献聚会。

堂弟缪长庚歿于富庄驿，荃孙伯父之子。

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四十六岁

在广雅书局。

二月，荃孙同年李铁船（征庸）招荃孙游香山。

三月，荃孙返江阴，在南菁书院、西郊书院（在江阴城西三十里西石桥镇）招阅文，为江阴人金逸亭廉访（国琛）所创，小有规模，在乡间已不易。

是岁，举行皇上圣寿二十岁恩科。

七月间，缪佑孙自海外归，荃孙往扬州访之。游平山堂、小金山、梅花岭。

渡江，初至金陵，游清凉山、北极阁、孝陵、元武湖、莫愁湖。乱后荒凉，结构草草，而龙盘虎踞，江山如故也。

书院门人来谒甚多，时书坊云集于贡院前，荃孙购书颇多。

后赴上海送缪佑孙入都。

与同族公议修谱，设局宗祠。

十月，张之洞调两湖，自粤来沪，荃孙迎至沪，同游焦山。

为志选侄娶黄氏，本镇黄企女。

光绪十六年庚寅（1890）年四十七岁

正月，荃孙葬伯父母于石柱头新阡。

二月，荃孙辞馆至湖北，谒张之洞，交《湖北通志稿》。

闰二月，到黄冈，住杨葆初官署，晤同年黄州府李荆南（钟豫）、杨惺吾（守敬）以及邓献之山长（琛），同游赤壁雪堂。翌日，渡江游武昌西山，登三泉亭、九曲亭。寒溪寺老桂大数十围，花开香吹过江，陶桓公手植也。

五月，入都。荃孙父亲犹健旺，家人均好。

起复，至衙门。

七月，补引见，记名道府，召见于勤政殿东暖阁，光绪帝询荃孙履历、年岁、江南今年丰歉、直隶近年水灾，一一奏对。

九月，志名考取典馆绘图誊录。

十月，荃孙父亲病于舌菌，延医多人，不愈，日渐委顿，二十日寿终。

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四十八岁

为父亲在京守制。

二月，山东巡抚张曜招荃孙东游，荃孙因葬亲之费无出，不得已至济南，张曜聘荃孙主持泺源书院。书院为山东名胜地，《小沧浪笔谈》有《垂柳》《苇荡》《方池》《鳌簪石》《铁狮峰》“五咏”。今一切如故，益以《芙蓉泉》《古柏》《明都司题名碑（都指挥司旧署改）》《唐墓志》《君子亭》为“后五咏”。邀诸生赋诗，出游趵突泉、开元寺、千佛山、龙洞、历下亭、铁公祠、汇波楼诸名胜。山东诸生经学则胶州黄象斌，博洽则诸城尹彭寿、日照丁文瀚、小门人王崇文，祠章则世昌王鹤年、单蓉镜、单步青、刘彤光等均优，是科大半中式。

七月，回京。

八月，谨扶父亲灵柩回里，停宗祠，择定祔葬罗圩祖坟左阡，定期明年正四日。

十一月，至湖北谒张之洞，聘主明年经心讲席。

十二月，回里，函辞泲源书院职务。年节时，得怔忡不寐之症，渐至不能看书。

光绪十八年壬辰（1892）年四十九岁

正月四日，葬二亲于本邑谢园镇。

病于怔忡，治两月不痊，辞馆回京，延左绍佐诊治，日有起色。

三月，为志名娶姚氏，武进姚彦嘉女，世谊之交。

五月，病渐愈，稍能看书。

六月，子祖保报捐库大使任职，仍归本生，承大宗，后分发湖北候补，挈妻子偕往。

闭门读《礼》，兼课两儿功课。

撰《金石分地编》。

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五十岁

正月服闋。

起复，到衙门。

四月，考差。题：《泽梁无禁》，诗：《密林生雨意》。荃孙随班入考。年过半百，九年未预考试，况经大病之后，心手俱退，完卷为幸。十九日引见。

五月，充国史馆提调。

六月，缪佑孙侍奉荃孙四叔母到京，住海波寺街。

七月，缪佑孙中风，急延左笏卿治之，渐愈。

八月，上丁，派国子监分献官，随班行礼。

十一月，三子僧保生。

撰《常州词录》。

是岁，刻《名家词》。

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五十一岁

在京供职，京察一等，引见，未记名。

三月，御试翰詹诸臣于保和殿，题《水火金木土谷赋》《杨柳共春旗

一色》诗。原定三等一名，经徐张两相国、翁尚书复阅（露名而后复阅，为从来考试所无，以后遂无此试），抑置三等一百二十四名，罚俸二年。荃孙在史馆与徐桐相国论事不合，相国有意求疵，始浩然有归志矣！

四月，派磨勘会试卷。

五月，乞假省墓，同人知荃孙不得留，逐日钱行。费杞怀作《耦耕图》以送，因为言官所劾，亦谋弃官。

道出津门，谒李鸿章，始知日本犯朝鲜，派兵援之。

六月，至镇江，偕绵竹杨叔峤（锐）、达县吴筱村（德潇），成都顾印伯（印愚）同游金、焦、北固、鹤林、竹林寺，访梁心海于海西庵，已病还鄂。

到武昌，谒见张之洞，留修《湖北通志》，寓居祖保汉阳丰备仓一月，张之洞嘱托荃孙阅两湖官课卷三期。

七月，酷热，到江宁，时举行甲午乡试，购书多种，回江阴，闻甲午战事日警，决计迎春眷归。

九月，渡海至天津，复至京师。

缪佑孙于七月去世，荃孙资助其眷属回扬州。

十月出都，闰枝同行，命志名先送眷属到湖北。张之洞调南洋，自到江宁谒见。再赴湖北，居住于武昌省城高观山麓。隔江山色，青盈几席。是年，盛宣怀嘱托荃孙刻《常州遗书》，皆荃孙收罗，盛宣怀只是出资。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五十二岁

在湖北修志。

二月，兼自强学堂商务科分校。

中日和议成。

八月，与达县吴小村（德潇）、义宁陈伯年（三立）、番禺梁衍若（鼎蕃）、钱塘汪穰卿（康年）作赏秋之会。

九月，到芜湖，袁爽秋同年招游赭山，饮于滴翠轩。到江宁，谒张

之洞，时黄漱兰太仆（体芳）、仲弢编修（绍箕）、康长素户部（有为）均集。又晤刘聚卿（世珩）、徐积余太守（乃昌），谈讲甚乐。张文襄师订明年钟山书院之约。

十月，到苏州。闰枝招同周笠舸（志靖）作天平、灵岩之游，复同游虎丘。

十二月，回鄂度岁。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1896）年五十三岁

二月，挈家至江宁，住书院。院西偏一小园，精室三间，回廊四合，北望钟山。植梧桐、杨柳、海棠、芙蓉、海桂数十株，屋后丛竹数百竿，一方池有芙渠焉。消夏坐卧于此，最为闲适。每月一课，约四百余卷。

金陵旧友如秦伯虞同年（际唐）、邓熙之明经（嘉缉），名士如顾石公训导（云）、甘建侯孝廉（元焕）、傅苕生观察（春官），有文酒流连之乐。

访得江宁聂名山善访碑，叶鞠裳语：“石与李云从并称，南聂北李者也。”

六月，四子恺保生。

七月，赴武昌祝张之洞六十寿。

冬月，到苏州，得刘燕庭拓本三千六百种。

回江阴扫墓。

撰写《艺风堂金石目》。

编《旧德集》。

是岁，校刊《常州词录》，毕。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五十四岁

在钟山书院。

正月，二女祉保生。

撰《续碑传集》。

十月，常州有梦琴太守（有庆）约来年主龙城讲席。

八月，举行丁酉正科。购书甚多。

十二月，赴武昌，谒张之洞师，交《通志》稿。祀灶日回书院。

是岁，刻《藕香零拾》。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五十五岁

在钟山。

正月，回里。到郡城龙城讲席。

四月，偕顾石公、傅茗生赴杭州，游西湖，住恽松云方伯署，移寓湖山云抱水边楼，湖州庞氏祠也。遍游诸名胜而归。

晤谭仲修、陈蓝洲、许益斋诸先生。

五月，奉学使文，废时文改策论。

六月，得改书院为学堂之信。

八月，慈禧皇太后训政，新制一概改旧。

山西胡中丞（聘之）寄《山右石刻文编》稿本，嘱订定。为检拓本，补入一百余种，并加考，成书四十卷。

是岁，刻《旧德集》。

为刘聚卿观察刻丛书。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年五十六岁

在钟山，兼领龙城。

八月，入都送志名引见。遍访旧友，与盛伯希（昱）、袁爽秋（昌）、许竹簋（景澄）、张次山（仲炘）、樊云门（增祥）、胡长木（延）、左笏倾（绍佐），门人王廉生、张燮钧常聚琉璃厂肆，谭正文、杨勤省、韩星垣诸书沽均如故，并晤李云从。

在沪上，见蒋香生太守书，在都见方柳桥太守书，购及千金。

志名引见。到浙江以盐大使候补。

长木以《山右石刻文编》嘱在江宁刊板。

十月，回江宁。

为三儿聘固始吴月笙女。月笙名镜沆，庚午举人，镇洋县知县，为荃孙蜀中旧友。

是年，刻《常州先哲遗书》：

《诗传旁通》十五卷（元）梁益

《三续千文注》一卷（宋）葛刚正

《三朝纪事》八卷（明）李逊之

《陈定生遗书三种》（明）陈贞慧

《吴中水利书》一卷（宋）单锬

《遂初堂书目》一卷（宋）尤袤

《得月楼书目》一卷（明）李如一

《景仰撮书》一卷（明）王达

《宜斋野乘》一卷（宋）吴枋

《阳羨名壶系》一卷附《洞山芥茶》（明）周高起

《戒庵漫笔》八卷（明）李诩

《文选注考异》一卷（宋）尤袤

《昭明太子集》五卷（梁）萧统

《萧茂挺文集》一卷（唐）萧颖士

《文恭集》四十卷《补遗》一卷（宋）胡宿

《春卿遗稿》一卷《补遗》一卷（宋）蒋堂

《摘文堂集》十五卷（宋）慕容彦逢

《毗陵集》十六卷《补遗》二十卷（宋）张守

《内简尺牋编注》十卷李祖尧注蔡焕补注

《丹阳集》二十四卷（宋）葛胜仲

《梁溪遗稿》二卷（宋）尤袤

《归愚集》十卷（宋）葛立方

《定斋集》二十卷（宋）蔡戡

《墙东类稿》二十卷（元）陆文圭

《清閼阁集》十二卷（元）倪瓒

《沧螺集》六卷（明）孙作

《荆川集》十八卷（明）唐顺之

《从野堂集》八卷（明）缪昌期

《落落斋集》十八卷（明）李应升

《小辨斋集》八卷（明）顾允成

《金忠洁公集》五卷（明）金炫

《堆山先生前集钞》一卷（明）薛采

《郁语阳秋》十卷（宋）葛立方

《存余堂诗话》二卷（明）朱承爵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五十七岁

在钟山书院，兼领龙城书院。

夏，闻端方、徐桐主张招拳匪攻各国使馆。拳匪入城，大肆焚掠，百官奔迸，有枉死者。东西各国联兵夺大沽。

七月，八国联军攻陷京师。

慈禧、光绪西逃陕西。

东南赖刘揆一、张之洞镇定，得以无事。

冬月，议和。

是年，刻《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文集》。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五十八岁

在钟山书院，兼领龙城书院。

五月，赴湖北谒见老师张之洞。

大水，钟山书院被淹，仅上房无水，西园竹木尽死。

九月，为子禄保聘恽次远女。次远名彦彬，辛未传胪、工部右侍郎，壬戌同年。

十月，慈禧、光绪两宫还京。

十一月，再到湖北，领江楚编译书局总纂。

到九江，明华亭廉门户（明保）约游庐山，江行两日至湖口，转入湖，到南康入山，游三峡桥、栖贤寺、鹿洞书院、归宗寺、秀峰寺、青玉峡、万杉寺，返舟。又两日，仍回九江，附轮返江宁。

十二月，购颜料坊李氏屋，书院既裁，荃孙即将移居此地。

辞龙城书院职务。

是年，刻《艺风堂文集》成，《艺风堂藏书记》成。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五十九岁

四月，移居颜料坊新宅。缪荃孙家自曾祖以来无立锥地。此时缪荃孙也积历年钱财，置此数亩土地。

七月，闻办学堂，领江南高等、中、小三堂事，甚形忙碌。

八月，补行庚子科场，书贾云集，得书极多。在江南逢科场五次，己丑及是年书最佳。

九月，刘揆一去世。张之洞署两江总督，住高等学堂作行辕。遂缓开高等学，先开中小学。

十二月，奉派赴日本考察学务。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六十岁

正月，偕徐积余太守（乃昌）及各教习赴日本考察各学，得暇即搜看旧书。适张之洞回两湖任，魏光燾接任，电促荃孙等回国。

三月十四日回江宁。闻志选侄歿于如皋，惊悼之至。

举荐经济特科，未赴考。

四月，开学，中小学均归兼辖，各友帮助，事尚顺当。

八月，举行癸卯科乡试。回江阴商办学堂事宜。

九月，到馆。

是年，刻孔北海、魏文靖、韩致尧、李忠毅四谱。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六十一岁

在高等学堂。

二月，赴鄂，见张之洞自京师陛见回任。

三月，回江宁。

校内新修大楼塌陷，压死六安学生一人，伤十人，诸生大哗。仅而抚定。参劾工程员章君（邦直）官，且勒赔。

八月，魏光燾调闽浙。

李兴锐来接任，总办胡木延卒于苏州，穆克登布接任。

十月，李兴锐于任上去世，命江苏巡抚端方暂署。

荃孙稽查两江师范学堂学务。

十一月，周馥到任。

端方任江苏巡抚，不久端方又调湖南，荃孙偕刘聚卿赴苏州送之。

住徐子静宅内，饱观书画及拓本。遇汤伯和书估，又购旧书。

十二月，回江宁。

是年，《聚学刊丛书》印行，荃孙举旧藏书应刻者助之，目列于下：

经类

《周易虞氏略例》一卷李锐

《读易汉学私记》一卷陈寿熊

《尚书义考》二卷戴震

《周礼补注》六卷吕飞鹏

《说文辨疑》一卷顾广圻

《小尔雅义证》十三卷胡承珙

《周秦名字解诂补》一卷王萱龄

史类

《周公年表》一卷牟庭

《南江书录》一卷邵晋涵

《铁桥金石跋》四卷严可均

《金石萃编补目》三卷黄本骥

《元碑存目》一卷黄本骥

子类

《松崖笔记》三卷、《九曜斋笔记》三卷惠栋

《意林注》五卷、《补遗》一卷周广业

《丙辰札记》一卷章学诚

《瑟榭丛读》二卷、《交翠轩笔记》四卷沈涛

《聚星札记》一卷尚谅

《古相斋读书杂识》王宗文

《退余丛话》二卷鲍倚云

集类

《清白士集校补》四卷蔡云

《落帆楼文集剩稿》二卷沈尧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六十二岁

在江南高等学堂。

为子禄保娶妇恽氏。

新调曾道（兆锷）来总办学务，其人放纵自恣。四月接事，十月辞去，浪费两万余金。

两江总督周馥又派吴广霈充任总办。

荃孙长女因病去世，年三十六岁。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六十三岁

在江南高等学堂。

三月，在宅东辟地造一楼庋书，正对雨花台，名之曰对雨楼。

六月，赴上海迎戴、端两大臣回国，感受暑热。回江宁，即患口鼻喎斜，右手三指麻木，医治始愈。

七月，长孙通生。

十月，次子佛保病卒，年十八，英年好学，荃孙伤痛之至。

十二月，为诸生办毕业。

是年，刻《艺风堂读书记》。

印行《云自在龕丛书》五集：

第一集

《尚书记》七卷庄述祖

《续千文》一卷（宋）侍其瑗

《吴兴山墟名》一卷荃孙辑

《吴兴记》一卷荃孙辑

《元和郡县志逸文》三卷荃孙辑

《奉天录》四卷荃孙辑

《集古录目》十卷荃孙辑

第二集

《三水小牋》二卷、《逸文》一卷荃孙校辑

《北梦琐言》二十卷、《逸文》四卷荃孙校辑

《牡丹谱》一卷（宋）陆游

《牡丹记》一卷（宋）欧阳修

《教童子法》一卷安丘王筠

第三集

《东湖丛记》六卷海昌蒋光煦

《效顰集》一卷江阴缪鉴

《万善花室文集》六卷、《续》一卷大兴方履篴

《齐云山人文集》一卷阳湖洪符孙

第四集

《名家词》

《水云楼词》

《柳下词》

《宋于庭词》

《正盦词》

《周稚圭词》

《董晋卿词》

《张翰风词》

《冰蚕词》

第五集

《定海遗爱录》一卷

《旧德集》十四卷荃孙钞辑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1907）年六十四岁

在江南高等学堂。

三月，辞两江师范学堂稽查。

五月，子禄保补考毕业，升本科。

吴广霁素有心疾，更有小人怂恿，狂如瘕犬，遇人辄噬，荃孙谨避之。

七月，张之洞入都，电召荃孙赴湖北，充任存古学堂教务长。荃孙即送师之洞首途，附火车至广水始回，两人自此不复相见。

辞江南高等学堂职务。

端方奏派任江南图书馆事。

十月，偕陈善余同赴浙江，购八千卷室藏书，以七万元得之。

大雪，游西湖。

十一月，到苏，奉特旨速行赴京，预备召见，以病乞假。

丁氏书旋陆续运江宁。

是年，刻《对雨楼丛书》四种：

《诗品》三卷（梁）钟嵘

《荀子考异》（宋）钱佃

《茅亭客话》（宋）黄休复

《南朝史精语》十卷、《札记》一卷（宋）洪迈荃孙校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六十五岁

在江南图书馆。

二月，具呈请端方代奏，请长假。

荃孙内兄夏闰枝太守署宁波府，去秋到任。荃孙欲访天一阁，闰枝与范氏定约，三月十八日开阁观书，遵旧例也。荃孙十一日赴宁波，住宁波府官舍，子僧保持行。

游月湖，晤同年陆渔笙前辈（廷黻）、童玉亭世兄（德厚）、盛心传编修（炳纬），皆旧雨也。

登天一阁观书。阮文达《天一阁书目序》：“此阁构于月湖之西，宅之东。墙圃周围，林木荫翳。阁前略有池石，与闾阖相远。今阁尚明时旧宅。阁之外有月台。台之下即小池，略有竹树。”《定香亭笔谈》云：“余两登此阁，阁不甚大，地甚卑湿，而列匮书干燥无蠹蚀，是可异

也。”今则不然，登阁阅书，散篇断简，鼠啮虫穿，几无完帙，与阮公所见大异。兵燹之后，所存无多。薛观察所定现存书目，不及原书十分之三。范氏子弟朴鲁不学，久已无人整理，再百余年，即此剩编零本亦不存矣。然皆明嘉靖以前本子，刻本无方体字，钞本皆蓝格棉纸，令人尤爱不释手。

游天童山，住寺中三日，敬观三朝墨宝，宋元碑有六种。

游阿育王山，观唐碑、唐幢。

四月，回江宁。

五月，到常州。王仙洲太守（步瀛）约修《常州府志》。

与常州善堂沙田讼事议和息。自己丑在江阴与夏涤初表兄（子沐）、章同年（成义）同报寿兴沙新涨两千亩，与苏州善堂毗连，水利房王守晟交构其间，连年兴讼。苏堂绅董身不履境，任凭圩长造报，勘验多番，两造均不折服。今年，苏董石子元（祖芬）、江孝成（衡）与荃孙旧交，彼此通函互让，同呈和息。详司核准定案，以后少所胶葛。

七月，到上海，盛宫保属续刻《常州先哲遗书》，体例照前编。

复返郡城，住志局。发凡、起例均具规模。

第二孙近生。

八月，怔忡病复发，辞志局。

《府志》自康熙陈玉璣先生修成，至今已二百余年。乾隆中，卢抱经先生为总纂，洪稚存、赵味辛、汤宾鹭、钱树参诸先生为分纂，为人所阻，事中止。道光中，李申耆先生为总纂，洪子龄（麟孙）、汤果卿（成烈）、薛子选（于衡）诸先生为分纂，亦不成，改修《武阳志》。此次，绅士中有与王太守不合者，又恐查办平日侵吞官项，百计阻挠。王太守适调补凉州，荃孙因借病辞。

十月，渐愈。得皇帝光绪去世消息，翌日又得皇太后慈禧去世消息。以宣统皇帝嗣位，改元宣统，醇亲王为摄政王监国。

十一月，学部荣中堂（荣庆）专函来促，赴都。

十二月，偕侄熙之回故里，到四河祖茔议迁葬。伯父母冢新正四日

下葬，留熙之办理。

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六十六岁

在江南图书馆。

正月，回江阴，拜伯父母新冢。

荃孙伯父庚申殉难，荣昌绅士故弁拾遗骸以大旗裹之，松棺入殓。甲申，伯母歿于郡城，亦停宗祠。庚寅，以四百元得峭岐三保一片地安葬，土人无理，又无看坟人。去年，始与子祖保议迁祔祖茔，依曾祖、祖父母、俞氏外祖父母，想亦阴灵默许。又广购坟外田二十余亩，似可永安。

广钞《宋元人词》。

定义改惜阴书院为图书馆。

五月，学部奏派京师图书馆正监督。

两江总督端方调直隶，荃孙送之焦山，两宿，方去。

赴常熟，与瞿氏商量进书事，寓游文书院。书院在半山腰，古木怪石，丛竹平台，胜地也。与旧友庞炯堂、李玉舟两同年、邵伯英编修小叙。

张人骏调两江总督。

七月，二女祉保许闰枝之子纬森，旧姻新好。

八月，学部函电交催，荃孙正拟北行，而闻师张之洞薨逝，一恸而病，两月方愈。

十一月，为三儿僧保娶妇吴氏。

是年，刻《王怀祖诗》。

为家衡甫刻《中吴记闻》，并撰《札记》。又《玉峰志》《玉峰续志》。刻刘光珊《感旧诗》，即送之。

为刘葆良刻其兄《葆真（可毅）文集》。

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六十七岁

在江南图书馆。

因为御史江春霖诬劾纳贿五千两与皖抚朱中丞（家宝），荃孙疏通

参案，疏上，不查办，荃孙愤懑已极，具呈求派专员严查，地方官慰之云：“上谕不问，已知其诬矣！何必再渎！”

二月，赴杭州，住夏闰枝杭府署。复游西湖。

张人骏奏修《江苏通志》，延荃孙总纂。

五月，沈子培方伯招游皖城，始见朱中丞，方知丁卯同年、词馆后辈，从前未见一面，未通一信也。巡警道卞柳门（绪昌）、学司吴棣轩（同甲）为旧友。劝业道童次山（祥熊）为门人，曹揆一（元忠）来江宁，言学部嘱视荃孙老病如何？揆一代促入都，允之。

八月，荃孙生日，接子祖保病歿之信，伤心之至。荃孙此子自幼相随，天性极厚，夫妇亦视同己出。

九月，由京汉火车入都，子僧保随侍，赁居西城太仆寺街。入署见掌院，又入学署见堂官。

时京师图书馆未建，借北城广化寺开办，到馆任事，分类理书。

荃孙离开京师二十年，又经大乱，名胜荒芜，旧雨寥落，触目生感。

荃孙师门已无一人。四川旧友则乔懋轩（树楠）一人，同课则冯观察金鉴、王学士锡蕃两人而已。同年则陆中堂润庠、吕尚书海寰、唐尚书景崇、延尚书廷杰、陈侍郎邦瑞、沈大理家本、李阁学联芳、陈给事田、张中丞曾敷、林侍郎绍年。旧游则荣中堂荣庆、张总宪英麟、陈阁学宝琛、盛尚书宣怀、邹尚书嘉禾、董援经康、罗叔蕴振玉。新交则吴中书昌绶、海宁王国维、宝侍郎宝熙、凤将军凤山、毓学士毓隆、陈参事毅。门人则张侍郎亨嘉、王仁俊、孙雄、张锡恭、陈世昌，均不胜记。

十月，子禄保以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毕业，奖拔贡，报捐主事，分部学习，掣农工商部派庶务司行走。

得电，第三孙生，名之曰蓬，僧保之子。

十一月，传旨召见养心殿，监国询学务及南北图书馆办事，荃孙一奏对，奉旨以学部参议候补。次日谢恩。厂肆旧人尚多，以谭正文、

韩翰文两铺为优，而价长至十倍不止。

十二月，荃孙赴南皮会葬张之洞师，与梁星海、端仲刚（端绪）同行，到者二十余人。过天津，会刘聚卿、傅沅叔、沈佑彦、沈冕士。

是年，刻《东坡七集》成。《续碑传集》八十六卷成（本百卷，因书局裁撤，截去补遗十四卷）。

为吴仲飴刻《拙轩集逸文》。

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六十八岁

供职京师。

丁衡甫中丞（宝铨）嘱与罗叔蕴同编《傅青主年谱》。

三月，派回江南，催瞿氏进呈书。端方嘱代刻《壬寅消夏录》四十卷。

回江宁，重订《通志》条例，张人骏创修《通志》，以张子虞观察（预）为总办，常款每月千五百金，荃孙嘱以八百金为局员开支，以七百元为纂修开支，如有不足，再议添款。子虞在江南多年旧属争求派事，满局冗员，月支千四百金，转至纂修，无款可发，是以志局为养闲人之地也。子虞不久去世，另委林貽书观察（开漠）为总办。本系荃孙旧交，荃孙与商裁冗员、节浮费，均肯照办。然本以为学司改官，指日除授，是以志局为暂歇脚之地也。寻简徐州道离任，又委张彬接任。张彬为张之洞侄子，夙传家学，办事结实。节本局浮费，延专员采访。荃孙欣逢同志，允于今冬将书目交卷，乞假回宁，专办志事，以冀成功。因革命爆发，《通志》修纂事情终止。

族兄禄田歿，回申港哭之。

五月，回京，并解瞿氏书五十种。

六月，编呈《各省志书目》四卷。四儿恺保病歿于家。

南中大水。

偕宝瑞臣游上方山。

八月，复偕瑞臣、金巩伯、刘仲鲁游房山云居寺。刻本馆宋元本《书留真谱》（本书一叶牒文牌子，序、跋述源流者均摹之，加考一篇）。

湖北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湖南、江西应之，山西、陕西应之，天下大乱。荃孙全家窜上海。于是京师图书馆职务自此结束。

九月，复交《新编善本书目》八卷，即乞假回上海寄寓。江宁亦于十月归革命党。

十二月二十七日，皇帝逊位于民国，缪荃孙以为此时，国破家亡，生不如死。

是年，《藉香零拾》三十二册成：

节《澹生堂藏书约》四卷（祁永燦）、《藏书纪要》一卷（孙庆增）、《流通古书约》一卷（曹溶）、《古欢社约》一卷（丁雄飞）

宴《唐开成九经碑图》一卷（魏锡曾）

游《大唐创业起居注》三卷（荃孙校）

玩《安禄山事迹》三卷（荃孙校）

好《牛羊日历》一卷、《东观奏记》三卷（裴庭裕）《广陵妖乱志》一卷（罗隐）

诸《十三处战功录》一卷（李壁）

费《玉牒初草》二卷（刘克庄）

可《宋中兴百官题名》（何异）

以《河南志》四卷（元人）

成又

就《栖霞小志》一卷（盛时泰）、《两京城坊考补》一卷（程鸿诏）

古《游城南记》一卷（张礼）、《据鞍录》一卷（杨应琚）

人《辽东行部记》（王寂）、《伪齐录》二卷（杨尧弼）

与《寓庵集》六卷（李庭）

之《还山遗录》二卷（杨奂）

续《静轩集》六卷（阎复荃孙辑）

出又

未《菊潭集》四卷（字求鲁□荃孙辑）

经《苏颖滨年谱》一卷（孙汝听）

刊《孙渊如年谱》二卷（张绍南）

布《曾公遗录》三卷（曾布）

者又

寿又

梨《山房随笔》一卷、《逸文》一卷（蒋正子荃孙校辑）

枣《刑统赋》一卷（傅霖）、《真赏斋赋》一卷（丰坊）、《河赋注》一卷（江沈）

始《旧闻证误》五卷、《逸文》一卷（李心传荃孙辑）

小《钱竹汀日记》一卷、《农丹》一卷（张标）、《强萼圃三书》一卷（强望泰）

帙《古泉山馆山跋》二卷（瞿中溶）、《破铁网》二卷（胡尔荣）

讫《敬斋古今藪》十二卷、《逸文》二卷（李治）

钜又

编又

《常州先哲遗书续编》成：

《象像管见》五卷（明）钱一本

《毛诗日笺》十卷秦松龄

《皇朝名臣琬琰集》二十一卷、《后集》二十卷、《续集》八卷（明）徐纁

《恩恤诸公志略》一卷（明）孙慎行

《天山年谱》一卷（明）郑鄮

《长安客话》八卷（明）蒋一葵

《荆溪外纪》二十四卷（明）沈敕

《杂诤》五卷杨名宁

《困思钞》三卷（明）孙慎行

《炙砚琐谈》三卷汤大奎

《午风丛谈》四卷邹炳泰

《暨阳答问》四卷李兆洛

《韵石斋笔谈》二卷（明）姜绍书

《饮渌轩随笔》二卷伍守澄

《初月楼论书随笔》一卷吴旋德

《学古文绪论》一卷前人

《教经堂谈薮》六卷徐书受

《龟巢集》十六卷（元）州应芳

《薛方山文录》二十二卷（明）薛应旗

《水南集》十卷（明）张袞

《赐余堂集》十四卷（明）吴中行

《正谊堂集》二十三卷董文友

《微泉阁集》二十卷董文骥

《清芬楼文》二卷任启运

《宛邻遗文》六卷张琦

《止庵遗集》四卷周济

《端虚勉一居文》二卷张成孙

《丹稜堂文集》四卷蒋彤

为沈子培刻《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澹水志》二卷。

为吴闿生刻《姑溪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卷、《札记》一卷，均成。

民国元年壬子（1912）年六十九岁

侨寓上海。此后历十余年，基本杜门不问世事，惟以铅槧自娱。

本年，曾写信给蔡元培，希望保护江南图书馆。

与邓实一起发起了编刊《古学汇刊》，并提出“学无今古，亦无中西”主张。

民国二年癸丑（1913）年七十岁

寓居上海，以校勘书籍，讲读学问自娱。

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七十一岁

寓居上海，以校勘书籍，讲读学问自娱。

本年，清史馆成立，赵尔巽为馆长，缪荃孙被聘请为总纂。

民国四年乙卯（1915）年七十二岁

寓居上海，以校勘书籍，讲读学问自娱。

荃孙本年夏到京师，因清史馆开馆之始，荃孙被邀，至京，但因会议一切编辑事宜多经折中，高年不便客居，回沪遥领，手定全书《凡例》一卷。因儒林、文苑、循吏、孝友、隐逸五传国史旧稿原出府君手辑，仍归增订，后以循吏一传分归他手。

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七十三岁

寓居上海，以校勘书籍，讲读学问自娱。

本年，因清史馆撰写事到北京。

民国六年丁巳（1917）年七十四岁

寓居上海，以校勘书籍，讲读学问自娱。

本年，荃孙主纂《江阴县续志》。荃孙在清史馆所撰写四传脱稿，又创辑明遗臣传、土司传，则国史所未具者也。

民国七年戊午（1918）年七十五岁

寓居上海，以校勘书籍，讲读学问自娱。

荃孙本年到京，与清史馆同仁会商史事。时馆中分纂积稿已多，府君力主列传应先拟定目录，划分时代，择人主任编排、归卷，加以修正，仍有头绪。自任康熙一朝，脱稿者十之六七，未完成。

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七十六岁

寓居上海，以校勘书籍，讲读学问自娱。

十一月初一日，缪荃孙胃溃疡发作逝世。

荃孙平生藏书校勘，私淑堯圃黄氏。光绪初为潘祖荫辑刊《士礼居题跋》，后有《续》，分贻江建霞京卿及邓君秋涓刊印行世。复偕同志吴伯宛、章式之广为搜访，所得益多，后由章式之一手校录，合前后已刻、未刻，编为《堯圃藏书题识》十卷，《刻书题识》一卷，荃孙独出资刊之。又于昔年所刊诸丛书之外，集录零星碎简，编为《烟画东堂小

品》十二册：

一、《康熙朝品级考》《圆明园考》(黄凯钧)、《周世宗实录》辑本、《后村杂记》(刘克庄)

二、《简庄随笔》(陈鱣)、《读金石萃编》(沈钦韩)、《摄山纪游集》(厉鹗王藻方士寔闵华陆钟辉张士科)

三、《公车征士录》全祖望

四、《东林同难录》《国史·贰臣表》《保举经学名单》

五、《五百罗汉名号》

六、《渔洋与林吉人札·与汪于鼎札》《覃溪嵩洛访碑图小记》《覃溪评选渔洋诗》

七、《徐星伯小集》辑本

八、《瞿木夫文集》

九、《西游录注和林金石考》《朔方备乘札记》(李文田)

十、《稽瑞楼文草》(陈揆)《吴山子文》辑本、《董子中诗》(董成)《思庵闲笔》(严虞惇)

十一十二、《宋人小说残本》凡二十五种。

己未年(1919)冬，诸书均已刊成。缪荃孙自著《艺风堂集》《续集》《外集》有文无诗，先已刊行。辛亥以后，所作文诗合编为《辛壬稿》三卷、《癸甲稿》四卷、《乙丁稿》五卷，亦先后写定付梓。

缪荃孙著作

《艺风藏书记》

藏书记缘起

荃孙年十二三。住申浦老屋。屋中存书四大厨，读经之暇，即取阅之。诸史杂家，尤所心喜。庚申之难，只字不存。转徙江淮，流离琐尾，亦时购零本，以消永日。甲子游蜀，受知于李顺德师，勖以目录之学。三上春官，陆遵秦晋，水出楚豫，遇书辄购，所积遂多。通籍后供职十六年，搜罗群籍，考订版片。迺时谈收藏者：潘吴县师、翁常熟师、张南皮师、文治庵丈、汪郎亭前辈、蔡松夫黄再同两同年、盛伯羲王廉生两祭酒、周苍生编修、王荦卿徐梧生两户部、陆纯伯中翰。互出所藏，以相考订。旧刻旧钞、《四库》未收之书、名家孤传之稿，共十余万卷。甲午初夏，与掌院徐相国议不合，投劾归，遂乞祠禄，辇书自随。庚子夏秋间，京师变起，南中亦岌岌，如李易安所云：“四顾茫茫，盈箱溢篋，知其必不长为己物矣。”秋日酷暑，移笔砚于深竹阴中，清风泠泠，洒我襟袖。因思勒成一书。遂按籍编目，尽录题跋印记，有《四库》未著录者，略举人之仕履，书之大意，得书六百二十七种，一万九百六十二卷。用孙祠书目例，分为十类，编成八卷。明知所得不足

称收藏赏鉴之名，所编亦不敢希巨野、安吉之目。然如潘李两师、冶庵、松夫、再同、伯义、苍生均谢世，莲生殉国难。所藏亦多散佚，而别无记载得以流传于世，真憾事也。今天下称瞿、杨、丁、陆四大家，目皆高尺许。荃孙一鳞片甲，第与《拜经楼》《平津馆》相伯仲。他日书去而目或存，挂一名于《艺文志》，庶不负好书若渴之苦心耳。辛丑十二月，江阴缪荃孙书于钟山讲舍之饱看山簃。

艺风藏书记卷一

经学第一

周易白文一卷

宋刊《九经》小字本。每半页二十行，每行二十七字。上有《音义》，版心有刻工姓名。

周易正义十四卷

影写东洋单疏本。宜都杨惺吾同年守敬遗予，为阮文达公所未见，真惊人秘籍也。每半页十四行，每行二十字。

周易正义序

周易正义卷第一

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奉敕撰定。自此下分为八段：

《第一论易之三名》

《第二论重卦之人》

《第三论三代易名》

《第四论卦辞爻辞谁作》

《第五论分上下二篇》

《第六论夫子十翼》

《第七论传易之人》

《第八论谁加经字》

周易上经乾传第一

周易正义卷第二二卷

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奉敕撰。

按：此书宋本先藏徐星伯先生家，见《程侍郎遗集》诗注。陈东之笔记亦云“雍熙二年官槧”，末页衔名有吕蒙正等十余人。此本无官衔。近闻由长沙何氏归吾友徐梧生户部，惜南北隔绝，未能借校异同也。

朱氏易解五卷

宋朱长文撰。旧钞本，有绍圣元年秋九月既望吴郡朱长文序。《四库》未著录，《经义考》止有长文《易意》，未知即此书否？缺自《讼》至《离》约半卷。收藏有“秘册”阳文长方印、“张印月霄气”“爱日精庐藏书”朱文两方印。张氏书目亦未载。

诚斋易传二十卷

明敏学书院刊本，嘉靖甲辰鲁国望洋子当泐序。盖明宗室也。

诚斋易传二十卷

明嘉靖壬寅尹耕刻本。版心有“疗鹤亭”三字。

此两本同刻，相去不过两年。朱刻自云“正尹刻之误”，而瞿氏《书目》所云讹字则两本相同。惟书院本标题“张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次行“庐陵杨万里廷秀”，三行“门人张敬之显父校”。尹本标题“诚斋先生易传”，次“宋宝谟阁学士杨万里廷秀著”，已非旧式，似书院本较胜也。

陈氏易说四卷

吴江陈寿熊撰，稿本。长洲诸神福跋，有云：“先生欲正王注之违，举孔疏之要，为继汉开宋之一书。”盖此书宗旨也。

尚书白文一卷

宋刊小字本。

尚书正义二十卷

影写东洋单疏本，亦杨惺吾同年所得者。每半页十四行，每行二十

四字。《周易》单疏尚见前人著录，此更绝无而仅有矣。

孔维等《上雕印五经正义表》并官衔。刻入《艺风读书记》。

长孙无忌《上五经正义表》。刻入《群书拾补》。

《尚书正义序》

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奉敕撰。

《尚书正义》卷第一

国子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臣孔颖达奉敕撰。

尚书义考一卷

休宁戴震撰，稿本，备采众说而折衷之。原定《虞夏书》四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止成《尧典》一卷。见孔检讨所撰墓表。

毛诗白文一卷

宋刊小字本。

毛诗要义二十卷

传钞本。收藏有“词仙过眼”白文小印。

诗缉三十六卷

明味经堂本。

仪礼白文十七卷

元刊本。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版心上有字数，下有刻工姓名。小黑口。

仪礼注疏十七卷

明刊本。衔名二行：“提督直隶学政监察御史余姚闻人詮校正、直隶常州府知府遂昌应棣刊行。”

仪礼识误三卷

旧钞《大典》本。卢抱经先生校勘一过，有二跋。

卢氏手跋曰：“丁酉六月丙午阅。经注本不一，疏与释文所据本各不同。张氏必欲从一废一，非也。予借得《仪礼》注临宋本，与疏先后多少亦有异。然按之亦殊有理，此又未疏之前一本也。抱经卢文弼识。”“乾隆四十二年七月乙亥抱经氏阅于钟山书院。是日课士。”

仪礼旁通图一卷

元刻本。

周礼十二卷

宋刊巾箱本。郑氏注。有重言二字作阴文。无重意，刻印俱精。每半页九行，每行十七字。日本曼殊院旧藏，有印，白文。

礼经会元四卷

元刊本。有至正乙巳潘元明序、至正丙午陈基序。本传后有六世孙叶广居识。每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四字。小黑口。收藏有“吴兴李敬仲氏家藏”朱文长印。

礼记白文二卷

宋刊小字本。

礼记单疏

影写东洋卷子本。

礼记集说十六卷

元刊本。首行“礼记卷第一”，次行“后学东汇泽陈澧集说”。篇首有至治壬戌澧自序及凡例五则，为元时最初之本。每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大黑口。六老堂三十卷，通行本十卷，均非旧第。通行本并凡例亦失去矣。

白虎通德论十卷

元大德刊本。前有大德九年东平张楷、大德乙巳东平严度两序。目录后有识语，为无锡州守刘平父钺梓，耆儒李显翁晦所藏旧本。每半页八行，每行十七字。收藏有“马玉堂”白文、“笏斋”朱文两方印。

某氏手跋曰：“《白虎通德论》十卷，元大德刊本。天籁阁藏书，汉班固撰。前有大德九年东平张楷、大德乙巳东平严度两序，并无名氏跋。”按：是书为无锡州守刘公平父钺梓，或即平父所识欤。目录后又有题辞云“敬以家藏监本刊行”，是则平父所识无疑。跋中论“不欲改迎子刘”一事云：“班固汉人，去古未远，必有所祖。假借通用，未可尽知。后人未得班固之心，安可轻议班固之述作”云云。诚哉是言，亦

可见其笃信好古，谨慎不苟矣。汉时《尚书》立学官者凡四家，曰欧阳氏，曰大夏侯氏，曰小夏侯氏，曰《古文尚书》。师承各守，训解多岐。至字句之异同，见于《释文》诸书者，盖难枚举，安知四家中不有作“迎子刘”者？古书散亡，百不存一，敢据今日所见之本为定耶。明辽阳傅钥本改“迎子刘”为“迎子钊”，并删去此跋。以后吴琯、程荣、何允中、胡文煥、钟惺诸本俱袭其谬，延误至今。不特无一人纠正，且有以不改“刘”字为过于拘泥者。于此盖叹平父之卓识为不可及也。

左传正义五卷

影写东洋单疏本。存卷四鲁隐公六年起。至卷九。庄公三十一年止。

谷梁正义一卷

江都梅毓撰。毓字延祖，蕴生先生之子也。同治庚午举人。绩学早世，著书未成。稿本流传，仅此一卷而已。

孟子私淑录三卷

休宁戴震撰。问答体，曲阜孔氏散出书。卷面题字“乾隆十六年岁次辛未春三月录”三行。

校元本论语注疏十卷

杨氏手跋曰：“元槧《论语注疏》十卷，卷首题‘翰林侍讲学士朝请大夫守国子祭酒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臣邢昺等校定。’按《宋志》及《中兴书目》并云邢昺《论语正义》十卷，今注疏本皆分为二十卷。此本仍十卷，尚存单疏之旧。第四卷、第八卷后有木记云‘平阳府梁宅刊’第五卷、第九卷有木记云‘大元贞丙申刊’，第十卷题‘尧都梁宅刊’。首尾有‘养安院藏书记’。‘养安院’为日本旧藩藏书之名，今日本所传古本多有其印记。按今世所传《论语注疏》以十行本为最古，然脱误亦不少。如《序解疏》中‘少府宋畸’，十行本以下并作‘朱畸’。据《汉书·艺文志》《释文·叙录》皆称‘宋畸’，此本与《汉志》《释文》合。若无此本，则‘宋’‘朱’二字竟不能定为谁误。又‘不逆诈’章、‘古之狂也肆’章、‘叔孙武叔毁仲尼’章疏文、十行本有空阙，闽监本同，毛

本以意补。此本独全。又凡浦镗及阮校所疑疏中讹字，此本皆不误。别详《札记》。是此本虽刊于元代，必根源于单疏，决非从十行本出。其注文亦多与纂图本《集解》合，远胜十行本。如‘不患人之不己知’章，此本有注文‘王云徒患知己之无能’九字，各注疏本皆脱。至于雕刻之精，俨然北宋体格，亦决非十行本所及。考金元之世，平阳立经籍所，故一时书坊印版麋集于此。今传世者，唯《政和证类本草》是平阳张存惠所刊，然已经明成化间重镌，非平阳原本。唯此尚是原刊，初无一页损失，岂非镶宝也哉！杨守敬识。”

是书杨惺吾得于日本，刊印之精，为元刻中罕见。跋中推为北宋体格，实非虚语。留案头月余，因议值未妥，校阮刻一过，成《札记》一卷。还书之日，颇为怅惘。

大学本旨一卷中庸指归一卷

旧钞本。收藏有“大兴刘氏校经堂藏书印”朱文长方印。

孝经一卷

影钞相台岳氏刻本。摹写极精。昆山徐氏藏书。收藏有“传是楼”朱文长印、“徐炯珍藏秘笈”朱文长方印、“彭城中子审定”朱文长印、“徐仲子”朱文长印、“御赐”白文、“忠孝堂”朱文长印、“慧成私印”白文方印。后有“浙江按察使”“两浙江南盐运使”两官印。

孝经一卷

日本影宋刻本。后有《音略》。每半页十五行，每行二十三四字不等。

孝经一卷

日本影宋刻本。前有唐元行冲序，后有宽政十二年源弘贤识。每半页六行，每行十五字。

小学第二

尔雅三卷

明刻本。首载郭序。每卷前标篇目，注中有音某者，完善未删。卷后复有音释。世传吴元恭本为经注之善者，此本间有胜于吴本处。如《释草》“蔓绕，棘菟”注：“今远惹也”，“惹”不作“志”，与《释文》合。《释木》“榎，柜柳”不作“柳气与《石经五经文字》合，又“皙无实枣气”“皙”不作“皙”，与《石经五经文字》合，又“皙无实枣”，“皙”不作“皙”，与单疏本合；又“蕢藿”注：“树实繁茂庵藿”，“菴”不作“庵”。《释鱼》“贝居陆𧈧”注：“贝中肉如科斗”，“中”不作“斗”；又“𧈧，𧈧蛇”，首“𧈧”不作“𧈧”。皆与单疏本合。他如《释宫》“屋上薄”，“薄”不作“簿”。《释天》“何鼓”不作“河鼓”。《释水》“縣出”不作“懸出”，胜于唐石经。又《释畜》“𧮎牝𧮎牡”不作“𧮎牝𧮎牡”。《释草》“其萌藿”注：音“縑縑”，不作“邱阮”，胜于雪窗本。每卷有音释，或即蜀相母昭裔《尔雅音略》欤？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大小字同。大黑口。收藏有“苍错斋藏书记”朱文长方印、“曾在鄂渚张芷隈家”朱文长方印。

尔雅三卷附校讹一卷

日本影宋刊本。首载郭序，后有音释。每卷总计经若干字、注若干字。每半页十行，行二十至二十三字不等，注每行三十字。均与瞿氏《书目》所载宋本相同。至胜于吴元恭本之字，及诸讹字，亦与《书目》同，其为善本无疑。校讹一卷，颇可观览。

尔雅二卷

明刻本。分《释地》以上为上卷，《释丘》以下为下卷，颇觉无理。郭序前多邢疏序，后有音释。及佳处与前两书同，版心有“宜静书屋”四字。

埤雅二十卷

明翻宋本。前有男宰序，署街：“朝请郎直秘阁权发遣淮南路计度转运副使公事借紫金鱼袋。”此佃之子也。按：宰字元钧，即放翁之父。放翁《跋向芎林帖》云：“先少师使淮南，实与芎林为代。”放翁即以是年十月生。有诗云：“少傅奉诏朝京师，橈船生我淮之湄。宣和七年冬十月，犹是中原无事时。”《系年录》：“绍兴十八年六月丙午，知临安府直秘阁陆宰卒。”是时放翁二十三岁。末行“宣和七年六月旦谨序”，记年日也。瞿氏《书目》以为佃子旦序，误矣。瞿氏《书目》又云：“汪氏师韩见宋刻《总目》外，每卷各有目次。”此本与宋刻同，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大黑口。收藏有“苍错斋藏书记”朱文长方印、“曾在鄂渚张芷隈家”朱文长方印。

尔雅翼三十二卷

明刊本。前有正德十四年都穆序略，云：“予家旧藏宋刻本，以归李工部彦夫，而罗公十六世孙刻之。”是此书源出宋版。每卷后有音释，版心上有字数，下有刻工名。后跋阙一页。

新刻韵略五卷

影钞元本。此书不著撰人姓氏，简首有许古道真序，作于正大六年，云：“平水书籍王文郁携新韵见颐庵老人”云云。卷末有墨图记二行云：“大德丙午重刻新本”“平水中和轩王宅印”。是书王氏后人所刻，已非文郁之旧。卷首有贡举三试程式及“章表回避”字样，并及于皇庆三年、延佑元年云云，是又大德后补刊者。按《金史·地理志》：平阳府有书籍。其倚郭平阳县有平水，是平水即平阳，史言有书籍，盖置局设官于此。元太宗八年，用耶律楚材言，立经籍所于平阳，当是因金之旧耳。每半页十六行，行二十字。

改并五音集韵十五卷

明刊本。题“淳阳松水昌黎郡韩道昭改并重编”。前有崇庆元年韩道升序，次崇庆元年改并《五音集韵》原序。末不署名次。隋唐长孙训言，郭知玄、孙奭旧序。目录前有论，后有入册，检韵术。序文、目

录、标题俱冠“至元庚寅重刊”六字。本书第一行及目录末又署“大明成化庚寅重刊”八字，是至元重刊金本，成化庚寅又从元版翻雕。金板从吴仲伊粮储借观，较明刻高二寸，广如之。故知元版，非翻雕。末附《五音类聚篇径指目录》一卷，《切韵指南》一卷。每半页十行，行大字十六字，小字三十二字。黑口。

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

元刊本。前有壬辰刘辰翁《韵会序》、丁酉熊忠序，均行书；李术鲁翀序，余谦题识，则正书也。有《凡例》一卷，题“昭武黄公绍直翁编辑，昭武熊忠子中举要”，又有《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一卷。熊序称“同郡在轩先生黄公公绍作《古今韵会》，仆惜其编帙浩瀚，隐屏以来，因取《礼部韵略》，增以毛、刘二《韵》，及经传当收未载之字，别为《韵会举要》一编”，是《举要》为熊氏所撰无疑。熊序后刻有陈橐告白云：“橐昨承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委刊《古今韵会举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画音义了然在目，诚千百年未睹之秘也。今绣诸梓，三复校讎，并无讹误，愿与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编系私著之文，与书铺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刊，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后学陈橐谨白。”四方牌子，十行，行十三字。是橐以此书为黄氏原书。李术鲁翀序亦称“文宗皇帝御奎章阁，得昭武黄氏《韵略举要》写本。至顺二年春，敕应奉翰林文字余谦校正”。亦与橐同，皆不考之过。每半页八行，小字双行，行二十二字。黑口。《平津藏书记》以为页二十二行者，乃《通考》行数，非本书也。首页有“千元十驾人家藏本”朱文长方印、“钟印文烝”白文、“子勤”朱文两小方印、“魏塘钟氏文烝庚申以后所得书”朱文大方印。盖本吴兔牀藏书，后归钟子勤者。又有“紫雪堂”朱文椭圆印、“金藏之印”白文、“愚三氏”朱文两小方印。陈橐告白，杜人翻刻，乞官长禁约，已开近人风气。

续千字文一卷

宋侍其玮撰，传钞本。后有谢褒跋。《四库》附《存目》云：“里贯未

详。”按赵希弁《读书后志》《续千文》一卷，宋侍其瑗字良器撰。黄山谷尝抵以书曰：“引辞连类，使不相抵触，甚有功。当与《凡将》《急就》并行也。”再按江阴葛文康《丹阳集》有《续千文序》，作“玮”不作“瑗”。葛刚正《再续千文》云：“梁韵昔叙玮编。今录注侍其公名玮，避讳孝宗赐名。从日。犹《晋书》‘韦昭’作‘韦曜’可证，《读书后志》作‘瑗’之误。此书后有乾道乙酉谢襄跋云：“邑大夫侍其公以其曾大父光禄所续《千文》示褒，作真、隶二书，刻诸浯溪崖石，以彰不泯。”今考王象之《舆地碑目》，《浯溪后集》侍其光祖编。《宋艺文志》有侍其光祖《浯溪石刻后集续集》一卷。浯溪隆兴甲申河间刘芮题名，内有祁阳令侍其光祖。褒所云邑大夫，即光祖也。《丹阳集》又有《侍其公墓志》云：“公讳玮，字良器，苏州长洲人。习儒学，皇佑二年登进士第。调杭州富阳、开封阳武二县主簿。掌书记阆州。改著作佐郎，知池州建德县。遭忧。服除，知光州固始县，监鄂州酒。又知吉州之永丰，签书桂阳监判官。稍迁通判全州。移刺化州，又刺池州。表请致仕。积官至朝散大夫，勋柱国，赐服佩视三品。子六人，长曰钊。钊子升卿，孙光祖。”里贯世系一一可考。惟浯溪宋人石刻，荃孙拓得一百五十五段，独无此文，未能窥见笔法。并葛刚正之注，均已久佚，为可惜耳。书人筠居亦无可考。

重续千字文二卷

宋葛刚正撰，并篆注，有自序。影摹宋本。刚正字德卿，自号水云清隐，江阴人，故自称申浦葛叟。葛氏自河南徙江阴，最称巨族。葛胜仲守湖州，有惠政，遂家于湖。其大支仍居江阴。胜仲自署丹阳者，乃其望也。自陈振孙误以为丹阳人，《宋史》因之，而宋元《镇江志》均不录，可以订其误矣。吴中侍其良器《续千文》不用《梁千文》已见字，德卿仿而重续之，亦不用前二书字。既成，并前二书篆之，且各为之注。惜篆注前二书已佚，惟此篇仅存。虽辗转摹写，其结体之工，尚可概见。《吾子行学古编》亦称之。聊城杨止堂河帅仿宋刻重雕，署名《三续千字文》，并二卷为一卷，无篆书，无德卿小序，注亦间有不同。可

见宋时传本非一。《四库》未收，《江阴志》亦未载其人。每半页四行，大字每行四字，小字每行二十字。此书系咸丰丁巳翁文勤公同书属幕僚田汉川大年摹篆，袁江李行之镇安录注，至为精妙。收藏有“翁同书字祖庚”白文小方印、“文搢金匱武肆珠鈴”朱文大方印、“宝瓠斋藏书”朱文方印。又有“朱学勤修伯印”、“唐栖朱氏结一庐图书记”两朱文方印。

翁氏手跋曰：“宋水云清隐丹阳葛刚正撰《重续千字文》，自为篆注。余得精钞本于维扬，盖从宋刻影写者。爱其工妙，乃属幕僚山阴田汉川大年摹其篆，袁江李行之镇安录其注，篆书视原本不爽毫发，真书腴秀，殆欲过之。余在军中既久，无尺寸之功，意忽忽不乐。赖此陶写性灵，宣其郁滞。若以为雅歌投壶，不知缓急，则昧予之本志矣。咸丰七年岁在疆梧大荒骆相月海虞翁同书识。”

六书正讹五卷

明翻元本。题“鄱阳周伯琦编”，注前有自序，吴当后序。每半页五行，小字每行二十字，大篆文占三格。篆文结体犹是伯琦手书。收藏有“蝴蝶草堂”白文方印，极旧。又有“歙许志古家藏”白文方印。

六书本义十二卷

明刊本。赵抃谦本名古则，是书尚署余姚赵古则编注，宋秦悼惠王十二代孙。首有自序、林右序、鲍恂序、徐一夔序。六书本义纲领、六书图本书数位篇第一，天文篇第二，地理篇第三，人物上篇第四，人物中篇第五，人物下篇第六，草木篇第七，虫兽篇第八，饮食篇第九，服饰篇第十，宫室篇第十一，器用篇第十二。末有牌子两行云：“先生邑人胡秉皋守宁国之明年，为正德庚辰，喜得此书，遂翻刻之。”每半页六行，行大字占三格，小字每行二十三字。

校影宋本韵补五卷

光绪丙子见影钞宋本於厂肆，每半页十行。小字每行二十四字，大字占三格。页旁注大几字，小几字。首页有“谢子芳刊”四字。价高未得，取连筠移本校一过，颇有佳处。

形声类篇四卷

武进丁履恒撰。稿本分四卷，曰《部分篇》，曰《通合篇》，曰《论入声分部》，曰《形声余论》。前有《与王怀祖书》及《复书》，后有庞大堃两跋。

一切经音义二十五卷

乾隆丙午武进庄氏刻本。金坛段若膺先生以宋本校订，用朱笔。间有墨笔，则高邮王怀祖先生校语也。

大唐众经音义序摹宋本式四行

终南太一山释氏

一切经音义卷第一

唐大慈恩寺翻经沙门玄应撰宋本每“经”字提行低一格。

艺风藏书记卷二

诸子第三

荀子二十卷

明刊本。版心上方标“世德堂刊”四字。顾千里云：“即从元纂图互注本而出，惟删其重意。”然《修身篇》“邱山崇成”句，《王制篇》“何独后世也”句下两条犹未尽删。其二十卷尾页尚刻“纂图互注”四字。卢抱经云：“虽有脱讹差舛，其本终未尽失。”

世德堂六子：《老子道德经》二卷、河上公注。《庄子南华真经》十卷、郭象注。《列子冲虚至德真经》八卷、张湛注。《扬子法言》十卷、五臣注。《文中子中说》十卷。阮逸注。

孔丛子三卷

崇祯癸酉裔孙孔胤植刻，连丛尚完。前有胤植序，后有孔尚达跋。

韩非子二十卷

明刊本。字画极清朗，题下有“亏四”二字，是重刻《道藏》本。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元刊本。高诱注。前有郑元佑序，序后有“嘉兴路儒学教授陈泰至正六年刊”一行。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元嘉兴路总管刘贞刊。贞字庭干，海岱人。以文儒起家，出为嘉兴路总管，擢授海道都漕运使。父克诚，字居敬，号节轩先生。累赠至礼部尚书，嗜校古书。庭干所刻，皆节轩所校。今流传尚有《大戴礼》《逸周书》《韩诗外传》《陈骙文则》等书，而孔奭轩以为刘贞庭，误矣。

吕氏春秋二十六卷

明嘉靖戊子许宗鲁刊本。前有宗鲁序。

文始真经三卷

明刊本。每节冠以“关尹子曰”。分一字、二柱、三极、四符、五鉴、六匕、七釜、八筹、九药凡九篇，犹存旧本之式。

冲虚至德真经八卷

元刊本。每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二字。字体清朗，元槧之至精者。

通玄真经十二卷

默希子注。按：《道藏》本有徐灵府注《文子》十二卷，即此书也。灵府号默希子，杜道坚《通玄真经赞义》云：“灵府，钱塘人。玄宗时徵士，隐修衡岳，注《文子》。书上进，遂封通玄真人，名其书为《通玄真经》，是《文子》之为《通玄真经》，始于灵府之注也。此本前有默希子自序。有云“我唐十有一叶皇帝”，又云“默希以元和四载投迹衡峰之表”。是灵府隐衡岳在宪宗时，非玄宗时矣。此书为严铁桥手钞本，下有璧一至璧十二，是从《道藏》钞出，有“严可均印”朱文、“铁桥”白文两大方印。

意林注五卷

海宁周广业附注。前有例言八则，录略十一则。首序撰人讳字爵

里，著述大意，而诸史所记卷帙，现今完阙存佚附焉。篇中涉有疑义，重采旧注及他书补之。先有注者，加“本注”二字，下别以按语。偶有所论，亦附篇末。后有《逸文》一卷、附录一卷。据《容斋随笔》所称，牟子、蒋子等十六家益之。

此书先在厂肆得四五两卷，及逸文附录一册。后在谭仲修同年献案头见有全书，为刘泖生手写本，而无逸文附录，因互钞凑足。丁酉又得旧钞本于扬估，亦无逸文附录，注亦详略不一。稍为考核，俟好事者刊行焉。

右古子

新语二卷

《两京遗编》本。刻于明万历十年，犹有古意。《术事篇》“至要”不作“致要”“资质”不作“资执”，殊胜他本。

明胡维新两京遗编十二种维新自序原一魁跋

贾子十卷 李元阳序

春秋繁露八卷 嘉靖甲寅赵维垣序

盐铁论十卷 弘治辛酉涂祯识都穆后序

风俗通十卷 翻大德本

潜夫论十卷

仲长统论一卷

中论二卷 宋绍兴石邦哲识、元至治陆友仁记

申鉴五卷 明黄省曾注，何孟春、王鏊序，省曾自序

人物志三卷 明王三省后序

白虎通二卷 明杨估校

文心雕龙十卷

贾谊新书十卷

明刊本。此书宋程漕使梓于潭州，淳熙辛丑潭州州学教授胡价跋。

正德乙亥吉府重刊，有右长史杨节跋。每半页八行，每行十八字，黑口。收藏有“古潭州袁氏卧雪庐收藏”白文方印。

贾谊新书八卷

明弘治刊本。目录后识云：“凡物久渐弊，弊久渐新。《新书》之行尚矣，转相摩刻，不知几家。字经三写，误谬滋多。所谓久则弊也。颉谨将各本与他本往复参校，尚有传疑，其亦弊则渐新。若好古君子，更得善本考证，则此书之弊尽革而永新矣。弘治乙丑句吴沈颉志。”收藏有“海宁杨芸士藏书之印”朱文方印。

盐铁论十二卷

明弘治刊本。目录后识云：“祜游学宫时，得汉庐江太守丞汝南桓宽次公所著《盐铁论》。读之，爱其辞博，其论核，可以施之天下国家，非空言也。惜所钞纸墨岁久漫漶，或不能句，有遗憾焉。乃者江阴始得宋嘉泰壬戌于荐绅家，如获拱璧。因命工刻梓。嘉与四方大夫士共之。弘治辛酉十月朔日新淦涂祜识。”

此张古余影刻之祖本，明时刻于江阴，尤为难得。收藏有“郑西冉阅”朱文正书一长印、“醉经堂印”“志雅堂印”朱文两方印。

扬子十卷

无注，明刊本，版心有“芸窗书院刊”五字。又有《文中子》十卷，与此同。疑所刻尚不上二种。

人物志三卷

明刻蓝印本。前阮逸序，后王三省题识。字大悦目。

类编标注文公先生经济文衡前集二十二卷

元刊本。每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中多明人补页。收藏有“文登于氏谟觞馆藏本”白文长印。其余藏印累累，皆伪作也。

独断二卷

明刊本。后有牌子云“嘉靖仲冬宗文堂郑氏刊”两行。

大德新刊校正风俗通义十卷

元刊本。每半页十行，每行十七字。卷九、卷十影写极工。收藏有

“马印玉堂”白文、“笏斋”朱文两方印。

儒门经济长短经九卷

旧钞本。字迹古雅，纸墨极旧。每卷有“杭州净戒院印行”七字。

精校封氏闻见记十卷

以明隆庆戊辰影写宋本校雅雨本。二卷《石经篇》增出百六十三字。三卷《制科》增二十三字，《铨曹》增六字。四卷《尊号》增二十六字。《露布》增八字。五卷《烧尾》增十九字。《图书》增二十四字。其一二字足补正者，又数十处，悉于卷端标记。明钞本。藏莫子偁丈处，从弟柚岑校此本以遗余，余又据张海鹏本校过，更为完善矣。

刊误二卷

旧钞本。收藏有“翰林院”官印。

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三卷

明崇祯辛未嘉定马调元刊本。有前后序，云悉遵乾道扬州本缮写翻刻。

西溪丛语二卷

明鵷鸣馆刻本。嘉靖戊申锡山俞汝成序，士礼居藏书。

黄氏手跋曰：“此鵷鸣馆刻《西溪丛语》，余亦有之。但贮诸家塾中，不以为难得之书。迨后见蒋寿松收顾氏书中有钱遵王家钞本并手校者，始知即从是刻钞出，遂重之。钱本阙失多同，因视鵷鸣馆刻为难得，而登诸旧刻之列。后余得嘉鱼馆钞本，取刻本相校，固胜刻。而刻亦有胜钞之处，钞因与刻并藏。惜刻有阙失并糊涂处，复借张切庵藏本补钞写全，可云尽美矣。顷湖估来说新开环经阁有旧刻《西溪丛语》，甚完全清爽。余曰：“是必鵷鸣馆刻本也。”属为取阅，果然，实胜向来所有之本。奈遭俗子评点，瑜不掩瑕，余以难得，故卒收之。易以家刻书三种。今而后钞刻皆为善本，可无遗憾。癸未四月十有三日莞夫记。”

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卷

明马调元刻本。收藏有“少华王氏植槐堂藏书记”朱方长印。

履斋示儿编二十三卷

旧钞本。孙奕自序，后有“新安如韦馆藏板”七字。文登于氏藏书。

程氏演繁露十六卷

题新安程大昌著，明族裔孙煦校刻。后有淳熙辛丑陈应行跋。以瞿氏《书目》证之，是嘉靖辛亥刻本。

野客丛书三十卷附野老记闻一卷

明嘉靖王敦祥重刊本。每卷末有“长洲吴曜书、黄周贤等刻”两行。版心亦有黄周贤、严椿等刻工姓名。

老学庵笔记十卷

过录黄尧圃校影宋本。

顾氏手跋曰：“是书毛子晋刊入《放翁集》行于世。予尝见陆敕先用钞本所校，斧季又用影宋本校，后五卷用残宋槧本校。第七后半卷及第八卷改补诸处，每与此刻合。今以朱笔圈别识之。盖此刻所据乃善本也。独是子晋跋语，首称向刻《稗海》函中，宜用此为底本，而相出入如此。敕先、斧季又绝不及此刻一语，皆所未解也。乾隆六十年岁次乙卯正月十一日润莘顾广圻校毕记。”

“陆敕先用宋本校汲古毛氏所刊。今归小读书堆。取勘此刻，颇多与宋本合者，实胜毛本远甚。已悉圈其旁为识。其他异同，仍载如右。乙卯四月润莘又记。”

“影宋本止有后五卷，毛斧季所据亦然，岂宋槧已不全耶？丁巳七月假得，较一过如右。至其本有评语，极浅陋可笑，而未题唐子畏名。兹悉削不录，恐阅者仍惑焉。爰并识之。二十八日灯下顾广圻书。”

黄氏手跋曰：“客岁假余友顾润莘校本《老学庵笔记》，至今春始为传录。渠所校为明会稽商潜本，是《稗海》中所梓。今此本亦同。然其中已有改正处，未识是翻板否？嘉庆元年中澣一日校毕书。棘人黄丕烈。”

“东城顾五痴家有影宋钞本，余曾见之。惜需值太昂，未之得也。

拟假一对以著异同。尧圃氏。”

“嘉庆乙亥重阅。此已越二十年矣。计跋此尚在昭明巷老屋。今一再迁徙，家中人唯老妻犹是旧有者。长妇及幼儿、幼女、三孙皆后添矣。长儿已亡，长女、次女已嫁。时事变迁，可感也夫。”

“乙亥四月八日，用新收影宋本校前五卷，并钩勒行款，补润革、陆敕先校本所未及也。余检此书后五卷，影宋本虽残帙亦未易得，故但借校之。其前五卷未尝有影宋本也。今忽得影宋十卷，可喜之至，手校如左。其后五卷，亲见影宋本，故不复校也。复翁。”

“余收得影宋本，友人张切庵借校，并此校本同借去，五月初一抵莫还。余适有事，未及检点。明晨坐百宋一廛中，检点及此，此切庵于临校时代为譬勘，并补后五卷所未校者。如此借书，获益胜于还书一瓠多矣。惜切庵古道，不即手录于上，谨以夹签识之，尤慎之至也。甘止醒人记。”

“一至四影宋本张切庵补校十条，五至七张切庵补校十条。按：毛斧季校残末本，后半卷影宋如之，讹谬独少。甚哉宋刻之可宝，而影宋之亦可信也。八至十张切庵补校九条。通十卷，共补校二十九条。甘止醒人手录，乙亥五月二日。”

“此书临校宋本，迄今已阅二十年，境界非昔日可比，而所见之书，又有影宋本全部出为余补昔日所不逮。余之享书福不可谓不厚，岂此一事果足折诸福，使余窘迫无地耶。家计日拙，虽迫于男婚女嫁衣长食阔之累，前跋已略及之。而此书新载甘止醒人之号，盖余取渊明诗意写照所云。甘止醒人者，渊明诗《止酒》一章廿句，句有“甘止”字，止酒则醒矣。故余戏取以为自号云。余自甲寅丁外艰，乙卯遭火灾，遂至日蹙一日。然此二十年来，纵极支绌，不如今日之甚。究由余之梦梦也，今醒矣，殆将自止矣。渊明诗本有“甘止”字，而今适当二十年，非前定耶。甘止醒人之自号，抑何巧耶。乙亥端阳前四日复翁丕烈记。”

宾退录十卷

明影宋钞本。空格悉依旧式，上下二册，长卷头康熙戊戌蒋西圃手

摹，赵与时分书自序，刘燕庭补钞宝祐五年陈宗礼序。书签亦燕庭自题分书。收藏有“西圃蒋氏”白文方印、“璜川吴氏收藏图书”朱文方印、“清爱堂”盘龙朱文长印、“嘉荫簪藏书印”朱文方印、“文正曾孙刘印”“喜海”白文两方印、“燕庭藏书”朱文长方印。

识遗十卷

传钞本。后有方山吴岫跋。

吴氏手跋曰：“考据确而精，论断审而正，记载书绝高品。故宋元著述家多援引之。然传写日久，间有亥豕脱亡，欲借一善本订之。徧索邺侯于海内，无有应也。故岫藏于篋中六十年余，亦不轻以借人。隆庆改元三祀姑苏方山吴岫识。”

困学纪闻二十卷

元刊本。泰定二年弟子袁清容序，而刻于庆元路学，距先生没时三十年，为是书初刻。有牟应龙前序，陆晋之后序。前有“伯厚父”“深宁居士”墨图记二方，卷末有“孙厚孙宁孙校正庆元路儒学学正胡禾监刊”二行。每半页十行，每行十八字。黑口。

敬斋古今甌十二卷

旧钞足本。张月霄、黄尧圃旧藏。末有“万历庚子春三月之吉武林书室蒋德盛刊行”两行。收藏有“士礼居藏”朱文分书长印、“秘册”朱文小长印、“张印月霄”朱文方印、“爱日精庐藏书”朱文方印、“闽中韬园陈氏珍藏”朱文长印。

黄氏手跋曰：“是编十二卷，为李氏原书，首尾完具。中十一十二两卷合为一卷，疑一阙其末、一阙其首而并为一也。本土礼居黄氏藏书。今归卿环仙馆，洵罕见之秘籍也。夏月假读，从殿本对勘一过，增多二百五十五条。其殿本有而此本阙者六十余条。以此推之，知当日《大典》所收亦即此本也。使全书果如本传所记为四十卷，则《大典》中零篇，不应于十二卷中已得十之八，而于三十卷仅得十之一二也。盖四十卷之数，或“十四”二字之倒，抑先时未定之目，迨后有所删并，其定本则为十二，未可知也。旧钞讹字衍脱颇多，随手改定，尚多未尽云。

道光丁亥闰月下澣拙经叟黄廷鉴识。”

九曜斋笔记不分卷

东吴惠栋定字撰。行书稿本，时有添注。移易处与《松崖笔记》每多互见。后有陈硕甫先生跋语。

右儒家

淮南鸿烈解二十八卷

明弘治辛酉芦泉刘绩刻，分卷与他本不同。后有识云：“据他书补数千字，改正数百字，删去百字。吾友沈子培以此为善本。”

明太祖御注道德经二卷

旧钞红格本。

广弘明集四十卷

明刻本。目录后有“径山寂照庵自刻万历辛亥岁冬十月识”二行。世所谓支那本也。

开元释教录二十卷

明支那本。

法藏碎金录五卷

明嘉靖刻本。版心有“晁氏宝文堂”五字。

佛祖通载十卷

明刊本。后有万历六年吴郡西寿山沙门性月跋。

右道家

唐摭言十五卷

旧钞本。新城王氏藏书。

李氏手跋曰：“乾隆庚申五月，购得新城王氏家藏钞本《唐摭言》十五卷。按：阮亭《蚕尾集》有《摭言》足本，跋云“《摭言》十五卷，

从朱竹垞翰林借钞。视《稗海》所刻多十之五。唐人说部流传至今者绝少，此书洎《封氏闻见记》皆秘本可贵重。当有好事者共表章之”云云。当即此本，名贤手泽，洵可宝也。庚申季秋易安园主人李文驹手识。

“又按阮亭《居易录》云：‘唐王定保《摭言》足本凡十五卷，宋嘉定中柯山郑昉刻于宜春。竹垞有写本，予戊辰辛未于京师两借观之。今会稽商氏刻仅十之一耳。商刻《稗海》多得之浙东钮石溪家云’。今是本末卷尾有前字，确系所钞宋本无疑。驹又识。

按：蒋凝赋四句播于人口，或称之曰“白头花钿满面，不若徐妃半妆”。今本均作“白头”。昔人以白头本为贵，此尚是白头本也。

春明退朝录三卷挥尘录二卷合订一册

旧钞本。吴枚庵藏书。《退朝录》卷末有“乾隆辛丑日短至馆生陶绪翰钞讫”。《挥尘录》上卷末有“乾隆辛丑冬至后一日馆生陶绪翰录竟”，下卷末有“腊月初五日馆生陶绪翰写竟”。收藏有“枚庵流览所及”朱文方印，后有“张印绍仁”白文、“学安”朱文两方印、“切庵”朱文大方印。

张氏手跋曰：“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三卷、杨诚斋《挥尘录》二卷，乃宋人说部中之攸关掌故者。向编刻于《百川学海》，别鲜善本流传。此册为吴枚庵所录，惜钞写不工，舛讹颇多。今霉雨之后，检曝藏书，因阅一过，改正数十字。意有疑者记之，俟更考焉。嘉庆戊辰夏日长洲张绍仁书于静寄东轩。”

春明退朝录三卷

明翻宋《百川》本。

尘史三卷

明钞本。士礼居藏书。

黄氏手跋曰：“嘉庆癸酉初秋，书友从任姓易得旧钞《尘史》。适过余斋，因得寓目。取校旧藏钦仲阳本，知此为最先之本。钦仲阳本行款与此同，且字之误者多合，后经义门何先生手校。斧季毛公曾借诸何氏，题曰‘钦仲阳本’。今藏余家，故亦题为‘钦仲阳本’也。此本钞

手在钦本先，无旧时藏书家图记。卷端任文田印，即今所自出者。卷上阙一页，影钦本补钞。卷尾剝去一行，以旧纸黏补，想是原有。‘庆元云云’一行，亦据钦本填补。秋雨凉生，手订此本，舛误阙失而志其颠末如此。中元后三日复翁丕烈识”。

“是书虽非毛氏所云何元朗本及伊舅氏仲木本，然古色古香，溢于楮墨，想不在二本下也。余既得钦仲阳本，又得此，可云双美。因重装与钦本并储。以来自任氏塾中，称曰‘任文田本’云。癸酉中秋前十二日复翁识。”

“己卯秋获见何元朗本，手校其异同于钦仲阳本。因索直昂，未之得也。盖为小读书堆藏本，而今已散出矣。复翁。”

卷首有“任印文田”白文方印，每卷有《士礼居藏分书》朱文长印、“平江黄氏藏书”朱文大方印。卷末有“织帘过眼”朱文小方印、“兰园”白文小印。

冷斋夜话十卷

竹虚斋钞本。收藏有“鄂□”白文、“襄勤伯章”朱文两方印。

石林燕语十卷

明正德元年监察御史杨武刊于大梁，后有跋，提行空格，皆依旧式，盖源出自宋本。每半页八行，行十六字。黑口。此书以此本为最善，收藏有“谦牧堂藏书记”白文、“谦牧堂书画记”朱文两方印。

石林燕语详校本十卷

仁和胡珽合杨氏、商氏两刻本，何义门、沈文起两校本及《四库全书考证》、李心传《旧闻证误》诸书校改，印入《琳琅秘室丛书》第五集。荃孙旋得《儒学警悟》中《石林燕语辨复》，合诸书校之，差为完善。

石林燕语辨十卷

宋汪应辰撰。《四库》未著录，从《儒学警悟》中钞出。《儒学警悟》太学俞鼎臣同上舍兄经编。第六卷阙首二页，目二百条。《吹网录》以为二百二条，衍“二”字。

寓简十卷

旧钞本。吴长元藏书。收藏有“翰林院”官印，又有“州来氏藏书记”朱文长印、“寒山一片石”朱文长方印、“延陵季子”白文方印、“寄云楼”朱文长印。

校订虱新话十五卷

原书四卷。从明秣陵张可大校本钞出，荃孙假十五卷本校之，钞手甚旧。首行“新刊潮溪先生扞虱新话卷之一”。分四十五类，每类若干条。题上注“前话”“后话”，题下注数目，立法类又多一条，较为完整。

梁谿漫志十卷

旧影钞宋嘉泰本。后有国史院牒并官衔，每半页十行，每行十九字。收藏有“翰林院”官印。

鹤林玉露十六卷

明南台旧刻本。万历七年，莆田林大黼补二十余版。至三十七年，余姚孙鑛属赵元茂、赵如白逐字刊正。又得宋活字六卷本，摭二十条为补遗。鑛白为之跋。收藏有“润州蒋氏藏书”朱文长印。

鹤林玉露十八卷

日本翻明万历甲申刊本。分天地人三集，每集六卷，均有景纶小序。每卷序次亦不同，有明黄贞序。

佩韦斋辑闻四卷

旧钞本。收藏有“读易楼秘籍印”朱文长印、“笥邨珍藏”朱文方印、“梯香阁藏”朱文长方印。

齐东野语二十卷

元刊本。前有至元辛卯戴表元序。每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字。中多补版。

志雅堂杂钞一卷

旧钞本。字画俊雅，蓝笔点句，朱笔校改，亦甚工整。收藏有“润州蒋氏藏书”朱文长印、“孙尔准读书记”朱文方印、“爱闲居士”朱文小方印、“桐轩主人藏书印”朱文长印。

澄怀录二卷

此书李顺德师钞以贻潘文勤师者，原出吴枚庵本。

吴氏手跋曰：“右借吾邱芝本，付陶生智录出。千狐腋，百衲琴，无穷山水，尽入奚囊夹袋中矣。丙申六月十八日，枚庵漫士吴翌凤记。”

庶斋老学丛谈三卷

明钱功甫手钞本。士礼居藏书。收藏有“钱氏书印”朱文方印、“润州蒋氏藏书”朱文长方印、“桐轩主人藏书印”朱文、“爱闲居士”朱文两印、“黄金散尽为藏书”白文、“歙西长塘鲍氏知不足斋藏书”朱文两方印。后有“老屋三间赐书万卷”“歙西长塘鲍氏知不足斋藏书印”两朱文大方印、“海宁陈鱣观”朱文长印、“孙尔准读书记”朱文方印。

黄氏手跋曰：“嘉庆庚午仲冬，用五砚楼所储携李曹氏旧钞本校一过。似此较胜。然曹本亦有一二可取处，以朱笔注于上方云。凡行间朱笔所校系旧有。复翁。”

右杂家

齐民要术十卷

明胡震亨刻本。前人过录校语。

右农家

新镌朱批武经七书十卷

明闵昭明伯弢刻本。评点朱色套印。

七书者，《孙》《吴》《司马法》《李卫公问对》《尉繚子》《三略》《六韬》。《六韬》分四卷，余各一卷。王文成批点本有徐光启、孙元化、胡宗宪、茅震东四序。收藏有“韦氏藏书”白文、“子牧子”朱文两方印。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十卷

旧钞本。篇首有李筌自序，及“入内内侍高班内班品臣赵承信”等

衔名。卷一有《总序》及《天无阴阳》《地无险易》两篇。又多卷九、卷十两卷。惟卷三阙《将军篇》，卷五阙“搜山烧草”以下。卷六《阵图》亦不完，仍与张刻同也。收藏有“锡纶私印”朱文方印。

武经总要前集二十一卷后集二十一卷

明弘治甲子西安守马思进刊本。前集“制度”十六卷。“边防”五卷。后集“□□”十五卷，“古候”六卷。有仁宗御制序。后附《行军须知》二卷。《百战奇法》二卷。有陕西布政使李赞序。

右兵家

大唐开元占经一百二十卷

蓝格旧钞本。海昌杨芸士藏书，后归郁泰峰收藏。有“杨印文荪”白文、“芸士”朱文两方印、“海宁杨芸士藏书印”朱文大方印、“泰峰所藏善本”朱文方印。

观象玩占五十卷

绵纸旧钞本。有朱笔校改。

乾象通鉴一百卷

宋河间免解进士李季奉敕编。此书见《玉海》，《四库》未著录，阮文达亦未进呈。孙渊如先生得旧本传钞，海内始知有是书。孙先生两跋，见莫氏《经眼录》。李季在秦会之十客内，《老学庵笔记》言为会之设醮，其人盖深于阴阳术数之学者。

宋宝祐四年会天历一卷

据宋本过录，并录朱彝尊、钱大昕、李锐、沈钦裴、蔡复午、陈杰、金望欣七跋。收藏有“吴兴丁氏迟云楼藏书记”朱文方印、“宝书藏本”朱文长印。

右天文家

太玄经十卷

万玉堂刻本。每半页八行，每行十七字。版心有“万玉堂”三字。白口。是明人翻宋刻最善之书，莫氏《经眼录》以为宋刻，误矣。

类编历法通书大全九卷

临江宋鲁珍辉山《通书》，金谿何士泰景祥《历法》，鳌峰熊宗立道轩类编。明刊本，黑口。内有至元二十四年台司造《春牛图》，又有台司出行吉日，可为元刻证据。

右术数家

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二十四卷

明翻宋本。题启玄子次注，林亿、孙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孙兆重改误。字画极精。每半页十行，每行大字二十，小字三十。收藏有“检亭藏书”朱文方印、“退思居记”白文方印、“时于此中得少佳趣”朱文长方印。

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十二卷

明影写宋本。纸墨极旧。后有王安石等衔名，末有“正统六年十有五日常川俞氏永惠堂家藏”一行。收藏有“汪士钟字春霆号喂园书画印”朱文长方印。

难经本义二卷

元许昌滑寿著。四明吕复校正明刻本。寿字伯仁，许州襄城人，见《明史·方技传》。有揭口序、张翥序、刘仁本序、自序，均在至正间。

医心方三十卷

日本行针博士康赖撰。安政六年刊本。所采多唐以前书。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三十卷

明覆金刊本，宋曹孝忠撰。金泰和甲子晦明轩本。明成化戊子翻

刻。有孝忠序、金麻革序、刘祁跋、宇文虚中跋。每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

伤寒百问六卷

日本称觥堂刻本。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十八卷

日本尚书堂刻本。是书分别三因归一治，其说出《金匱要略》。收藏有“淮浦草堂”朱文长印、“分蕉绿窗观赏”朱文方印、“随轩”朱文小方印。随轩，上海徐渭仁也。

卫生宝鉴二十四卷补遗一卷

元罗天益撰。明刻本。天益字谦甫，藁城人。谦甫受业东垣，盖升其堂而入其室者。是书采摭李氏精研之论，益以论诸家之说，而以己意隐括之，实为医家至要之书。卷一至三曰《药误永鉴》，卷四至二十曰《名方类集》，卷二十一曰《药类法象》，卷二十二至二十四曰《医验纪述》。后附《补遗》一卷，述外感伤寒等证，疑韩夷重刊时增葺。前有胡广序、蒋用文序，后有韩夷公达跋、杨荣后序。收藏有“太谷孙氏家藏”朱文方印。

医林集要十卷

明王玺撰。明刻本。玺官甘肃总兵官平羌将军，手集古今良方加以论断。始于中风，终于小儿，凡十卷。成化壬寅春德堂刊，首有玺自序。

玉机微义五十卷

明正统庚申陈有戒刊本。首有莫士安序、纯自序，均作于洪武丙子。又杨士奇序，后有王暹序。《四库》所收永州本刻于嘉靖庚寅，则在此本之后矣。首页有“清川氏图书记”朱文长印，盖日本收藏家也。

全幼心鉴八卷

明寇平撰。成化四年刻本。平字衡美，选古方效于今日者，汇成一书。前列察病法，后具用药方，名曰《全幼心鉴》。牌子一小儿捧一牌，曰“玉峰书堂”四字。

摄生众妙方十一卷

明隆庆三年衡府刊本。首有衡王序，后有马崇儒跋。

先醒斋广笔记四卷

明刻本。是编初名《先醒斋笔记》，乃长兴丁元荐取缪希雍所用之方，哀为一编。希雍又增益群方，兼采本草常用之药，增至四百余品。又增入伤寒温病时疫治法，故曰“广笔记”。首有丁元荐序。癸丑春日则万历四十一年也。收藏有“黄”字朱文方印、“保如”二字朱文方印、“宝儒藏书印信”朱文方印。

新刊铜人针灸经七卷

明山西平阳府刊本。篇首小引云：“夫疗病简易之法，必须针灸。欲明针灸之方者，必须注意于是经。是经也，得之秘传。治病则有受病之源，指穴则有定穴之法。效验神速。亟绣梓与众共之。”

新编西方子明堂灸经八卷

西方子无考，与《铜人针灸经》合刻。《四库》著录即是本也。

右医家（著者注：意即以上为医家）

艺风藏书记卷三

地理第四

元丰九域志十卷

旧钞本。绵纸黑格，纸墨极旧。取冯集梧校刊本核之，如“西京河南府·土贡”注，冯本：“蜜蜡各一百斤阙器二百事”，此本作“磁器”。县一十三注，冯本“复以孟州汜水县隶府省入阙县为行阙口，又省寿安、颍阳、阙口□氏阙口王阙县为镇”。此本作“省入河阴县为镇，又省寿安、颍阳、伊阙、候氏、偃师、王屋县为镇”，无阙字。《青州北海郡·县六》注，冯本“建隆三年以阙”，此本作“北海县置北海军”。

“密州高密郡”，冯本“安邱”下空白七行。此本一行“望莒、州西南一百九十里，三乡。有阙”。二行“高密、州东北一百二十里，二乡，有阙”，三行“上齐州济南兴德军节度”，四行“地理、阙”，五行“户口、阙”，六行“土贡、阙”，七行“县五、阙”，八行“紧历城、阙”，九行“紧禹城、阙”，十行“中章丘、阙”，十一行：“中临邑、阙”，十二行，“沂州琅邪郡防御”，“常州毗陵郡江阴”注，冯本“利城、茶林、石橘三镇”，此本作“石桥”，均胜于冯本。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收藏有“李文藻印”白文、“素伯”朱文两方印，又有“知不足斋藏书”一小木记。

新编方輿胜览七十卷

宋刊本。题“建安祝穆和父编”。前有嘉熙己亥良月望日新安吕午序，后有嘉熙己亥仲冬既望穆自跋。此书元明无刊本，所存皆宋刻。每半页七行，行大字十四字，小字双行，每行二十三字。每页左线外标篇名。收藏有“宋印兰挥”朱文、“己丑进士”白文两方印。

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之书二十四卷

明刊本。是书明洪武十七年官修，系府州县于星分野，名为天文，实则地志。于元明间分并割隶最为详备。官版，大字，每半页八行，每行二十字。

大明一统志九十卷

明慎独斋小字本。是书义例一仍《元一统志》之旧，书名亦沿用之。官刊大字本外，刊本极多。此慎独斋刻中版小字，字甚精致。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大小字同。

广輿图二卷

明刊本。元临川朱思本。本初原图，明吉水罗洪先念庵增纂。首卷作輿地总图一，作两直隶十三布政使图十六。次卷作九边图十一，作洮河、松潘、虔镇、麻阳诸边图五，作黄河图三，漕河图三，海运图二，作朝鲜、朔漠、安南、西域图四。又附日本图一，琉球图一，华夷总图一。图后有《建置表》，亦颇详核。

地图综要四册

明天都吴学俨敬胜、海阳朱绍本支百同编辑，朗润堂刊本。分总卷、内卷、外卷三目。总卷总图通论。内卷两京十三布政使子目。先建置总数，次分里图，次分界图，次各府州县志，次总论，次事宜。外卷长江会源分里图、江防全图、漕河分里图、黄河分里图、海防全图、日本岛夷入寇要害图、海运分里图、九边图、四夷图。明人防边防海经画极为周密，于此可见其概。首页有“程襄之”白文方印。

乾道临安志残本三卷

旧钞本。从宋本出，行款悉依旧式，每半页九行，每行二十字。收藏有“师竹斋图书记”朱文方印、“汪喜孙孟慈印”白文长方印、“小字阿买”朱文方印。

淳熙三山志四十二卷

传钞本。

程氏手跋曰：“道光屠维作谿之岁孟陬月，据刘燕庭方伯所藏明人写本对勘一过。乌程程庆余记于吴中寓斋。”

雍录十卷

明嘉靖壬辰知西安府事汝南李经刊本。盖与宋敏求《长安志》、李好文《长安志图》同刻于关中者。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一字。收藏有“古潭州袁卧雪庐藏书记”白文大方印。

新安志十卷

明人影宋写本。楮墨极旧。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收藏有“朱彝尊锡鬯甫”白文方印、“某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朱文长方印。

附录旧式

大宋孝宗乾道二年赐进士第中议大夫知鄂州军府事新安罗愿编

嘉定赤城志四十卷

明台州守谢铎重刊宋嘉定本。时在弘治丁巳。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收藏有“抱经堂藏书印”朱文长方印、“汉唐斋”白文小长方印。后有“道光癸巳岁武原马氏汉唐斋收藏书籍楷书”长印。阙。

海盐澉水志二卷

明《盐邑志林》本。澉浦见《水经》，唐时置镇，宋时设官。绍定三年监镇税罗叔韶属常棠为《志》八卷，凡十五门，词简事核。棠自序，又叔韶序。此本为明黄罔樊维城汇编《盐邑志林》并为二卷。书非旧第，特尚无删节耳。

淳祐临安志六卷

宋施谔撰。鲍渌饮得“山川”“城府”二门钞本，钱塘丁氏刻之。此旧钞本，“寺观”“祠庙”二门亦六卷。按：《胡书农学士年谱》云自《大典》钞出《施志》，编为十六卷。或从胡本传钞者。第止六卷，尚不及其半。岂胡谱衍十字欤？

重修琴川志十五卷

此书罕见。从常熟故家传钞。

玉峰志三卷续志一卷

传钞本，源出自宋。

附衔名一页

《玉峰志》，淳祐辛亥五月修，壬子二月刊于县学。预纂修著书氏名于后：

迪功郎平江府昆山县尉俞炜

迪功郎平江府昆山县主簿施丙

迪功郎平江府昆山县丞卜稷

迪功郎平江府昆山县主簿吴坚

承事郎平江府昆山县主管劝农公事兼主管运河堤岸搜捉铜钱下海出界专一点检围田事兼弓手寨兵军正项公泽

重修昆陵志三十卷

宋史能之撰《昆陵志》。三山邹补之创修，成十二卷，见《宋艺文志》及《书录解题》。迨淳祐辛丑，宋慈为常州守，能之为武进尉，始增修旧志。越三十年，咸淳四禩，能之为守，再修补而刊行之。元延祐丁巳重刻。藏书家罕见著录。乾隆间赵味辛先生先后购获钞本。仅阙第

十一卷第一页及二十卷《词翰》。嘉庆庚辰刊于亦有生斋，乱后版亦散佚。此旧钞本。尝用赵刻校一过，颇有是正。第十三卷《土产类》亦阙一页，赵先生所未详也。收藏有“黄钧私印”朱文小方印。

寿昌乘一册

撰人无考。辑本。宋嘉定十四年，升武昌县为武昌军，以与鄂州节镇之名相类。因玉宝寿昌之文，锡名曰“寿昌军”。“乘”取《晋乘》之义。此书久佚。今从《大典》二千二百七十三四“昌”字下辑出，止三十四页，略存大概。其贡士名额止于宝祐三年，盖修于是时。

河南志残本四卷

撰人无考。传钞本。首京城，次周城古迹，次后汉城阙古迹，次魏城阙古迹，次晋城阙古迹，次后魏城阙古迹，次隋城阙古迹，次唐城阙古迹，次宋城阙古迹。盖首册也。徐星伯先生从《大典》录出。开卷云“河南府路罗城”，知为元人所撰。而宫殿坊市，直录宋敏求之书，间加改窜。星伯先生撰《唐两京城市考·东京》即此书为底本。虽断珪零璧，亦当宝贵矣。

至元嘉禾志三十二卷

旧钞校本。有至元戊子郭晦、唐天麟二序。

冯氏手跋曰：“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季秋，假得此本，与家藏京中钞本互校。人事牵扰，至戊申五月始校毕而归之。其中尚有阙误，未知将来更得旧本重校否？孟亭居士识。”

管氏手跋曰：“《至元嘉禾志》刊本流传绝少。近日钞藏者脱误甚多。张丈叔未、钱丈味根假戴氏、章氏、沈氏诸本互为补校，已称善本。甲午秋，学师钱深庐夫子属为校，临阅三月而竣。今年客生沐茂才别下斋，偶读藏书。凡古志专集中于是书有所补益者，复得数十条。因注明原书，以正诸本所未及。并为生沐另校一本，以待付梓。然其中尚多阙误，是非明眼者莫能厘定焉。始信校书之非易云。时道光己亥十二月既望，海昌管庭芬芷湘氏记。”

唐氏手跋曰：“咸丰戊午二月，以冯孟亭先生钞本勘一过。其标京

本者，其家所藏京中钞本也。十四日北窗下记。端甫。”

李氏手跋曰：“是书丙辰秋日端甫茂才得之吾禾书友者，脱讹几不可读。丁巳正月，假硖石蒋氏别下斋藏本，属为传录，校正诸条。两本审对，复得异同数百字。二月十二读毕，因并录管君芷湘原跋于卷末。梅会里实贫李文杏志于海昌陈氏之双清草堂。”

昆山郡志六卷

传钞本。朱笔用黄尧圃藏本校，墨笔用陈子准藏本校。

黄氏手跋曰：“《昆山郡志》元杨谔撰。铁崖先生序云二十二卷。今本‘风俗’起，至‘异事’止，十六门，共六卷。盖不全本也。竹汀詹事跋云‘首尾完具，疑铁崖所见为别本’，其说非也。《地志》首重建置、沿革、輿图、城池、乡都、桥梁、水利、户口、赋役、学校、官署、坛庙、祠宇诸大目，今皆阙而不载。且杨叙中明有昆山自县升州，户版地利日增，赋税甲天下。州县庸田水道利害所在而志中绝不及之，其非完帙可知。此第全书之后六卷。科第、名宦、人物、杂记诸卷尚存，足备宋元事。是邦之掌故，不以残阙忽之可耳。道光甲申春正上元日琴溪拙叟黄廷鉴记。”

又六卷

旧钞本。嘉兴劳氏藏书。有“丹铅精舍”朱文长方印。

类编长安志十卷

影写元刊本。首载贾餗序、王利用序、天骧自序。此书取宋氏《志》，稍增金元间沿革故事，而分门条系之，故曰“类编”。旧为张蓉镜藏书，字画雅洁，图绘精整，钞本之至佳者。每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二字。收藏有“胡印季堂”白文、“云坡”朱文两大方印，“赵秉冲印”白文、“湘南”朱文两方印，“蓉镜私印”“琴川张氏”“小琅环仙馆藏书在在有神物护持”朱文三方印，“尧夫张燮”朱文、“癸丑词臣”白文两小方印。

齐乘六卷

明嘉靖甲子青州守杜思重刊元本。有思自序、苏天爵序、男潜跋。

每半页八行，每行十五字。收藏有“红豆斋收藏”朱文长方印。

无锡县志四卷

传钞本。元王仁辅撰。《无锡金匱志·流寓传》：“王仁辅字文友，巩昌人，久寓邑中。两娶皆吴产，故多知吴中山水人物。创修县志，成二十八卷。卒于梅里之只陀村。《千顷堂书目》有元王仁辅《无锡县志》二十卷；《提要》因卷数不符，疑此书为明人所撰。”按：此书近编四卷。第一卷为爵里，第二卷为山川，第三卷为事物，分上、下二子卷，第四卷为词章，亦分上、中、下三子卷。子卷中又分小类二十一，合之正与二十八数合。而小类有不成卷者。疑撰书目时据县志修入，卷数未核实也。至书名以州为县，系后人所追改。

苏州府志五十卷

旧钞本。独山莫氏藏书。

明初顺天府志残本七卷

传钞本。明初洪武年修《北平图经》，《永乐大典》卷八千四百二十“平”字韵载之。《日下旧闻》亦间引用。荃孙修府志时搜之《大典》。“平”字韵已失去。忽见此书，七卷至十四卷，上下均阙，亟为录存。按：洪武元年改大都路总管府为北平府，隶山东行中书省。二年，置北平行省。永乐元年改为顺天府。此必修于永乐初年，故得编入《大典》。《文渊阁书目》未载。署字号《北平图志》，疑即《北平图经》。万历癸巳谢杰修府志序言亦未及此书，可见明时即罕有知之者矣。

辽志一册

明薛□撰。明钞本。分图考、沿革、山川、海道、赋役、徭役、边防、兵政、马政、风俗、方物、外夷、古迹。弘治戊申董越序，嘉靖乙丑王之诰序。

顺天府志六卷

明刊本。谢杰、沈应文前后任顺天府尹，以是成书。府丞谭希思、县丞张元芳同编次。六纲，三十七目。

泸州志残本二卷

撰人无考。从《永乐大典》二千二百一十七卷录出，叙述谨严，考订翔实，惜佚其下二卷。

江阴县志十五卷

明刊本。知县赵锦、邑人张袞撰，唐顺之序。分建置、提封、风俗、食货、学校、秩祀、河防、兵卫、禄秩、官师、选举、列传、外记、外传、遗文十五门。

桂林风土记一卷

明谢氏小草斋钞本。闽中谢在杭旧物也。卷首有“翰林院”官印，即《四库》底本。

永嘉闻见录四卷

国朝孙同元辑。稿本。同元字雨人，仁和人，颐谷侍御之子。为永嘉教谕七载，手辑此编，考证详明，洵为善本。有劳季言附考。首有“劳参军”小长印，朱文，“劳格季言”小联珠印，朱白文。末有“庚辰”长印，朱文。

直隶河渠书一百二卷

此书荃孙就手稿詮次补足，缺卷取诸《畿辅安澜志》。王履泰删去夹注，大字皆原文也。

国朝戴震撰。稿本。乾隆戊子方恪敏公观承总督直隶，延东原先生于莲花池撰次。是书首卫河七卷，次漳水十一卷，次滏水三卷，次大陆泽五卷，次宁晋泊一卷，次虢沱河八卷，次东西淀二十一卷，内唐河三卷，沙河一卷，滋河一卷，府河五卷，易水五卷，涞河一卷，清河五卷。次永定河十六卷，内桑乾河四卷。次白河十九卷，内白河八卷，潮河二卷，榆河四卷，大通河五卷。次蓟运河九卷，次陡河一卷，次滦河一卷。内热河。诸水源流，古今迁变，孰异孰同，为利为害，擘肌分理，考镜具备。按：此书创之于赵东潜，成一百三十二卷，名曰《直隶河渠水利书》。东原为删润存一百零二卷，书名去“水利”二字，详《经韵楼集》。后吴江王履泰攘窃此书进呈，易名《畿辅安澜志》。仁宗

嘉为有用之书，赏以同知，发北河效用，仍命武英殿刊行。然履泰不学无术，删繁就简，全去夹注，遂令考订不明。不如原稿完善多矣。阙永定河。

黑鞑事略一卷

宋徐霆撰。旧钞本。专纪元代塞外制度、风俗，语皆翔实，与传闻者不同。

姚氏手跋曰：“是编为故太史王懋中氏家藏。余近于其弟上舍君处借录。秋日苦短，继之焚膏始讫。同志者当谅余衷云。嘉靖丁巳秋九月望夜，句吴茶梦道人姚咨识于华秋馆之寒绿轩。”

蒙鞑备录一卷

宋孟珙撰。与前书合订一册，又附李大谅《征蒙记》。

蛮书十卷

卢抱经先生手校钞本。

南岳总胜集三卷

校宋本。宋刊，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前阙图六页，后阙《隐逸传》及《叙古跋》共四页。从徐梧生户部假得，校于嘉庆壬戌唐陶山刻本上。余见《艺风读书记》。

东国史略六卷

善耕堂顾氏钞本。每页阑外小耳“善耕顾氏文房”六字，卷末有“顾肇声读书记”一印，朱文，黄堯圃跋。

黄氏手跋曰：“此钞本《东国史略》六卷，善耕顾氏书也。蛀蚀损字，虽黏补，无可填字。适吴谢堂氏书散出，余拣其尤者二种，此书却与焉。因用朱笔照本校其异，以墨笔填其蠹痕。工未毕辄止。以书非所急，且校讎颇难，贮诸篋中久矣。日来昼长无事，时扰倦魔，偶取出半之。吴本首有赵清常跋，谓录于燕京冯沧洲仲纓家，必是旧本。今校其字于顾本上，此又可以顾本参吴本，取未尽善处也。嘉庆癸酉五月二十有三日，黄丕烈书。时身衣薄絺，几忘为夏至节。故能烧烛挥毫，不致蚊蚋交集。并记。”

诸蕃志二卷

此书从《大典》四千二百六十二“蕃”字韵辑出。一刻于《函海》，再刻于《学津讨原》，均遗其自序。又上卷志国，下卷志物。张本“志国”二字亦遗去矣。

“《禹贡》载‘岛夷卉服，厥篚织贝’，蛮夷通货于中国古矣。繇汉而后，贡珍不绝。至唐，市舶有使，招徕懋迁之道，自是益广。国朝列圣相传，以仁俭为宝，声教所暨，累译奉琛。于是置官于泉广，以司互市，盖欲宽民力而助国朝，其与贵异物穷侈心者乌可同日而语。汝适被命此来，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牀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间其志，则无有焉。乃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名曰《诸蕃志》。海外环水而国者以万数。南金、象犀、珠香、玳瑁、珍异之产，市于中国者，大略见于此矣。噫！山海有经，博物有志。一物不知，君子所耻。是志之作，良有以夫。宝庆元年九月日朝散大夫提举福建路市舶赵汝适序。”

职方外纪六卷

明天启癸亥刊本。李之藻、叶向高、杨廷筠序之。地图皆折叠。守山阁佚去三序，图亦平列矣。

艺风藏书记卷四

史学第五

史记一百三十卷

明翻宋本。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合刻。首《索隐》二序，次《集解》序并注，次唐张守节《正义》序，次《正义·论例》《谥法解》，次目录，次《补史记序》，次《补史记》。书前有三家序，而中只《集解》《索隐》两家。字画古雅。每半页十四行，每行二十五

字。有“丰城游明大升校正”一行。游明，正统九年举人，景泰二年进士。官福建提学僉事。《读书杂志》曾引之收藏。有“王印履吉”朱文方印。

史记一百三十卷

明秦藩刊本。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合刻。有嘉靖十三年秦藩鉴抑道人序。以《明史·诸王表》考之，乃定王惟焯也。又有嘉靖庚戌秦藩允中道人序，乃宣王怀塈也。以千文为次，自“天”至“往”，凡二十册，每卷有“史若干字，注若干字”两行。《甘泉乡人稿》云版式与震泽王氏同，而秦藩为胜。后济南黄臣跋，此本脱。

汉书一百二十卷

明正统翻刻宋淳化本。首行“高纪第一上”，双行注“师古曰”云云。空一格题“班固”。又空一格，题“汉书一”。次行低六格，题“秘书监上护军琅邪县开国子颜师古注”。与瞿氏《书目》景祐本同。版心每页有“正统八年刊”五字，鱼尾上注“大字若干小字若干”。下有刻工姓名，末页有“右奉淳化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提旨校定刊正”两行。黄尧圃以此本为最善。

汉书一百二十卷

明嘉靖丁酉广东崇正书院刊本。首行“高帝纪第一上”，双行注“师古曰”云云。空四格题“汉书一”。次行低三格题“正议大夫行秘书少监琅邪县开国子颜师古注”。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护页有“康熙壬子居江宁。十月初八日在书铺廊，未时偶遇，即得藏之”。下押“温印闻口”白文小方印、“良伯”朱文小圆印。收藏有“果亲王藏书图记”朱文长方印、“寓有庵陈氏藏书私记”、“鬻及借人为不孝”朱文两大方印。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

明正统刻本。版心每页有“正统十年刊”五字。阙列传第一至第五，钞配。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

明崇正书院刊本。题字印章与《汉书》同。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

明汪文盛刊本。

三国志六十五卷

明万历丙申祭酒冯梦祯、司业黄汝良刊。每半页十二行，行二十三字。与单行宋本《吴志》行款一律，其所自出欤？

周书五十卷

宋刊明修本。大题在下，小题在上。每半页九行，每行十七字。严铁桥云：“《贺兰祥传》较今本多六十余字。”此本之可贵如此。

北史一百卷

元大德信州路刊本。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首行大题在下，版心有“信州路儒学刊”“信州象山刊”“象山书院刊”“道一书院刊”“稼轩书院刊”“蓝山书院刊”“玉山县学刊”“弋阳县学刊”“贵溪学刊”“上饶学刊”等字。徐元叹藏本。前有蓝笔一行“崇祯己卯四月十四靛笔再勘，钞补首二卷，及红蓝二笔勘过”，皆元叹先生手迹。

徐氏手跋曰：“此书尚有南监本，系至正年信州路刊刻。糊突脱败，几不可读。嘉靖元年增补十分之一，新陈错杂，日就刊落。秀水冯梦祯为祭酒，复用全刻，其功甚大。然与《廿一史》兼行，不能独购。波家贫，难致全书。从坊间觅得此书，后阙《魏纪》之二，中有阙落亦不少。辄往亲故家借来钞录，劣得疏通。阅自天启乙丑岁暮，卒业于丙寅四月初十日。奔走事故，废学日多，动淹时序，有愧古人。徐波识。”

新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宋刊本。本纪表志题“翰林学士兼龙图阁朝散大夫给事中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判秘阁臣欧阳修奉敕撰”，列传题“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朝请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充集贤殿修撰臣宋祁奉敕撰”。大题在下，每半页十行，每行十九字。白口。目后有牌子，云“建安魏仲立宅刊行，士大夫幸详察之”行书两行，是南宋闽本。惟英宗以上讳

阙维谨，英宗以下不避，从北宋本出也。收藏有“项氏万卷堂图籍印”朱文长方印、“毛褒华父”连珠小印、“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白文方印。每卷有“汪印士钟”白文、“闾源真赏”朱文两印。汲古阁旧装《艺芸书舍宋元书目》内有此书。

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元大德刊本。题衔行数字均与前书同，只黑口为异，而字迹潦草，不如宋刻远矣。中有正德八年补刻者。

旧唐书二百卷

明刊本。首行题“监修国史推诚守节保运功臣，特进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上柱国谯国公，食邑五千户，食实封四百户，臣刘昫等奉敕修”。次行“皇明奉敕提督南畿学政，山西道监察御史余姚闻人詮校刻”。三行“苏州学儒学训导门人嘉兴沈桐同校”。有文徵明、杨循吉序，及詮自序。收藏有“安乐堂藏书记”朱文长印、“吴江陈燮叔理氏印”朱文方印。

五代史记七十四卷

宋刻本。每半页十二行，每行二十一、二、三、四字不等，白口。每页下注一字，似是刻工之姓。行字极密，刻画清挺，宋刻之至精者。杨惺吾得之日本，辗转归余。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

明成化庚子翻刻元本。前有至正五年中书右丞相阿鲁图、左丞相别儿怯不花、前右丞相脱脱等《进〈宋史〉表》。目录后有校勘臣彭衡暨丁士恒十人姓名。黑口，补板白口。有年号。前有明成化十六年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御史桂阳朱英序，后有跋，阙末页，不知何人。然瞿陆《书目》均收此书，不言后跋，想均失去。

辽史一百六十卷

元刊本。首卷有至正三年三月十四日、三月二十八日圣旨两道，又脱脱等《进〈辽史〉表》，修史官员、都总裁、总裁官、纂修官、提调官及校勘诸衔名。每页二十行，每行二十一字。

版心列刊工姓名。

元史二百十卷

明洪武刊本。首有洪武二年八月十一日李善长《进〈元史〉表》《凡例》《目录》、次宋濂《记》。黑口。徐星伯先生藏书，朱笔通体点过。

右正史

逸周书十卷

明嘉靖癸卯四明章槩刻本。前有元至正黄阶误作玠。序，后有槩跋。按：顾润菴曾跋云“《周书》刻本类脱‘王会解中卜人’至‘钟牛’二十行，至正甲午本之一页”，此尚是全璧。其余佳处，亦每与元本合，洵称善本。首页有“翰林院”官印，书衣有木记“乾隆三十八年十二月江苏巡抚萨载送到《汲冢周书》一部，计书一本”。

战国策校注十卷

明万历辛巳张一鲲刻本。附张文忠居正、陆文裕深批评。有王篆序、鲲自序。

吴越春秋六卷

明吴琯刊本。

说苑二十卷

明仿宋刻本。用杨氏海源阁宋本校一过，行字相同，偶有不同，用朱笔勾勒，脱文亦摹全。杨氏本见《士礼居题跋》。

右古史

汉纪三十卷

明正德庚辰翟汝扬刊本。前有何景明序、吕柟序，收藏有“存省堂书画印”朱文长印、“稟斋”朱文方印。

汉纪三十卷后汉纪三十卷

明嘉靖黄省曾刊本。

大唐创业起居注二卷

旧钞本。士礼居藏书。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

明万历甲戌李栻重刊本。有栻自序。

三朝北盟会编二百五十卷

明钞蓝格本。前人以朱笔校勘，点画甚精。

皇宋十朝网要二十五卷

宋眉山李梈编。梈字季永，文简公焘次子，绍熙元年进士。理宗朝历官同知枢密使、四川安抚使。此书纪太祖至高宗朝事迹，虽采摭从略，亦有出文简所撰《长编》之外者，可资考证。诸家书目，尠有著录，仅见《玉海》《文渊阁书目》、焦氏《经籍志》中。此旧钞本，辛卯得之沪肆。

宋季三朝政要六卷

旧钞本。目录后有“皇庆壬子”四字。

明太祖皇帝实录二百卷

明钞蓝格本。存四十九卷至一百七十九卷。

明穆宗皇帝实录七十卷

明钞蓝格本。收藏有“慕斋鉴定”朱文圆印、“宛平王氏家藏”白文方印。阙。

续资治通鉴六十四卷

明王宗沐撰。隆庆辛未刻本。有梁梦龙序。

崇祯新政要略十卷

不知撰人姓氏，传钞本。自天启七年十月十五日至崇祯元年三月十一日止，逐日编录邸报。例云：“撮取要领，接续成文。凡有关系，并无遗漏。”后附吏部大小九卿科道访单。顺德师手跋曰：“《崇祯新政纪略》十卷”不知何人所辑。以天启七年之间，举朝皆阉党矣。所云“参魏忠

贤劾崔呈秀者”，皆阉党图自救之术，非恶魏崔也。此时虽尧舜在斧戣，亦不过瓦釜雷鸣而已，有何可采之章疏？则辑此书者，亦阉党也。故每于暗右逆案之语，辄评黄圈点之。独倪鸿宝世界，已清方隅。未化一疏，但录旨意而不加甄录，则此书之无一可取，亦可知矣。恶直丑正，实繁有徒。以崇祯暗愚之君，身当其际，又孰知正味哉。宜乎转去转远，卒以杜勋、曹化淳为心腹而后已。死病无良医，诎不信耶？置此于坐间，若妖魅呈形，不用照妖之镜矣。光绪十九年七月望前一日一痴道人。”《棟亭书目》有此书。

右编年

东观奏记一卷

旧钞本。收藏有“半树斋戈氏藏书之印”朱文方印、“戈小莲秘籍”朱文长印。

东都事略一百三十卷

旧影写宋本。今通行五松室刊本，系影眉山程舍人本刊。而原本收藏家亦间有之。独此本另出一宋刻，《世家》内多沈贵妃一篇。谢表前有“呈进《东都事略》奉提行俞旨谢表”两行。目录、分卷亦不同。

路史前纪九卷后纪十三卷国名纪九卷发挥五卷余论十卷

明万历辛亥乔可传寄寄斋刊本。前有朱之蕃序、可传自序，后有李维桢序。

契丹国志十七卷

旧钞本。收藏有“孔继涵印”白文、“荭谷”朱文两方印、“有香”朱文小方印。

孔氏手跋曰：“乾隆己亥三月二十八日钞于微波榭。”

华阳国志十卷

明影写宋刊本。卷十上、中、下三卷俱全。《汉中士女传》亦多出赞词数句，系钱叔宝手钞。校勘精详，字迹古劲。每一层卷，墨香横溢，

为云自在龕钞本书中铭心绝品。每卷有“钱谷手钞”朱文小方印，又有“卖衣买书志亦迂，爱护不异随侯珠。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鬻之何其愚”长方木印。收藏有“中吴钱氏收藏印”白文长方印、“蕉林藏书”朱文方印。题签亦真定相国手书。

华阳国志十卷

嘉庆甲戌廖运使寅刻本。顾千里校最为精善，荃孙又先后取何义门、顾秋碧、顾尚之校本合校，颇有佳处。

何氏手跋曰：“钞本《华阳国志》十二卷，初阅见其讹谬甚多，疑非善本。及以新刻对校，乃知后来妄加窜定，有使人笑来者。此本尚存旧刻之真也。康熙己丑焯记。”

大业杂记一卷

钞校本。唐杜宝撰。此书从《续谈助》钞出，非完帙。有“蓉镜珍藏”朱文方印、“虞山张氏”朱文大方印。

五代史补一卷

旧钞本。首页有“小山堂书画印”朱文方印。

南唐书三十卷

明嘉靖庚戌顾汝达万玉楼翻宋本。东海晋明姚昭跋。提行避讳均从宋刻，字画亦极秀雅。向见友人藏是书，诧为宋版，果得高价售去。盖贾人撤去姚跋，伪刻末页。增入一牌子“宝庆丙戌王伯大刊”两行，而首页“万玉楼”白文方印与此本同，终难掩作伪之迹也。每卷有“中吴钱氏收藏印”朱文长方印、“蒹葭堂藏书印”朱文大长方印、“衡门璠玗堂图书”朱文腰圆印、“衡门璠玗堂秘籍不许人留外”朱文大方印。

蜀梼杌二卷

旧钞本。有明焦弱侯跋。较《函海》《艺海珠尘》两刻字少讹脱。惟自序中所举，如张扶、冯涓、张士乔、段融、蒲禹卿、张云、陈及田淳之徒。今只有蒲禹卿《对策》。又云如髯须、肥遗、远望、绩长、禹粮、蒲骚之类。今只存肥遗一事。髯须见《海录碎事》所引，非完书也。鲍氏知不足斋藏本。

鲍氏手跋曰：“乾隆戊戌端午后一日，雨窗从金元宰书客借得钞本，补录前后序二篇，并校勘一过。其足本俟更求之。”

伪齐录二卷附刘豫事迹一卷

旧钞本。绿格本，阑外前有“治朴学斋著录”六字，后有“星伯拙书”四字。卷中朱笔点校，皆星伯先生手迹。

平巢事迹考一卷

旧钞本。收藏有“茶坡所藏”朱文长方印。

汝南遗事四卷

传钞本。

皇元圣武亲征录一卷

张穆、何秋涛校本。

征缅甸一卷

严修能元照手钞本。

严氏手跋曰：“嘉庆八年癸亥中元前三日，归安芳椒堂主人严元照修能氏手录。”

招捕总录一卷

严修能元照手钞本。

严氏手跋曰：“嘉庆八年七月十三日录起，十六日午后竣工。共四十一页。修能严元照识于芳椒堂。”“行款悉遵旧钞本。修能又识。”

此两种《四库》未著录。阮文达公得旧钞本进呈，推为罕觐秘籍。实则从《经世大典》钞出，全文均在《元文类》中。《文类》卷四十至四十二，采《大典·序录》，分治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五门。《政典·征伐第一》平宋、高丽、日本、安南、云南、建都、缅甸、占城、海外诸番、爪哇、平倒喇沙十一子目。今仅录《征缅甸》。《招捕第二》则全录焉，并非秘籍。惟《大典》久佚。今取元本《文类》互相校讎，各有佳处。疑前人钞自《大典》，非出于《文类》也。

右别史

魏郑公谏录五卷增编一卷

旧钞本。题款“唐尚书吏部琅琊王方庆集。明尚书户部山东清吏司主事句吴华云校”。增编题“明吴郡学生彭年增编”。

李相国论事六卷

旧钞本。仁和劳季言校。又据《名臣奏议》补《论回纥》一篇。收藏有“平父”朱文长方印，后有“丹铅精舍”朱文长方印。

劳氏手跋曰：“道光壬寅六月传钞文澜阁本。丙午，据《历代名臣奏议》校。《奏议》所采仅二十六条，去取不甚当。字句间亦窜改删节，然此本舛脱，藉以校正。又卷三百四十一“论回纥请昏”一条，似即七卷之阙篇，今钞录附后。余如卷百三十一、百八十七、二百六十三、三百一十一六条，系采之《纲目》，卷二百九十一条则采自《新书·本传》。又二百二上言德宗朝事，末七十余字亦与《纲目》文同。有据以补此本之阙者，误矣。是书成于大中五年，距相国之没二十余年。传闻异辞，不无失实。适值李卫公迁谪之后，故于赵公不无贬词。如论郑纲事，按其年月，悉皆参错。而宋景文反据以补二传，宜其为吴廷珍所纠也。三月丙辰朔劳格季言父识。”

绍陶录二卷

旧钞本。鲍渌饮藏书。有“老屋三间赐书万卷”“歙西长塘鲍氏知不足斋藏书印”两朱文方印。陆存斋刻。缺十一页。

韩忠献公遗事一卷

旧钞本。行书。收藏有“不夜于氏藏书印”白文长方印。

范文正公言行拾遗录四卷附吴中遗事一卷洛阳志一卷义庄规矩一卷西夏堡寨一卷褒贤录一卷

元刊本。有天历庚午八世孙国儒识。收藏有“古盐马氏”朱文、“笏斋珍藏之印”朱文两方印。

苏长公外纪十卷

明王世贞撰。豫章璩之璞校定。燕石斋刊本，万历乙未重订，序后有牌子。

元功垂范三卷

纪平南王尚可喜事迹。自东江至撤藩为二卷，尹源进撰。又自停止迁移至归葬海城为一卷，张允格续撰。此书颇不易得。

高士传三卷

玄晏先生皇甫谧撰。五岳山人黄省曾颂。嘉靖癸巳刊本，有省曾自序。

重刊宋朝南渡十将传十卷

章颖撰。传钞本。

敬乡录十四卷

传钞阁本。吾友章小雅故物。

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旧影元钞本。目录后有“元统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书堂”一行。武英殿本所脱卷二两页、卷九一页、卷十一六页均在，可称善本。每半页十三行，每行二十三字。收藏有“沧苇”朱文大方印、“佛桑仙馆”白文方印、“琅环福地张氏藏”白文方印、“泰峰所得善本”朱文方印。

李氏手跋曰：“武英殿聚珍本颇有讹舛，以此本校之，二卷夺二页，九卷夺一页，十一卷夺六页。余小小夺落百数，讹丰亦百数。聚珍本已称难得，此本更为仅见之书。得好事者重依此本刊之以流传于世，则古书之幸也。芙川其有意乎？道光十五年正月李兆洛识。”

沈氏手跋曰：“海上藏书家为吾门郁君泰峰最富。道光辛丑秋七月，英吉利再陷定海。江苏戒严，余奉大府檄，协理上海，防堵局务。因出是书，属校读。时作辍，凡五阅月而三终卷。共得钞误二百六十九字，疑者三十六字，阙脱者三十五字。用朱识于每册尾。其字从俗写者，即标注每页之上，而原校之字不与焉。余学识浅陋，舟中又未携书，故于地理人名概未深考。校既毕，将以还泰峰。因识其缘起于简首，并以自

愧云。时道光癸卯四月上旬，桐乡沈炳垣手书于吴门寓馆。”

国朝名臣事略十五卷

旧写本。亦有“元统乙亥余志安刊于勤有书堂”一行。而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一字，与前书不同，疑非影写。收藏有“武林汪泰玄家藏典籍”朱文方印。“孙辅元读书”白文方印、“汪襄”白文方印、“检亭”朱文长方印、“卢橘山房”朱文长印。荃孙校讹并摹脱页补足。

万柳溪边旧话一卷

旧钞本。收藏有“惠栋之印”白文、“定宇”朱文两方印、“红豆书屋”朱文长方印、“戈小莲秘籍印”朱文长印、“臣印戈载”白文、“顺卿”朱文小联珠印。

明名臣琬琰录二十四卷后录二十二卷续录八卷

明弘治乙丑刊本。有张诩序。《四库》以《后录》为《续灵》，而阙《续录》八卷。此本尚全，稍有钞配，然亦颇难得矣。

近代名臣言行录十卷

明徐咸撰。嘉靖辛未自序，即刻于是时。

复社姓氏录一卷

明吴应箕撰，旧钞本。

朱氏手跋曰：“雍正十年桂秋，借徐伯吹表伯刻本《复社姓氏录》。邓尉山朱时渭手录竟并书。”

崇祯忠节录三十二卷

高承延撰。男佑钅订补旧钞本。阙卷十一。

苏颖滨年谱一卷

宋左奉议郎赐绯鱼袋孙汝听编。传钞《永乐大典》本。

曾公遗录三卷

宋曾布日记。自元符二年三月起，三年四月止。自《大典》“录”字韵钞出。

入蜀记六卷

影钞宋本。每半页十行，每行十七字。

西使记一卷

旧钞本。前有“翰林院”官印。

右传记

陆宣公奏议二十二卷

明万历九年知庐州府事叶逢春刻本。

陆宣公制诰十卷奏草七卷奏议七卷

明刻本。收藏有“山民”朱文方印。

李忠定公奏议六十九卷

明泰和萧泮刻本。收藏有“景氏珍藏”朱文方印。

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

明经厂刻本。

右奏议

元丰官志四卷

景写宋刊本。此书记宋代官制，《四库》未收，《宋艺文志》亦未见。善字行，出汉王房。

序云：“朝廷设官，所以董率百工。上至公孤，下而司牧，各修职事。自周官以降，秦汉因之，或加沿革。六朝迨唐、五季，损益不同。本朝自开宝三年，太祖命宰相赵普定百官品秩，删去繁冗，正其阶级，题为《开宝官志》。神祖元丰四年，又命两府再加详定，亦有增删，凡若干员，题名《元丰官志》。善沛偶于竹溪先生家拜录以归，藏之笥篋，以明祖宗宪章焉。时淳熙二年上巳日崇安赵善沛题。”

麟台故事三卷

景写宋本。并抚黄尧圃跋。

黄氏手跋曰：“是书为景宋旧钞，惜止三卷，盖不全本也。然实世间

稀有之书，与聚珍本不同。其《才令篇》叙次多异。初，书贾携来，手校一过，乃知其佳。旋因议价未谐，复携去。后知归于西畝草堂，遂倩余友胡苇洲转假，景录一册，积想顿慰。还书之日，谨志数语，以拜嘉惠。”

宋中兴百官题名二卷

宋何异撰。今存《学士院题名》一卷。钱辛楣先生钞自《大典》。中兴、行在、杂买务、杂卖场、提辖官、中兴东官官寮题名。荃孙亦钞自《大典》。均起建炎，讫嘉定。

三公年表一卷

不知何人所撰。起建炎，讫淳祐。亦钞于《大典》。

宋宰辅编年录二十卷

明万历丁巳吕邦耀刻本。宋刻久失，邦耀得钞本于焦弱侯处。中阙二卷，足以周藩所藏残本复刊。卷中多原阙字，想底本已漫漶。收藏有“王印士祯”白文方印。

续宋宰辅编年录二十六卷

自刻本。徐录自建隆戊午，讫嘉定乙亥。续录自嘉定丙子，讫德祐乙亥。体例一准前编。

秘书监志十一卷

旧钞本。收藏有“王印宗治”白文方印。

通典二百卷

明刻本。大字密行，每页有刻工姓名。其源似出于宋本。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六字。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二十卷乙集二十卷

旧钞本。一蓝格纸影宋钞本，提行空格均依原式，惜止存乙集卷四、卷五、卷六、卷八之半、卷九至卷十九之半，共十四全卷又两半卷。佳处极多，并辑出聚珍本逸文五篇。收藏有“吴印任臣”白文、“志伊”朱文两方印。一绿格纸钞本，纸色亦旧。存甲集二十卷，朱笔校甚细。目录后有“丙午闰七月二十日借钱氏萃古斋钞本校对”朱笔两

行。收藏有“秋清逸士”小长方印。荃孙合两本为一，又照聚珍本钞足，并假刘燕庭钞本通校过。

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

明慎独斋刻本。目录后有牌子云“皇明正德戊寅慎独精舍刊行”两行。

明会典二百二十八卷

明万历官刊本。首弘治十五年御制序，次正德四年御制序，次万历十五年御制序，次弘治、正德、嘉靖、万历四朝诏谕，又纂辑诸书，又开报文册衙门，又弘治间凡例，又嘉靖间续纂凡例，又万历四年张居正等请敕礼部编辑事例送馆劄子，又万历年间重修凡例，又万历十五年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等进书表文，又重修诸臣衔名。按《四库》著录为弘治本。《提要》云：“万历本世不甚传。”而《天禄琳琅》所收，即此本是。搜罗未到，遽诋为世不甚传也。

政和御制冠礼十卷五礼新仪二百二十卷

旧钞本。收藏有“春草闲房”白文方印、“士钟私印”“汪氏腴园”两朱文方印。

大金集礼四十卷

旧钞本。不题撰人名氏。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明昌六年礼部尚书张玮等所进。”原阙第二十六卷、第三十三卷、第六卷《悼平皇后篇》、第二十七卷《立仗篇》，第十二卷至十七卷俱有脱文。广雅刻是书，荃孙细校一过。中有脱衍错出及小注误入正文处，成《校勘记》一卷。收藏有“破车钱氏藏书”，盖钱冬士家物也。

大金德运图说一卷

传钞《大典》本。

宋元马政二卷

旧钞本。宋马政采自《会要》，出《永乐大典》一万一千六百七十二。元马政采自《经世大典》，出《永乐大典》一万一千六百七十八。徐星伯先生汇钞。

右经政

名公增修标注隋书详节二十卷

宋刊巾箱本。题“唐特进魏徵撰”，“徵”阙末笔。前有世系图、地理图。首页阑外记“高祖一”。卷一眉上标事由。每年及“史臣曰”皆白文。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字。收藏有“海虞鲍氏珍藏金石书画之章”朱文长印。

史通二十卷

嘉靖乙未陆深刻本。有彭汝寔、李佶序，杨名跋。《读书敏求记》著录。收藏有“旧雨草堂”朱文方印。

唐鉴二十四卷

影写宋刊本。首题“东莱先生音注唐鉴卷之一”。次行“承议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骑都尉赐绯鱼袋臣范祖禹撰”。三行“朝奉郎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兼权礼部郎官臣吕祖谦注”。钞写精致，朱笔校勘亦谨飭。无跋，无藏印。

涉史随笔一卷

旧钞本。首有“翰林院”官印，盖《四库》底本。收藏有“吴焯之印”白文、“尺帛”朱文两方印、“流传勿损污”小长方印。

旧闻证误二卷

影写宋刊本。次行题“秀崑李心传伯微甫”。是书《宋艺文志》作十五卷，久佚。馆臣从《大典》搜辑百四十条，析为四卷。此从钱唐丁氏藏宋刻影写，惜只存首二卷，然已有五十余条。全书果出，必不止百四十条也。《旧闻》顶格。《证误》低一格，书名亦有漏落者。护页题云“庚申八月上辛吴郡周承明、林若抚、倪驯之、盛子九同过徐君韶斋中，鉴定宋版。”

旧闻证误四卷

从阁本传钞精校，远胜《函海》刻本。

宋纪受终考三卷

明刻本。前有自序，后有弘治辛亥戴铎跋。黑口。士礼居藏书，收藏有“太原叔子藏书记”白文长方印、“子孙保之”朱文、“莲泾珍藏”白文两小方印。

黄氏手跋曰：“余所收王莲泾家书最多，皆得于其族孙处，则犹是家藏未散本也。就中有《孝慈堂书目》，分门编类序次颇详。以之求莲泾所藏，虽久散之本，按其册数之多寡，纸色之黄白，几如析符之复合。可知书籍贵有流源，非漫言藏弃已也。顷郡中程姓书散，肆中购去，邀余观之。见此册有“莲泾珍藏”印，又有“太原叔子藏书记”印，遂携归取证。《书目》所云“緜纸衬订一册”依然在目。余与莲泾之缘，抑何深耶。爰著数语于卷端。嘉庆乙未冬十一月晦日，堯圃黄丕烈识。”

主要参考文献

基本文献：

《艺风老人年谱》 北京大学出版社。

《艺风老人日记》 北京大学出版社。

《艺风堂文集》。

《艺风堂文续集》，宣统二年艺风堂刻本。

《艺风金石文字目》，光绪三十二年（1906）刊本。

《艺风堂文漫存》，民国间艺风堂刻本。

《续碑传集》。

《艺风老人自订年谱》 后子缪禄保、缪僧保识。

光绪：《顺天府志》。

《龙龕手鑑》。

缪荃孙：《云自在龕随笔》。

叶德辉：《书林清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叶德辉：《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论著：

夏孙桐：《缪艺风先生行状》。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 华中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

翁同龢：《瓶庐诗稿》，民国八年刻本。

赵尔巽:《清史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柳曾符、柳佳:《劬堂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王钟翰:《清史补考》，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柳诒徵:《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

李希泌，张椒华:《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

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

顾廷龙:《艺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张之洞:《书目答问》，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年版。

张碧惠:《晚清藏书家缪荃孙研究》，（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1991年版。

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版。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广义·版本编》，齐鲁书社，1991年版。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齐鲁书社1990年版。

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

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任继愈:《中国藏书楼》，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柳曾符、柳定生:《柳诒徵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卞孝萱、唐文权:《民国人物碑传集》，团结出版社，1995年版。

柳诒徵:《首都志》，南京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影印，1985年版。